

怡和世纪

第44期·2020年11月

先贤精神
各领风骚



S\$10

ISSN 24249661



24249661

006

巍巍高山
滔滔江水

048

经历三个不同历史
时期的工人党

070

新加坡国族打造
和国民意识培育



长城 中国汇款

ZHONGGUO REMITTANCE



“ 一 站 式 ” 无 忧 服 务

特快
安心

历史照片





怡和**点击**

004 先贤精神 各领风骚 / 谢声远

目录

怡和世纪
第44期 • 2020年11月

专题

- 006 巍巍高山 滔滔江水 / 邹文学
- 011 竭智·尽力·挥泪 / 连奇
- 017 熟悉又陌生的角落 / 佟暖
- 020 李光前、陈六使与华社争取公民权运动 / 李奕志
- 025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 柳舜

四脚亭

- 030 推进民主进程 朝野尚须努力 / 河洛郎
- 032 三届全国大选是一道三角习题 / 刘安安
- 033 几年才打一叉的期待 / 范里
- 034 官与管 / 彭飞
- 035 大选与统计学 / 岳缘

视角

- 037 派阀政治依然掌控日本 / 黄彬华
- 039 中美之争, 争什么? / 林少彬
- 042 5G通讯系统的意义 / 刘家明
- 044 新冠疫情下的中美经济 / 陈定远

钩沉

- 048 经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党 / 林恩和
- 059 马绍尔访华之旅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 / 林恩和

编务咨询 Editorial Consultants

陈抗 林任君 赖涯桥
周维介 卓南生 王昌伟

编务统筹 Editorial Coordinators

林清如 陆锦坤

主编 Chief Editor

谢声远

副主编 Deputy Editor

林少彬

编辑委员 Editors

谢声群 邹文学 杜国俊 林恩和

思维

- 070 新加坡国族打造和国民意识培育 / 廖建裕
076 文明冲突的逻辑反思 / 胡林生
078 在多元社会里对“肤色盲”的随想 / 叶鹏飞

书架

- 080 走入曹雪芹的艺术殿堂 / 雨石
082 书中自有黄金“粮” / 林言
086 白崇禧的“台湾岁月” / 何华

拾贝

- 090 “大丈夫”成功攀登富士山 / 黄彬华
093 泰戈尔的新马文缘 / 周维介
097 归 / 林臻

艺苑

- 098 南洋画派 / 姚梦桐
103 香雪遗事 / 陈弘庵
104 南洋竹枝词的演变与特色 / 郑爱强

看板

- 108 “希盟”政府终究承认不了独中统考 / 穗昕
110 二十不惑 三十而已 / 张骊
112 俄罗斯首先注册冠病疫苗 / 卢丽珊
114 疫情背后的思维探讨 / 陈迎竹

天地

- 117 困疫四记 / 十渡
120 困疫写真 / 林少彬
122 樟木飘香 / 黄华

感言

- 124 回首来时路 / 邹文学

告别读者

- 128 珍重 再见 / 编委会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郑钧如

发行 Distributors

杨云仲 谢声群 何沁光

设计 Graphic Design

[舜] 设计工作室
SHUN Studio

出版 Publisher

怡和轩俱乐部

Ee Hoe Hean Club

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

Tel: 65-6224 2678 Fax: 65-6222 2745

Email: eeheohean@gmail.com

Website: www.eeheohean.org

印刷 Printer

Winson Press Pte Ltd

20 Bedok South Road, Singapore 469277

Tel: 65-6741 4511 Fax: 65-6741 40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刊文章仅代表作者或论者个人观点

MCI (P) 096/10/2020

先賢精神 各領風騷



狮城一角，怡和轩穿越大时代、大时空，邂逅同盟会、革命党人、工商巨擘、英国总督、广大民众、文教精英、反殖英雄（如尼赫鲁）等。她为受欺压和战火蹂躏的东方睡狮伸出了援手、号召抵抗来犯日寇，见证民族教育的播种和丰收，参与居住地的经济建设、争取华社公民权，不一而足。

这一切，离不开怡和轩先贤们的奉献和坚守。他们是资本家，曾经腰缠万贯，却在不同的时代、以各自的方式，为南洋、为马来亚和新加坡作出巨大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一开始，怡和轩便选对了方向，与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一道，三位一体，在关键历史时刻，团结广大民间组织和民众，惊涛拍岸，蔚为奇观。

于是，我们想起林推迁、林义顺、李俊承、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高德根、孙炳炎、陈共存等已故先贤，他们践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关心国事、伸张正义、不畏艰难、不说空话、办实事、兴教育的功业和精神，载入史册，令人敬仰！

今年是怡和轩成立125周年，在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她经历了殖民地的不公、法西斯战争的杀戮，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马来西亚的从天而降，新加坡共和国的诞生，沧海桑田，变迁不可谓不大，但怡和轩先贤精神，作为怡和轩乃至全社会的珍贵财富和优良传统，一以贯之，历久弥新！

本期系统介绍了怡和轩早期四位杰出人物，新马各界所熟知的陈

嘉庚、李光前、陈六使和孙炳炎。他们是先贤精神的缔造者、传承者和维护者。邹文学的《巍巍高山，滔滔江水》一文，凸显陈嘉庚雄才大略，艰苦奋斗，团结四方，引领社会，毁家兴学，造福后代的高风亮节，不愧为华社之脊梁，民众之灯塔，社会之骄傲！怡和轩已故会长高德根对他的评语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精神人格，将垂为后人典范楷模。”

李光前、陈六使二位，事业上深受其惠，精神上得其真传，李光前殚精竭虑，守护着风雨飘摇中的华文学府，特别是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华侨中学。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忧心忡忡说道：“今日真正之严重问题，乃整个华文教育生命之延续问题，以及合理发展问题。吾人欲问，世代久居于此，有事业于此之80万华人，母语教育能坐视其一日中断乎？”陈六使从现实需要出发，倡办海外绝无仅有的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为华校高中毕业生创造进一步升学的机会，为社会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才。李光前对南洋大学的创办如是道：“吾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学界对陈六使的赞誉是：“创办南洋大学，浩气长存；维护民族教育，功在千秋”。连奇的《李光前为多元教育作贡献》和佟暖的《陌生又熟悉的角落》两篇专题文章，从不同的视角，把我们带入两位先贤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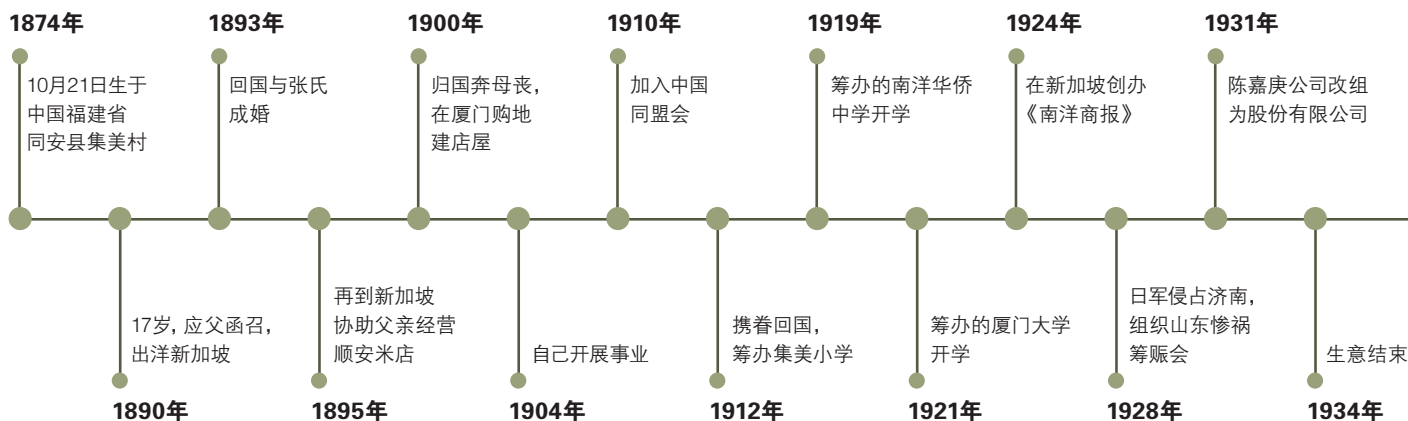
二战后李光前和陈六使领导华社争取公民权运动，历经十载，为二十余万华侨赢得新加坡公民的地

位。早在1947年12月，李光前已向殖民地政府提出，许多华侨已将新加坡视为永久的家乡，他们应该享有选举权。1955年8月，陈六使等受委起草一份争取公民权备忘录，并在随后殖民部大臣到达新加坡时，由中华总商会发动70多个团体约2千人到加冷机场和平请愿，把争取公民权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李奕志的《李光前、陈六使与华社争取公民权运动》，对两人的锲而不舍和无量功德有详尽的回溯。

随着陈六使卸任怡和轩主席，新加坡获得独立之后，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新常态下，孙炳炎成为任期最久（1966—2001）的怡和轩主席，后人评为“对怡和轩的贡献非凡，是先贤精神和怡和轩宗旨的忠实守卫者，怡和轩在他手中保住本色，守住底线”。柳舜在刚完成的力作《孙炳炎恪守的人生哲学》中，有进一步深入透彻的诠释。他写道：“心正，念旧，容人，孙炳炎在他的时代是个杰出的领袖，在未来是难得的一位模范人物。”

四位先贤的彪炳功绩，折射不同时期南洋社会的历史风貌和政治现实。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他们都是怡和轩历史进程中的奇葩，但是，怡和轩走到今天，与怡和轩人才辈出，红花绿叶交相辉映，先贤精神代代传承和发扬是分不开的。如今大环境彻底改变了，一花独放的存在已不存在，唯有寄望怡和轩百花齐放、春色满园，收获新的精彩！

作者为本刊主编



巍巍高山 滔滔江水

不朽的陈嘉庚精神



文：邹文学

陈嘉庚先生曾担任多届怡和轩总理，职位：1923-1927，1928-1930，1935-1941，1945-1948。怡和轩在他领导下，从一个只有百多名会员的小社团，跻身新加坡最重要的华人团体行列，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影响中国、新加坡以至东南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非政治组织。趁怡和轩创立125周年之际，回顾陈嘉庚的一生成就及其伟大精神，具有一定意义。

爱乡爱国 义不容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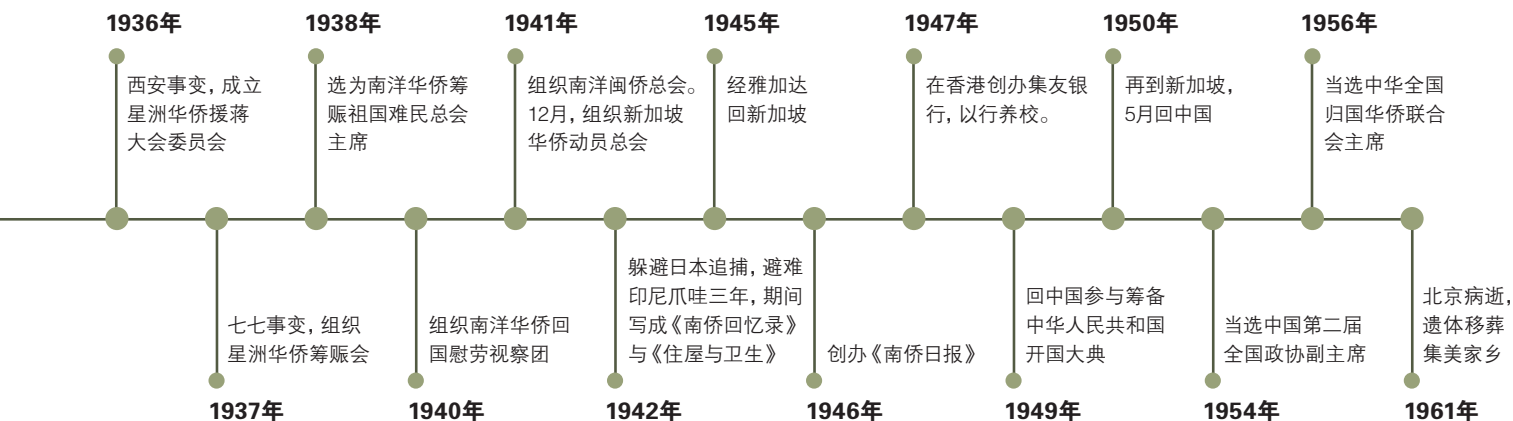
陈嘉庚生于1874年，16岁来新加坡谋生，60年后的1950年他回中国定居，1961年因皮肤癌复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爱乡爱民的实业家，除了打理自己的公司业务，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在公众事业上。

首先是关注福建老家人民的福利：1911年，他成为福建保安捐运动小组的

主席，支持推翻清朝统治和保护家乡治安；1922年，他联合闽南侨领，为反对闽南种植鸦片树苗向省长请愿；1938年，他发起售卖救国债券，支援福建建设；1940年10月，他在泉州考察期间致电福建省主席陈仪，要求撤销统制运输规定，因为这条例衍生的许多舞弊和苛捐杂税，已造成福建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陈仪不以为然，他再上书蒋介石，要求撤换省长，后者也不予理睬。1941年4月，他不畏阻挠，在新加坡召集南洋闽侨大会，通过议案，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调走陈仪。他在《南侨回忆录》里写道：“吾侨非如国内军阀官僚，竞争地盘权利，我等所争及要求者无他，只希望勿以残酷苛政特施于我闽人而已。”

其次是关心中国命运。他多次高举义旗，在新加坡成立多个筹赈组织，对苦难的中国同胞伸出援手。1928年，他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获得新加坡122个团体响



应，三个月内筹募善款30多万，救济遭日本军烧杀掳掠的山东难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新加坡华侨群起反对和谴责。8月17日，星华筹賑会在怡和轩召开大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很快筹募到1000多万元支持中国抗战；10月10日，南洋多个地区华侨纷纷响应，派出168名代表议决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賑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办事处也设在怡和轩，陈嘉庚出任主席。

自此，陈嘉庚成为新马、印尼和菲律宾乃至南洋其他各地的抗日活动总指挥，怡和轩无形中也成为救亡运动的司令部。1938和1939年，中国政府为了突破日本的封锁，努力促成滇缅公路通车，极需要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机械员支援，南侨总会于是先后安排九批机工3192人前往云南，而怡和轩也自然成为联络各方志士的枢纽。

嫉恶好善 无所畏惧

在1942年之前，陈嘉庚关心中国内政，批评贪官污吏尤其积极。他在《南侨回忆录》里有一则文字《为公为私可质天日》写道：“余自前年因西南异动而攻击陈济棠；以提倡和平卖国，攻击汪精卫；以阻碍军运，攻击宋子良；以舞弊国帑，攻击孔祥熙；以贪污误国，攻击吴铁城、蒋鼎文、高凌百；以野心祸国，攻击陈仪、徐学禹；以教育党化，攻击陈立夫；呜呼，此岂余之好事哉！若谓余反对国民党而发，则所敬仰如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马寅初、张发奎、卫立煌、胡宗南……，及其他等数十人，岂非国民党人乎！不过激浊扬清，属余代表

南侨职责，嫉恶好善，出令爱国天性，既不能圆滑敷衍，又不能同流合污，安能免于受人不满耶！”

战后，1946年9月7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通电美国总统等五位领袖，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不应该再援助蒋介石政府，而应协助促使内战终止。他的反蒋立场，首先遭到马六甲华社发难，继而迎来东南亚各地多个组织的一片谴责声浪，然而，秉持着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正义精神，他顶住各方压力，坚决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前途而请命。

从以上行动和文字记录，可知陈嘉庚实乃大义凛然的爱国爱民志士。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择善固执、敢怒敢言，全不顾及私利以及个人安危。

立足当地 站高望远

陈嘉庚立足新加坡，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关系公众利益的事，也是非常关心的。

1927年，本地好多闽商与当时的福建会馆董事，对兴学的态度都很冷漠，这导致陈嘉庚向薛中华领导的福建会馆董事会施压。根据杨进发所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的评价：“福建会馆内部组织之涣散，乃是催促改革要求之根本因素。一向崇尚组织的陈嘉庚，目睹福帮最高机构内充斥着上述种种弊端，乃感憎恶不已。他将福建会馆之改革、重组以及自己之出而领导，归因于会馆之趋于腐化。”在1929年举行的会员大会上，他获得众多闽商会员支持，接手主席职位，此后便大力开展会务改革。



1929年，陈嘉庚鉴于中华总商会的帮派运作性质不易改变，倡议成立中华会馆，希望能借此团结更广大的族群而不受限于籍贯和宗族的观念。在他的构想下，中华会馆将容纳举凡与华人

社会有关的社交、慈善、教育及文化等各类活动，也欢迎中华总商会设于馆内。不过，这项建议最终遭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否定。

1939年，陈嘉庚提议在中华体育会前面大草场兴建中华大会堂，以促进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的联系。他描述会堂可容纳千人，中国领事馆也可设于此，并设图书馆。他的这个构想，或许因为时局艰难不能付诸实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新加坡市区投弹。陈嘉庚在总督要求下，召开华侨总动员会。12月30日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全面支持抗日战争。后援会除了组织保卫团、劳工服务团和宣传队，也依众议成立星华义勇军。

1948年初，投降日军的原马来亚英军司令白思华，发表一份《关于马来亚战役之报告书》，把华侨援英抗日的事迹一笔抹杀不说，还诬指华侨乃趋势附炎之辈，“协助敌人多过协助我等”，全马华社顿时哗然。陈嘉庚于是以南侨总会名义提出抗议，并列事实据理力争。起初白思华不予理睬，他便发出警告：“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白思华最后才承认抗议的“内容乃千真万确”，并向华侨道歉。

由此可见，陈嘉庚是一位站得高看得远的社会领袖：眼光锐利、做事果断、敢创新、敢尝试、也敢冒险。

倾家兴学 启迪民智

陈嘉庚忧国忧民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开拓实业和兴学办校。他认为中国要强大，经济须发达，果真如此，振兴实业和普及教育便是两大途径。

1907年，他代父陈杞柏还清因生意失败欠下的款项后，便快马加鞭，看准时机发展自己的经济王国。他前后开办工厂三十多家，商店百余处，也经营航运。除了大规模开发黄梨园和橡胶园，他也建立加工厂和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拓销售网，聘工人数万，一度还成为世界著名橡胶产品供应商。

与此同时，从1906年开始，他便有计划地在居住地和家乡建校，全面发展新式国民教育。

他创办及资助的新加坡九所华文学校是：1906年道南学校、1912年爱同学校、1915年崇福女校、1918年南洋女校（南洋女中前身）、1919年华侨中学、1930年南洋女中、1938年南洋华侨水产及航海学校、1941年南侨女中（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及1946年的光华学校。此外，他也曾捐钱资助两所英文学校：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

陈嘉庚对故土乡民的爱怜，也反映在他持续捐出巨款，在集美兴建的八所学校和厦门大学。1913至1927年期间，他和弟弟陈敬贤在集美建立的学府包括：集美男小、女小、男师、男中、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和国学，学村里还设有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及幼稚园，统称“集美学校”。从1919年起，他也发起建立厦门大学，1921年开课时，半数学生是南洋华侨的子弟。

宁吃稀粥 不弃教育

陈嘉庚读书不多，只会讲闽南话，连华语都听不甚明白，却是一个具有眼光和睿智的民族教育家，他不但顾念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机会，也积极提倡女学，并格外重视师范和技术职业课程。后来，他还进一步办起大学，明知不易，还是情愿挑起这岂止千斤的重担。

有人作过统计，他在1904至1934年做生意的30年内，总共赚钱1900万元，捐助集美学校和厦大的款项便达800万元。

陈嘉庚倾全力办学，可从以下几个例子见诸一般：

1919年，正式成立陈嘉庚公司所办的律师文件里指明，南洋所有不动产，捐集美学校永久基金。1923年，他把在马来半岛柔佛州的4000亩大成胶园和陈嘉庚公司三分之一股权，捐给厦大基金。1929年，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程序文称，厦大与集美学校是公司最大股东。

到了1931年，他的生意失败，八大银行逼债，将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限制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援。这

时候，整个组织发生怠工现象，银行集团不得不要求陈嘉庚继续担任董事经理。陈嘉庚开出的条件是须付他月薪4000元，并在月底发薪时，直接汇款给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陈共存在1984年撰写的《我的伯父》一文里指出，4000元约等于八十年代的40万元。“我的伯父的人生观是尽量培养人家的子弟，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模范。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郑炳山著的《陈嘉庚与李光前经营企业和为人的比较》，有这么一段话：“在企业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的长子陈济民曾劝他减少逐月汇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陈嘉庚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

林孝胜著的《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这么说，1934年，陈嘉庚在生意上正式退场后，“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后悔毁家兴学。”他还这么勉励自己：“自

古英雄豪杰何尝不遇艰危落拓，况我乃一庸愚侨商，妄敢妄事怨咎。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耻辱。’”

陈嘉庚还不无感慨地说：“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境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这就是陈嘉庚的宽大胸襟和英雄气概。

他的挚友黄奕欢指出：“他的地位的形成，最初显然与他的财富有关系，随着他财富的丧失，他的威望与事功反而日隆一日，这与他的献身国事的精神与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

人在会所 心系社会

陈嘉庚是在1923年继任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37年开始，他更视俱乐部会所为家，在三楼有个卧室，工作起居，一律在此。

因业务关系与他较常在一起、排行第五的儿子陈国庆，在《我的父亲》一文里说：“他接掌怡和轩后，就在



欢迎尼赫鲁来访怡和轩

三楼设立一间小图书馆，购置了《四库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等书刊供会员阅览。他自己最喜欢读的书是《三国志》。”

林孝胜的文章也透露，他上午去了工厂，中午“回家或到怡和轩俱乐部用简单午膳，吃番薯粥。下午，他到总行办公。五时下班到怡和轩处理社会及教育事务。”

他的老友洪丝丝写道：陈老后来长期住怡和轩，整年难得回家一两次，相熟朋友调侃说他是怡和轩做和尚。1947年12月底，陈老的次子陈厥祥从香港搭乘轮船前往汕头途中被海盗绑票，“我从南侨报社的电报知道，就到怡和轩去告诉陈老。谈话前，我很担心他可能经受不住……他听了……虽然也皱一皱眉头，但接着就对我说起福建会馆办学的经费问题。……之后，他才考虑如何营救爱子的问题。”

怡和轩是陈嘉庚的强大实力地盘，是本地华社开展多项重大任务的大本营，因此它自然成为新马华社最具历史意义的团体。

陈嘉庚曾在这里接见多名中国重要人物：1929年，中国国民党重要领袖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和傅秉祥等来新，陈嘉庚便在怡和轩宴开五席招待，与会者包括林文庆、薛武院和林义顺等新加坡华社领导人物。1940年12月31日，他率考察团到中国10个月后回新，便是在怡和轩接见记者访谈华感想。1941年3月，国民政府驻新领事馆，为了阻止报纸刊登陈嘉庚在南侨总会大会上发表的批评讲话，竟唆使夜宿怡和轩的安南代表，乘夜盗取南侨总会印章盖印在发给报馆的假公文上。

放眼世界 支持正义

陈嘉庚也在回忆录上记载，1941年他是在怡和轩接电话，获知英国两艘战舰遭日本击沉。12月8日凌晨，他给日本军机的投弹吵醒，便是在怡和轩窗口看到不远处冒起的大火和浓烟。1945年10月7日，怡和轩同人在会馆召开欢迎会，祝贺他在印尼玛琅等地避难三年多后得以平安回来。不久，他也在怡和轩分别接见马来亚抗日军和柔南人民委员会的代表。

陈嘉庚同情弱小的侠义精神，也反映在他对被帝国主义蹂躏的弱小民族展开的反殖斗争的大力声援。1946年3月，他接受邀请，参加了本地印度社群发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尼赫鲁访新欢迎会筹委会”。18日他

亲到机场迎接，19日出席群众大会。当晚，他还在怡和轩设宴款待尼赫鲁；他的欢迎词是这么说的：“尼赫鲁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豪，而本会之欢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伟大人格。盖先生平生受尽艰难困苦，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民谋幸福……”

1947年2月4日及7日，陈嘉庚在怡和轩召开两场新加坡华侨大会，抗议荷兰军人在印尼巨港大规模屠杀华人，并商议行动计划。他痛斥荷兰：“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何不自量乃尔！”并提出“全南洋华侨一致行动，对荷兰实行经济绝交”的方案，赢得全华侨社会的拥护。最终，荷兰殖民政府不得不向华侨道歉和赔偿。

陈嘉庚不只带领华社与怡和轩超越帮派扩大影响力，也引导大家放眼世界，支持世界各地开展的正义事业。

一代伟人 精神永存

1949年4月28日，怡和轩与福建会馆为他联合举行欢送会，因陈嘉庚5月5日即将前往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他们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写道：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

1961年，陈嘉庚逝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追悼大会。会长高德根致悼词说：“我们聚集这里，为的是追悼一代伟人陈嘉庚先生。陈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精神人格，将垂为后人典范楷模。他的一生表现了完整无疵的崇高人格……要表扬陈先生那种忘我为人的仁爱襟怀，明辨是非的强烈正义感，毁家兴学的伟大牺牲精神。”

作者为本刊编委

参考资料：《南洋回忆录》（陈嘉庚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杨新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与南洋华人》（叶钟玲著）、《回忆陈嘉庚》（中国文史出版社）、《陈嘉庚》（黄今英著）、《百舸争流—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怡和轩出版）、《陈嘉庚、李光前与现代新马》（廖建裕编）、《陈嘉庚新传》（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

竭智·尽力·挥泪

李光前为多元教育作贡献

／文：连奇

现在提到先贤陈嘉庚、陈六使和李光前，他们倾资兴学的精神，常常令人感动。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让他们挺身做出奉献的，到底是什么驱动力？那时候，他们对教育有什么看法？这些，都值得后人探索。

李光前和陈六使，创业前都曾经是陈嘉庚企业的骨干，因此，受到他“毁家兴学”精神的影响，事属必然。尤其是李光前，他也是陈嘉庚的女婿。

李光前自幼随父亲从中国南来，在新加坡英印学校和崇正学堂受中英教育。十五岁时，他到南京暨南学堂升学，后入北京清华高等学堂和唐山路矿高等学院深造。辛亥革命后，李光前回来新加坡。他就读测量专门学校，并通过函授修读土木工程科。从以上学历看，李光前所受的教育高于同时代的企业家。他掌握中英两种语文，从商后，有能力直接与外商往来，也到欧美考察业务。这样的经历，使他具有更开阔的眼界。

1918年6月，陈嘉庚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会议上演讲，指出当时中国文盲问题严重，每百人只有四人识字，这样的国民素质，势将影响国家的生存。他强调：“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而当时新马和南洋各地只有小学，随着适龄学生增加，毕业生于十三岁后就要失学，如果不早日开办中学，必将“贻误后生”。

1919年3月21日，南洋华侨中学开学。在当时，这和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的开学一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作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中打破当时各帮华校的局限，不用方言授课，而以国语(后来称华语)教学。陈嘉庚当选为华中董事总理(后称董事主席)，其后，他又两度出任，



李光前

前后共八年半。1934年，陈嘉庚卸任，由李光前接掌。

让青年之花开遍南国

李光前连任华中董事主席达二十一年。他接任后，立即为华中清还银行贷款。1940年，他独资为华中兴建科学馆，并购置科学仪器和设备。1945年，经过日本侵略军三年多占领和破坏，华中几乎只剩空壳，复兴需要经费，他为此捐献了大笔资金。在华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李光前不断贡献财力。1954年，他辞去华中董事主席职务后，仍独资捐建了图书馆。

1939年3月20日，李光前在华中建校二十周年的庆典上讲话，希望“侨胞本当年通力合作之初衷，更竭智尽力，同心培养此艰难缔造之硕果”，使青年之花在炎荒之南国开遍，“更表现其宣扬祖国文化之重大使命”。

他也申明，“教育乃专门事业”，为了使教职员在校务上实施抱负，董事会同意“本校除纲领外，校长统辖全校行政，举凡任用教员以及教务实施等均交由校长主持，以收指臂之效”。

1948年，郑安仑受聘为华中校长时，李光前对他说：“华中一向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董事长是家长，但是事实上处理校务的还是校长。好像南益公司一样，我虽然是东家，是家长，但是一切业务，都是由经理去处理。所以当校长的人，就应该操实权，以精明果断的精神，合理的去处理一切校务。至于学校的经费，完全由董事会负责，毋须担心。”

由以上引述，可知李光前对管理校务的看法是一贯的，和他管理企业有共通之处。同时，也看到他对培育青年的冀望。

居住地一份子的呼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李光前正在美国参加树胶会议，因此滞留在那里四年，到1945年11月底才回来。这一年7月12日，即在日本投降之前，他投书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马来亚之未来——华人社群的见解”一文，针对当时有关马来亚组成的原则提出看法。

在这篇投函中，他阐述了华人移居马来亚的悠久历史。华人在吉兰丹州已居住了700余年；在马六甲，则从十五世纪起就已移居。华人奉公守法，勤劳苦干，爱好

和平，“并未与其原居地维持任何政治联系或承担任何义务，指责华人移民有夺取政权或侵占领土野心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他还强调了华人为建设马来亚所作的牺牲和贡献：

“处于英国主政下的马来亚，在财政上获英资助，然其发展主要有赖于华人之汗水、鲜血、辛劳乃至生命之付出。若说富有华人在数目上多于富有英人，其原因是华人与英人的人口比例是100:1，而且，每一名发财致富华人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上百甚至上千人曾为了国家之发展而在恶劣气候环境下拼命劳作，最后亡命于丛林或偏僻地区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不良因素导致了大多数国家走向狭隘民族主义——3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又强化了此趋势——事实上，若说定居各地的华人能够独善其身、不受此负面影响，那才是令人讶异的。”

无独有偶，1954年8月22日，陈六使在招待世界青年大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也有相似的表述：

“……星马之有今日的繁荣，完全是世代相处于此之华、巫、印、英四大民族胼手胝足，共同缔造者。就华人与南洋群岛之关系来说，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余年来，地方上之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而能与各民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的传统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1956年2月27日，在招待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的茶会上，陈六使说“本人南来已四十余年，自认乃系当地人，应为当地尽力”。

二战结束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殖民主义，日不落国，都已经难以为继。英殖民主义者凭借军力重占新马，面对的是种种争取民主的斗争。当时，英殖民统治者出台了马来亚联合邦法案，受到各族人民的反对。它也不顾百业萧条企图征收所得税，并指派马来亚分担英国的巨额军费，诸多措施都不利于民众。李光前身为中华总商会会长，代表商界和民众提出了反对，并参与了反宪制运动。和陈六使一样，在这个时代，李光前充分显示了作为马来亚一份子的承担。这一点，对于了解他们为何“竭智尽力”办教育，也许有帮助吧！

马来亚意识的加强

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在这样的潮流中，马来亚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

1950年9月，英华学校新校舍开幕，其中的大礼堂由李光前捐建。因为公务出差，他发给学校一份讲稿，其中表达了他的希望：

“政府给予英校优厚的经费援助，我感到很是愉快，我诚挚的盼望，政府同时亦援助各方言学校，因为新加坡人民都讲着一种以上的语言，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虽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能全体保有马来亚意识。”

以上这段话，指出了在资助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明显地偏向英校。当然，这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偏向。

1953年，李光前向英殖民地政府提议，扩建莱佛士图书馆，使它成为公共图书馆，人民可以免费借阅书籍。为此，他捐资超过37万元。1957年8月16日，莱佛士国家图书馆举行奠基礼，他在致辞时指出：

“1953年初李氏基金委员会同人认为新加坡乃多种民族聚居之地，欲求各民族亲善合作，并沟通彼此间文化，必须有一新的免费图书馆收集东方民族图书，以应各民族文化需要，依其需要程度，分别供应非如从前仅着重于西洋文化者，庶可造就新加坡良好资格之公民。吾人既依此意见，向政府提出建议，莱佛士国家图书馆近日在进行建筑中，适值新加坡行将获得自治，所有议院议员，可全部出诸民选之时期，益证此举之饶有时代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李光前对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重视，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有马来亚意识。他所说的“东方民族”，无可否认，指的就是华、巫、印各大民族。1963年，陈六使更直接地说：“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这个民族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而李光前以巨额的捐资，为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加坡大学前校长李光前

支持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1953和54两年，对华文教育来说，有两件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陈六使倡办马华大学(后定名南洋大学)，一是五·一三学生请愿。

早在1950年9月9日，陈六使就提出要“在马来亚创办一大学”。他认为“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间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到了1953年1月16日，他又提出，“吾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当时，华校中学毕业生升学无路，北上已不能到中国，当地则马来亚大学容纳不了。因此，华文大学的开办已刻不容缓。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陈六使承诺为此献捐五百万元。

陈六使倡办华文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引来殖民地官员的异议，以为是要与马大竞争，更有甚者，将使马来亚民族发生分化。在这样的时刻，李光前于1953年2月7日

举行记者招待会，出面力挺陈六使，对一些疑问做出解释。他指出创办华文大学的需要：

“查星马二地华校学生数达48万之巨，于高中毕业后，甚少有受当地高等教育之机会，其故何在？是乃由于社会人士未能深加注意有以致之也。或有误会华校办学之宗旨，适与当地政府所设立之英校，立于敌对之地位。其实不然，政府所设立之学校，未足以收容多数适龄之学生，故华文中小学，遂应此需要，而设立此种学校。自创办以迄经常费用之筹集，固常遭受种种之困难。惟若华人放弃之，而不加以注意，则今日星马二地将见数十万大可为之青年，已平白遭受失学之痛矣，其损失宁可计量耶？”

“查马来亚每年则有成千之华校高中毕业生，甚少希望能得受当地高等教育之机会，其数额已日见增加，为谋补救此种可悲之现象起见，则另筹出路，庶免绝其向学上进之望，固属当务之急。”

为华教前途两度挥泪

1950年，英殖民地政府颁布了“学校注册法令”，学校注册官获得极大权力，只要认为某校不能令他满意，就有权随时封闭该校，不必经过什么考虑和调查。法令于5月27日公布，当局在扣留南洋女中某学生后，即于5月31日突然到华中搜查，跟着，以学校涉及政治活动为由，宣布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为非法。两校一面向总督上诉，一面推举李光前为代表，准备和律师一起出席政府行政会议以进行沟通。由于舆论界的呼吁，以及各界人士的奔波和交涉，历时数月，两校才在接受当局的条件复办。

经过上述波折，华教身处险境，举步维艰，已是洞若观火。从中也就可以理解关心华教的董、教及社会人士的忧虑。

1954年初，殖民地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都要登记服役。法令一出，立即引来学生的反对。他们以学业受影响为由而要求免役。郑安仑校长在回忆华中的文章中指出：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很多殖民地都纷纷的自治或独立。新加坡也是一个殖民地，经过英国一百多年来的统治，大家无不深深地体会到受人管束的痛苦，民族尊严的侮辱。尤其是青年人更为敏感。所以同学们对于服役的措施，内心就激起了反感。所以就以妨碍学业与厌战为理由，而喊出‘好男不当兵’，‘我们要读书’的口号，来反对服役登记，家长们也大都支持他们。”

郑安仑认为，对于学生反对服役其实是反抗殖民统治，“当局也知道这种实情”。

由于当局没有明确答应免役的要求，5月13日，九百多名各中学男女生，在克里门梭路列队，静候向总督请愿的十八名学生代表带来消息，但遭到警察以警棍驱散，造成三十余人受伤，四十余人被捕。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到6月2日，发展为两千余中学生到华侨中学集中，坚决要求当局予以缓役。

李光前于英国得到通知后，立即于6月3日回到新加坡。据郑安仑回忆：

“六月五日，商会小组与董教联合会和华校联合会

今日真正之严重问题，乃整个华文教育生命之延续问题，以及合理发展问题。吾人欲问，世代久居于此，有事业于此之80万华人，母语教育能坐视其一日中断乎？政府当局、华人社会、华校之董事、教师、学生，以及学生之家长，能不竭诚勉力，共同维护之乎？

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李光前先生在会上致词，热泪脱眶而出，致为悲痛。”

李光前在会上直诉心声，强调学生集中、学校何时开学，都不是大问题：

“今日真正之严重问题，乃整个华文教育生命之延续问题，以及合理发展问题。吾人欲问，世代久居于此，有事业于此之80万华人，母语教育能坐视其一日中断乎？政府当局、华人社会、华校之董事、教师、学生，以及学生之家长，能不竭诚勉力，共同维护之乎？”

他呼吁，为了“我整个华文教育足以延续于风雨飘摇中，并进而发展于无已”，华文教育机关之董教学，严守教育宗旨和立场，不涉及“非教育范围内之事”。他更郑重表示，学校董事于尽心尽力之后，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以致学校陷入危机绝境中者”，则唯有引退一途；“条件之来自主管当局，非董事会负荷得起者，董事会亦不能迁就承诺”。

从李光前这番肺腑之言，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华文教育前途的担忧。身为商界领袖、学校董事主席，他也感到了压力的沉重和能力的局限，因此，他对当时各界的呼吁，可说是一种寄望；对“主管当局”，则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挑明。

6月6日晚，李光前在怡和轩俱乐部会见了学生代表。第二天，他在郑安仑校长陪同下，亲临华侨中学视察，并召集约数百名学生在礼堂讲话。据郑氏忆述：“李先生说话时，心情非常的沉痛，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感动。”他劝导学生说：

“……本人亦认为，华文教育危机，伏之已久，而今日则渐陷入绝境险境中。诸君曾细思乎？华文教育既久在危机中，吾人之行动可不愈加谨慎乎？吾人行动谨慎，犹可望脱危机而入坦途，一不谨慎，岂非立转危机，而趋绝境乎？然则，吾人行动之后果，而使整个华文教育陷于无可挽救之地，于心安乎……”

李光前表示，他将和中华总商会诸董事一道，共谋妥善解决这次事件。他说：“就本人言，凡认为做得到者，本人必许诺诸君，务必达到，任何辛苦在所不辞。若认为，确走不通，做不到者，断不愿信口答应，开空头支票。……”

郑安仑忆述，李光前劝导学生两天后，6月9日，总督

退回学生代表团的请愿书，要求由学校董事会与校长代为转呈。“李先生遂于十三日上午九时，在怡和轩召集各中学董教代表，及集中学生家长举行会议。……会上李先生谓：倘若学生愿意登记，彼愿带同前往，如当局要拘捕，彼愿首当其冲。至于代表团给总督的呈函，彼愿意代为转呈，碰钉子亦心甘，只要对学生有所帮助。他说话时甚为激动悲痛，热泪潜然而下。……”

中学生大集中事件历时二十二天，在殖民地政府准予缓役后，学生于6月24日宣告解散。

然而，那是个反殖高潮滚滚的时代，学校无论如何很难维持平静。五·一三事件后第二年，又发生了福利巴士公司工潮，一些学生前往慰问工友，由此引发了华中、中正二校被令停课事件。同时，学校还须开除一些学生。李光前身为董事，免不了又要为此与当局交涉。正当这时候，政府成立了委员会，目的在调查华校实际情况，为了不节外生枝，封闭学校和开除学生的事才不了了之。

热心赞助教育足为良范

李光前自1934年至1954年任华中董事主席，历时二十一年。有华中教师的回忆文章认为，李氏不但任期长，出钱也最力，尤其是后半期的十年中，“虑患最深”。可是，即使“华文教育危机，伏之已久”，而且“渐陷入绝境险境中”，在资助华教方面，李光前未曾有过丝毫退却。

1953年，福建会馆新建一所小学，命名为光前学校，以表扬李光前为建校慷慨捐款。李氏一再申明意愿，希望更改校名。为此，他于2月4日特致函主席陈六使和执委，说明随着时代进步，“举凡教育慈善均应为大众化事业”，为了学校前途，不宜再以个人命名。后来，新建小学更名为“光华学校”。

1954年，各界热烈响应创办南洋大学，筹款活动如火如荼。8月10日，距五·一三事件过后约一个半月，李光前致函陈六使，承诺为南大捐献巨款。其数额是，从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之时(1953年2月12日)起，到1957年止，在这五年内，新马各地实收民众捐款总数的十分之一，将作为他捐款的根据。在当时，这可是个喜讯。依照诺言，他献资一百万元。实际上，在后来南大的建设过程中，他还不断慷慨解囊。

1957年3月21日，华侨中学纪念创校三十八周年，同时举行国专图书馆落成典礼，请陈六使主持开幕仪式。

陈六使在致辞时指出，国专图书馆的建筑费全部由李光前捐助，学校为表扬其热心教育的精神，才决定以李先生令尊翁的大名为新图书馆命名，而这并非李先生的本意。陈氏对一众来宾说：

“三十年来，李光前先生为了人类的进步，在星、马、暹罗、印尼与中国等地出钱赞助教育事业，其数目有数千万元，这在海内外的中国人言堪称第一，令人可敬，而他无任何目的，纯为赞助教育的精神，诚足为世人的良范。”

至此，陈氏指出当时有人给李光前扣红帽子，“对他予以诽谤”，“这等于对中华文化予以诽谤”。

一个普通公民受委为大学校长

1958年10月25日，马来亚大学在毕业典礼上，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教育的贡献。马大1949年在新加坡成立时，李光前曾捐款二十五万元。1951年，他再捐二十五万元，以助马大图书馆购置图书和文献。（陈六使也曾捐助马大三十万元）李光前接受学位后，在致辞中阐述了商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1962年，马来亚大学分家，移到吉隆坡的称马来亚国立大学，原在新加坡的改为新加坡大学。

这一年，李光前受委为加坡大学首任校长。6月12日上午，他在就职典礼上讲话，表示大学选一个普通公民出任校长，“证明东南亚目前的发展阶段中，我们有必要与民众建立起更为密切和谐的关系”。他认为，“在促进本地多种族源流的融洽团结方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为人民提供循序渐进、着眼全面的教育，并普及启蒙开导性

的思想”，这样，就可以使不同种族“更多地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同文化传统”。

同一天下午，李光前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典礼上，又作了发言。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是象牙之塔，“在精神状态方面，我们应偶尔放下学业或工作，花时间以正确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学术上的进取，不应以牺牲对实际生活的真正了解为代价”。

1965年，李光前因病辞去新大校长职位。

1967年，李光前病逝，享年七十二。他于1952年设立的李氏基金，至今仍为教育、文化、医药、慈善等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作者为前报人，资深文化工作者

参考资料：

- (1)《李光前文稿、讲辞与信函选编》，黄美萍、章星虹编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8年出版。
- (2)《华中回忆》，郑安仑，《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建校六十周年特刊》，P.139-159，1979年出版。
- (3)《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言论集》，李业霖主编，霹雳州南洋大学校友会2014年2月出版。
- (4)《陈嘉庚言论集》，陈嘉庚，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



熟悉又陌生的角落

访陈六使儿媳陈萍蕊



文：佟 暖

2020年是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5周年。

历届董事会名表里显示，陈六使先生是于1948年上任，执掌主席职务至1962年，历时15年，时间之长，仅次于孙炳炎先生（196-2001年期间担任主席）。陈六使先生是怡和轩俱乐部继陈嘉庚之后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这段期间，陈六使先生也身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树胶公会、新加坡树胶厂商公会主席等要职，在参与和推动新加坡华社团体的活动中，为重振战后民生经济，促进社团规章制度变革，建设华校普及文化教育，向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星马两地在地公民权，维护厂矿橡胶等制品厂商经营权益等领域里作出卓越贡献，先生的名字和当年的华社命运紧密结合，牢不可分。特别是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

馆倡议筹款组建东南亚唯一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登高一呼的身影，始终铭刻在人们的心底。

歌曰：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

但即使是南洋大学的创举，也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往事。

怡和轩俱乐部先贤馆一直展示陈六使先生生平事迹资料，让有心人借以瞻仰曾经激荡人心的事迹。再想进一步重温南大校史的民众可以去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昔日的南大图书馆兼行政楼）二楼的“南洋大学图片”展室，观看展室里留存的建校历史图片。

除了亲身经历者，年轻国人若不是听别人讲述，根本不知晓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华族社群以集体筹款个人捐献方式来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和历史意义。



陈六使

华社极少或不依靠英殖民政府的资助，自办民间学堂，教导下一代子女读书识字，认识民族传统价值观，逐渐自成体系的华校教育成为凝聚族群维护社会集体利益的强大力量。新马华社成员从二战前的侨民到建国后的国民，其文化身份认同也伴随政治体制经济架构等因素更迭，历经西方殖民、日本军国主义乃至冷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等阶段，长期以来不能摆脱被强势西方文化压制、被狭隘种族主义歧视的格局情境下求生存谋发展。今日再来回顾这段岁月，谁都不能绕过以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先贤为代表的华社族群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因为在他们身后，有难以计数从中国家乡来此谋生的华人族裔，选择在这里生生不息，胼手胝足，秉持忠孝仁爱、服务牺牲、舍己为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滋养和构建家园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打造民族教育事业的一砖一瓦。正是上个世纪华社所倡导建设的华文学校教育体系，奠定我国多元文化建设的根基。

2019年10月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前厅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举行揭牌仪式，大学当局宣布今后将围绕南洋谷和人文学院大楼，比邻华裔馆的该地段连接南大湖将扩建而形成南洋校园的文化遗产区。¹日后，会否利用这一文化遗产，积极宣扬上世纪华社贤达闻人热心公益事业建设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事迹，打造属于我国独有的多元文化价值，甚为期待。

歌曰：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之前，本刊访谈陈六使孙子陈锡远时得悉，由陈家子嗣在祖居地集美筹建的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也于2013年开幕，对外开放参观。²显然的，陈列馆资料详尽，对不论老少不论国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而言，陈文确陈六使兄弟俩的一生事迹都是极为生动的励志话题。

历史日渐走远的身影，会否在此穿越时空，因宗族因亲情而动人心弦，从不同的维度，再一次回到血脉关联，回到文化基因的主轴上来。

因为这样，我们特意寻访陈六使先生儿媳陈萍蕊。

在老人的家门前就听到厅里传出很响亮的声音。她拄着助听器出来迎客，身子站得笔直，包着口罩的面容清瘦有神。

从高龄九十五岁家人的记忆中找回往昔的身影，宽敞的大厅里，中西合璧的家具摆设，搭配雅致而大方的书画作品工艺摆件，一张高台上放着陈永汉的遗照，仿佛也在聆听老伴谈话。

房子周遭围绕着轻轻流淌的水声，落地门窗外所有花草种植物都清理得很干净，她说那是老园丁的功劳，而她自己的生活简单，从网上购物，食物送上门，除了一位贴身女佣，偶尔自己下厨，亲自做爱吃的甜点。每周，她去教堂做礼拜。

其实听她自我介绍的资历并不简单：1946年去美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拿个Master学位，1954年才和陈永汉回来新加坡。我们先去欧洲旅游，怕回来就很难再去。第一次走进陈家，她说。“我像个foreigner（外国人），他们只讲家乡话（闽南话），我讲英语讲广东话。在这之前，我对我的家翁陈六使一无所知。”

19世纪末年，神州时局飘摇，清朝政府挡不住西方列强瓜分土地和掠夺资源的势头。20世纪初始又遭遇鼠疫，百姓生计难以为继。

翻阅家族传略，陈六使年仅五六岁时，父母均死于瘟疫。迫不得已，老三陈文确以借来的三块银元作盘缠，只身投奔南洋，后来在陈嘉庚经营的橡胶园里工作。等站稳脚跟后，才将陈六使等兄弟一一接来马来亚和新加坡。

陈家只有陈文确读过私塾，陈六使只读过几年小学。但兄弟俩勤勉工作，人品忠厚诚实，因此受到陈嘉

庚赏识重用。1923年陈文确和陈六使等自立门户，相继开办联和公司、益和公司，兄弟协力建立家族事业。其创业初始并非一帆风顺，后来由于国际胶价上涨，益和公司日渐成为行业中佼佼者，集种植、制造、贸易为一体而产生规模效益，业务渐渐遍及马泰越印等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益和业务暂告停顿。战后复业，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二代子弟开始加入阵营。英国政府后来撤销购胶统制令，韩战爆发促使战略物资的橡胶价格大涨，种种因素促使熟谙橡胶经营的益和公司更发展壮大。50年代，陈六使经营的益和树胶有限公司和李光前的南益树胶有限公司并驾齐驱，成为新马橡胶行业中执牛耳的人物。

早年从福建两广等地下南洋的移民，大部分都来自穷困的山区农村，当远离故土，只能通过家族和宗亲的社会联系，在陌生的生活环境中求取温饱，个人体魄须吃得苦经得住磨难之外，人格品德的素养也是站稳脚跟后迈向人生成功之路的另一重要基石。然而，也有巧取豪夺专走偏门而白手起家成为商界巨擘者，以此反证，陈文确陈六使兄弟之所以得到陈嘉庚所器重，后来成为陈嘉庚身边的人，因为哥俩接受陈嘉庚精神的感召，热忱奉献社会，从家乡集美开发，远至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散支发叶开花结果的励志话题，意义始终离不开弘扬中华文化，致力发展华文教育事业这一条主轴。



丹絨禺俱乐部旧貌，陈六使常在此宴客。

歌曰：直到山穷水尽 一生和你相依

老人侃侃而谈：EngHan一直帮着爸爸做事。老人很严肃，也很聪明，橡胶是他的专长，后来，没有了NanYang（南洋大学），爸爸就去做水泥。因为有国外留学回来精通英文的儿子帮他。他很节省，做生意并不注重外表，办公室家具很老旧。益和的生意我不晓得，但办公室我去过。后来我还去搬了他的办公桌。她指着身边放电话的小儿子说：除了柚木，有些是老酸枝做的。我觉得丢了可惜。

为了我和永汉的婚事，他（陈六使）去问过李光前。后者向他做出保证。他们很亲近，有商有量。李先生中英文都会，我和他的女儿是好朋友。可是，一个个都走了。说到这里，老夫人无比惋惜。但很快回过神来，脱下口罩拍照。老人接着说：很多Nanyang时常来家里看望爸爸，他带我们去看小别墅，给Nanyang的教授住的，从那里能望见树胶厂的这些楼房（她拿着照片）。每个周末，在丹絨禺的大屋子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大概有六桌。爷爷很喜欢孙子，常常来抚摸我儿子前胸，说心跳不错。孩子心脏有问题，他这样子表示安慰。然后，给孙子们钱，每人十元。

老人讲述当年很琐碎的身边事，她眼中的大家族，领头人威严，不多话，而在她嘴里反复脱口而出的Nanyang，亦是她的一桩桩家事。虽然她反复强调，“I don't know about Nanyang”，不过，很多Nanyang，很多从前他帮助过的亲戚朋友都来送殡，“many many people.....”

午后的风潮湿，雨丝细弱，隔着篱笆的斜坡，花草葱茏点缀其中，静谧的居家之地，热情的老人请客人品尝她亲手制作的糕点。

简约而明亮的圆桌上，发现中间有一大玻璃杯，一颗颗红豆沉在杯底，仿佛辉映着当年相思树的身影，陪伴她融入Nanyang大家庭。

作者为本刊编委

注释：

¹详见2020-01-03联合早报《陈六使径 我阿公的路访陈六使孙女 陈丽音》（吴庆康）

²参看第42期怡和世纪《最难风雨故人来》（佟暖）

李光前、陈六使 与华社争取公民权运动

／ 文：李奕志

—— 战后，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兴起，反殖浪潮高涨，英殖民统治者遂同意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在当年5月30日自治邦第一次大选投票中，人民行动党获得华社的大力支持，拿下了立法议院51席中的43席，以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6月3日晚，行动党在市政厅前大草场举行10万人庆祝胜利群众大会。该党中央委员吴庆瑞博士（行动党

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在大会演说时指出，在大选中“受英文教育的人，是不投人民行动党的票的，那是我们的意料中事”，因为“受英文教育者的态度，多半是给英文报所影响……英文报在进行选举宣传时，对于人民行动党所表现的偏倚态度，是众人皆知的”。由此可见，当年行动党主要是靠非英文教育的人士取得执政权。



当年申请公民权的盛况

在该选举之前，新加坡立法议院于1957年10月16日通过了“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其中规定在法令生效前连续住了8年的居民，可于两年之内申请成为公民。这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自1947年来为华侨社群努力争取公民权的成绩。该公民权法令于11月1日生效后，总商会即动员大约22万名华侨前往注册为公民。1959年大选的选民共有58万7千7百79人，华侨新选民约占37%，行动党共获得选票28万1千8百91张，如不会英语文的华侨新选民都支持行动党，那就是该党支持者的约78%。这显示华侨新公民对该次大选结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让之前没有政治权利的华侨社群融入主流社会，在政治上拥有话语权。这是总商会李光前和陈六使等领导人与英殖民统治者经过十年博弈，通过提呈备忘录、陈情、协商与谈判等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总商会在反殖民统治浪潮中，通过和平手段为华社取得政治权利的重要贡献。李光前是怡和轩会员，曾任总商会董事、第22届（1939年）与第24届（1946年）会长。陈六使是1948至1962年怡和轩的主席，也曾任总商会董事、第23届（1941年）副会长与第26届（1950年）会长。

华侨社群争取公民权的缘起

二战前，中国广东与福建省沿海的一些居民陆续移居新加坡。当时，这些移民抱着“人在新加坡，心向中国”的旅居心态，只想在当地谋生，等待有所积蓄后即回返家乡，加上中国的国籍法是以血统主义为原则，身居海外的华侨也拥有中国国民的身份。因此，他们对自身在居住地的政治权益不关注或不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以及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华侨在当地的生存空间面对严峻的挑战。在大环境改变下，华侨移民社群开始转换心态，由以往“落叶归根”的想法改变成在当地长久安居乐业的“落地生根”思维。因此，作为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总商会响应了时代的号召，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领导华侨社群争取在当地的公民政治权利。

点燃新加坡华侨社群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导火线，是英殖民统治者于二战后为加强其统治地位在马来亚推行的政治体系改革。在二战前，英殖民统治者完全掌管了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与檳城），但还未能

全面掌控马来半岛的各州，于是在二战结束后即推出了改革马来亚政治统治架构之政策。1946年1月22日，英殖民部大臣在国会发表了未来的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宪制的部长声明。接着，他于3月4日在国会公布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与新加坡的宪制草案摘要”，其中的要点包括：

(1) 由马来半岛各州与檳城及马六甲组成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则成为单独的殖民地。

(2) 设立马来亚联邦公民权制度：于法律生效后在当地出生者即属公民；法律生效前在当地出生，并于法律生效日为当地常住居民者，即可成为公民；在1942年2月15日之前15年里住满10年，年龄不小过18岁的常住居民，于宣誓效忠当地政府后，即可成为公民；此外，符合其他规定条件者可申请归化为公民。

这份白皮书公布后立即引起各界的反对声音。总商会认为新加坡是马来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与马来半岛分割。马来半岛的马来社群则不同意将苏丹的管辖权转移给以英国委任的总督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同时也认为公民权制度太过宽松让移民社群可成为公民。

马来亚联邦于1946年4月1日在反对声中宣布成立。为了安抚马来社群的情绪，当局成立了由苏丹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代表和英国官员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以检讨马来亚联邦白皮书。该委员会随后发表了宪制修改建议，提出将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并修改之前已公布的公民权制度，将移民社群获取公民权的门槛提升。由于该工作委员会缺乏全面的代表性，并提出被认为是苛刻的公民权条例：各州苏丹的臣民被视为符合了以当地为家乡和效忠对象的条件可成为公民；其他社群人士可申请公民权，申请者如在当地出生则于申请前15年里住了10年，其他居民则必须在申请前20年里住15年，此外，申请人应通晓马来语或英语。当修正宪制的建议提出后，即引起各方的抗议。12月22日，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国民党，新加坡与雪兰莪印度商会等组织，在吉隆坡举行会议讨论马来亚宪制课题，并成立了一个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由马六甲华社领袖陈祯禄担任主席，提议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统一马来亚，以及凡视马来亚为家乡和效忠对象的人士都可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当时作为新加坡华社领导机构的总商会理所当然也关注新的宪制问题。

李光前是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的先驱者

总商会会长李光前于1946年12月23日在董事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总商会的立场，有关公民权问题应详细讨论。接着，总商会董事会于1947年1月15日召开会议时，对马来亚宪制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并决议由李光前领导一个包括陈六使在内的11人小组委员会负责研究宪制问题。2月15日，总商会向当局委任的宪制修正建议咨询委员会提交了备忘录，要求在马来亚出生的各族人士都拥有平等的资格可自动成为公民，其他人士只需居住5年不附带语文条件即可申请公民权。

在宪制咨询委员会工作期间，为争取华社的权益，马来半岛各州的中华商会也纷纷向委员会提交建议书，并于1947年2月23日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共同组织了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并推选李光前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共同争取新马华社的政治权益。该联合会与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分别领导新马人民争取应有的政治权益。7月24日，英殖民部大臣在国会发表布了宪制修正草案摘要，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取代之前的马来亚联邦宪制。由于新的宪制没接纳各中华商会与民间团体提出的要求，于是两个领导人民争取政治权益的组织便分别发起于10月20日在新马两地举行总休业（罢市）一天以示抗议。李光前吁请新加坡各界支持该抗议行动时指出，总休业是自愿参加的，行动称为休业而非罢市，是因为后者有政治意味。这显示了李光前在处理问题时不存偏激的倾向。

在新的宪制下，只有英籍民才拥有新加坡立法会和市政局的选举权。按照英国国籍法的规定，是英籍民便有公民权。该法令是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凡在英国与其殖民地出生者都自动成为公民。久居新加坡的华侨和外国侨民则可照该法令的规定申请归化英籍享有公民权，但必须通晓英语文。这项语文的规定将绝大多数不懂英语文的华侨拒于门外。在这情况下，总商会只得领导华侨社群争取应有的公民权利。

李光前于1947年12月两度致函新加坡辅政司，认为不让华侨社群拥有选举权是不合理的，许多华侨已将新加坡视为永久的家乡，他们应该享有选举权。1948年1月14日，李光前率领了总商会9人代表团与总督会谈，以争取华侨的选举权。在会谈中李光前提出仿效马来亚联邦在英籍民制度外另设新加坡公民权制度。总督的回应是

需要时间考虑。这是在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中，李光前首次口头提出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的建议。

尽管1947年10月20日的总休业抗议行动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但英殖民地政府仍坚持按照计划于1948年2月1日实行马来亚联合邦宪制。一些反对这措施的人士便提出于2月1日再次举行总休业以示抗议。在第二次总休业行动被提出后，执法部门曾计划扣留李光前等领导人，以制止再度发生总休业的行动。时任新加坡咨询议会议员的张赞美（后来出任进步党副主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新加坡总督被告知要扣留李光前的建议后，召见了他和另一位咨询议会议员陈振传及检察长，共同讨论如果当局采取行动扣留李光前，将会对华社有何冲击。张赞美说，他与陈振传对此事感到惊讶，并对总督说李光前是一位非常有建设性与受尊敬的华社领袖，如果他被扣留，华社的反应将是难于想象的，检察长似乎也同意这看法。随后，新加坡总督与马来亚大总督反对了扣留行动的提议。其实，在一些激进人士提出再次举行总休业的意见时，李光前就不同意。他主张应通过协商来解决，以免引起各民族之间的误解和摩擦。在他的努力下，第二次总休业的抗议行动并未出现。这再次证明李光前处理事情是采取中庸之道。

陈六使提呈设新加坡公民权制度备忘录

随着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后，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英殖民地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以阻止新加坡华侨与中国的联系，使得华侨在政治上成了孤儿。这进一步促进了华侨对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愿望。1950年11月29日，总商会成立了由陈六使领导，包括李光前在内的9人委员会为华侨争取公民权。该委员会在完成一份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备忘录后，1951年2月21日，会长陈六使与副会长陈锡九联名将备忘录呈交新加坡总督。该备忘录正式建议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要求在申请公民权之前的10年里住满8年，并宣誓效忠，以及能与写中文或英文，即可取得新加坡公民权。此外，由于当时实行的英国国籍法规定连续住满8年并谙英语者，可申请归化为英籍民以享有政治权利，为争取不会英语文的华侨之权利，总商会的备忘录也要求懂华语者可申请归化英籍民。

1951年12月英殖民部大臣访问新加坡时，同意了总商会的要求，让通晓华语人士也可归化为英籍民。1952年

2月29日，新加坡辅政司致函总商会指出，懂华语文者已可归化为英籍民，政府不考虑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的提议。这项回复导致总商会董事会就争取公民权工作是否应继续下去发生意见分歧，一些受英文教育的董事认为应呼吁华侨通过归化获得政治权利，但陈六使等较多数的董事决定要继续争取新加坡公民权。10月31日，总商会决定再向总督提呈争取公民权的备忘录。11月20日，总督与总商会会长陈锡九率领的代表团商讨了该备忘录。在会谈过程中，总督明确表态华侨只有归化英籍才能拥有政治权利。

英殖民地政府放宽归化英籍的语文条件限制后，陈六使申请归化英籍，他的申请于1954年9月11日获得批准而为英国与殖民地公民。1957年10月新加坡立法院院通过“新加坡公民权法令”后，由于之前陈六使与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因南洋大学问题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周瑞麒与首席部长林有福向新加坡总督建议撤销陈六使的英籍民证书，不让他在新的公民权法令下注册为新加坡公民。11月28日，陈六使与家人到福建会馆的公民权登记站按照新法令规定申请公民权时，未能像其家人一样当场获得一张临时公民权证书，而是拿到一张申请将延后处理的通知。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后，总督终于在1958年3月通知英国殖民部林有福基于政治考虑不再坚持取消陈六使的公民资格，而且公民权咨询委员会也不反对让他成为新加坡公民。陈六使随后便获准注册为新加坡公民，不过他的公民权问题并没到此画上句号。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过后第二天，人民行动党政府即宣布基于陈六使“曾经积极与反国家共党分子合作”，政府要取消其公民权。1964年7月17日，政府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褫夺陈六使公民权。陈六使于1972年9月11日逝世时仍未恢复其公民身份。

马绍尔推动公民权法案的制定

1953年7月21日，新加坡总督鉴于当地政治发展的趋势委任了以林德（Rendel）为首的宪制检讨委员会，总商会随即致函该委员会为华侨争取公民权。12月23日高德根与陈六使等总商会代表与委员会主席林德面谈华侨公民权问题，林德以委员会无权处理此议题回复。在林德委员会提呈的报告书获得当局的采纳后，总督即宣布由1955年2月8日起实行新的宪制，即所谓的林德宪制，并决定1955年4月2日为新的立法院院选举投票日。由于之



早期公民权证书

前总商会积极争取华侨公民权，参加竞选的各政党，除了亲英的进步党外，为争取华社的支持都在竞选纲领中列明争取公民权的要求。选举结果，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阵线得到的最多席位，但未过半数议席，便与马华公会和巫统组织联合政府。随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与副会长叶平玉按照董事会的决定，致联名信给马绍尔，要求他为久居新加坡的居民争取公民权。

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后即面对一连串的工潮，穷以应付，为了寻求华社领袖的支持，他在叶平玉的陪同下到怡和轩与陈六使见面。在会谈中陈六使要求马绍尔实行竞选诺言，让久居新加坡的华侨拥有公民权。经过这次会谈后，马绍尔基于其政治考量，遂着手推动设立新加坡公民权的计划。总商会在争取公民权的工作上仍不断努力。1955年8月3日，该会决定由陈六使等再起草一份争取公民权备忘录，准备在月中当英殖民部大臣到新加坡访问时提交给他。15日，殖民部大臣到达新加坡时，总商会发动70多个团体组织了约2千人的队伍到加冷机场和平请愿，要求殖民部大臣给予新加坡公民权。18日，英殖民部大臣接见了陈六使等总商会代表讨论有关公民权的要求。殖民部大臣于第二天向记者表明，总商会

提出的公民权问题，可由新加坡政府解决。这让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往前推进了一步。

当华侨社群争取公民权行动进入决定性的阶段时，1955年4月22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尼外交部长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正式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之前，英殖民地政府担心华侨如取得当时还没有国籍身份的新加坡公民权后，在中国国籍法下他们又是中国国民，因而出现的双重身份会导致效忠的问题，于是坚决不同意设立新加坡公民权的建议。中国在中印协议中正式放弃双重国籍政策，让英殖民地政府不必再顾虑华侨的双重身份问题，这对华侨争取新加坡公民权极为有利。

在总商会不断争取下，马绍尔终于在1955年9月6日召开各民族与政党代表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设立新加坡公民权计划，高德根与陈六使等总商会代表也出席了会议。马绍尔最初提出的建议遭到反对，总商会代表不同意他要求申请公民权者年龄要达到40岁，以及在申请之前20年里住满15年的条件；欧亚裔和马来族代表则认为外国侨民可归化英籍，新加坡公民权计划应在自治或独立后才谈。随后，马绍尔修改了他的草案，并与各方经过一番协商，接着便将新加坡公民权计划草案提到与英殖民部的宪制谈判议程上。

马绍尔应新加坡各界人士的要求，于1956年4月中率领各党派争取独立宪制代表团前往伦敦与殖民部进行宪制谈判。在谈判中，双方原则上同意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其中一项建议是在新加坡住满10年并放弃他国国籍者可申请成为公民。总商会多年来的努力已见曙光。由于马绍尔未能争取到他要的完全内部自治，返新后愤然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1957年3月，林有福再率领一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英国与殖民部谈判，遂达成新加坡设立自治邦的协议，并落实了新加坡公民权制度的计划。经过各界一番争论后，新加坡立法议院于1957年10月16日通过了“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该法令让在新加坡住满8年的华侨，都可申请公民权。华侨社群从此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在政治上拥有了话语权。这是总商会领袖李光前，陈六使等多位董事经过10年不屈不挠努力为华侨争取到的政治权利。

作者为管理学与历史学博士，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导师

参考资料：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6.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Singapore, 1954.

David Marshal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ranscripts, September 24, 1981,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Federation of Malaya, Summary of Revised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1947.

Malayan Union and Singapore, Statement of Policy on Future Constitution, 1946.

Malayan Union and Singapore, Summary of Proposed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1946.

Public Record Office CO953; CO1022; CO1030.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All-party Mission to London, April/May, 1956.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in March and April, 1957.

The Singapore Citizenship Ordinance, 1957.

Thio Chan Be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An Ordinary Man*, 1977.

李奕志：《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2018。

新加坡《南洋商报》。

新加坡《星洲日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会议记录》。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孙炳炎恪守的人生哲学

／ 文：柳舜



南方饥困乡人渡海求生。海外几个地名总挂在乡人嘴上：菲律宾、缅甸、暹罗，“吕宋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道尽心中的钦羨。那时听到槟榔屿马六甲，直到陈嘉庚的事迹广泛流传，新加坡（石叻坡）才渐渐有了名气。

孙炳炎是众多移民里头平凡的一员，许许多多纪念册披述了他的生平，他的奋斗和成就。是的，每个成功的人物都有耀眼的星辰，成功绝非偶然，抬头是荆棘，低头是蒺藜。

从1927年四处打工，到1932年以微小的两千元在芽笼创立“森林公司”，先后在杂货店、汽车零件店、酒庄、黄梨厂当过书记和店员，经受的压力挑战，锻造了他的毅力与魄力，

逐步形成奋进的人生观。首先是勤劳工作，抓紧时间学习。创业以后，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勤劳、讲信用、谦虚、多交友少树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打工阶段，忙完一天的杂务，晚间他钻进书本，阅读报刊，认真读英文。小学只念几年，知识远远不够用，加紧苦学是硬道理。他有一肚子意见想抒发出来，便尝试写作，稿子投给《新国民日报》，笔名“卡火”，写的多是杂文小品。东北事件触发他的激愤，作了一篇《哀莫大于心死》，痛骂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创业未曾阻碍他的刻苦自学，他要多方位认识这个世界，他要深入人群，拥抱澎湃的社会洪流，发挥一己的棉力。

两千元创立“森林公司”

1912年2月（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同安孙厝村孙清廉家，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婴发出第一声婴啼。孩子快速长大，送进村里唯一的乐安小学受教。

“乐安”是陈嘉庚办的学校。孩子命里同嘉庚先生似有不可言说的缘份。

孩子健康、聪明、乖巧，喜欢运动。村里没有出路，父亲远在海外。1926年他14岁，兄弟姊妹四人由母亲带到新加坡，一家人得以团聚。

孙炳炎是这孩子的名字。货船《丰平号》将他们送到陌生的土地，开始一生的长征。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颠荡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北方难民逃亡南方，

与陈嘉庚结为忘年交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嘉庚擎起救亡帅旗，本地侨胞纷起响应，200多个团体组成星华筹赈会。1938年进一步扩大组织，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成立“南侨总会”，会址就在怡和轩。

陈嘉庚正义之火所至，金石为开，熊熊烈火燃遍东南亚。

孙炳炎被选为芽笼筹赈分会主席。他仰慕陈嘉庚的精神，陈嘉庚赏识他敢说敢做，浑身干劲。两人结成了忘年交。

随着英军投降，星岛沦陷，日军登陆搜捕抗日份子，制造杀害五万以上良民的大检证。孙炳炎东藏西躲，有时连续几天没回家。

三年八个月的苦难挨过了，日本投降，新加坡一片废墟杂乱无章，物资缺，人力缺，样样缺。

在重建过程中，其困难和捉襟见肘可以想见，机智和力拼缺一不可。

孙炳炎胼手胝足，辛苦累积，1945到1950的数年间，积下资产5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百废待举，建筑材料是大热门，他决定转型为有限公司，把业务从新加坡拓展到全马各地和香港。

50年代打下基础，60年代乘风起飞，表面上一切光鲜顺利，内里的汗水疲惫谁能明了？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政府立定主意在裕廊开辟工业区振兴工业，他立即响应，官民合创的第一家重工业：“大众钢铁厂”终于在1962年奠基，1963年投入生产。

接下去新加坡由政府或民间推动的经济建设，森林公司都十分关注，竭力参与。

1956年孙炳炎参加一个庞大的星马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多个省市。由于公司资信销网俱佳，广东五矿进出口公司委任森林为新马等地区总代理，此行并荣获多类建材的总经销权。

丰隆集团财雄势厚，一向执建筑材料商之牛耳，它代理日本的“乌龙牌”水泥；森林代理“五羊牌”，中国

制造。每当货轮近岸，上百条驳船涌入河口，工人将五羊水泥一袋袋搬入货仓，日夜川流不息，路人驻足旁观。

中国方面得到收获，日本方面也屡有斩获。孙炳炎一路是潮流的先锋，主张“插花要插在前面”，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改变组织，扩展为“森林企业”挂牌集团，同时延请“能人”助阵，这就是1964年的转型，向公众售股。

气势如虹的森林有个对比“够力”的上层架构：常务董事会。成员如下：

谢镛——曾在“南顺”服务，作为智囊团之一，筹备挂牌事务，后担任森林金融新马总管。

杜亿春——负责所有政府部门的招标，管理拆船厂，联络日本取得技术和人材协助。杜原是檳城森林公司经理，操一口流利日语兼英语。

沈来喜——勤劳精干，从英文秘书升为董事，联系政府部门，参与合同协议的拟订。

陈惠民——马来西亚商人，投资森林集团，负责建屋和油棕种植业。

吉隆坡和檳城两位董事经理：张明寰，张利瑞，除督管贸易，协助金融，负责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如种植、屋业等，也各付出辛劳。

森林投资马来亚水泥厂以及与日本合作的八幡钢铁厂，则由杜亿春、谢镛担任董事。

他的处事原则和特质

挂牌之后，森林周围百商云集，要求共同开发的投资项目繁复，单单审议就费去好多时间。有些项目做成，开了厂，如洋灰瓦厂Atlas，塑胶装饰板厂Decola，混凝土预制厂等，最终蒙受亏蚀。一度远至印尼开垦森林区，也落得问题重重，铩羽而归。

森林有不只一个的黄金年代，后来黯淡下来，可能是多种因素所造成，这里不需要去研究。然而，无论晴天阴天，孙炳炎都能保持一颗超然物外的赤心，“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这不是人人做得到的，除了个人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社会进步不变的信念，还须有与生俱来的坚毅的个性。

我们来看看孙炳炎具有怎样的特质：

- 1) 有强烈的求知欲;
- 2) 积极、乐观、真诚,幽默,富亲和力;
- 3) 爱乡,爱国,爱身边的亲友、同事、会友以及来往商户;
- 4) 有相当精准的判断力,善于捕捉潮流的动向;
- 5) 容易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热衷于开拓新事业;
- 6) 策略既定,马上实行,绝不拖拉苟且;
- 7) 人际关系极佳,平等待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对付别人;
- 8) 慧眼提拔公司干部,擢升他们到领导层;
- 9) 顺境时不麻木不自满,逆境中不消沉不颓废;
- 10) 坚持做好事,做“对”的、不违良心道义的事。

新马政治七年三变

他有成熟的人生观,相信世事无常,导师陈嘉庚或曾告诉过他,能取能舍方为真君子,钱收久会臭,钱不是用来花天酒地,多赚钱可以用来做更多的好事。

他在与家人、亲友、会友、同事来往的言谈,一再重复他的人生哲理。

孙炳炎事业猛进之时,正是新马政治急遽变动之际。短短七年,新加坡跨越自治/大马/独立三个时代。

1965年3月就任会长,中央政府还在吉隆坡,重要事务东姑首相说了算。孙炳炎就职时宣布未来要推动的六项工作四项任务,其中几项必须中央政府拍板,比如营业税诉求,向日本追讨血债,都是紧锣密鼓不容稽延的要务。

孙炳炎率领董事,参加马华商联会的追讨血债会议,面谒东姑首相陈情,恳请财长陈修信改变营业税政策。而新加坡方面的事务可谓千头百绪,新旧交织,当中如配合政府工业化宏图,成立修改章程小组,筹建纪念碑,设立总商会基金与陈嘉庚奖学基金,修葺晚晴园,扩大会内文教活动,组团外访考察……最令孙炳炎揪心且投下最多精力的三件事,依序是:追讨血债建碑和修改章程。

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告独立,形势大为改观,孙炳炎与一般华商脚下和心里的石头一下子抛开,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凭着能力与智慧,新加坡无疑的将向前迈进。

追讨血债按了休止符

新加坡人不会忘记,1963年8月25日,政府大厦广场举办十万人群众大会,群情鼎沸,激昂声中演说者历数日军当年的检证,强征奉纳



孙炳炎与陈嘉庚在北京合影留念

金,杀害民众不下五万人等罪状,大会通过坚决追讨血债五千万新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李光耀总理亲临会场发表演说。

事过三年,日方装聋作哑,1966年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新加坡,事件重新炒热,各界议论纷纷。

整个事件比预估的更快达到结果。新日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日本会献出5000万元,半为赠款,半属贷款,免息。

声明由李总理转告总商会,附带说明:这是为了消除彼此在工商业进行合作的障碍,总商会要确保这个问题不再成为日后的争端。

如此解决显然与十万人大会的决定颇有距离,怎么办?

11月1日孙炳炎复函李总理,表示董事会对于函中所提政府为我国经济发展着想所采取的决定,至为了解;惟是项决定恐与各民族群众大会议决案“未尽相符”,难向群众交代……

如此委婉的反应,获得政府又一份复函,简捷了当告诉总商会:这是新加坡政府所作决定,政府并非邀请贵会向人民解释政府的决定,向新加坡人民交代是新加坡政府的责任。……

强势政府的态度已十分明白,事情在一边“决定”一边“遗憾”的情形下按了休止符。

筹建纪念碑困难重重

1962年1月,全岛许多工地发现无主骸骨,数量可观,证实都是日占时期惨遭杀害者的遗骨。凡有通报,

总商会即派人前往视察收拾，越积越多，遂组织“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进行探查、发掘和迁葬的全套工作。

累累白骨的照片出现在报章上，怵目惊心，血淋淋的一段历史如在眼前，这也酝酿了1963年十万人追讨血债的群众大会。

死难同胞不只华族，总商会联合其他民族共同处理，建造纪念碑悼念亡魂，蔚为共识。

募捐委员会迅速成立，推动商团、会馆、仁人义士捐输共促其成，政府以一元对一元作为赞助，另拨出一块四英亩的地方建立碑园。

工作进展顺利，不过并非一帆风顺。

原来设计的纪念碑基台好几层，准备将600多瓮遗骨火化后展示于公众面前，警示战争的罪恶，后因不同民族对丧礼有不同的宗教风俗，改为土葬，骨骸深埋在200呎纪念碑的基台之下。

此外，曾任南大秘书、诗词家书法家潘受，受孙炳炎礼请，书成李光前极为欣赏的一篇精心撰写的《碑铭》，计划中依循潘受的墨宝，连同英译缕刻在碑台四面壁上，一切程序都说好了，可是，“等到纪念碑揭幕，只看见碑名”，没有记述事件的文字，以及文字闪耀的血光与呼喊。

1967年2月15日，纪念碑终告揭幕。孙炳炎会长致词用了潘受碑铭的文词，请读以下铿锵的声音：

这座纪念碑的完成，一则以象征新加坡人民对死难者致永恒的悼念；一则以宣示侵略战争的不足为训。

冤不宜结，仇必须解。我们今天要严正指出，今后人类如要生存，国与国之间应互相尊重，特别是大国强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战争才得永久消除。

我们强调，任何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

那年起，每年的2月15日，就订为悼念亡魂的祭日。

总商会修改章程掀起风波

孙炳炎第二届会长任期将满的时候，总商会爆发了一场针对分帮选举制度的论争。

1968年7月17日董事特别会议，康振福首先开炮，发

出书面声明给各家报章，猛轰总商会修章小组开了16次会议，结果对大原则问题没有一个交代，这大原则便是废除帮派。

公开声明批评帮派不合时宜，开倒车。

康振福的支持者是小组成员之一黄祝秋。

孙炳炎以书面答复。康振福回驳，同样公诸报端。

为了应付康等的“挑战”，总商会举行第二次特别会议，接着征求会员对章程修改提建议书，并在十月十二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康振福在该次会员大会以“把持分肥”一语，指帮派制存在弊病，引起大多数董事严词责难，这也导致康振福11月初辞去财政主任一职。

董事会议黄祖耀指出：把持分肥这句话实在不能说。康先生对总商会会务一向工作勤劳，其他方面也都为尽力，唯独这次提到“分肥”，实在大错特错。

陈共存进一步说：把持分肥这字眼相当严重，整个董事会多少会给社会人士和东南亚人士讲（议论）。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应付，第一是承认有分肥，第二是默认，第三是起来解释，叫冤枉，第四是采取法律行动。不过这（最后）一点我们绝对不这样做。

康振福后来在报章澄清说，他讲的是帮派制的弊病，绝对无意损及商会名誉。

康的辞函文句又出问题，11月底董事会达致如下议决：辞职书中所有指摘完全不符事实。即席通过康的辞职，并且决定不予答复。

不答复，因为怕对方纠缠下去没完没了。

15人修章小组修改了部份章程，分帮选举仍旧保留。

孙炳炎取代高德根膺任会长，作为福帮的一员大将，康振福是其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康的手上控制了龙溪会馆一批总商会会员，过去这批两百多名的会员也曾发挥作用。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康振福冲着孙炳炎开炮，至今不得而知，但整个事件是董事会认为废除帮派尚未成熟，董事会审议15人小组的建议，孙炳炎并没有独断独行，他必须遵从大家的意见，他常说，他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康振福身为多间华校董事，为华教出钱出力，人所共知，但这次风波显出他的急躁，不只得罪了华社最高机构——总商会任劳任怨的领导层，而且强人所难，进而用词不当，引发众怒。

总商会二战后数度修改章程，帮派制的存废是其中议程之一，1947年李光前担任会长，修章触及帮派，产生了歧见，李光前觉得时机未臻成熟作罢。1959年章程修改，帮派依然存在。

帮派本是历史的产物，早年华人渡海谋生，衣食住行看病找工作，靠的是乡亲亲戚，形成宗派也就形成力量。总商会要真正做到“华人最高机构”，要展示自己的代表身份，同殖民地政府办交涉、提建议，或者向外商外国争取共同利益，唯有团结各帮各派，集中最佳人力物力，才能取得成功。

总商会便是一步一脚印壮大起来的，在漫长的日子里，证明了帮派存在的价值。

当然，事过境迁，各个时期随着大环境的变动，纲领和目标便也跟着转变。

任怡和轩会长36年

孙炳炎逝世于2002年，享年91岁。

同他有过接触的人，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亲切幽默、爽朗豪迈；一起共事的朋友惊见他的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祖国永远在他心中。新加坡是他的家，事业在这里，家庭在这里，1965年家的后面才多了个“国”。

没错，新加坡一得一失关系到他的前途。然而中国是他文化的根，生命的源。孙厝村祖先的塚在那里，先人的遗训在那里，那里有族人的期盼，如同鱼离不开水，祖国给予他非金钱所能替代的温暖。

他曾说，一辈子在学这学那，学到差不多懂了，就要走了。

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因他谦虚，包容，不像大老板。怡和轩会长当了36年，同安会馆主席36年，中华游泳会主席38年，孙氏公会，中华医院，福建会馆……许多团体的基金、会所、设备，是他这实干派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号召推动下，人们梦想成真，从而孙炳炎树立了声望和威信。



孙炳炎在怡和轩100周年庆典上

王鼎昌黄金辉两位总统和家人，可说是他家里的常客。他家拿手的同安“薄饼”，炊制一流，贵宾们齿颊留香。

他喜欢交友和旅游，退休后常携带家人游历名山古刹，每到中国，一定访问家乡亲属，资助家乡的学校和医院。曾经在殖民地时期遭驱逐出境的，自动赴华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如张楚琨、黄复康等老友，他也一定设法找到他们，促膝聊天叙旧。

以上是他平凡的一面。在商业疆场他的苦拼与机巧，又是另一番风貌。

心正、念旧、容人，孙炳炎在他的时代是个杰出的领袖，在未来是难得的一位模范人物。

作者为本地作家

参考书目：

- 《大德不孤》 郭倩、叶薇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孙炳炎评传》 孙桂平、孙吉龙著
- 《独木成林》 主编陈毅明
- 《帮派制度的论争》 国际时报社出版

推进民主进程

朝野尚须努力

／文：河洛郎



新加坡最近在疫情下举行了大选，结果一出，许多人都觉得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置于新加坡整个民主进程的当中来观察，这样的结果很值得大家欢欣鼓舞的，它所展示的意义不是工人党又多得了几席，而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开始转变，这是新加坡走向民主化必须要走也必定要经历的阶段。

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的历史，如果我们把殖民地时期林德宪制下的选举也计算在内，只有短短65年的历史，新加坡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可说是步伐蹒跚，今天的跨越，只不过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一些人还是互相排斥与他们政治倾向相左的结果，因此出现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虽说是仿效前殖民者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不过英国殖民统治者从未在他们的殖民地真正实行过他们国内的国会民主制度，因此，新加坡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传统可以继承。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的氛围，造成新加坡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严重对立，两种政治力量互相排斥和博弈的结果，以及相互的不信任，形成新加坡这种世界少有的议会民主制度。在执政党强有力的管控底下，反对党的生存空间被强力挤压，只能苟延残喘而不能有大作为，逐渐形成新加坡这种一党独大的局面。外国学者一般上把新加坡这种政

治制度称为“专政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友善一点的把它称为“软性专政体制”（Soft Authoritarian State）。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则从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形式着眼，把它定位为“管理型体制”（Administrative State），以目前新加坡的政治情况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精准的。

无论我们给予新加坡的议会民主制度怎么样的标签，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加坡的议会民主制度长期缺乏制衡（check and balance）和问责（accountability）的机能，长远来说对新加坡是否能生存以及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关系重大。陈庆珠在论述新加坡的“管理型体制”的时候，也对它的缺点提出忠告，她忧心忡忡的指出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僚管理体系和由此出现的问责制的缺席，对新加坡来说将会是一个隐忧。

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这个隐忧？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贯彻，并不是靠五年一次的选举来展示，它必须依赖全民的常年的政治参与和关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不鼓励竞争性或对抗性的政治，在这种考虑之下，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只能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进行，他们通过人民协会和工会组织进行支持政府的动员；另一方面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在新加坡逐步缺席，造成新加坡人民在压抑的政治环境之下普遍患上政治冷感症。独立之前人民对政治关注和参与的热情迅速退潮，五年一次的选举变成民主的嘉年华会。

行动党第四代领袖王乙康在2017年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说，新加坡受制于幅员狭小，政策上能作的选择有限，因此人民通过选举选择一党专政是必然的结果。他进一步强调，新加坡如果出现两党制或多党制，各个体系将出现分裂，新加坡需要的是执政党内部的自我更新和多元化。这种说法与第一代领袖强调新加坡缺乏资源，必须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再加上处于周遭不友善的环境，是新加坡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hard truth），以此建立新加坡人民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形成一种“团结一致效果”（rally round the flag）同出一辙。两种论述都是对一些现象或事实作选择性的解释，要人民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是一种催眠式的“强迫选择”（coersion），其目的是要合理化一党专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第一代领袖还能以善治和政绩来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说法，对受新媒体影响的新一代选民，这一招是否能继续奏效？从2011年来几次的大选的观察，可以很容易得到答案。

虽然说执政党统治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选举而取得，不过它的威信的建立和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依靠有效管理和政策达标；同样的反对党的存在价值也必须通过对政府政策的理性讨论和批判性审查才能体现。

国会议员不是普通公民，品德的要求是最低底线，我们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

养，也要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和多种语言存在的历史背景要有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避免被利益集团或种族偏见左右，也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的角色。这次大选朝野方面都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子，必须引起大家的警惕。

这次反对党取得进一步的胜利，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新加坡政治生态真正的转变，一方面执政党要改变咄咄逼人的态度，要能忍受反对党不厌其烦的审查，不要把它视为零和的博弈，这样才能避免产生同质化思维（groupthink）的弊端，使施政更加透明。我们很高兴看到，执政党在对待反对党的态度也在朝积极的方向转变，比如正式委任工人党的毕丹星出任反对党领袖。反对党在取得更大的资源来行使问责权力和审查空间后，应该借此东风，强化监督的角色，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而是深入地为民社会添砖加瓦，更不能依赖巧言令色的辩论来哗众取宠，让国会殿堂沦为一般辩论会的角逐场，做到工人党前领袖刘程强所说的“副驾驶”的责任。

希望朝野双方能加强合作，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寻求共识，推动新加坡民主议程的向前发展，良币驱逐劣币，形成国会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西海岸集选区 PAP 竞选宣传布条、党旗、国旗（林少彬摄）

2020年、2015年和2011年 三届全国大选是一道三角习题

／ 文：刘安安



新加坡2020年全国大选尘埃落定，国内国外的评说分析纷至沓来，其中人人最感兴趣的一个要点是比较了最近两届的大选结果，今届人民行动党蝉联执政的总得票率是61.24%，而上届（2015年）的总得票率是69.86%，二者之间的落差是近九个百分点。另一个吸睛的焦点是，工人党除了保住后港单选区一个议席与阿裕尼集选区五个议席，还攻下盛港集选区四个议席，合为十个议席。于是，报人学者老调重弹出现在2011年全国大选结果后的二个关键词，即“分水岭”和“新常态”。并说是2020年全国大选结果才是本地政治的“分水岭”与“新常态”，而不是2011年全国大选结果。

这得交代一下上一届于2011年5月举行的大选结果及本地异常的政治氛围，人民行动党是以总得票率60.14%获胜的，却是历届大选最低的得票率。此外，反对党工人党不仅保有原来的后港单选区，还一举攻下由人民行动党重量级资深部长候选人领军的阿裕尼集选区，这是本地政坛破天荒的一宗大事，亦是国际政治新闻版

面的头等事，故有人名之为我国大选的“分水岭”。紧接着在当年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执政党支持的重量级候选人陈庆炎博士也赢得很艰辛。再来，2012年5月后港单选区及2013年1月榜鹅东单选区的补选结果，执政党举荐的候选人皆不敌工人党候选人。这一连串的选举挫折，成了“新常态”，令人民行动党陷入选举的困境。简言之，执政党犹如被选民摆了一道又一道，得票率如同钟摆效应般摆过来摆过去，常胜军开始尝到败选的滋味及苦头。

怎么说呢？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在每5年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下，从没中断地连续执政超过半个世纪，可说是世界上罕见的政坛常青树。这是创举？还是神话？

在2011年全国大选中败选落马的行动党部长杨荣文准将，曾语重心长地说人心思变，是执政党实施变革的时间点慢了拍。时间不等人，人得跟时间赛跑。正如台湾龙应台教授所言，执政党精英团队的决策逼不得已向左转，社会福利政策推出“建国一代卡”，以减轻上了年纪的国人的保健医疗费用及公共交通等的生活费；并全面展开与民共商社会课题的讨论会。

2015年3月，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6个月后，执政党打铁趁热地假借“李光耀光环效应”与“建国50周年国庆”二大节骨眼，倾其雄厚的政治资源及社会资源，强打全国大选，执政党原本视此役非同小可、不甚乐观，却喜出望外地以近乎七成票轻轻松松取得胜利。磨刀霍霍的各反对党没有建树，只有工人党尚能保住后港单选区及阿裕尼集选区的议席。这模糊了2011年大选后的“分水岭”与“新常态”之说及意涵。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执政党一方面表示“谦卑谦卑再谦卑”、“不断地改进并为人民服务”等承诺的说辞；另一方面自我良好感觉又回来了。



后港激战地的工人党旗帜与树荫下的 PAP 旗帜（林少彬/摄）

可是，强人政治已一去不复返，长治久安的政治格局开始起变化，形势比人强，本地的政治板块已悄然形成，执政党占十分之四强，反对党占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三是中间游离选民，这是不容忽视的移动板块，因为这是教人难以捉摸的选民，有时选党不选人，有时选人不选党，有时弃权投废票，但他们是决定政党输赢的游离选票。

笔者不揣谫陋，心中总觉得2015年的大选结果暗藏着“玄机”，对执政党和反对党而言，这个“玄机”，是一道三角关系复杂的习题，其中含有“美丽的错误”？或“不美丽的错误”？或“既美丽又不美丽的错误”？兴许，是个人浪漫情怀发作，而这个发想，对执政党及反对党来说皆管用，且还并在交错、此消彼长。

选民在“听其言、观其行”、紧盯着执政党的在任表现，而执政党在高票当选后，似乎又故态复萌，好便宜行事。诸如：

- 第三代的领导人萧规曹随地如法炮制第四代接班人，一脉相承的精英分子，来自同温层的质同人马，一字排开，没有个性独立鲜明及接地气的亮点，一切的一切，来自组织的安排。
- 对反对党的策略，一如既往，在信息及资源种种不

平等之下，以强者自居，给人“鸡蛋跟石头”、“咄咄逼人”、“秋后算账”的负面感观。

- 习惯于强势的“一元”好办事，视包容多元为畏途，殊不知一个人在聆听时比在讲话时更能听到及学到东西。
- 执政党实施多年的集选区制度，是把双刃剑，原本是旧人带新人的优势已不见，倒成为赔了“资深部长”又折了“新血”，可谓损失惨重。
- 承袭威权时代之“政治立场正确”的做法，时而出现党（派）政（治体制）分不清也说不清的状况及局面。这是具有独立思考及求变求新的中间选民所不敢苟同及不会买账的。

最后的结果是，选民再借 2020大选告诉执政党，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选民如流水，可以是“载舟之水”，也可以是“覆舟之水”。接下来，关键是即将接班的第四代领导班子，在五年里须要抓紧时间“一放一抓”。所谓“放”，学会“割舍离”，放下沉重的政治及历史包袱。所谓“抓”，身体力行并与时俱进地去开创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新世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文：范里

几年才打一叉的期待



几年才打一叉说的是大选投票。

照理说，新加坡选民每五年有一次打一叉的义务和机会。

过去，有过不短的一段时期，许多选区没有对手叫阵，执政党都“不劳而获”，你想打一叉也没处使劲。几轮下来，好不容易盼来对手，没料到睡一觉醒来，突然被划到哪个集选区里。昨日近邻，今天的陌路人，眼睁睁

“甘榜”被搁在另一边马路上，如此曲折的打不了叉，选民已不奇怪，当做神话。

选票格子内打一叉是预防作弊。记得1963年笔者首次当义务启蒙，讲到口干，左邻右舍老太太们还是不明白为何打勾不对打一叉才对。符号的日常认知是对的就打勾错的才打一叉，脑子转不过来的选民，到冷静日那天都想明白打一叉这回事了吗？这黑潭深得很，别趟。

回想难得的数次打叉，某些过程其实很戏剧性，比方陪别人坐顺风车或搭直升机，跌宕起伏不由你自主，可谓几度夕阳红，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很多时候，对看着办的打叉，小民只好走着瞧，无奈。

新加坡政府坚持在Covid-19疫情中举行2020年换届大选，全部选民无一例外必需戴口罩排队投票，场面真是稀罕，只此一例，不希望今后再来。国人带着如斯悲情不得不去履行应尽义务的同时，仍心挂挂在一线医护人员身上，这种高于一切的人文关怀，十分温馨感人。站在自家门窗前以手机灯光表达问候的点点心意，打叉前后几个夜晚深嵌脑中，光影记忆一大笔，难忘。

由于Covid-19用到“疫”字，这次选举不妨也叫“疫起来打叉”不？（还好这“疫”谁也不敢说版权归他别无分店！）

选情和疫情，不能两边都打叉。和往常一样，刚开打，搞笑段子就在街头出现，抢占位置的党徽倒挂已不算是“小鲜肉”。反倒是两幅以漫画样式展现的招贴牌，一改选举过去的刻板印象，抓人眼球。漫画画出社会问题一把抓、画出弱势者心声，这样的视觉效应并不

亚于过往的群众大会场景，漫画胜似千言万语却在无言中。始作俑者的参选人，坚持社区默默耕耘，十数年如一日，即使被没收按柜金也在所不惜。这样坚持发声的政治诉求，岂能以胜败论之，正是应了闽南话的“打死毋走”，憨实。

新冠病毒好似照妖镜，网络则专立此存照，接踵而至的看点可恨又可爱，叫人目不暇给。先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社会舆论质疑新精英参选，2020年首开先例。接着若干耄耋老者，有男有女，自拍录像，敢怒敢言，直捣黄龙，可视为拜COVID-19所赐“疫”起开放的民意生态。网络线上鏖战，令主流媒体近乎尴尬的新阵仗，之前没见过的窘和囧，可圈可点，可乐。

往届大选，对选后谁执政没悬念。过去需苦苦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候大家打叉的结果，慢慢地手机替代一切，听消息改为听四周哗然而起的尖叫声。依然如是的2020年7月10日晚，给予你我更多的悬念。

也许再一个五年后的打叉，才见高下，期待。

作者是本地作家



文：彭飞

官与管



小时候住小坡六马路，住家楼下早上有流动市集，售卖各式早点，周末晚上也常有夜市，与相隔两条街的白沙浮夜市遥相呼应。当时常见场景是突然有人高呼“地牛来了”，顿时一阵鸡飞狗走，有摊贩或推车或卷包袱仓皇遁逃，被逮到的呼天抢地，连人带货押上车。

后来父亲经营咖啡店，偶有稽查员登门查验，搜出有缺口玻璃杯，按数量开罚，一周收入即刻打水漂，店里老食客会低声说：“这些地牛厉害。”

稽查员其实属于低层公务人员，有了专属范围权力，就能让人烦不胜烦，甚至痛不欲生。电视剧里令老百姓

寝食难安的往往不是县太爷，而是一干恶形恶状的衙役公差，避之不及则随时大祸临头。

中国传统社会官文化盛行，士农工商“四民”里读书人至上，“学而优则仕”，即使芝麻绿豆小官，庶民心中仍属光宗耀祖头等荣誉。父亲这辈人，南来前在中国乡间饱受贪官酷吏欺凌，英殖民时期因语言不通，上现代官府衙门办事倍受折腾，对大小官员向来只“畏”不“敬”。

文字学家考证“官”其实是“馆”之古字，在“馆（官）舍”内任职之人引申为“官（员）”；而“管”古时与“官”相通，除“官吏”之意，也有“管辖”、“管束”

等义。“官”与“管”自古便形影相随，有官存在之地，庶民百姓便难摆脱被管束、管控的命运。

现代政府已非封建官僚，代议士取代传统父母官，由一人一票民主程序遴选，竞选口号是标准化的“为人民服务”，但本质上始终是当官，并在授予权力之后，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管控着你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从旧时朝廷委派到今日选举产生，仍然是画出一块万民辖区，由官员统领管治，下设各层级小吏，鸣鼓申冤与拦轿喊屈已属影视画面，但民意产生的机构组织，仍然避不开官与管的传统模式。

去年清理家里旧物，有些家具要丢弃，致电市镇会询问，柜台职员转接高层，对方问了住址后，说：“我们只服务组屋居民。”要求说明为民服务机构拒绝服务私宅居民的理由，对方复述同样答案，客气、冷漠而毫无转圜余地。

其实住家与联络所、市镇会、居民委员会的直线距离都在1公里范围内，与民意代表的距离却几乎是天涯海角。迁居本区二十年，历经多次选举，却从未见到任何在任者与竞争者上门家访，仅透过电视影像单向传播。

今年大选遇上冠状病毒疫情，阻断措施更给了无需沟通接触的理由，只在邮箱里见到一份份毫无温度的宣传册子。选前周末最后冲刺时间，远远听见竞选广播，隆隆车声过后，连个人影都不见。偶尔夜里出门，灯柱上悬挂一个个竞选人像宣传板块，苍黄街灯下，竟有几分诡异，远远连绵犬吠声更增添凄厉。

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有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古时皇帝深居禁宫，远离百姓，不知民生疾苦；而官僚体制造就大大小小名目繁多官员，对百姓的管制剥削导致民不聊生。腐败专制的封建体制挤压着人们生存空间，越是动乱年代，越是向往远离王法管束的“桃花源”，偏远山林里安身立命。

住处无官来访，大小事无人管，自然也就无大官小吏相扰，所谓“山高皇帝远”，可以高唱《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

正得意间，门铃响了，环境稽查员上门检查伊蚊，美梦碎落满地，这世间原就不再存有官管不到的空间。

作者为本地作家

／文：岳缘

大选与统计学



随着新国会的成立，我国独立后的第十三次大选正式完成了任务。这次的大选少了群众大会的热闹，多了网络视频，也多了多方各种社交媒体的报导和评论。从提名日到大选落幕，几乎每篇分析的报告，都少不了各种统计数字，正好利用这次大选来重温统计学。

出现得最多的，也是最基本的是比值，把两个要比较的量相除得到的结果就可以知道它们相对的大小。如果把其中一个数量除以两数之和，再乘以100，就是百分比，或者我们更常用的巴仙(%)。接着就是各类的图表，当要比较的东西超过3个时，有云“一图胜千字”，用图表

就更能看出数据的大小和不同。这次大选就用了许多如直方图、长条图、圆饼图和折线图等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反而是平均值就好像没有出现过。

最接近平均值的是《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的报导：最年轻的候选人23岁，最年长80岁，中位数49岁。中位数是指把全部192个候选人依年龄排列，排在第96和97的那两个人的平均年龄。如果把全部人的年龄加起来再除以192，得出的才是所有候选人的平均年龄。当然还要再计算其标准偏差，才能够完整地显示出这次的候选人的年龄分配情形。或许觉得这个讯息对大选分析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也就没有人去计算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为什么抽样计票结果和最后计票结果那么相近，是巧合吗？那么就要温习一下统计学里的抽样理论了。抽样计算属于统计学里的“推论统计”领域，在大约100年前才趋于成熟而成为目前应用最广的分支。要正确应用抽样计算的“事件”的总体数量要大，参与的“样品”以及抽样的方法都必须是随机和没有先决的偏差，所以这就适合用在大选计票的程序里了。

我们假设大选是完全随机事件，候选人的成与败的或然率都是0.5 (50%)，所以整个大选事件的或然率分配就会符合“常态分配”图表 (Normal Distribution)。从图表中可以查出，如果要95%的结果都符合这分配的话，它的“置信区间” (Z) 等于1.96，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1.96是95%“置信度” (可信度) 指数。当然从图表也可以查出90%的Z是1.65，99%的则是2.58，而一般常用的是95%。有了“置信度”，再计算“常态分配”的最大标准偏差 (D)。D是事件的“成与败的或然率之积的平方根”，因为成败的或然率各为0.5，所以 $D = 0.5$ 。再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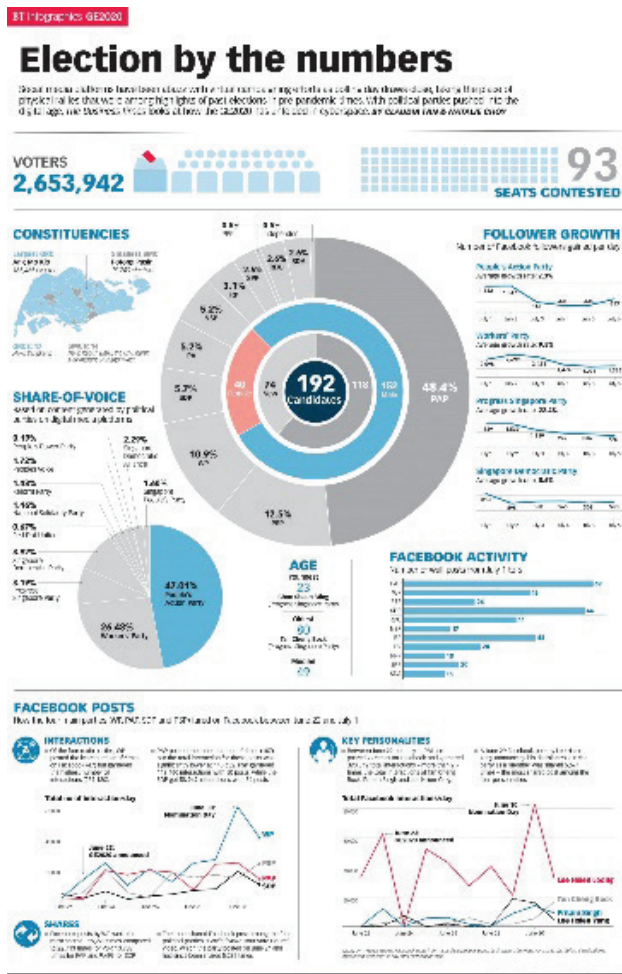
抽取样本的数目N，代入以下公式：误差 (W) 等于“Z与D之积，除以N的平方根”，那么抽样计票结果与实际计票结果的误差 (W) 就可以算出来了。

根据选举局的网站提供的资料，每个选区会被分成若干个 (k) 投票站，每个投票站会随意抽出100张票，所以总数就是 $N = k$ 乘以100了。从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来求证以上误差W的算法的准确度了。以阿裕尼选区来计算，有51个投票站所以 $N = 5100$ ，得出 $W = 1.37%$ ；实际计票结果的误差是 $(60 - 59.93) = 0.07%$ 。宏茂桥 $N = 6400$ ，得出 $W = 1.23%$ ；实际计票结果的误差是 $(72 - 71.91) = 0.09%$ 。再看看武吉巴督， $N = 1000$ ，得出 $W = 3.1%$ ，实际误差是 $(57 - 54.8) = 2.2%$ ，最后再算荷兰-武吉智马， $N = 3800$ ，得出 $W = 1.59%$ ，而实际误差是 $(68 - 66.36) = 1.64%$ 。所以可以总结地说，依据这个抽样程序进行的话，有95%的把握可以预测得出，抽样计票与实际计票的结果相差在2%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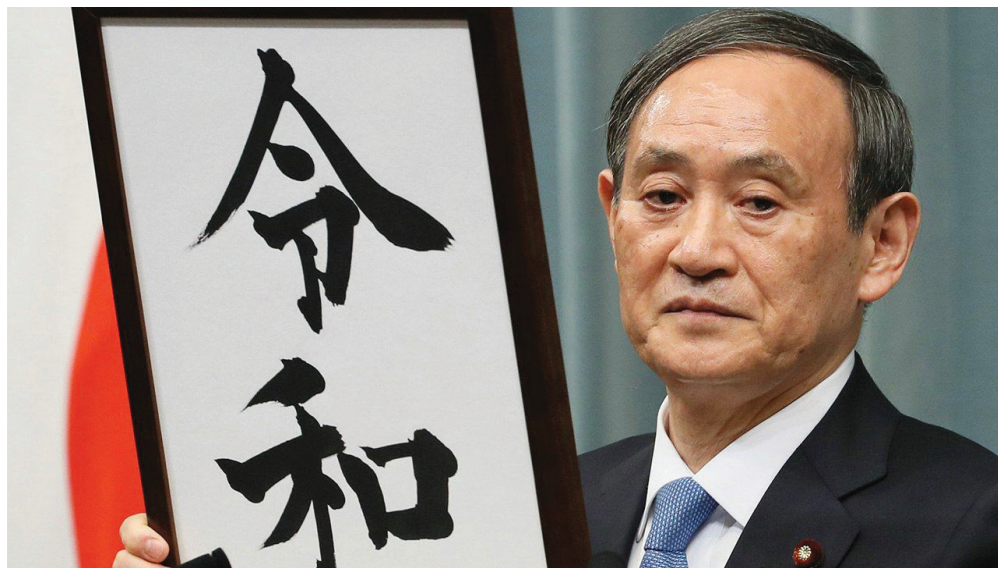
如果符合了事件的先决条件和假设，统计学是可以得出相当准确的结果的，但是也不能迷信统计学或者滥用之。就以大选成绩来说，统计学虽然可以用来估计抽样的误差，但也谨此而已，它只有“数据”而没有“为什么”的内涵。大选过后有很多关于得票和失票的分析，统计学在这里就用不上了。因为投票是秘密的，因此就算事后有足够数量的问卷调查，所得的资料也没有绝对的可信度。假设能够综合和推论某些原因，但不可能知道每个原因的相对比重。如果只快速敷衍地下定论，没有“深民间”去感受“地气”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结果就会是浪费资源解错题了。

既然知道了抽样理论的原理和计算，在来届的大选，如果抽样程序没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抽样结果，很有把握地预测到最后计票结果。除非两党的抽样得票率相差在3%之内，否则就不必要灌咖啡挨到半夜，苦苦等待实际计票结果的出炉了。

作者为工程师



《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 有关2020大选的统计图



文：黄彬华

派阀政治依然掌控日本

原本在日本政坛默默无闻的菅义伟，当了首相安倍晋三近八年发言人（内阁秘书长）之后，一是天天上报上电视，二是当众扮演政务不分巨细全由他拍板的肥皂剧，结果，竟然也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传媒又给他图文并茂封了个“令和大叔”称号，加上无派阀、非世袭、草根出身的“三无政治家”盛大宣传，不仅成了自民党政权中一个罕见又突出的“庶民政治家”形象，显然又成了日本政坛一个另类的拔萃人物。

庶民政治家也能登上政坛高峰，这是第一个惊喜。号称“无派阀”的菅义伟，能够左右逢源，反而在派阀林立的自民党内受到所有大派阀的一致拥戴，这是第二个意外。前首相安倍晋三暗示，这次选举后继首相，他不偏袒，也不左右投票，菅义伟竟然获得五大派系、约八成议员的公开力挺，这更是一个奇迹。

再做台湾白日梦

安倍晋三号称因病下台，菅义伟乘虚而入，即刻便以“继承”安倍政权姿态独占鳌头，并在组阁过程中故意保留了绝大部分安倍内阁成员，包括副总理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经济财政兼再生相西村康稔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伏笔，是让安倍晋三的“岸”姓胞弟——岸信夫出任防卫相。

这到底是安倍晋三的深谋远虑，还是菅义伟在投桃报李，即刻把防卫相这个敏感位子双手奉还“安倍·岸家”的呢？虽然情况有些复杂，但在关注日本动态者心里，“岸信夫问题”的突然显现，不仅意味着安倍晋三不会因此就退出江湖，更是在暗示，安倍不仅准备东山再起，还打算重组“安倍·岸家”王朝呢！（岸信夫确实是安倍晋三的胞弟，只是他从小被过继给其舅舅岸信和，故改姓岸。同样属于自民党细田派。）

菅义伟在日本政坛意外发迹，源自他当了安倍晋三的“管家”，经过近八年的相濡以沫，又再度遇上安倍的二度中途辞职风波，外表是菅义伟临时受命，真实是菅义伟从管家变成真正的首相，投桃报李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但是，岸信夫的出现，即使是投桃报李，却又有露出日本政治另有拐点的滋味，就是“日本的台湾白日梦”又公然显现了。

众所周知，岸信夫是现代日本的“台湾帮”首领，过去是李登辉的代理人，现在则是蔡英文的联络人，他虽然不是以首相安倍晋三胞弟身份参与日本的涉台政策，依然是以“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身份活跃于日本政坛。菅义伟首次组阁，就把防卫相当成大礼回报给安倍明确说明，菅政权不仅会忠诚于安倍路线，更会将扶持安倍·岸家骨肉再建权力中心的任务视为己任。

“安规菅随”必然变种

不过，“安规菅随”换汤不换药执政能行吗？日本不论是舆论界还是一般百姓都普遍认为，安倍过去既有“病后复辟”的记录，这次渡过难关之后，只要有第三次重掌政权的需要，他还是会拼命尝试的，何况现年66岁的他比起71岁的菅义伟永远年轻了5岁，这也就是安倍可能第三次复出的根据。

安倍晋三原本是个视权力如命的人，搞政治不仅是他唯一的专长和嗜好，更是他家族（岸家、佐藤家、安倍家）的“专利”之一。其外祖父岸信介，从二战战犯，摇身一变成了自民党政府首相；接着其外祖叔佐藤荣作也当上首相；到了安倍晋太郎一代，却只当上外相，却是终身的遗憾；直到安倍晋三，不仅两度当上首相，更两度中途放弃相位。难道，现在历史又要重演？

看来，这次他是要把相位搬回“岸家”去的了，就是打算把其别姓的胞弟岸信夫培养成另一代的首相……在思想保守又落后的日本，这些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故事，而是曾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换言之，在派阀政治依然取代传统议会民主的日本，这些都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

管中窥豹日本机会

日本第99代首相菅义伟，外表上也是通过党内选举、国会投票，天皇认证，才正式登基为日本新首相的。

但是，根据自民党党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任期原本要到明年9月才到期，但他提前辞职，继任首相的任期也就只能到明年9月结束，加上国会众议院任期又要在明年10月完毕，到时国会改选也就势在必行，包括提前或闪电大选都是可期的政治议程。

新首相菅义伟面对短命下台的威胁，一便是执政自民党内部大佬们是否对他继续支持的问题，二是大选自民党能否保住众议院的多数议席，不仅菅义伟政权摇摇欲坠，连自民党政权也将生死存亡。因此，当前日本人普遍的担忧，一是长期政权下的“稳定”必将结束，二是日本又将回到“七年六相”的政治动荡局面，三便是整个日本将再度回去派阀政治横行霸道的时代！

从安倍的临阵退却，到被迫禅让，再到菅义伟的意外获得继承大位，既是日本式的政治演出，更是日本式派阀政治的升华。因此，有不少日本问题专家一再强调，“不了解派阀政治不能理解日本，不了解自民党更不能理解日本政治。不了解日本政治也就不能理解日本内外政策。”当然，首先就要了解自民党的派阀形成背景，而派阀的运作程序也必须研究，这就是日本别树一帜的背景，日本特殊性的原因，其民主的世界性落差，甚至日本总是落后于世界的基因。

日本这次出现政治变异，从安倍的戏剧性下台，菅义伟的童话般登场，再到政治的季节性变动，给了世界再一次管中窥豹日本的机会。

作者为本地前媒体人



图文：林少彬

中美之争 争什么？

当 孟晚舟两年前（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拘留时，起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家中资企业的个别事件，谁知道两年后的今天，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不能让中国领先下一代的国防科技！”，这下子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里，首先让我们了解华为5G和下一代国防科技的关系。

首先，华为这家公司，的确年年投入巨资和大量科研人才，在通讯科技上获得了惊人的突破和进展，这是获得世界各国顶尖的行家们公认的事实。而且华为是在由美国主导的通讯科技标准机构的支持下，在公开透明的科技发明权竞赛中，遵循先发明者为赢家的原则，年年赢得了大量的5G发明专利。

笔者曾经在2017年6月本刊第32期第72页，列举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公布的实际数字，华为在2015年一共获得800项专利，在第二年而且以150%的井喷式增长获得了1,202项专利。在2018年一共提交了5,405件申请，遥遥领先欧美群雄。截至2019年10月为止，华为在中国拥有51,592件专利，美国16,982件，欧洲6,937件，德国6,853件，英国6,526件。

华为在不断创新的正能量推动之下，率先全世界从2019年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提供5G服务。2019年4月，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夫妇还受邀出席了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观赏了采用5G的展览会场和各式表演。8月18日，深圳成为中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大城市。（注：深圳市面积

约2,000km²，为新加坡的2.8倍；人口为1,344万人，为新加坡的2.4倍）

什么是5G？

那么，什么是5G呢？最简单的比喻可能可以用“未来的超级高速公路”来形容它。

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样的画面：首先是今天的高速公路，就是我们常见的双向各四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但是它在高峰期还会出现交通阻塞的状况。跟着，是一幅“未来的超级高速公路”的画面，这条公路也是双向，不过各向拥有20条车道，而且还并排着高铁和磁浮的轨道。这条公路无论是在什么时段，都畅通无阻。5G的网速是4G的10倍以上，一部1G的电影只需3秒就能下载。4G的时延为30-70毫秒，而5G低于1毫秒，为远程遥控应用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现有的高速公路网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设施（简称基建）之一。上述凭空想象出来的“未来的超级高速公路”可不是钢筋水泥建筑物，它是以为首的科学家们研发出来的新一代通讯科技，它是能够带给广大用户更快捷更美好生活的新型基础设施之一，不过，它是肉眼看不到的新型基础设施，简称为“新基建”。新基建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IR4.0）的基础。

[注：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在2020年4月20日发布了“新基建”的定义，5G被归纳在“信息基础设施”领域，该领域再细分为三：第一，通信网络基础

设施(如5G等);第二,新技术基础设施(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和第三,算力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等)。据悉,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正在积极部署新基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相关报道。]

正是因为5G是新基建里头至关重要的科技,山姆大叔突然醒来发现,从纽约到洛杉矶的“未来超级高速公路”竟然将会是“Made in China”?!这口气怎么能吞得下去,于是就炸开了锅!

那么,5G和国防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的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数码通讯战争。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减少伤亡和争取选票,正在把传统的海陆空三军(和太空军)逐步以无人化武器取代人力,比如,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太空船等。就如图1的我国某军工企业开发的无人巡逻艇,它可以让我们家的宝贵子孙坐在舒服的冷气房里,眼看屏幕手按键钮,就可以操纵这艘无人巡逻艇的行驶方向,还可以遥控船上



“Made in Singapore”的无人巡逻艇(笔者摄于2010年新加坡航空展)(图1)

那架无人机枪(图1中央部分),锁定目标连续发射,比起玩电玩还更刺激,而且轻松无比。

但是,一切的远程操控,都需要安全可靠又高速的无线通讯设备,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愿意不愿意使用“Made in China”的5G设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会暴跳如雷,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当自己要打人时,竟然得依靠别人的设备来传达命令!这多没面子啊!

抖音(TikTok)又怎么了?

那么,抖音是什么?为何美国科技大佬想要收购抖音的美国业务TikTok呢?

抖音是个短视频应用(APP),它是当今世界各国青少年的最爱。它是字节跳动(ByteDance)公司的产品之一,诞生于2016年9月,在中国国内称为“抖音”,而在海外则称为“TikT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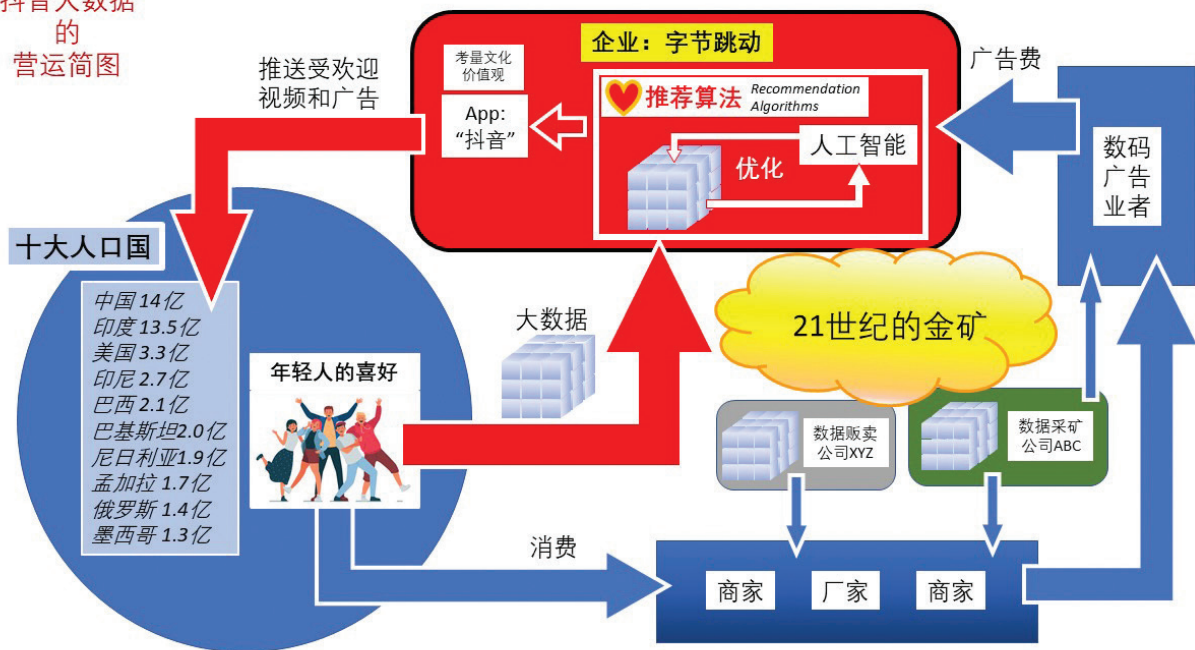
这个月刚满四岁的抖音已经成功登陆155个国家,并且“精通”75种语言,吸引超过8亿用户,超越了推特,也使脸书脸色大变。而且,抖音的用户平均每天刷屏52分钟,仅次于脸书的58.5分钟(注^①)。

抖音鼓励年轻人摄制15秒的音乐短视频上载,倘若作品能吸引一定数量的粉丝,就能升级至30秒到1分钟,到时就能“开店”卖东西甚至接广告等。抖音还会分析用户的喜好,帮助广告主们自助投放广告,精准触达目标人群,提高商家的广告效益。

笔者尝试绘制图2以说明字节跳动公司如何活用大数据,创造出良性循环的过程。图中,红箭代表数据流向,蓝箭代表财务流向,以反时钟方向旋转。12点钟的红色大长方盒是字节跳动公司的大脑中枢。

首先,字节跳动公司在市场战略上锁定了牵引消费的是年轻人,因此掌握年轻人的喜恶数据至关重要。在这个战略之下,年轻人的“赞”与“不赞”的数据能够收罗的越多,就越能够提升人工智能市场分析的精准度,提高推荐算法的身价,所推送出来的视频和广告受欢迎的机率就越高(红箭向下),青年人之间口碑一旦传开,用户就会越来越多,能收集到的数据就顺势增长(红箭向上),另一方面,被广告诱导的年轻人激情的购物消费(蓝箭向右),商家厂家得益,增加广告(蓝箭向上),抖音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有资金进一步优化人

抖音大数据的 营运简图



抖音大数据的营运 (2020年9月15日绘制) (图2)

工智能和大数据 (白色长方盒), 提升算法精度, 创造出一个良性循环,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多的双赢经济效益。

大数据一旦运用得好, 就简直像是双手抱着一座“金矿”, 越懂得挖掘数据, 就越能够挖到更多的黄金, 难怪有人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金矿”, 或者“二十一世纪的石油”, 谁的手上有大数据, 谁就能制胜天下。过去在中东发生过的战争, 有学者称之为石油资源战争, 那么, 在二十一世纪里, 我们应该会看到几场“数据石油资源战争”。

今天美国TikTok收购案的焦点在于: 美国的年青选民的喜好情报, 现在在谁手中? 11月大选即将来临的美国应该怎么办? 这才是为何美国当局着急的原因。

从保卫抖音的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使出“禁止‘推荐算法’出口”(图2红心之处)这一绝招, 可谓四两拨千斤也。(未加工的原始数据是没有价值的)

总而言之, 华为也好, 字节跳动也好, 他们的创新科技和大数据太成功了, 致使惹来了横祸。同样的, 还有几家中国的企业, 他们在其他领域上也遥遥领先全世界, 看来安宁的日子很快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面对蛮不讲理的来犯者将会变成一种“新常态”。

不过, 从高处远望, 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和几家民间企业, 正开始带领着中国转型升级。我们相信, 向来有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 将会在下来的四五年内大力建设“新基建”。读者将有福气看到中国人民在新基建上的新生活, 新工作, 也将有机会看到“世界工场”在第4代工业革命中所创生出来的新产业、新服务。在此, 期盼新工作新服务之中, 有些部分能够来到新加坡, 也帮狮城转型升级。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注¹: 2020年7月3日, Oberlo, 10 TikTok Statistics That You Need to Know in 2020 [Infographic]



文：刘家明

5G 通讯系统的意义

由于冠状病毒COVID-19 的发生，国际组织“第三代（通讯系统）合作伙伴计划”（3GPP）¹在今年7月3日，针对5G通讯系统（以下简称5G）发布了第16版的规格（Release 16），比原定计划迟了将近7个月。这个消息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说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兴趣，不过对全球通讯科技界来说却是个了不起的消息，因为它是未来通讯科技5G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2013年的5G 规格白皮书的拟定到现在，全球的通讯规格标准制定机构，经过了7年的合作、研究、开发和磋商，终于完善了整个5G的架构和设计。5G现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通讯网络系统，不必依赖现在我们熟悉的4G-LTE的科技的支持了，5G也可以在不干扰现状的情况下，慢慢发展而最后取代4G-LTE系统。

究竟5G有些什么卖点和吸引力呢？由于每个国家的操作环境和选择的硬件设备不尽相同，所以很难拿实际的数据来比较。既然我国已发了5G执照，由明年中开始推出5G服务，所以就选用我国资讯与媒体发展局（iMDA）所设定的标准为例子来简述好了。首先是快，5G的传送速度要比现在的快20倍；5G主要是无线移动通信，所以在时速350公里的情况下也要能够继续提供服务；在1平方公里的面积里要有能支撑1百万个接驳点的密集度；最后就是系统要能达到1毫秒的超低“时延性”，也就是要比现在的4G-LTE快上25倍。这样一个“快、动、密、低延”的通讯系统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又有什么好处呢？

5G的超性能对一般只有通讯需求的消费群来说，最多是在汽车里下载一集韩



剧时比现在快了大概20倍罢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用处。但是对网络游戏玩家来说，这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网络。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5G，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不间断地进行游戏博弈了。还有就是加上各种虚拟现实(VR)、增强实境(AR)和综合实境(MR)等游戏软件和设备，基本上任何角落都可以被转变成网络多人同步游戏平台，商机无限！

由于科技的飞速进展，全球开始进入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时代了。4IR的四大科技宠儿：人工智能、区块链、云端科技和大数据都必须要靠5G的支撑来收发数据，才能发挥全部潜能；与此同时5G也将带动了对“边缘处理”(Edge Computing)的需求和发展，5G是未来智慧工业社会的支柱。遥控机械人，无人飞机，无人操作运输系统等都需要超“低时延”的无线网络，才能确保安全。例如目前的无人驾驶科技，因为4G-LTE的速度慢和“时延性”高，故不能满足规格要求，于是利用多种感应器，雷达，摄像机，终端处理机等等添加辅助科技，所以操作非常复杂和昂贵，也还不能达到对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性，所以在广泛推行方面遇到问题。这些也都只是冰山一角，其他金融，银行、商业等领域，运输和物流的“物联网”(IoT)以及分支出来的“工业物联网”(IIoT)也需要一个超高性能的系统来支撑，所以5G有它在4IR里的实质需求和地位。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5G科技所提供的超性能也是国防、国安和民防必备的，它对国家应对各种安全事故时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具体的例子就不多说了。世界各国憧憬的未来世界，智慧城市和智慧国，没有至少像5G这样的无线通讯系统，是不能有效和经济地完成的。就只从科技方面为出发点，智慧城需要数量非常大，种类非常多的感应器，能及时收集和传送资料到云端，以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分析和做出及时的决定。就如“智慧交通”里的每一部智慧车至少都要用到几百到上千个低价的感应器互相“交流”，同时也要与其他智慧车交换讯息，也就是达到所谓的从“车际联系”(vehicle-to-vehicle, V2V)，到与车外系统的“车物联系”(vehicle-to-everything, V2X)等等的的应用。智慧交通也只不过是智慧城里的一个项目罢了，我们还有智慧医疗，智慧环境、智慧能源、智慧教育，智慧休闲等等，没有5G科技真的是搞不定的。

从以上明显的一些例子，可以想象到5G对未来世界的重要性。谁控制了5G科技，谁对未来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因为这样5G才被抬上了国际舞台，成为强国政治博弈里的筹码。装置一个全5G通讯系统，需要规格专利，高端芯片，终端器材(如手机)，操作软件，基础建设配备和电讯公司网络。在研发方面，华为贡献的专利最多，美国高通的芯片最先进，韩国的三星和华为的手机也已面市，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则还在与合作伙伴发展。目前发展得最快，能够独当一面推出完备的5G系统的公司就只有华为了，华为系统的价格也相对较低。美国借用国家安全为名的封杀华为行动，背后其实还有贸易和经济保护美国公司利益的目的。如果各国跟随着美国行动，不但会拖慢了提供5G服务的进程，还会大量增加设置成本。所以就算世界封杀华为行动成功，也将会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Victory)，而且这还更会是“杀敌八百，自损一万”，得不偿失的惨胜哩！

根据计划进程，3GPP会继续在明年或较后发布第17版的规格，不过大体上只是对现有的第16版的某些方面的改进或补充，应该没有什么大突破了。所以目前各科技巨头已开始讨论6G系统，去年七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行动通讯会议(Mobile World Conference)就已经有与6G相关的讨论了。虽然还没有对6G具体的规格和设备做出预测，一般相信6G会在2030年后完成研发。不过在目前新冠病毒COVID-19、科技和贸易战、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洗牌的阴影下，经济发展和4IR的路程充满变数，5G通讯系统是否能如期如愿地广为人服务，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注¹：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成立于1998年，讨论和制定电信通讯标准的机构。成员包括各国的电信标准机构如欧洲的ETSI、日本的ARIB和TTC、中国的CCSA、韩国的TTA、北美洲的ATIS和印度的电信标准开发协会。3GPP的目标是在国际电信联盟IMT-2000计划范围内制订和实现全球性的(第三代)移动电讯系统规范。(节选自《维基百科》)

／ 文：陈定远

中美 经济

新冠疫情下的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以来，至2020年9月7日，全球累计病例已超过2700万例，死亡人数累计88万人，每日新增病例约24万例。美国累计病例为全球之冠，累计超过627万例，死亡人数累计达到19万人，每日新增病例约三四万例。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防控明显不力，甚至可说是失控。在中国，新冠疫情基本上已得到全面控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极少，人民生活已步入常态。



在新冠大疫之下，世界经济格局又有巨大的变化，使到中美经济的紧张关系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除了疫前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制裁中国华为等企业，鼓励美资撤华等之外，疫情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失业率，让美国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又创新高，贸易赤字还在继续，美国经济大受打击，复苏的前路漫漫。

另一方面，中国在新冠疫情发生三个月后，就已经将疫情控制住，开始朝向经济复苏的道路前进。目前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非美国莫属，疫情拖住美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使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短。

疫情发生之后，油价跌至谷底，金价节节攀升，美元虽没有什么贬值，但美国大量放水，美元数量激增，激化许多国家的去美元化行动。在这个大背景下，让我们谈谈新冠疫情下的中美经济。

美国经济掉入黑洞

疫情影响所及，让各个领域进入“停摆”，各国的经济活动无不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疫情肆虐，一声令下，人们不得外出，居家防控，各娱乐场所、百货商场、餐馆、工厂，旅行社等都迫关闭，工人停工，店铺没有生意，收入全无，可是企业的工资和租金还得照付。如果这只是短期的困难，勒紧腰带也就能够挺过去，可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情况没有好转，工人失业，企业倒闭，与日俱增。

七月底，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萎缩32.9%，是近80年来有统计数字以来最大的降幅。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萎缩为5%。

疫情对民生的影响也很严重，第二季度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骤降34.6%，个人的消费突然减少三分之一强，这也是有统计记录以来萎缩最大的一次。因为疫情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服务支出减少，重挫43.5%。

美国有人非常形象地把这种情况比喻为：美国“掉入了很深的黑洞”，“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爬出来”。眼看美国疫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美国尚未掉到黑洞底层，而且还在掉，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爬出来，尚未可知。新冠疫情致使经济停顿，经济必须重启。经济若无法重启，民生就得不到改善，而经济能否复苏，

取决于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如果继续增加，重启经济计划无法有效展开，会掉入黑洞的更深一层。

需更多财政支助

看看下面这些数字，就能知道美国的失业纾困计划有多沉重。

美国目前约有失业人数近4000万人，如果新冠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失业人数还会增加。7月3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43.4万人，此前一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则为142.2万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造成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19周超过100万人，其中，今年3月和4月失业人数最多。5月，美国开始重启经济计划，失业问题有所缓解。但是随着近期疫情反弹，情况又再恶化，美国失业人数又会增加。

有人估计，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将达到全国人口16%的峰值，明年的失业率也有可能至少为10%，美国人口约有3亿人之多。

由于疫情影响民生巨大，美国政府在今年三月推出一个2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为每个失业人员提供每周额外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这2万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到七月底已经发完，过后，失业者的每日支出将如何筹措？目前还没有下文。

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主席鲍威尔指出，在财政政策上，美国经济需要国会和总统提供更多的财政帮助才能恢复；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必须维持基准利率在历史的零利率低位，必须购买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向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他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增长，第四季度继续增长。

掠夺各国财富数十年

美国虽然是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可是负债累累，国债总额已达26.5万亿美元，如果不是美元霸权的赐予，美国也许已经像阿根廷一样，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美元霸权让美国在全球享受特权，一直享受着别的国家未能享受的双赤字(政府财政与贸易赤字)特权，一直在收割各国的财富，而且为时已经数十年。

今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将增至6.6万亿美元，政府财政收入却在减少中，估计今年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为3.3万

亿美元，是2019年赤字9840亿美元的三倍有余，为有史以来最高的赤字记录。

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债）为1.074万亿美元，持有美债总额只排在日本之后。今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债，今年首六个月就抛售了1060亿美元的美债，未来有可能还再抛售2000亿美元的美债。不仅中国在减持美债，许多国家也在抛售美债。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国债规模的扩大、黄金涨价，加速了各国去美元化的步伐，参与去美元化的国家竟有41个之多。

要知道，美国政府财政不是这几年才入不敷出，说出来会让人吓了一跳，美国政府财政发生赤字，原来已经有40年的历史，年年钱不够用，没有一年政府财政是有盈余的。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赤字，就是贸易赤字，美国的进口大于美国的出口。美国商务部最近公布，今年7月份商品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到636亿美元，6月逆差为535亿美元，今年贸易总产值大约会有7000亿美元吧。进口年年大于出口，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有40年的历史了。美国年年进口大于出口，这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是拜美元霸权所赐。

这就是美国一直存在着的“双赤字”问题，这是美国一直不去解决，如今也不可能解决的“双赤字”问题。请问40年来，赤字年年，美国双赤字累计下总有近万亿美元吧？

美国的双赤字窟窿，都是用美元霸权来填补的。凡遇上赤字，美国就放水，增加美元货币投放量（就是我们俗称的印钞，其实不必印），来填补赤字。外国不论卖货给美国，还是贷款给美国，得到的都是美元。外国手头上持有的海量美元，实质上也是美国债务的一种，只是这种债务，是不必用美国资产来偿还。滥发美元，以美元换取外国物资，这不是掠夺外国资产又是什么？

美元量化宽松措施无限量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显示，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率也在逐年下降中，从1995年的79%下降至2015年的58%，这个比率还在逐年下降中。如果美国在贸易上和中国脱钩，不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使用美元结算，那么，中国将继续抛售美债，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势必增

加，此举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今年发债总额将高达其GDP的98%，不仅是有史以来最高，也远远高出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60%。情况虽然严重如此，但美国政府毫不担心，就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美国还债绝无问题，因为美国随时能够“加印钞票”，用以偿还债务，而且美元广受人们欢迎。

在美国掌控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下，一盎司黄金的价格在1945年为35美元，今天，黄金已经涨到2000美元一盎司，黄金对美元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7倍，而美元相对于黄金则贬值了98%，美元几乎贬完，然而对世界各国货币而言，美元依然坚挺，坚不可摧，原因就是美元至今仍然通过SWIFT享受强大的霸权。这也难怪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德国和中国等国家，要把他们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其本国。

今年来，为提振经济，美联储经过两次降息，利率已降至0%，并宣布其开展的量化宽松措施是无量化的，换句话说，如有需要，美元货币量的增加是没有限制的，因为，疫情所需的支出，提振经济所需投放的资金量之大，美元大放水，是不可预估的。

中国经济扭转收缩

反观中国，由于成功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实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温和而不过于激烈，自今年三月起，经济活动已经逐渐复苏。根据7月中公布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换句话说，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3.2%，第一季度经济萎缩，下降了6.8%。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人心振奋，这是全球第一个在新冠疫情期仍旧不容乐观的时候，扭转了经济收缩，转负为正，取得经济增长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做出研究预测，全球经济在2020年将面临经济收缩，GDP降幅估计为4.9%。鉴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控制，预计世界经济将呈现负增长之时，相信中国经济今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正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谁遏制了新冠疫情，谁就能取得经济复苏，对疫情的控制，绝对是重中之重，必须当作头等大事来做。

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果断政策，实行多种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封区封城，不惜动用大量的资源，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便成功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

另一方面，控制疫情的同时，如何开始重启经济计划，必须小心翼翼，拿捏得好，离不开精准溯源，精准防控。倘若处理不当，因为复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可能触发更多的新冠病例。在适当温和的重启经济措施下，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得到复苏，便有了后来的3.2%经济增长。有人预测，到今年底，中国的GDP将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中国的经济活动的迅速复苏，制造业加大马力，加上中国供应链的超强韧性，能够有效修补各国的短板和不足，确保全球产业链的不会断裂，保证货品的正常供应。《纽约时报》惊叹地说道：按理今年是中国“出口机器”停滞的一年，因为来自外部的加征关税、鼓励企业撤离中国，以及疫情蔓延令工厂停工，但复产复工之后，中国企业强势回归展开出口闪电战，这种优势可能在世界从疫情恢复后会持续很久。

中国仍为美国第一贸易国

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由美国首先挑起。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占其GDP仅为0.5%，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这个比例为3%，因此关税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贸易战下的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要比美国来得高。

中国经济的“转正”，不靠外国的需求，不靠外国经济的拉动，靠的是中国国内巨大的人口，强大的经济，足够的内需。

目前的国际分工没有改变，国际贸易的结构也没有改变。在这方面，中国优势在国内其广大的市场，还有强大的企业生产网络，这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强大保障。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额有显著的下降，但是自中国控制新冠疫情之后，就在今年四月，中国又恢复成为美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国。此外，中国今年7、8两个月的出口也表现得非常强劲。

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果断裂，货物供应严重短缺，需求大于供给，物资供应不足，接踵而来的将是全球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比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所发生的滞胀更为严重，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曾高达双

位数。在此，中国在避免可能发生的一场全球经济滞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提升，令中国能够重塑全球产业链，而产业链的日趋完善，对确保全球产业供应链不断裂，保障其完整与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从今以后，中国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将下降，世界经济依赖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将增高。

今年的新冠疫情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今年中国的经济复苏已全无悬念。此次新冠疫情对美国会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影响，也许这是美国经济和国力衰退的开始。40年来。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货币投放量不断扩大，今年的疫情，会使这三个“不断扩大”进一步扩大，其结果只会是美国经济和国力的逐步衰败，而中国的经济与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作者为中国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教授



文：林恩和

经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党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 (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 (C C Tan) 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立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ï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



工人党在后港的群众大会万人空巷

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 ‘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的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 A1838,3024/1/7 Part 1）

1957年11月3日马绍尔宣布工人党（Workers' Party）正式成立，以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诉求。在当年马来亚意识高涨的年代，工人党也把追求一个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当作奋斗目标。马绍尔建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工党，为此他曾特地到伦敦工党总部学习组织工作和取经。工人党在成立初期表现强烈的亲工人的色彩，在30位执委中，工运人士就占了20位，这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它的党名。假如要给

它归类，工人党在政治谱系中处于偏左位置。马绍尔自己把工人党的政策和主张，定位在介于右派的劳工阵线和左派的行动党之间。

1957年12月的市议会选举给新生的工人党一试身手的机会，虽然作为主席的马绍尔没有参选，它在32选区中只派5个候选人参选，结果有4位中选，这对于初试啼声的工人党无疑是好成绩。

政治黑箱操作下的牺牲品

这场市议会选举，另外一个以反殖和社会主义为诉求的人民行动党也参与，它的14位候选人有13位中选，成为市议会的执政党。从创党到执政市议会，行动党的反殖、争取独立和主张社会主义的立场，已经取得大量选民特别是华族选民的认同。工人党在这次的胜利也展示它的实力，在行动党的李光耀看来，面对一个和它立场大同小异的工人党竞争，行动党在即将举行的自治邦首届大选，要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得不利。他认为工人党能够取胜是因为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行动党主席杜进才也说“最大的对手将会是工人党”。当时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则表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工人党必将在大选中取得好成绩”。（见NAA 1838,3034/2/1 PART 6）

行动党在市议会的胜利，让前一段时期因为领导权受到党内左派挑战，有意与林有福结盟的李光耀，在权衡利害关系之后放弃这个想法。为了制衡党内的左派，也化解共产党对其他反殖政党的支持，遂有1958年3月李光耀和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秘密会见。李光耀此举是寻求共产党的合作，以便为他走向执政之路保驾护航。

在李光耀和马共之间的黑箱操作之下，1958年8月4日发生“郑越东辞职事件”。郑越东是工人党副主席，也是电器与无线电工友联合会主席，1957年在工人党的旗帜下中选市议会加冷区议员。他以工作繁重难以分心兼顾市议员的工作为由，辞去市议员的席位，同时宣布辞去工人党副主席。紧接下来的由于郑越东辞职而举行的加冷区补选，工人党候选人罗嘉法遭遇惨败，按柜金被没收，行动党候选人则取得压倒性胜利。工人党在这次补选失利，一般认为是失去左派群众支持的结果，而行动党的胜利，证明李光耀的策略是成功的。

这次补选的失利对马绍尔来说是灾难的开始，对工

人党的打击接踵而来，首先有5位工人党执委退党，加入人民行动党，接着他的前战友林有福，联合自由社会党组织新加坡人民联盟（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工人党仅存的三位市议员及一位执委跳槽加入，让工人党一时陷入困境。

1959年5月根据第二次“默迪卡谈判”的结果，新加坡举行自治邦成立前的大选，大选过后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新加坡的政治地位也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邦”。这次大选，行动党和人民联盟全面对抗，参选全部51个议席，工人党在遭受连番的打击之后，只派三个候选人参选，其中包括马绍尔。马绍尔选择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经禧区参选，直接面对他的前战友首席部长林有福以及行动党的候选人。选举结果让马绍尔大失所望，受周瑞麒弊案缠身的林有福不但中选，而且票数竟然比他多达一倍，其他两个工人党候选人也遭遇惨败。

被边缘化的马绍尔

1959年大选，在左派的护航下，李光耀得偿所愿，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51席中获得43个议席，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行动党执政后，党内左右两派的分歧逐渐凸显。为了摆脱套在颈项的信天翁（albatross around one's neck西谚，意为灾难或不祥之物，引自吴庆瑞语，指党内左派），李光耀提出“通过合并取得独立”，和英国、马来亚联合邦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密谋商讨成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计划原是李光耀对付党内左派的杀手锏，计划一提出马上激化党内两派的矛盾。

1961年6月7日安顺区因行动党议员病逝举行补选，让刚刚在芳林区补选失败的行动党面临另一场考验。这意外而来的补选，让失意已久的马绍尔重新找到政治舞台。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份，提出废除“内部治安法令”和“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的主张，反对成立马来西亚，提出实现新加坡独立的见解。他的主张得到行动党党内左派的支持，让他在安顺补选中顺利当选。

马绍尔重新当选为议员的时候，刚好是行动党因为马来西亚的计划造成分裂，党内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包括13位立法议员被逼退出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行动党与社阵两大阵营为马来西亚问题进行激烈的攻防战，作为反对党议员的马绍尔也卷入这场大论战之中，因为是孤军作战，而且缺乏中



1961年安顺区补选马绍尔当选立法议员

心论述，立场摇摆不定，夹杂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他，显得顾此失彼。

1963年1月18日，马绍尔因与工人党副主席岑忠民和秘书长蔡毓杰，在有关加入马来西亚的公投（referendum当年称为“全民投票”）问题上产生分歧，宣布退出工人党，成为独立的立法议员。失去明星领袖的工人党因此进入冬眠期。1963年2月2日行动党政府为扫清障碍，在新加坡展开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逮捕行动，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逮捕了一百多个反对党、工运和文化社团人士，其中就包括了两位工人党的领袖，其秘书长蔡毓杰和副主席岑忠民。蔡毓杰在同年9月获释，旋即代表工人党投入同月举行的大选，失败后宣布脱离政坛。这次大选是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第五天举行，工人党仅派出3个候选人参选，马绍尔重作冯妇在安顺区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工人党则派出张素强参与该区的竞选。两人均惨遭痛失按柜金的失败，其他两位工人党候选人蔡毓杰（勿拉士峇沙区）和黄汉照（克罗卜区）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这次行动党和社阵两大阵营激烈竞争下的大选，无论工人党或马绍尔都被边缘化了，败得人仰马翻。

永不言倦的政府批评者

从马绍尔创立工人党到退党，工人党经历了5年2个月的马绍尔领导时期。客观来说，他没有给工人党留下

什么可资借鉴的政治资产，无论是在政治主张、政治愿景或党建组织上。马绍尔虽然在从政开始就想以英国工党为师，在党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组织建设方面，能够有所借鉴。不过，因为他没设法引进政治人才，建立团队来贯彻和执行这些工作，致使工人党变成一个马绍尔唱独角戏的政治舞台。工人党建党初期，是以工会团体作为基本群众的来源，也在党纲中罗列一些基本维护劳工利益的主张，仔细检测下都是一些较为空泛的老生常谈，缺乏明确的见解，这都是它明显的缺点。

马绍尔留给大家的记忆，就是他永不言倦充当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府批评者，以及他不假辞色和尖酸泼辣的批评言辞。他当首席部长时期，在浮尔顿广场的海苹果树下，首创每周会见选民为民排忧解难的做法，今天不管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纷纷效法，算是一项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吧。

1965年8月9日，与中央政府冲突不断的新加坡，终于得以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新加坡立法议会也改称为国会，选区由51区扩大到58区，在1968年举行的新加坡独立之后的首届国会大选，由于最大的反对党社阵坚持“议会外群众斗争”和反对“假独立”，宣布抵制大选，其他势力较小的反对党也不想参与。在58个选区中只有7个选区有人参选，工人党派了2位候选人参选，由其秘书长黄汉照参与义顺选区，组织秘书岑忠民则在惹兰加



马绍尔1962年6月在珊顿道群众大会

由选区，其余5个选区的候选人都是独立人士，行动党在提名日当天就宣布当选为执政党。工人党原本以为能够吸收社阵的选票，以“有效率及诚实的反对党”作为竞选口号，不过事与愿违，选举结果2位工人党候选人和其他5位独立人士均告饮恨沙场，新加坡开始进入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

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积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加强住房、教育等基础建设；在政治方面却一点也没放松，1971年5月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和煽动华文沙文主义”为由，援引内部安全法令扣留《南洋商报》4位要员。接着指责英文《东方日报》(The Eastern Sun)涉嫌接受外国资金资助，进行“黑色活动”。另一份英文日报《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也被指控是“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工具”，面对报章准证不能更新的困境。这是新加坡政府插手报业、管控新闻的先声，试图制造一种寒蝉效应。

“你必须被毁灭不止一次。”

——惹耶勒南引述总理的话

相较新加坡政治的严冬，后马绍尔时代的工人党挨过冬眠得到复苏。1971年8月留守工人党的旧党员邀请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参加工人党，他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律师。随同他一起加入工人党还有一些新血，为处于低迷状态的工人党注入活力。惹耶勒南随即被委为秘书长的重任，负起改组工人党和拟定新党纲。在他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14人的新领导层，其中4位是来自于旧领导班子，工人党的党务开始重新启动，除了在各区成立区委会，工人党的机关报《铁鎚》(The Hammer)中英文版也先后创刊。

惹耶勒南时代的开始

惹耶勒南的加入，开启了工人党的惹耶勒南时代。1972年8月的大选是惹耶勒南领导下的工人党面对的第一次大选。为了宣示工人党新的主张，他首先为工人党制定了“14点宣言”(14-point Manifesto)，宣言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强调“新的社会需要一部新的宪法”。提出“在行动党统治下必须修改和废除的错误作法”：包括归还人民基本的权力；加强议会民主制度；修改未经审讯的扣留法令；废除过度集中的权力；重新实施陪审员制度；废除雇佣法令以及大专入学准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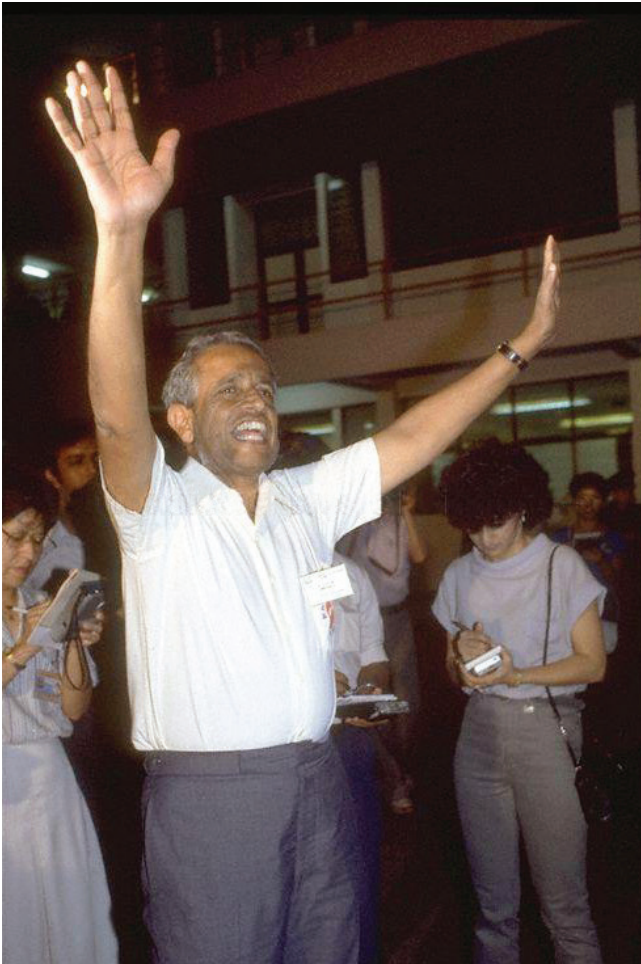
工人党有27位候选人参选，几乎占了全部65个国会选区的一半。在这场大选中，行动党参与全部65席的竞选，有8席因没人竞选而不劳而获，其他5个反对党包括2位独立人士参与其他57个选区。选举的结果行动党囊括了全部议席，虽然工人党是全部反对党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但是惹耶勒南参选的花拉公园选区，和对手行动党的李昭铭相比，只得到区区2688票，令他大失所望。这次选举新加坡经济刚好进入快步发展时期，选民相对关心的是面包和饭碗问题，工人党“14点宣言”强调基本人权和公平法制，难以引起大部分选民的共鸣。再加上执政党对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提出质疑，影响选民对反对党候选人的观感，也对工人党造成影响，因此只能在工薪阶级和平民中吸收到选票。

大选过后工人党通过其代表律师惹耶勒南，起诉行动党候选人郑文滔以及广播局涉嫌毁谤，因为郑文滔在竞选演说中指责工人党接受一笔60万元的资助，作为竞选经费。不过两项起诉均告败诉，造成工人党的大笔财务负担。事后美国《新闻周刊》的新加坡记者冯清莲写了一篇报道《新加坡选择性的正义》，发表在当年11月11日的国际版，因而吃上官司，被处以1500元的罚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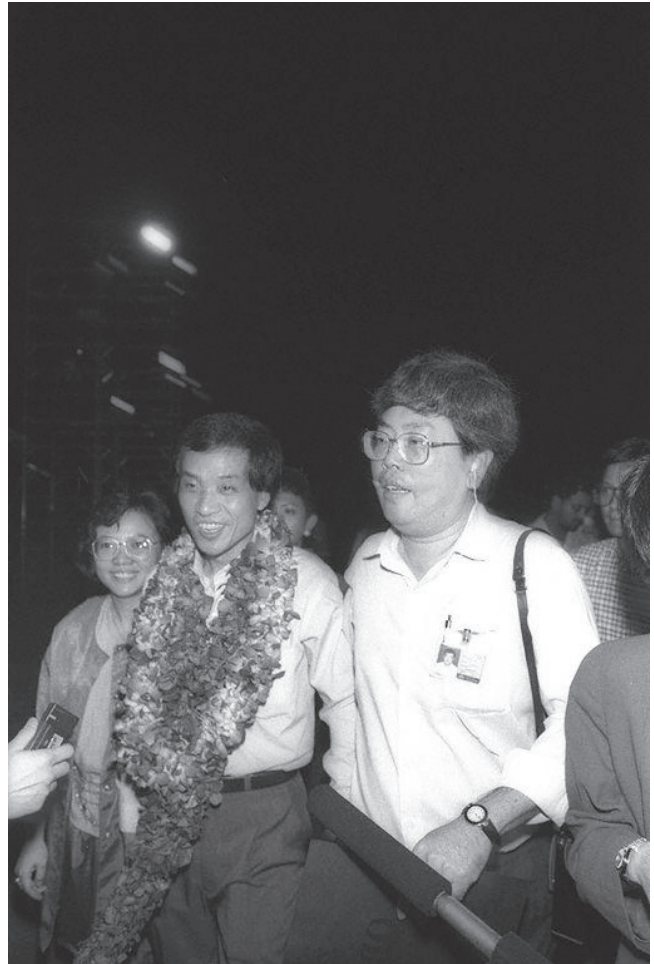
1976年的大选，工人党因为选前人民阵线的并入而增强了势力。它派了22位候选人参加竞选，并以“迈向一个关怀的社会”为题发表竞选宣言，并以此作为竞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工人党长期使用的标志性的口号。选举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行动党再次囊括了全部69个议席，工人党还是保持反对党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惹耶勒南在菜市面对行动党强人邝摄治，第一次取得佳绩，在全部反对党候选人中得票最高。惹耶勒南选后表示：“1976年的大选让工人党成为新加坡一个不容忽视的反对党”。

大选过后，工人党武吉班让候选人何元泰就被内部安全局通缉，罪名是“煽动华人沙文主义情绪”，何元泰后来逃亡英国并长期定居于此。惹耶勒南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被总理李光耀起诉涉嫌毁谤，最终被罚以巨额的赔偿。

1977年5月拉丁马士区因该区议员逝世举行补选，惹耶勒南在与各反对党的协商下，得以单独会战行动党候选人陈天立，不过成绩不佳，饮恨沙场。接下来在1979年，6位行动党国会议员引退，作为该党自我更新的举



1984年大选惹耶勒南当选为安顺区国会议员



1991年刘程强首次当选后港区国会议员

措。惹耶勒南参与直落布兰雅的选区的补选，成绩有所进步，得票率高达38.8%。

面对1980年的大选，工人党只参与8个选区。竞选中工人党提出“恢复人民基本权力”，“终止未经审讯的逮捕”和“降低人民生活的成本”，难以引起选民的共鸣，行动党再次横扫全部75个议席。李光耀选后总结说：“面对现在更有鉴别能力、更加挑剔的选民，他们期望看到的是有更良好教育的候选人”。以此出发，我们看到行动党的精英政治进一步的推行。

打破国会的垄断

屡败屡战的惹耶勒南在1981年迎来转机，10月由于安顺区议员蒂凡那卸下议员职务，以便出任新加坡总统。惹耶勒南在这场三角战的补选中，以微差打败行动党新手，成为社阵杯葛国会以来首次有反对党的议员，打破行动党15年全面垄断国会的局面。不过这历史性

的胜利对于惹耶勒南个人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虽然他在国会孤军作战，不过表现不俗。他针对许多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经常向部长甚至是总理提出挑战，让行动党政府不敢对他掉以轻心，也建立了他敢怒敢言的形象。随着他的声望日隆，接踵而来政府对他和工人党的打击也越多。从1982年开始到1984年，他和工人党就面对二连三的法律行动，让他穷以应付。但是他始终越战越勇，从政府严控新闻媒体、购买高尖端武器、学校分流制度以及延迟提取公积金的年龄等课题，他一一不肯放过。他的表现让人们增加对工人党的信任，吸引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士加入，其中就包括了刘程强。

1984年大选，行动党引进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工人党依旧强调建立“一个关怀的社会”，来回应行动党的精英主义以及家长式的统治。行动党则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嘲笑反对党的候选人的素质，甚至拿波东巴



1991年大选惹耶勒南在友诺士集选区的群众大会

西区反对党候选人詹时中的中学会考成绩，来与行动党候选人马宝山的对比，以此证明行动党候选人比反对党候选人优秀。选举结果一出，被嘲笑的詹时中反而逆胜，成为得票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则在安顺区守土成功，得票也大幅度增加。反观行动党总得票率只有62.9%，比上一届足足跌了12.6%。李光耀认为这是选民“给予政府压力”，恫言考虑修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这次大选首次引进“非选区议员”制度，不过因为全部反对党原则上反对这个制度，高票落选的工人党和其他反对党候选人均拒绝接受成为“非选区议员”。

1986年7月惹耶勒南被取消议员资格，因为高等法院判他和工人党主席黄汉照在“呈报工人党账目时报假账”，他被罚款5000元兼入狱1个月。这项判决也致使他不能参与下一届的大选。

1987年5月，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22人，罪名是“涉嫌参与一项推翻政府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并指控他们“渗透教会与学生团体”，其“幕后主脑是陈华彪”。陈华彪是新大前学生会领袖，1974年被判参与骚乱罪，出狱后逃亡至英国。22人中有些人曾帮忙工人党的竞选工作，或者为工人党机关报《铁鎚》撰稿，不过并非工人党的党员。看得出政府担心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党合流而采取的行动。

1988年的大选开始实施集选区制度，政府说采取这项新举措是要保障少数民族候选人在国会中保持一定的比例，不过反对党及工人党持反对立场，认为这是要减少反对党中选的机会。社阵在影响力日减的情况下，在选前并入工人党，虽然惹耶勒南无法参选，工人党派

出32人参选，人数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倍。工人党在这次大选中，得到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助阵，在友诺士集选区与社阵前主席李绍祖和电视媒体人卡立，组成三人团队参选，结果只以1.8%的微差落选。在这次大选中，只有民主党的詹时中守土成功，再度中选。

1991年的大选显得有点突然，因为距离上届大选只有3年，让大家不自觉地猜想是要防止惹耶勒南参选的举措，因为他的参选禁令即将期满。此事令吴作栋宣布将在大选过后的一年半内另外举行补选，让他得以参加，以免贻人口实。在这1991年的大选，反对党首次采取“补选策略”，只派少数候选人参选，工人党只参选5个单选区和2个集选区。结果这个策略奏效，有4个反对党候选人中选，其中一位是工人党候选人刘程强，他在后港区得票52.8%中选。另外三位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包括詹时中蝉联中选。在友诺士集选区，工人党的竞选团队以政坛老将李绍祖领军，仅以47.6%得票率落选，选战的激烈给行动党造成不少的压力。

1997年的大选，成绩令反对党大失所望，民主党由于党争造成分裂，詹时中改以人民党的名义参选，得以保持议席。另外两位民主党原议员却告双双落选。工人党的刘程强，在后港区不但守土成功，得票率还上升至58%。工人党在静山集选区由惹耶勒南领军，另一队友邓亮洪成为这次大选的焦点人物，他是一名律师，也是南洋艺术学院的主席。他在竞选过程中，被执政党指为“华文沙文主义者”，认为他对于华语和华族文化的言论，危害新加坡的种族和谐。静山集选区工人党以得票率45.2%落选。选后邓亮洪面对巨额的毁谤官司，选择流亡在外。惹耶勒南以最高票落选人身份，重返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

2001年对工人党来说是重大的改变的时刻，领导工人党30年的原秘书长惹耶勒南宣布不再寻求连任。5月刘程强被选为新秘书长，在2001年大选前几天，惹耶勒南宣布退出工人党，并带走一批跟随者。

天生的反对派

工人党在马绍尔退出后，逐渐陷入低潮。惹耶勒南的加入，让工人党重新复苏，他不但改变了工人党，也给死气沉沉的新加坡政坛带来活力。凭借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终于打破行动党连续16年在国会中的垄断。

从他赢得安顺补选开始，改变了国会没有反对党的日子，让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成为新常态。

惹耶勒南与他的前任马绍尔一样，都是具有很强个人性格的政治人物，两人都是敢怒敢言，不同点是马绍尔在批评执政党时，虽然不假辞色，但是所用的词语多属漫骂色彩，呈现的是戏剧性和吸睛效果；相较马绍尔，惹耶勒南对执政党的批评更具杀伤力，针对的问题更具体更实质，他锲而不舍多次挑战执政党的政治容忍度，因此被执政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他难以容忍，一连串的官司随之而来，面对人格毁灭、破产、监禁以及两度被逐出国会，各种打击让他穷以应付。当年李光耀这么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袋子里藏有一把斧头，那是很锋利的。你挑战我，我就拿起它，我会逼你到死巷”。李光耀够坦白，不装好人，把两人的恩怨情仇说得淋漓尽致。

惹耶勒南和马绍尔的共同点是个性张扬，领导作风独断，很难和意见相左的党内人士相处，因此在他们领导期间，党内风波不断。工人党成为他们演独角戏的舞台，也因此不能在党内建立稳固的领导团队，遑论党的政策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工作。长期对党务工作的忽视，对有素质的候选人的选拔培养付诸阙如。惹耶勒南时期工人党虽然不断有“明星”效应的候选人投靠，但他们的忠诚度不高，且各行其是来去自如，工人党成为失意政客或机会主义者的栖身工具。

盖棺论定，在惹耶勒南领导工人党的30年，他以个人在国会力战执政党团队，在各个重大课题上穷追不舍，据理力争的形象，让工人党得到选民的认同和肯定，为工人党在每届的大选中保持40%左右的选票，这比其他反对党30%的平均得票率还要高，这就是他对工人党作出最大的贡献。

惹耶勒南的政治生涯充满悲剧色彩，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天生的反对党，面对政治猎巫时总是一派勇者无惧。新加坡政治历史上如果少了他，必定要大为失色。

“我要工人党成为理性和负责任的政党。”

——刘程强

2001年5月工人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连续做了10年工人党议员的刘程强，接替惹耶勒南成为工人党秘书长。跟他的前两任不同，他既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名气，也

非社会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更重要的一点他是非主流的华文教育源流出身，要在处处以英文为尊的政坛闯出天地，更是障碍重重。

刘程强是末代南大生，毕业后从事华文教师的工作。处身教育界，让他深切了解政府的精英主义分流教育政策，断送了许多学生的求学前景，也阻断了他们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的途径，让他决定投入政治，希望能为新加坡作出改变。1982年，他加入工人党，旋即被委为组织秘书，1984年的大选，他是惹耶勒南在安顺选区的竞选代理人。1988年大选刘程强首次与工人党其他2位候选人参选中峇鲁集选区，虽然落败，不过他在华语辩论会中，与李显龙和副总理王鼎昌在“民选总统”课题针锋相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91年大选前出任工人党的副秘书长，参选后港单选区，以生动的潮州话发表竞选演讲，赢得后港区选民的支持，中选为国会议员。万事起头难，在缺乏经验管理市镇理事会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执政党不友善的动作，但是他在后港区凭着接地气的基层工作，以及勤政亲民的深耕细作，逐渐凝聚出一种“后港精神”，把后港区打造成工人党的坚固的堡垒，让他在1997大选轻易蝉联后港区议员，得票率进一步提高至58%。

打造自己的路

刘程强一接手工人党，就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他对工人党的方向和策略做出调整，改变前任采取的比较激进的对抗性的作法，把党从中间偏左的立场向中间靠拢，成为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政党，工人党也因此被人视为“简易版”的行动党(PAP-lite)。民主、自由、人权不再是工人党强调的意识形态。它表明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关注民生课题，与执政党进行理性的竞争。为了回应新一代选民对候选人素质的要求，工人党开始比较注重候选人遴选工作，成立遴选委员会来进行，以此建立忠诚度较高以及较稳固的骨干队伍。从此，工人党杜绝了所谓“政治明星”带枪投靠的历史。

2001年的大选是刘程强领导下的工人党马上面对的大选，党务改革刚刚开始，因此成绩乏善可陈。工人党参选阿裕尼集选区5人团队，因为在填写竞选表格出现差错，被取消参选资格。最后只由刘程强留守后港区和另一位候选人傅立源出征义顺区。受美国“911事件”的影响，新加坡经济也面对衰退，选民的投票行为变得谨

慎，大选结果刘程强得以保住后港区，不过得票率稍微下降至55%，义顺区则遭遇惨败。

工人党虽然在这次大选表现不理想，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工人党在刘程强领导下展现的新作风，吸引了一批新人加入，他们不但年纪较轻，也拥有较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包括后来成为工人党骨干的林瑞莲、严燕松、陈力峰等。在2003年6月的中委会改选中，8位新人被引进中委会，刘程强力排众议推举新人林瑞莲出任党主席。从刘程强的大胆起用新人，并委之以重任，让人看到他过人的胆识和海纳百川的容人胸怀，也给工人党的更新计划带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2006年的大选对行动党来说是一个试金石，因为这是行动党在更新计划下，由李显龙首次以总理的身份领军的大选；对于工人党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这也是刘程强接手工人党后，对他提出的新路线、新方向的一个检验。

2006年的大选，工人党一口气推出20个候选人参选，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候选人，也让人看到在刘程强领导下的工人党已经脱颖而出，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出现在众反对党之间。刚出任工人党主席的林瑞莲领军一个5人团队，出征阿裕尼集选区，这是林瑞莲第一次参与选举。竞选期间，发生了“戈麦斯事件”。戈麦斯是林瑞莲团队的一个候选人，因为指责选举局没有处理他的“少数民族证书”的申请，后来选举局拿出当天的录像显示戈麦斯没有呈交申请书，戈麦斯才做出道歉。天赐良机行动党见猎心喜，上至总理下至部长，轮番指责戈麦斯玩弄政治把戏，说他人格有问题，是个骗子，并提高到质疑反对党候选人诚信的高度。戈麦斯事件是一

齣《罗生门》，过度的打击最后引起选民的反弹，网络博客李健敏制作了视频《肉胜面》加以讽刺，选前两天行动党才惊觉而停止攻击。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党派出“新星”饶欣龙，带领一队由年轻新人组成的“敢死队”，挑战总理李显龙领军的宏茂桥集选区。

这次选举，在工人党的堡垒后港区举行的群众大会，出现历史性的万人空巷的场面，通过网络而传遍新加坡。在这种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助威之下，工人党取得不俗的战果，刘程强守土的后港区，得票率冲高到62.7%新的历史高度；阿裕尼集选区得票率43.9%；攻打总理坐镇的宏茂桥集选区团队也取得33.9%得票率，林瑞莲在选后得以出任非选区议员。

突破集选区不可攻克的魔咒

选后的工人党得到长足的发展，2011年的大选，是工人党一次练兵的机会，也是工人党在刘程强领导之下面对新一轮的检验。在这一次的大选，工人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刘程强放弃留守后港区，而是移师到阿裕尼集选区。在阿裕尼集选区，集中了工人党最好的候选人，除了刘程强、林瑞莲、后来成为工人党秘书长的毕丹星(Pritam Singh)、莫哈默费沙(Muhamad Faisal)，尤其是令人瞩目的“王牌候选人”陈硕茂，他除了拥有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的学位外，还是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的精英人才。他亮丽的履历，比诸行动党的候选人毫无逊色，为工人党吸引不少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的支持。后港区则由饶欣龙出征。

工人党在大选前发表它的新竞选宣言“迈向第一世界的国会”，主张国会必须有足够的反对党议席，才能有效监督和制衡执政党，避免出现腐败和错误，国会才

作为一个平民出身又是受华文教育的政治家，他终于冲破社会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藩篱，以一个华校生的视野，引导新加坡的政治向前发展。就这点来说，它所揭示的意义非凡，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展现的政治胸怀，为工人党也为新加坡留下宝贵的资产。



工人在2011年阿裕尼一役一举成功，突破集选区无法攻克的魔咒。

不会沦为替执政党政策保驾护航的树胶印国会。刘程强在竞选演说中提出“反对党是要扮演副驾驶的角色”，时刻提醒执政党不要打瞌睡并监督它行驶在正确道路上。他的说法是要安抚一些选民，反对党目前无意取代政府，而是扮演辅佐的角色，让选民安心投票。由于竞争激烈，阿裕尼集选区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李光耀出来发表了被认为失分的评论：“假如阿裕尼（选民）决定那么做，那他们将会有五年要在后悔中度过”。

选举结果工人党果然攻下阿裕尼集选区，突破集选区无法攻克的魔咒，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转折点。水涨船高，工人党不但保住后港区，得票率也冲高至64.8%。工人党在这次选举整体平均得票率是46.6%，高于反对党的平均得票率的39.5%，工人党在国会稳固成为第一大反对党。

新一轮的国会开幕，工人党的陈硕茂在国会的首次发言一鸣惊人。他把工人党比喻是“敢于谏言、敢于讲真话，不怕被唐太宗讨厌”的谏臣魏征；希望明理的执政党做唐太宗，共同开创太平盛世，我们不要一个“执政党独断独行、而小人唯唯诺诺的世代”。他的言论引起大家的关注，《联合早报》罕见地为此发表社论《国会辩论令人耳目一新》，赞扬陈硕茂清晰地厘清了几个关键政治概念，例如爱国不是任何政党的专利；多元不会造成政治分裂；培养独立精神与服从强势权力之间的矛盾；反对党作为反对和监督政府的正当角色等。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硕茂过后长期在国会保持低调，令许多对他有所期待的人大失所望。

有起有落的工人党

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的重大胜利，过后不久就面对

一个不小的尴尬，新科议员饶欣龙传出绯闻。他起初自我人间蒸发，过后对传闻也不作出任何解释。工人党在面对危机处理时，一时表现犹豫不决，拖延多日最后才做出开除的决定，让工人党失分不少。后港区后来的补选，工人党派出方荣发应战，虽然保住议席，不过得票率略有下降。

2012年12月，行动党榜鹅东区国会议员柏默婚外情曝光，他也是国会议长，很快地向总理递上辞呈。相较于工人党前期的危机处理，行动党表现出一贯的果断，立即做出明确的决定和说明。虽然如此，该区的补选，工人党的李丽连以54.5%的得票率当选，让工人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再增加一席。

2015年的大选对工人党来说是处于较不利的环境，一方面这一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一些选民对他的缅怀之情难免会化为支持执政党的选票；另一方面这一年新加坡适逢建国50周年，铺天盖地的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执政党展示50年治理新加坡的成就不无帮助。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党因为在上一届的大选取得长足的进展，党内或支持它的选民自然会对这届大选有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工人党派出强大的队伍，一共28人参选5个集选区和5个单选区。这也是独立以来执政党首次面对全面的竞争。选举结果工人党失掉新赢取的榜鹅东区，只保住后港区和阿裕尼集选区，阿裕尼仅以1.9%的极小优势取胜；后港区得票率下降4.4%；工人党整体的得票率也下降6.8%，虽然还保住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宝座。反观行动党的得票率从2011年60.1%跃升至69.9%，创下了行动党有史以来第二高的记录。

2016年6月工人党举行大选失利之后的中委会改选，选情激烈，12个中委席位一共有21人角逐，刘程强秘书长的职位首次面对陈硕茂的挑战，在新引进的30位干部的支持下，刘程强得以保住秘书长一职。所幸不像以往党争过后有人脱党出走，陈硕茂虽挑战不成，仍留党成为中委兼财政。从这点可以看出，工人党的党内民主和党纪已经逐渐建立，成为一个较成熟的政党。

2018年4月工人党中委会改选引起大家普遍关注，刘程强在选前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秘书长一职。新一届的秘书长由毕丹星出任，负起领导工人党的重责，刘程强继续留任中委。工人党在刘程强的领导下完成世代更新计划，把党带入一个有序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十七年功过评说

从2001年到2018年执掌工人党秘书长17年的刘程强，终于卸下他的担子。17年功过如何评说？刘程强出任领导领导工人党的时候，设定了“走自己的路”、把工人党打造成理性和负责任的反对党，这些目标是否都一一完成？

工人党今天在新加坡政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选民心目中的良好印象，证明刘程强的路子是走对了，也证明他是有政治判断力、有远见、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领导人。刘程强接手的工人党，说它是一个烂摊子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受华文教育背景出身，又不是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走进一个处处以英文为尊，以社会地位论资排辈的新加坡政坛，要闯出自己的天地，可以想象他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去领导一个反对党。从初期英文报章记者故意吹毛求疵他的英文，处处为难就可知道他的处境的艰辛。不过，作为一个华校生，也有他与众不同的优点，比如他的“知所进退”、他的“不逾矩”、他的“小心驶得万年船”，让他终于把一个“烂摊子”转型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反对党。

与工人党前两个领袖的有勇无谋比较起来，刘程强展现的是有智有勇，“该出手时就出手”，阿裕尼一役就是极好的例子。在完成设定的目标之后，他又能急流勇退，不眷恋权位，为后人立下典范。不过，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不时抛出的妙语佳句，比如“杀鸡儆猴”、比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比如“拿出香蕉，引来的也可能是猴子”，通俗一点的还有“告到你脱裤”，形成他独特的政治语言的修辞风格。不过，随着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失，这种政治语言多元的呈现也可能成为绝响。

今天许多人论说刘程强，都强调他改变了工人党，其实他不但改变了工人党，也同时改变了行动党，或者说他领导下的工人党的存在和发展，迫使行动党不得不正视和作出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行动党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对待反对党的态度，行动党长期执政下的善治和经济成就，让它取得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滋长了不容许他人挑战和质疑它的执政地位，衍生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思维。在刘程强领导下，工人党从一个对抗型的反对党转变成建设性的反对党，与执政党理性的博弈取代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让行动党逐渐改变一

味压缩反对党生存空间的做法，转而将反对党视为是议会民主的象征来容忍；第二是在工人党政策主张的竞争下，迫使执政党不得不对一些政策作出修改。特别是在2011年大选过后，政府开始扩大“社会安全网”，对老人保健、交通、住房政策作出调整。当年的副总理尚达曼针对这些改变，形容行动党已经转变为中间偏左的政党。

工人党从创党开始就走中间偏左的路线，政策主张偏向维护弱势群体的福利，让它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乏草根庶民的支持。刘程强却能跳出初期“潮州怒汉”的角色，把支持者扩大到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作为一个平民出身又是受华文教育的政治家，他终于冲破社会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藩篱，以一个华校生的视野，引导新加坡的政治向前发展。就这点来说，它所揭示的意义非凡，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展现的政治胸怀，为工人党也为新加坡留下宝贵的资产。

作者为本刊编委



文：林恩和

马绍尔访华之旅 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

马绍尔一生多姿多彩，他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各有各的精彩：他是新加坡历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件律师，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在最后的十五年又转身一变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和他作为杰出的律师和出色的外交官的角色比较起来，作为政治人物的他显然比前两者失色。1956年6月，他宣布辞掉首席部长的职务，面对党内同志众叛亲离，成为政治孤鸟的他显得郁郁寡欢。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电报，邀请他到中国访问。这个邀请让马绍尔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兴奋不已。对他来说，这无疑天上掉下了馅饼，让他有机会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聚焦在镁光灯底下。

马绍尔这次访华对主客两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中国来说，1955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

的亚非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与会国家的共识；另一方面，他也趁出席会议之便，与印尼外长签署了有关解决印尼华人双重国籍的问题，并呼吁入籍华人应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效忠居住国。中国可以借着马绍尔来访向正在寻求摆脱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的国家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反殖斗争的支持，同时也趁这个机会向东南亚其他国家阐明中国政府怎样看待和处理当地华人华侨的问题，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马绍尔来说，中国不计较他失去首席部长的职位，给予他高规格的接待，让他亮相政治舞台，有机会和一个重要的大国讨论涉及新加坡政治议程的事并得到他们首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刚好这时新加坡的贸易咨询委员会也收到中国邀请，计划组织工商业考察团到中日两国访问，委员会主席是马绍尔的好友叶平玉。叶平玉于是向马绍尔建议由他出任考察团顾问。由一位具有反殖政治



光环的马绍尔率团访问中国，毫无疑问的将能增加考察团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分量和地位。

虽然说马绍尔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这次出访中国，分别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的邀请，纯粹是民间的交流。不过，在当年的冷战氛围下，出现不少杂音，也引起殖民地当局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的疑虑。马绍尔深刻认识到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是首位新加坡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受邀到新中国访问，面对质疑和杂音，他力排众议，一个由61人组成的各民族工商业考察团终于在8月中旬成行。

从8月14日到10月14日，马绍尔此次到中国访问历时2个月，收获颇丰。除了必要到访的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为了让他多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和民情，中国主人特地安排马绍尔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首先是到中国东北，去了沈阳、鞍山、长春等城市，参观了东北的中国的重工业中心；接着安排他到西部的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参访；最后到南部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城市昆明、重庆、武汉、南京、杭州和上海。马绍尔访华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时期。他参观了中小学、托儿所、大学、法院、寺庙、清真寺（回教堂）、教堂、工厂、居民区，和中国社会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中国人民团结奋发的精神，让马绍尔留下深刻印象。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加坡初到被称为竹幕后的新中国，一切是那么的新奇，对马绍尔可说是经历了一场文化震荡，犹如爱丽丝梦游了仙境。

马绍尔在上海期间被安排与四位资本家见了面，他们当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玉阶、号称“纺织大王”的永安纺织厂的郭棣活（David Kwok）和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念义（Julius Liu）。当年中国正属于新民主建设时期，还允许私有企业存在。这几位资本家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能与马绍尔用英语直接交谈。访华期间他还两次私下和林建才律师见面吃饭，林建才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时离开新加坡到中国。

不过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马绍尔在上海期间也探访了犹太人社区。事缘上海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伯拉罕（R D Abraham）知道他来华访问，特地写信给

他，要他协助一些想到以色列的滞留在华的犹太人离境。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迫害，许多人从欧洲及苏联来华避难，人数一度多达3万多人。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这些犹太人纷纷响应号召回到以色列。马绍尔访华时，尚有5百多人因故滞留在华。马绍尔趁与周恩来会面的时机，直接向他反映，使到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他在访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包括副总理陈毅元帅、乔冠华、廖承志、彭真、罗荣基等。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国庆宴会上没有安排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当时也到北京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同桌。不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他这次访华的重头戏就是两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会谈的重点自然是他早就准备好的问题，他想要知道中国政府怎样看待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以及怎样处理所谓“双重国籍”的课题。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已经清楚表达了中国的政策和看法，作为政治人物的马绍尔希望藉由中国总理针对新加坡的具体情况，再次明确表达立场，不无为他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和博出位之嫌。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把华人公民权的课题，列入新加坡宪制谈判的一篮子计划之中，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会影响新加坡的宪制谈判的进程。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应马绍尔要求，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公报，正式说明中国对新加坡华人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其实这和中国与印尼于1955年在万隆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精神没有两样，主要有四点：

- 1) 中国政府乐见新加坡华人遵循自己的意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并效忠于他们的居住国。中国政府认为这有助于中国的利益和新加坡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和新加坡的友好关系；

- 2) 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在自愿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后，不再是中国公民，虽然他们仍旧保持和中国在血统和文化上的联系；

- 3) 那些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的华人如果要入籍中国，必须根据新加坡法律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 4) 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法律，不许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基本的权益

必须得到尊重和不容歧视。

马绍尔和周恩来的两次会谈可以说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之下交流，不过，两人有时难免有交锋，比如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两人在认知上有明显的落差，这也凸显了两人不同的鲜明性格，从附录的“谈话记录”就可看出来。

我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刘晓鹏教授提供给本刊“谈话记录”的稿本，这也是引起我写作本文的动机。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谈话记录”，笔者在必要的地方作了背景说明和注释。为保持原汁原味，以及让大家体会当年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语境，我们不对行文作改动，只针对错别字纠正。

作者为本刊编委

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新加坡前首席部长马歇尔谈话纪录

时间：1956年8月19日

地点：中南海西华厅

陪见人：张奚若¹、廖承志²、李哲人³、乔冠华⁴、吴茂荪⁵

(本文未经总理审阅，如有错误，由纪录整理人负责)

马歇尔⁶ (以下简称马)：非常感谢总理接见。

总理：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马：感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欢迎我到中国访问。我先前还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

总理：在日本期间好吗？

马：很好。我非常抱歉，去年总理到新加坡⁷，当时我是新加坡首席部长，但总理到达时，英国当局没有通知我，直到总理离开后，他们才告诉我。当时未能欢迎阁下，非常抱歉。

总理：当时我们去也是没有计划的，是偶然的。新加坡当局还是很好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也很感谢。

马：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才知道，我当时非常气愤。

总理：西方朋友与本地人的关系还是有些隔阂？

马：距离很大。西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让我当首席部长，但是不让我知道各方面的全部情况，只告诉我他们愿意告诉的事，因此对于许多事不能知道真相。在殖民地的(当)这样的首席部长，实在是一个令人难受的位置。

总理：要克服隔阂需要时间，要克服很多困难。

马：……新加坡反殖民主义应该不带种族成份，各种族应该彼此合作，否则就形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现在新加坡人口中有76%是中国(华)人，15%是马来人，8%是印度人，2%是其他种人。

总理：你的种族协作的思想很有意义，这在马来亚也可适用吧？

马：应该也可以。我在尽自己的力量做。马来亚从英国统治下解放⁸(自治)后，他们着重主张政权应交马来人。长期以来马来人对在经济上占优势的中国(华)人有猜疑，这种经济上的猜疑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更加剧了。马来亚的中国(华)人做生意比较聪明，因而在经济上占优势，马来人现在主张马来亚应该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因此现在马来亚各种族不仅不和谐，而且彼此敌视。那里的中国(华)人是愿意合作的，但马来人态度很强硬。拉赫曼⁹(注一)对中国人很敌视，其特点是认为马来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被共产领导的游击队破坏，而游击队中大部分人是中国(华)人。去年10月双方和谈¹⁰未成是使人不愉快的问题，这就造成敌视中国人的便当的借口。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区别是：新加坡入籍手续很简单，马来亚则规定很严。直到最近，他们还规定：只有在1957年8月以后出生的人才具有公民权。昨天与陈付(副)总理¹¹所谈的话使我感到愉快和惊喜。在新加坡，我的反殖民主义的努力已经失败，但我下台后，还会有人继续努力。不过新加

坡人口中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受欧洲（英文）教育的中国（华）人，这些人都害怕不会讲英文的中国（华）人（这些人到新加坡有三、四十年了），对他们有敌对情绪。我认为新加坡、马来亚要取得和平，必须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公民权。有的人告诉我说我的这种看法不对，我觉得在新加坡的中国（华）人也能对当地忠诚，他们是和平的、勤劳的人民，中国（华人）血统并不妨碍对当地的忠诚。

总理：关于这个问题，昨天陈付（副）总理已跟你谈得很多，我无需再重复了，我且再（现在）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来讲讲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独立运动与新加坡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立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都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中国最近才摆脱殖民主义，因而必然同情独立运动，很自然地憎恨殖民主义。如果我们今天要求对外扩张，那就是走殖民主义的老路。中国自己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痛苦，如果再把殖民主义统治强加于人，那是不可想象的。不仅我们的制度不允许，也不和（合）人情，也不合乎这个时代。我为什么提出时代问题呢？如果中国在19世纪末强盛起来，也会成为帝国主义，日本就是这样。我们也不为自己的祖先辩护，中国在封建地主时代也侵略过别人。如对越南、朝鲜，但这时代已经过去了。新中国不会这样。中国刚刚从火坑里跳出来，不能从一个火坑又跳到另一个火坑。西方国家是在18、19世纪利用工业的发展，在亚洲、非洲、澳（原文为奥）洲建立起殖民统治的。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要走殖民主义的道路一定要失败。不仅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今天走这条路要失败，就是过去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今天要走这条路也一定要失败。我曾与日本朋友谈过这种意见，他们也同意。我们有许多经验教训，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呢？从国际环境、从历史看都是这样。从我们与各国的关系说，我们要求和平，要求各国平等，这表现在中国与印度、缅甸的关系上，表现在亚非会议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¹²上。就国内说，我们落后了近一百年，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建设。所以从国家发展上说，也不可能产生向外扩张的政策，重复过去各国走过的老路。今天我们不讲思想，从事实看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但是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华侨问题。中国的确有1200多万华侨在国外，大部分在东南亚，还有的在南美等地。这就形成了这些国家怀疑的因素，也是被西方国家利用为挑拨的借口。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是利此（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新中国不能对此负责。就是西方国家也不能说是我们送了许多华侨出去殖民。这是客观存在的。

问题是新中国对华侨的政策，很多国家对这个问题关心，这也是我们应该加以确定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政策，陈付（副）总理昨天已经谈到，我现在想进一步说明我们制定这种政策的客观情况。中国华侨到国外去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中国之所以有大批人在国外，是因为这些人当时在国内无法生活，他们出去是为了谋生活的，都是自己去的，国家并没有管他们，当时的国家自顾不暇，也顾不了他们。他们去的地方也是同样遭受侵略和贫穷、落后的地方，他们有的是去经商的，有的是被贩为奴的。经商的赚了钱，看起来如你们所说，比较聪明，在当地经济上占了优势，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帮助了当地的开发，一方面也的确赚了钱，引起本地人的一些不满意。中国华侨并非都是思想上趋向进步的，大部分是很保守的（除了年青的一代），例如他们长期不学外国话，有的死了之后棺材还要运回来，有的离家很久，还要保留一块土地，有的出去多年，还要在国内娶妻生子。这就造成了很复杂的华侨情况，如满清政府与蒋介石都是主张血统主义的¹³，造成了双重国籍，并运用华侨与当地人的不合，运用双重国籍，经常捐款、挑拨华侨与当地人的关系，致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新中国诞生以后，引起华侨很自然的爱国主义的情感，他们看见祖国站起来来了。蒋介石分子在大陆上搞不出什么了，就在华侨中制造分裂、捐款、骗青年参军，其结果是华侨问题更加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华侨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取消双重国籍，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这种复杂情况。不能使华侨感觉新中国对他们统统都不要了，而蒋介石要他们。如果这样，不但对中国不利，对华侨住在国也不利。

以上是说明华侨问题的复杂情况，现在再说明我们的政策：

第一，我们极力主张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华侨可根据自愿选择所在国或中国国籍，既非简单的出生地主义，也非简单的血统主义。未成年人的决定于父母。更不能有时间限制。

第二，华侨选择所在国国籍，中国政府不加以任何阻止和干涉，既经决定之后，我们就同意并且鼓励。选择所在国国籍后，这些人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应再多（多为衍字）参加华侨团体，应该忠于当地。剩下的只是亲戚关系，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亲戚关系。

马：这里我想问一句：阁下是否说，中国同意和鼓励华侨选择所在国国籍？因为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很重要。新加坡有50万未满20岁中国（华人）血统的人，他们已经是英国臣民，

这些人是否还须选择国籍?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 这些人到21岁即可享受全部公民权。

总理: 我在前面已说清楚。第一, 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国籍。第二, 如选择当地国籍, 中国绝不干涉和阻拦。假定我们与新加坡有协议(条约)或协议, 则已取得或将取得新加坡籍者, 他们认为要保留或取得新加坡籍, 我们不干涉。第三, 可能原来是新加坡公民或别国公民现在要做中国人, 不愿做本地人(现有新加坡公民权者要做中国人或无公民权者要保留中国籍),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这就是要在条约中讨论的具体问题, 如果两国订立条约, 要讨论这个问题。

他要做中国人, 我们也不能拒绝他, 否则就如刚才所说的: 似乎新中国对于1, 200万华侨统统都不要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说明。新中国不要, 蒋介石说他要, 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选择国籍时, 总有一部份华侨要保中国籍, 年青地(的)一代较容易改变, 老年一代有可能愿保持中国籍, 如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对于愿保持中国籍的, 我们有几项规定:

(1) 这些华侨不应参加本地政治活动。作为华侨, 应遵守本地法律。

(2) 我们不在这些华侨中组织共产党。过去有过, 后来取消了, 其他政党也取消了, 因为这容易引起华侨与当地(人)之间的误解。

马: 新加坡的情况是独特的, 绝大部分中国(华)人, 如果他们选择中国籍, 这些人就都有可能变为中国人, 新加坡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

总理: 我先回答你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 有些华侨选择当地国籍后, 又要求回到中国, 我们不能拒绝他; 但是在中国与印尼的双重国籍条约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还须先得当地政府的许可。要所在国许可之后我们才能接收, 所在国不许可, 我们就不能接收。所以不可能一夜之间把人家统统都变成中国人。

这是回答你的问题, 现在说第四点。

第四, 新加坡的华侨是有其特殊情况的, 在其他地方, 所谓中国人是少数, 在新加坡是绝大多数。

马: 在马来亚华人占居民的40%, 在比例上说恐怕仅次于新加坡吧。如果新、马联合, 则马来人占45%, 中国(华)人在(占)44%, 印度人占8%, 中国(华)人与马来人数字差不多, 拉赫曼对这种情况很害怕。

总理: 有形成恐惧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也有殖民者造成的恐惧。

马: 直到今年以前, 英国对马来亚是控制得很紧的。但是说句公道话, 马、华之间的紧张是在英国统治撤退后才冒出来的。

总理: 要知道印巴分治也是在英国人撤退时才发生的。(马大夫)(指马绍尔, 可能是周总理口误)。所谓华侨的情况, 在新、马与其他地方不同, 在其他地方也各有所不同。因此条约不可能一样。我们愿意照顾各国的不同情况, 以使多数华侨能参加所在国国籍。以新加坡、马来亚为例, 绝大部分华侨国籍不能确定, 这是个问题, 应该设法解决。因此我们不拒绝, 并很愿意与每一国的政府或有代表性的当局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绝不想拖延, 更不是想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扩张。

根据以上所说四点, 我们必须达到谅解, 所以现在说第五点。

第五, 要使华侨选择所在地国籍, 不是很简单的。须做极大努力, 做许多说服工作, 除了法律规定外, 说服工作是必要的, 我们也愿意做这种说服工作。但是也要照顾华侨的保守性, 他们过去习惯于双重国籍。在印尼, 反对《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就是中国(华人)血统的人, 你昨天说印尼不满意, 要知道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在开始, 还需要时间, 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 当然, 如果能把1, 200万华侨一天都变成所在国人,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人口很多, 并不一定需要这1, 200万人, 更不会用这1, 200万人进行扩张。我在万隆时找华侨代表谈话, 当时万隆和雅加达两位市长都在场, 一边说, 一边就翻译给他们听。

我们希望华侨都选择当地国籍, 但不(不是衍字)是不能拒绝他们选择中国籍, 不能造成一种情况, 好像新中国不要他们了, 新中国不要他们, 蒋介石要他们, 不能造成这种情况。

马: 蒋介石在新加坡华侨(人)中已失去信用, 有几家报纸和一些有钱的人支持蒋介石, 目的是为了赚钱。我来的时候, 有人问我是否去台湾, 我说我们应该现实, 台湾在新加坡经济生活是没有作用, 无须到台湾去。就新加坡说, 可以完全撇开蒋介石不谈。

总理: 这也是一个因素, 虽然这个因素在其他地方作用也许更大些。我们很愿意你就新加坡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特点直接提出来交换意见, 这样可以找到更适合于新加坡情况的解决办法。

马: 谢谢阁下。我现在不是首席部长, 我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谈话。华侨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保持新加坡的稳定与和平。阁下所说的四项(原话如此)原则如能公开发表, 将有更大的作用。在新加坡我是主张各民族平等和谐的, 但有两个困难:

(1) 新加坡有23万年纪较大的华侨(人)还没有公民权, 马来人, 混血人等都反对给他们公民权, 我认为这些人的公民权应得到解决, 但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攻击, 包括一部份中国(华)人。

(2) 在学校里我规定设立马来文、英文、印度(淡米尔)文、中(华)文(北京话)四种语文课程, 我把这四中(种)文字(语文)作为新加坡的正式文字(官方语文)。中国(华文)学校以中国(华语)教课, 但在小学要学马来文, 在中学在(再)学英文, 这在当地都是必要的, 为此我们花了几百万元来办学校, 这为了使各民族平等和谐。但有些中国(华)人似乎已(以)反对政府为愉快。

当然, 新加坡不是中国的一部份, 但是中国说的话对新加坡在道义上有很大的影响。

看样子, 新加坡还要做几年的殖民地。外交还在英国人手中, 新加坡不能签订条约。但我希望华侨(人)问题在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直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不能签订协议应该怎么办? 你们的经验多, 请问以采取什么办法为好?

总理: 感谢你说到这一个实际问题, 你为新加坡的独立, 并且是把各民族包括在一起的独立而努力, 我们表示钦佩和支持。使新加坡的所谓华侨(人)(已取得公民权者)和华侨(无公民权者)参加新加坡的独立生活(活动)是值得做的事。这样对新加坡有好处, 你的努力方向是值得称赞的。

尽管你不是首席部长, 但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劳工阵线主席, 我们很愿意跟你交换意见。华侨问题最好当然是订立协议, 在为订立协议之前也可以采取临时办法。我们还有时间研究, 在你离开中国以前总可以找到订立条约以前的临时办法。

马: 在明年年初获(或)今年12月内就可以使新加坡23万中国人得到完全的公民权。去年4月我在这问题上的努力失败了。去年12月在伦敦时, 英国同意给予这些人公民权, 但是他们把这项权利列为宪法的一部份, 要就是由我们接受整个宪法, 不然英国就整个不给。结果我们全部未接受。今年12月内将使愿意取得公民权者得到公民权。如果阁下在公开场合, 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或其他适当场合公开说明四项原

则, 将大大消除东南亚一般人的疑虑。这些原则如果不公开, 东南亚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有扩张野心。

总理: 临时的解决方式可以研究, 你刚才提到的方式也可以研究。你可多与外交学会的人接触, 与他们多谈谈新加坡的特殊情况。总可以找到适当的方式。我们从一方面考虑, 你也提出另一方面的考虑, 这样考虑可以更全面。

马: 我保证将给予一切帮助, 来到这里, 我必须承认遇到我未意(预)想到的友谊和谅解。新加坡是一个小国, 新加坡所要求的是与邻邦和平相处, 这对新加坡的生存是必要的。昨天陈付(副)总理澄清了许多问题, 今天阁下又重加肯定。新加坡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完全有可能性。我一切都愿意听外交学会的安排。

总理: 许多问题我们还可以交换意见, 你可先到各地看看, 比如先到东北或西北看看, 也许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你回来时我们还可以交换意见。

马: 光是新加坡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原注一) 现在马来亚联邦首席部长。

(原注二) 这里指的是陈付(副)总理。

注释一(林恩和加注)

¹ 张奚若(1889-1973), 著名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出任教育部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中国从事民间外交的机构, 马绍尔访华就是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

² 廖承志(1908-1983), 中国外交家, 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曾任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 港办主任等职, 长期领导中国人民外交、中日关系及港澳台侨务工作。接待马绍尔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³ 李哲人(1910-1969), 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⁴ 乔冠华(1913-1983), 早年留学德国, 获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及国际时事评论员。1974至1976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⁵ 吴茂荪(1911-1984),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

⁶ 马歇尔(1908-1995), 新加坡译名是马绍尔(David Saul Marshall), 犹太裔新加坡人, 著名律师、政治人物, 1955-

1956出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曾任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是新加坡工人党创始人。1978–1993任新加坡驻法国大使。

⁷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4月16日搭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机“空中霸王”，从仰光飞往雅加达，拟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因槟城至雅加达途中气候恶化，临时改道来新，在新加坡加冷机场休息2小时25分，再续程飞往雅加达。停留期间受到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麦唐纳接待。

⁸ 我相信马绍尔当时说的是“merdeka”，这个词的意思是独立，不过结合当年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情况，应该是说“自治”。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举行首次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选出52位立法议员。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取得51席，联合邦第一次出现民选的自治政府。

⁹ 拉赫曼在新马的译名是东姑阿都拉曼 (Tengku Abdul Rahman)，是马来民族全国统一机构 (简称巫统UMNO) 的领导人。他在1955–1957年间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后，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

¹⁰ 指的是“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日为了解决马来亚的紧急状态，结束马共发动的游击战争，马来亚共产党代表陈平与马来亚联合邦代表东姑阿都拉曼和陈祯禄以及新加坡代表马绍尔举行三方和平谈判，地点在马来亚霹雳州的华玲

(Baling)，史称“华玲和谈”。和谈最后破裂是因为东姑提出的投降条件不被马共接受。

¹¹ 陈副总理，指的是陈毅 (1901–1972)，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中国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上海市市长、中国外交部长。

¹²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提出的外交纲领性政策，最初是由中国总理于1953年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成为后来处理中印关系和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发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言》，其中就包括这五项原则。

¹³ 中国在清末引进国际法，在1909年颁布《大清国籍条例》，从而为保护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法律依据，一改以往拒不承认海外华侨身份的政策。《大清国籍条例》采取的是血统主义国籍法 (Jus sanguinis)，凡是有中国血统关系 (即父母有中国血统) 的人，无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基本延续清朝国籍法主张，因此海外华人理论上都是中国公民，同时也可保留居住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改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取得当地国籍后，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周总理第二次接见新加坡前首席部长马歇尔谈话纪录

时间： 1956年10月9日下午3时至5时

地点： 中南海西华厅

陪见人： 张奚若、廖承志、乔冠华、吴茂荪

(本文未经总理审阅，如有错误，由纪录整理人负责)

总理： 住得怎样？

马歇尔 (以下简称马)： 令人神往！

总理： 快两个月了吧？

马： 到星期天两个月，陈先生一直跟我在一起，作我的向导。

总理： 那么没有个人自由吗？

马： 我需要他的帮助，我不能讲中文。

总理： 两个月应该可以讲几句了。不会到街上去走走吗？

马： 会讲「很好」，这是很有用的话。会到商店买点东西，到东安市场买玉器。

总理：在上海怎样？

马：在上海买了一个玉石香炉，很好。

总理：没有到他们几位家里去拜访吗？在上海见到了荣毅仁¹吗？

马：到张会长²家里去过，在上海到郭先生（郭隶活）³家里去过，他有一个女儿嫁新加坡一个百万富翁⁴，我可以告诉他女儿，他生活得很好。

总理：跟他谈了一谈吗？

马：跟郭先生，刘（念义）先生⁵，南洋烟草公司的简先生⁶一起谈了谈，他们都说英文。我听说你见过新、马贸易考察团。

总理：跟他们谈了两个钟头，谈的一些话报纸报道有些走了样。

马：新加坡有4个记者参加了接见，但他们都没有纪录，因此报道不一。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⁷很兴奋，去找叶平玉⁸，他的报道唯一正确。

总理：第二天我又与漆德卫等4个英国记者谈了一次，漆德卫的报道一般还好，有一两处错误。我对他们说，英国如愿意作新、马的朋友，就应该承认新、马完全独立，这样就有可能指望新、马还留在大英联邦内。我两次都这样说的，漆德卫的报导里加了“继续”一词，即“继续做新加坡、马来亚的朋友”，这就有些区别。头一天谈话的报道则直接说英国是新、马的朋友。我的话你同意吗？

马：完全同意。五星期前，在新侨饭店一次鸡尾酒宴会上，你叫漆德卫过来，对他说，如果新加坡各种族团结一家（致），新加坡在英联邦内独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你的“在英联邦之内”的话在新加坡引起很大激动。因为实在说，在新加坡最怕的还是中国（华）人，你的这种说法最清楚地表明中国对新加坡无阴谋，所以很受欢迎。有人说：要说这是陷阱是不现实的。

在新加坡其他各族人对中国（华）人的确担心，虽然我觉得这是荒谬，但是事实。你的话使他们安定（心），不担心中国的威胁。基于同一原因，我希望你就华侨政策问题发表声明，以表明中国不但不侵略，而且很合理（理性）。我希望你能了解当地人的心情。要知道中国人（华人）在新加坡占76%，在马来亚占40%。你们如果要搞翻新加坡，你们是能够的，你对漆德卫的谈话对新加坡的稳定有帮助，如你能发表声明，一方面可帮助华侨（华人）取得公民权，一面也可使

其他各族人免于忧虑（顾虑）。

去年4月，英国同意给居住10年以上的中国人（华人）以公民权，虽说要居住10年以上，实际是全部，因为中国人（华人）都是10年以前到新加坡的。英国最初不同意，经争取后，5月间英国已同意，并列入宪法草案，所以公民权问题是一定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表关于华侨政策的声明，将给新加坡稳定。

总理：10年前到新加坡的有多少人已取得公民权？听说有大部分人未取得公民权，是有（否）实有其事？

马：新加坡125万人，中国（华）人96万，占76%，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有50万是21岁以下未成年的人，这些人到满21岁时，依法就是英国臣民，有完全的公民权。第二类，约20万至25万人有公民权，其中一部分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一部份是归化的，归化的很少，因为进行规划（归化）要花很多钱，要5个介绍人，要报告5年的情况，包括财产情况，须经警察调查，并且宣誓，因此很少中国（华）人愿意归化。第三类，中国（华）人是23万成年人，都是1910-1949年到新加坡的，现在他们第一次愿意做新加坡公民，过去英国当局要他们归化，许多人就没有钱办归化。我们政府上台后，提出三项政策：（1）各民族有同等教育权；（2）规定四种语言（包括中文）为正式（官方）语言；（3）公民权。现在前两项已实行，只剩下公民权问题。有趣的是，去年5月连马来人都不敢公开反对给予这些人公民权，实际给予公民权问题各方面已经接受。这种问题解决后，在两年内各地将设一些机构，中国人（华人）到那里去宣誓，说自己在新加坡已居住10年以上，愿意效忠于新加坡，就可以取得公民权。我所说的是新加坡的情况，马来亚联邦（联合邦）的情况是不同的。

总理：宪法是怎样规定的？

马：宪法草案现在还是秘密的，去年5月所有政党都同意。宪法草案规定，在1957年4月到1959年4月两年之内，所有在新加坡住了10年以上的外国人，只要宣誓完全效忠于新加坡，并永远在新加坡居住即可马上取得公民权，不用缴费，不用介绍人。在这两年内手续非常简单，两年以后当然要采取正常的归化手续。这是去年所规定的，我相信现在宪法草案上对这点仍会保留。

总理：你所谓正常的归化法是怎样的？

马：英国在1952年搞了一个现行的归化法，规定居住5年，说明父母血统，说明财产状况，经过警察调查，要五个介绍人，限制很严。新加坡独立后将有自己的规定。刚才所

说的宪法的规定是为了使成千成万的人能够做新加坡公民，以后则应按正常的归化法办理。

总理：就是说以后你们一方面不会继续用英国的归化法，一方面也不能像宪法规定那样简单。

马：是的，宪法的规定是要解决23万中国（华）人的公民权问题，手续的规定只是一种形式。一方面要使每个人可以做新加坡公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他可能不愿意做新加坡公民，不愿意者两年以后可按其他办法办理。

总理：刚才所说的三类人以外的呢？是否祖代在新加坡？

马：马来人约12万，印度人约5万，还有混血人，我记不清这些数字了。印度人、印尼人也有一些没有公民权的。

总理：取得公民权的是太少了，应该多些。

马：有58万人是在21岁以下的，中国（华）人是男的先到新加坡的。男的赚了钱以后，女的才去。新加坡人口大增是在1940年以后，新加坡实际是一个未成年（年轻）国家。

总理：是很有希望的国家啰！

马：但愿如此，到1960年大部分都满21岁了，选民将大增。

总理：中国人中是否有不愿意取得新加坡籍的？

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只能提第二手（间接）的意见，1955年4月以前，大部分人是不愿取得新加坡籍的，以后他们看见通过选举可以取得权利，他们都有兴趣了。我的意见是，他们现在都愿意取得公民权。马来亚联邦（联合邦）是不给这些人公民权的，可是新加坡给。因此报纸都在要求公民权，不愿要公民权的很少，他们可能有些犹豫。如果中国发表声明，会促进他们取得公民权，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坦白说，新加坡中国（华）人占76%，除非其大多数人都效忠于新加坡，否则新加坡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应给他们以充分的权利。他们属于新加坡，新加坡也属于他们。

总理：我赞成这个意见。

马：关于这个问题，我第一次与您见面谈话时就感到高兴。如果你能非正式地发表中国对华侨的政策，那不仅对于新加坡、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总理：华侨政策的原则已经宣布过，现在是对新加坡的具体问题，因此我想弄清楚一些情况。听说有排华现象，这种现象是仅限于马来亚联（合）邦，还是新加坡也有？我是

听见那些记者说的，想从马歇尔先生这里知道一些情况。

马：我无保留地说，新加坡绝无排华运动。我们准备在宪法中做有关于公民权的规定，即是证明。虽然印度人、印尼人也有公民权问题，但主要是解决中国（华）人的问题。

总理：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按照宪法取得公民权后，他们效忠于新加坡的问题自会解决。以后关于国籍问题的法律手续要到新加坡独立以后由两国协商处理。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国籍问题解决以后，你认为是否有可能使马来亚对中国人的态度有所改变？

马：肯定会有所改变。

总理：有信心吗？

马：遗憾的是：新加坡被人统治了130年后，现在可以讲话了，但是去年罢工有269次之多。某些中国学校（华校）的学生表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对马来亚有影响，他们要求防范。如果你能发表声明，将证明拉赫曼说中国（华）人不忠诚的话是完全错误的，马来亚政策必须改变，否则新、马合并就不可能，目前的分隔是人为的。新加坡的紧急法令⁹的确会被滥用，罢工的人被关押起来，但有相当数量是制造政治混乱的，学生也罢课了。在反殖民主义的高潮中，是有些偏激情绪的，带有中国（华人）民族主义的趋势，但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不必太重视。可是马来亚很重视，英国报道故意渲染，说新加坡在培植极端的中国（华人）民族主义。马来亚联（合）邦说这些人不可能忠于新、马，只能忠于中国。

总理：新、马长期分裂，在经济上、地理上都是不利的。

马：是。他们总是从种族观点来看问题。

总理：种族问题只是一个原因，一种借口，上次也谈过，这与英国的政策恐怕很有关系。

马：如英国的政策在这方面做工作，一定是朝着种族方面去做。

总理：你老是集中到一个问题，老是种族问题。无疑我是支持你的这种看法的。即：中国人留在新加坡、马来亚，忠于新、马，取得公民权。但是使新加坡独立发展，各民族团结——这才是广泛的看法，因此我想广泛交换意见。

马：但这是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则新加坡、马来亚可取得真正独立，不是形式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你是更有政治经验的，我不能相比，可是我熟悉当地的情况。

总理：你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你说得对，应该消除种族歧

视，取消种族不合（和），以便团结各民族，使他们忠于新加坡、马来亚，争取完全独立，这是关键。在这个关键上我支持你。但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团结为了什么？是为了去掉英国殖民统治。这样说，并不是说仇视英国人民，而是仇视殖民主义，使新加坡、马来亚获得完全独立，这样才有可能使新、马留在英联邦内。这是我们的好意，不仅是对新加坡、马来亚，而且是对英国的好意。因为做好事才有好结果，这是积极的一面。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果英国不允许新、马独立，如果使中国人与其他族人不合（和）、仇视，实行分而治之，使新、马分治，这就是殖民主义，就会遭到人民反对，中国人也会反对，这是亚非会谈的精神。我们要看看这一面。

马：从已发表的我们的行动看，独立须经两个阶段。马来亚明年8月可独立，但并非完全独立，还要与英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肯定在东南亚条约¹⁰之外）。新加坡也一样，明年可独立，获得完全的自治政府，有各种内政权，但没有外交权、国防权。第二步是像锡兰一样，有完全独立。因此明年8月马来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有条约，新加坡除外交权外，有一切权利。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新加坡虽无外交权，但去年英国已同意在对外贸易上新加坡有完全权利。

总理：你提出的是步骤，未涉及我所说的原则。我是从两方面分析问题。独立可能要分步骤，独立的程度决定于新、马人民，我们局外人不能具体地说。刚才我所说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两步也好，三步也好。你对这点怎么样？你似乎不敢触及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是自由交换意见。

马：反殖民主义是有限度的观点，除去殖民主义是目前的任务。种族问题不仅对除掉殖民主义是重要的，本身也是一基本问题，对今后都很重要。种族问题的解决对独立问题重要，对新、马合并也重要。我感觉惊奇，你说除掉殖民主义是目的。

总理：没有什么惊奇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马来亚不是怕中国去进行殖民主义吗？如果你同意各民族团结起来以排除殖民主义，也包括中国的殖民主义。不仅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不仅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也包括有些人所怀疑的中国的殖民主义。这正是谈到基本问题。我不知你为什么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敢面对这问题，不仅外国的殖民主义我们要反对，自己的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如果中国强大起来，也绝不允许自己进行殖民主义。你可以告诉马来亚、新加坡人民，说中国总理说过这话。如果中国强大时进行殖民主义，新加坡、马来亚以及全世界都有权利（权力）和由（理由）来反对中国。

马：我百分之百同意。如果我给了一种印象，好像不敢触及殖民主义那真是遗憾。只有解决了种族问题，新加坡才能终止殖民主义，达到完全独立，使新、马合并。

总理：还可以加上一句，终止从任何方面来的殖民主义。现在已经清楚了。为民族发展，独立，必然要永远摆脱殖民主义，这个民族也不会允许自己进行殖民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马：我对第二方面有兴趣。我想你已经看到了我起草的新闻报道草稿，这点应予补充。

总理：我看到了。大体上许多地方可以用，但可使其更完全，请外交学会的几位做一些修改。

马：今天你所说的这句话要加进去：要独立，不仅要消除各种殖民主义，而且不使自已进行殖民主义。

总理：完全同意。不仅现在如此，而且在后代也如此。

马：虽然我自认有普通的智慧水平，对世界的事情知道一些，但是我是到中国来才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这要感谢外交学会的邀请。我喜欢中国人，希望中国有好的政府，但是突然害怕中国强大后，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主义。现在我已不害怕了，并且我还要帮助别人了解这点。

总理：因不了解而有恐惧，丝毫不能怪你。同时，我们共同站在反殖民主义的战线上，如果我们进行殖民主义，是不忠实于自己；如果造成一种状况使后代进行殖民主义，也是对后代的不忠诚，对人类也不忠诚。新闻发表后，希望对中国人好好说服，如上次说，不能用它来压制他们。

马：在马来亚联（合）邦方面我不可能做多少工作，那里有一个陈修信¹¹，是一个青年人，我愿通过他去做。拉赫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新加坡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新加坡当部长¹²，他是激烈反对给中国（华）人公民权的。去年到伦敦谈判时，我就对他说，或是他支持我，或是他辞职，结果他表示支持我。拉赫曼对此很不满意，他叫不要走得太快了。因此在最近时期我不准备干涉马来亚。将来也许看不见我在这方面做什么工作。我希望在新闻报道中也不要涉及马。

总理：不涉及马来亚，那对你不方便。

马：谢谢你。

注释二 (林恩和加注)

¹ 荣毅仁 (1916–2005), 中国企业家, 曾任中国政府副主席, 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² 指的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

³ 郭棣活 (1904–1986), 洋名是David Kwok, 出生于澳洲悉尼, 中国企业家。家族在上海经营永安纺织公司, 有“纺织大王”之称。

⁴ 指郭棣活的女儿郭子思 (洋名 Mavis Yu), 嫁给新加坡富豪余东璇的儿子余经纬。

⁵ 刘念义 (1910–1967), 洋名Julius Liu, 中国企业家。家族在上海经营大中华火柴公司、青岛火柴公司及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 有“火柴大王”之称。1967年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 改革开放后被平反。

⁶ 指的是简玉阶 (1875–1957), 中国企业家。1905年与其兄简照南在香港创立南洋烟草公司。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作广告宣传, 成功占领华南和南洋市场, 早年新加坡报章经常都可见到这则广告。1916年, 南洋烟草公司在上海开设分公司, 1918年, 其总部由香港迁至上海。

⁷ 漆德卫 (David Chipp 1927–2008), 1950年加入路透社为记者, 两年后被派驻东南亚。1956年来到中国, 成为新中国首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记者。曾独家采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中国领袖毛泽东而声名大噪。四年后回去英国并在1968年出任路透社总编辑, 1969年改任英国报联新闻社 (Press Association PA) 总编, 1986年退休, 2008年病逝。

⁸ 叶平玉 (Yap Phing Geok), 新加坡土生华人, 银行家, 曾任殖民地市议会官委市议员、市议会属下工商咨询委员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来亚黄梨制造总会会长、四海通银行董事经理等职。1948年被委为太平局绅, 1963年代表人民联盟参与新加坡大选。1953年与陈六使、高德根等, 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殖民地制宪委员会主席林德爵士 (Sir George Rendell) 商讨华人民权问题, 为日后新加坡非土生华人取得公民权铺开道路。

⁹ 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 英殖民地政府援引紧急法令在新马宣布“紧急状态”, 直到1960年才解除。紧急法令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 赋予政府行使四大权力: 即有权宣布戒严、有权可以不经过审讯逮捕和扣留任何被认为危害治安的人、有权限制公开演说、出版和结社自由以及警方有权封路、搜查和没收房产、车辆以及搜查任何可疑人士。

¹⁰ 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美国在1955年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主催下成立的集体防卫军事组织, 总部设在曼谷, 共有8个成员国, 即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纽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目的是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势力, 美国有意把它打造成东南亚的北约, 但是不成功, 1977年宣布解散。

¹¹ 陈修信 (Tan Siew Sin, 1916–1988), 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的儿子, 为马六甲土生华人。马华公会稍后与巫统和印度人国大党组成政治联盟。陈修信在1955年中选为马来亚联邦立法会议员, 出任工商部长, 1959年改任财政部长, 同时成为马华公会会长, 他长期担任这两个职位至1974年辞职。马绍尔访华时, 他是马来亚联邦工商部长。

¹² 指新加坡巫统 (UMNO) 领袖阿都哈密 (Abdul Hamid) 时任地方政府、地政及建屋部长。

新加坡国族打造和国民意识培育



文：廖建裕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起源

新加坡国族打造的时间并不长。1826年，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一个部分。当马来亚于1957年宣布独立时，她只将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檳城包括在其疆域内，把新加坡排除在马来亚联合邦之外。然而，那时的新加坡知识份子，不论是受华文教育或英文教育，都把自己视为马来亚人。¹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居民都有共同的历史的经历：他们在英属马来亚出生或长大，曾经历过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许多还同是英国的臣民。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的互动频繁且周密。新加坡其实曾经是马来文化和华族文化的枢纽。主要的马来文和华文报章，都在新加坡出版。新加坡也曾是马来亚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殖民时代，新马之间并没有疆域的分割。

即使在马来亚独立后，新马的密切关系没有中断。新加坡居民仍然自称为马来亚

人，将马来亚当成是自己的国家。在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新加坡主要领袖的目标依然是和马来亚合并，成为独立的马来亚的组成部分。这个愿望最后得以实现。那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变成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

然而，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的日子并不长。两地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新加坡变成一个独立国。从政治或者是法律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国族打造应该是从1965年才开始，因为之前并没有独立的新加坡的概念和国家。其实，新加坡独立初期，许多新加坡人都抱着希望，能够再重返马来西亚的怀抱，主要就是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人眼里，一直以来，新加坡始终是马来亚/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一旦独立，弹丸小岛没有了腹地，没有资源，很难独自生存。但是，三年过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回头，继续步上建国之路，打造新加坡国族。

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国家认同

先谈国族(nation)的定义。有时也翻译成民族。在世界各国，目前仍然有两种民族国家/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一种是单元族群国族(ethno-nation)，它由单元族群所组成，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另一种是多元族群国族(multiethnic nation)，美国和中国都是。其实，单元族群国族只有十多个，而且有些正在消失中；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多元族群（或种族），新加坡是属于这类“多元族群的国族”。更正确地说，是“多元族群的国家”，国族还在形成中。

多元族群的国家经常发生族群冲突，因为各族群都以自己族群的利益至上，没有共



2020年国庆日（林少彬/摄）

同的归属感，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没有强烈的国族的概念。因此，这些多元族群的国家都在积极地打造一个国族，以便能够使人民团结一致，朝向一个目标前进。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如何打造其国族？我们如果探讨新加坡的当代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熔炉时期”，第二个是“文化多元化时期”。

政府将各族群融合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制度。政府把所有的族群语言学校转型成为国民型学校，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虽然从一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强调多元种族和双语政策，在实施时，尤其是在第一个阶段，太过强调统一而不是多元性。英语的应用致使族群的语言或者母语逐渐放置在第二位。在这时期所强调的是“新加坡人”概念。人们谈的是“华裔新加坡人”，“马来裔新加坡人”和“印度裔新加坡人”。虽然行动党继续采取多元族群的政策，但是淡化族群认同，落实像美国的“大熔炉”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加坡的各种种族最终会融成“新加坡人”。

在1970年代，政府曾经推行新加坡民族服饰以分别新加坡公民和其他的外国人，但是没有成效。政府也提倡“国族”的歌舞，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效果。1990年，那是在新加坡庆祝25周年建国纪念时，新加坡政府采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可是这与多元族群文化的理念似乎又有冲突。

1995年1月，当时还是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宣布：多年来打造“新加坡人的新加坡”逐渐实现的梦想，即将各种族融合在一个大熔炉里，已经被抛弃了。1995年5月，有一批较年轻的新加坡领导人提出了新加坡21世纪愿景，并且探讨有关新加坡的认同的问题。李光耀资政认为，他对于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的坚韧性颇为佩服。他说：

“我看过日本人被征服过，我也看过他们如何复兴。我有点勉强承认，我仰慕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个太阳族，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单元族群的优势：团结以及相互间的完全信赖。”

李光耀还说：

“我们如果是一个种族有多好，一个种族、一个语言、一个宗教。赛·惹化阿峇（马来西亚马来领袖）也就是以此想打败我们：“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宗教！将我们排除在外，也排除许多不是他同种族的人。”很

明显，李资政想到新加坡在过去曾经是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的历史，并且认为吉隆坡政府建造“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模式不能用于新加坡。了解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李资政会这么说：

“当我们经历了这些折腾，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与他们相反：我们要相互忍让，相互接受，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元文化。换句话说：我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你的身上。”

李资政也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一个“部族”（tribe）。部族这个词其实是吴作栋当总理演讲时所用的一个词汇。吴作栋后来也向李资政做了回应。在对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演讲中，他说：

“我引用‘部族’一词作为一种比喻。它是指一种具有特殊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特征的大家庭，其成员具有共同的命运。这并不是在试管中配制出来的新加坡部族。……这个在引号内的部族，生动地描绘我们长远的愿望和目标，那就是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基于多元种族的一个民族（people）和一个国族（nation）……但是，为了避免混乱，我要用更清楚的词汇：一个‘多元种族的新加坡部族’（multi-racial Singapore Tribe）”。

放弃大熔炉的模式

不论李光耀和吴作栋都同意，单元族群的大熔炉模式的“国族建设”在新加坡是不合适的。但是放弃这个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抛弃了“国族打造”的计划。行动党政府仍然在寻找各族群的共同点，以便能够打造一个“国族”。

打从独立开始，新加坡政府已经将所有的族群学校改成国民学校（只有回教学校是唯一没有转型的学校），英语变成了主导性的语言。除了马来人外，华人和印度学童都逐渐地失去了讲“母语”的能力，甚至母族文化。政府特别担心华族学童完全西化。政府认为华裔新加坡人如果只能说一种语言，而这个语言又不是“母语”，那是不该发生的事。于是，政府将宗教教育列入学校课程，提倡母族的语言和文化。连互助性的组织，也以族群为基础。至于国家认同，新加坡人开始强调族群的背景：新加坡华人而不是华裔新加坡人；新加坡马来人而不是马来裔新加坡人；新加坡印度人而不是印度裔新加坡人。

但是，如果将这个当成是新加坡放弃国族建设是错误的。事实相反，国家还是有意打造新加坡国族，但是，

其模式已经不再是大熔炉。它与印尼的“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国家”的模式有别。政府已经建议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的多元种族的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他的演说中提出“国族英雄”(National Hero)，“国族标志”(National Symbols)和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他承认，新加坡还不是一个国族，因为她还缺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共同的文化。然而，他说“新加坡人已经有自己的社会特质，致使他们与其他的‘部族’有区别。这个包括新加坡式的英语(Singlish)，他们喜爱的食物以及两K：即Kiasu(怕输)和Kiasee(怕死)”。

然而，他强调不同的新加坡族群可以从他们各自的文化遗产打造共同的价值观。他提起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养，新加坡政府希望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打造出新的新加坡国族。

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通常可以分成两种社会。一种是菲尼维尔(J S Furnivall)提出的“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这样的社会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各种族多以种族为中心，不能相互容忍，政党和社会组织也是以种族(族群)为基础。这种社会，经常产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可是，M.G史米特(M.G. Smith)提出另一种“多元性社会”(Pluralistic Society)，虽然这也是多种族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各族间能相互容忍，而社会组织也是跨种族的，这个社会较为稳定。言外之意，新加坡政府要建造一个“多元性社会”而不是停留在“多元社会”。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五个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这五项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政府虽然大力践行这五项共同价值观，但是却没有将之成为法律的条文。由于没有人做过详细的研究，我们不知其有效性。不过，在学校里，与此有关的“新加坡信约”，从新加坡独立不久就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学子的脑海里。

实际上，新加坡还在寻找国家身份认同。虽然新加坡是个多语言的社会，国家承认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是新加坡的国语，但是它是象征性的，真正为国人广泛使用的工作语(working language)是英语。在岛国，英语变成了团结各族的语言。

由于迅速全球化，新加坡又变成了一个移民社会。当时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长的杨荣文在2000年的访谈中

透露：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外国人涌入新加坡。我可以给你一个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统计数字：每两个新加坡新生儿诞生，我们引进一个外国永久居民。同时，在每四个新加坡人的婚姻，有一个是同外国人结婚。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数目已经增加两倍。我们已经再度成为“移民社会”。

大量的外国移民对于国族建构是一个挑战。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对国族打造也是一项更大的挑战。《白皮书》建议，到2030年新加坡的人口要增加到6百90万人。这个《白皮书》在国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新加坡人对于大量的外国人涌入新加坡感到不满，他们埋怨交通和居住的恶劣情况，致使政府最后说6百90万这个人数是“最坏的远景，而不是政府所想达到的目标”。

在投票前，《白皮书》的条文在国会引起激烈的辩论。李显龙总理一再强调，新加坡人的生育率很低，如果在2030年新加坡的人口还是在6百万人以下，那么，新加坡就无法维持目前的发展。李显龙强调新加坡人是政府最关心的群体。“我们要新加坡好，使新加坡人也会好。”结果政府议员都投支持票，而反对党则投反对票。大量的移民的继续涌入，确实使国族打造发生困难，也使新加坡国内“族群认同”的情绪继续高涨。

强烈的族群(种族)情绪与国族打造

虽然国族打造有所进展，但是非常缓慢，反而是种族的情绪逐渐高涨。其实，国民型学校是多元种族的学校，旨在融合不同族群的学生。但是，近年来不同族群的学生并没有融合在一起，我们反而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学生都留在各自的族群里。

在2004的一份由新加坡国大学生组成的政治学会调查报告，显示出新加坡学生对于国族认同的程度。这个调查是根据网上调查，虽然其方法不很严谨，但是可以当作参考。在750位反应者当中，有67.8%的反应者以自己的种族认同，而与国族认同的占第二位，也有66.8%。这意味着经过了39年的国族打造，新加坡大学生的族群(种族)认同和国族认同一样强烈，或者说，族群认同比国族认同还高出1%。

种族或族群以及宗教在新加坡还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政府还立法禁止以种族和宗教课题攻击他人的法规。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找有关的机制，以便能够将各族群融合在新加坡的大家庭里，这些机制包括国民服役，国民

型学校，共同价值观，国族的标志，以及任人唯贤的公务员制度，政府还规定在一个组屋区内少数民族不能超越25%。在另一方面，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也加以强调。两种措施，致使两者可能发生冲突，至于如何取得协调，也是政府当前的重要的任务。如前所述，国族建构的成绩还不理想。国族打造是一项长期的项目，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然而，由于新加坡不是以“单元族群”作为国族的模式，而是多元族群国族的模式，以避免不必要的种族冲突，但是，要实现这种模式的国族，需要漫长的时间，或许也不能完全实现。

从实际出发，新加坡政府在国族打造的同时，也应用国籍(Citizenship)条例(或者公民权)促进国民团结，以便迈向国族建构的道路。但是，国籍是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而国族是文化和心理因素的概念。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国籍/公民权的商业化？

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国籍/公民权已经商业化。这意味着，公民权的给予是按照外国人对于居住国的贡献，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在新加坡，也实施这样的政策，欢迎有财富和技能特长的外国人来新加坡定居而成为公民。起初给予永久居留证，后来才给予公民权。最广为人知的是在体育运动方面。在2005年中期，三个中国出生的运动员，足球队李靖(音译，29岁)，羽球员邢爱英(15岁)和李羽佳(22岁)获得了新加坡公民权。李靖当新加坡足球队助理教练两年，爱英和羽佳在新加坡羽球总会培育计划下来新加坡。根据《海峡时报》报道，“这三位外来人才由于获得公民权给予各自的运动项目推上了一把”。

可是，新加坡人对于这些新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意见分歧。有些勉强接受他们为“新加坡人”，有些公然反对。其实，早在2002年，当英联邦运动会时，中国出生的乒乓运动员井浚泓，李佳薇和张雪玲为新加坡取得了金牌。有些新加坡人就评论说，她们是“输入品”，不是新加坡本土的运动员，因此，她们的胜利不是“新加坡的胜利”。有些人不以为然。新加坡领导人，包括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则认为，“她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因为她们是新加坡公民，她们为了新加坡曾经艰苦地工作。”

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新加坡乒乓队由中国出生的球员李佳薇，冯天薇和王越古组成，为新加坡赢得了难能可贵的银牌，有关“输入球星”的争论又起。2010

年同样的乒乓球队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击败了中国的乒乓队，获得了冠军。这时，来自新加坡的批评极少，反而是来自中国的网民攻击她们，说她们“出卖中国利益”，是“叛徒”。但是有些网民却称她们是“中国海外兵团”，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种网上的骂战，引出这个课题的另外一个层面。在新加坡政府收集意见的会议中，由146位政府委任的“青年大使”。其中一个学生问青年和体育部长维文，为何需要聘用外来的运动人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人才？部长听了冒火。他说那些认为已经入籍的新加坡的外国体育人才“不算是真正的新加坡人”(less of a Singaporean)具有“很小的脑袋，不公平，和非常、非常自私！”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新加坡派出同样的乒乓队，她们在比赛中获得了铜牌。有关“输入球星”的争论又冒起。新加坡人还是意见分歧。同年，当李佳薇公布自己退休后要回中国发展，“输入球星”的争论又再度点燃。我这里提出的例子全部都与体育有关，其实，外国人在其他行业中也比比皆是，可是，由于没有在报纸上加以报道，很难找到具体的证据来评论。

如前所述，外国人入籍前必须先通过取得永久居民的阶段。作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除了参加选举外，他们有许多义务，包括服兵役。除了不能买第一手政府组屋单位，永久居民也享受公民一样的权利。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永久居民在学费、医药费都享有与公民同样的补助，直到后来这种待遇才有改变。2008年，由于许多公民埋怨，政府才颁布学校和大学的学费永久居民要比公民多付20%，不过已经入学的不受影响。这种稍稍的调整是用来辨别永久居民和公民。然而，移民在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次大选中，执政党输掉了多个议席。在大选过后，政府再次调整有关学费和医药费，以辨别永久居民与公民之间的不同。

外来人才的问题

国族打造的另一个问题与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尤其是当政府积极地招募外来人才来新加坡工作和居住。外来人才对新加坡的贡献和今后的继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需要外来人才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由李光耀当总理时提出的。他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外地出生的新加坡人将新加坡的经济地位提升了。随着新加坡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外来人才。新加坡训练出来的人才虽然可以

作为核心,但是这是不足够的。李光耀认为,“我们过去能获得良好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有额外的外来专门人才。他们自动地被新加坡吸引而来到新加坡。如今如果我们不拟定一些措施来吸引我们需要的额外人才,我们不可能迈入电脑和机器人的时代。”

李光耀所持的愿景对新加坡的国族打造是一项挑战,因为,将有更多的非新加坡人会变成新加坡人。有些外来人才不大愿意入新加坡籍,有些要保留双重国籍。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在李光耀让贤后继续落实。在吴作栋当总理时,他继续实施这个政策。2004年当李显龙继任总理时,政府更加强这个政策的落实。2006年,李显龙在国庆演说中表示,新加坡的人口由于生育率低而急速下降。他认为,最可行的方法来弥补这个空缺的就是移民。不过,这些移民都是外来人才而不是增加国家负担的普通移民。他还说,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当世界各国都需要人才,人才变成了各国争夺的稀有“货品”。新加坡为了要保持它的领先地位,没有其他的途径,必须将移民政策自由化。李显龙呼吁新加坡人接受新移民,并且帮助他们融入新加坡的主流社会。

有些国会议员认为很多新加坡人很勉强地接受李显龙总理的看法。新加坡媒体对于总理的演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多人也能接受新加坡需要外来人才的事实。但是,当这些外来人才与他们竞争,并且威胁他们的职位时,他们就“不理智”了。

发表国庆演讲后,李显龙又再强调,吸引外来人才是为了新加坡人的利益。虽然有些人“明白和支持”政府政策,但是其他人担心这些外来人才在职场和学校给新加坡人带来的竞争。他们甚至说,新加坡政府是由他们选出来,旨在要政府保护新加坡人的利益。李显龙承认新加坡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新加坡人。但是他说:“保护新加坡人的方法是需要新加坡有足够的人口,使经济能够增长,使我们有更多的人工作,使我们有更多的商人开始新企业,使新的创业人士来此创业,使新加坡有足够的人才以便使新加坡人有很多的工作。”

应该指出,有关新移民的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成本”。其实,一样重要的是有关这个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如何改善现有的政策。

此外,有一点值得一提。李显龙总理表示必须与海外的新加坡人保持联系,不要让海外国人忘记新加坡。这种

与海外新加坡人保持联系的措施并不新颖,可是,李总理所强调的是海内外新加坡国民的团结。

为了吸引外来人才,政府在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工作几年后鼓励他们加入新加坡籍。但是入新加坡籍就得放弃原来的国籍。有人因此提倡双重国籍以留住人才。

双重国籍与国族认同

我们谈过,新加坡政府曾给予杰出的运动员新加坡公民权,以便能够代表新加坡参加国际赛。2004年有个原籍巴西得足球队员阿克马·贡卡维斯入新加坡籍,以便能代表新加坡。可是两年后他向报界透露他要回巴西。许多新加坡人议论纷纷,说他对于新加坡不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

新加坡《海峡时报》专栏作家何安迪就此事写文章,他说这是新加坡承认双重国籍的时候了,因为世界有90个国家已经承认双重国籍。他又说:

“双重国籍的确曾经发生问题,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但是今天国籍证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证。……这是因为,受高深教育者可以自由选择在哪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说,护照就好像是旅游证件。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也喜欢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离开了。给予他们第二个护照会使他们留下来,融入于当地社会和做出贡献。给予双重国籍在一定的时间,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当时的内政部长的黄根成作了回应,有关双重国籍的问题必须非常慎重地处理,因为公民需要服役。

“如果有双重国籍,当时间到了,遇到需要他们时,对他们是很困难的选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两年之后,黄根成又谈双重国籍的问题,这与2006年的总理国庆演讲相关。他呼吁新加坡人欢迎新移民,因为他们为新加坡带来财富和繁荣。但是,在国籍问题上他的看法与两年前一样。

不过,有关双重国籍的辩论没有停止。国会议员伍碧虹在2006年11月又提出双重国籍的问题。她说:“14万新加坡人居住在海外,而有许多已经入外国籍,如果他们要回新加坡而要他们放弃外国国籍,那将是新加坡的损失。”她还说,新加坡欢迎外来人才,如果他们在出生国那里还有财产和家庭,要他们放弃出生国的国籍,他们是很可能不大愿意的。因此她呼吁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

研究这建议。她说她了解双重国籍有效忠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的情况，但是她相信新加坡政府能够找出特别的方法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

李光耀资政也参与有关双重国籍问题的讨论。在2007年4月，在花旗银行举办的晚宴上，有人问澳洲与新加坡两国是否可以有双重国籍。他说“这是将来的问题，由下一代的人决定。我自己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首先，最重要的是两国必须对于未来有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建立繁荣的澳洲和新加坡。”然而，双重国籍对新加坡的安全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年轻人可以选择不服兵役。他还说他知道新加坡年轻的领袖正在详细研究它对安全问题的影响，特别是对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影响。“不过我不敢预测将来新加坡政府会做什么。以前我是反对开赌场的。”但是，新加坡现在有赌场。

当时的外交部长的杨荣文也发表意见。他说目前实施双重国籍还不是时候，但是政府每10年一次会检讨这个问题。以后政府可能会逐渐尝试推行双重国籍法。总理公署的部长林瑞生则说，目前新加坡国族的观念还很脆弱，双重国籍对于新加坡这个小国很不利。如果此时落实双重国籍，那么新加坡所获得的将仅有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则由另一国所取得。可能在2030年时，当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已经很稳固，我们才能实施双重国籍的政策。

其实，双重国籍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对一个小国。一方面，人们经常将国籍和国族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要控制自己的国民。但是世界的全球化，国籍变成了“商品”而不是政治效忠和国族认同的标志。正如何安迪所说，“护照只是像旅行证件”，好像没有权利和义务。但是，许多新加坡人对于国籍的商品化大表不满。他们认为国籍是神圣的，他们不要“新公民”在新加坡繁荣时留下来，但是，当新加坡遇到困难时，他们就离开新加坡，留下贫穷的新加坡人自己解决。实际上，双重国籍会使社会分裂成“新公民”和“新加坡人”而不是将他们团结起来。

双重国籍对国族打造有负面的作用。在国族的观念里，国族的成员必须忠于自己的国族。当两个国族冲突时，国族的成员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的国族这一边。如果国籍被认为是国族打造的基础，双重国籍挑战了国族打造。

结语

在东南亚，新加坡是第二个最年轻的独立国（最年轻的独立国是东帝汶），她不是“国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国家国族”（state-nation）。国族打造正式开始是在1965年，而距离真正国族（民族）的形成还很遥远。

新加坡史家艾文·李（Edwin Lee）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其共同的敌手是共产主义，而李光耀没能独自处理这个问题，而东姑对此也深感忧虑。于是马来西亚诞生了。但是当共产主义的威胁除去后，两个总理的不同理念浮现。”新加坡离开了马来西亚。艾文·李认为，新加坡变成了“意外的民族（国族）国家”（Unexpected Nation）。

留美的新加坡经济学家琳达·林也说，新加坡不是一个民族（nation，国族）国家。它并没有具备一个国族所具备的条件。她观察了许多来美国的新加坡研究生，发现到他们只是把新加坡当成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但是对这个地方并没有强烈的感情。她认为，一个国族最重要的特点是国族认同，而新加坡人正缺乏这种认同。

上述的作者告诉了我们，新加坡是个新兴的独立国，同时也缺乏国族的概念。没错，新加坡是个新兴的独立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像所有新兴的独立国一样，其国族仍在形成的阶段。其国族打造还很脆弱，不过，这不等于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由于国族的打造需要漫长的时间，新加坡政府在打造新加坡国族的同时，也积极地培育新加坡国民（公民）的概念，利用国籍概念和公民权来促进族群的团结和合作，并且迈向新加坡国族（民族）的打造。最后，新加坡国族打造是否能顺利完成，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定论。

作者为东南亚研究所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注¹：马来亚意识可以在受华文教育和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中找到。比如，当时只有马华文学，没有新加坡文学。马来亚大学，一间英文大学，建立在新加坡。只有在1962年时，该大学才改名为新加坡大学。在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作者在南洋大学受教育。在南大的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的学生都称自己是马来亚人。《我爱我的马来亚》是当时南大生最喜欢唱的歌曲。其实，连在新加坡的共产党，也叫马来亚共产党。



文：胡林生

文明冲突的逻辑反思

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亨廷顿认为：世界各大文明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世界三大文明，即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无论在宗教、文化传承、社会结构、传统习惯、政治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基本观念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文明的社群和国家间的冲突。他还预言，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会联手抗拒西方文明。他的理论和观点，获得不少西方学者的赞同。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反响，但也受到不少学者的严厉批判。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主要依据，一是由于文明并不是一个有机体，自然不会引起冲突；二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目前仍然是国际纷争的主要根源。

人类的文明，基本上是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组合而成。如果我们进一步检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会发现只有一部分精神文化组合，存在着争论的空间。特别是有关管理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处理国家金融的经济体系，孰优孰劣，东西方的学者评价各不相同，但学术观点的歧异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理念，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不同文明的国家早已视为现代化治国的圭臬。所以，政经理念的歧异，是不同区域和不同文明国家经政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人类文明经过漫长的全球化过程，由于频繁的联系

和联系，会走向“和而不同”或者是“同而不和”的局面，仍有待历史的验证。

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

亨廷顿把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特别是生活习惯，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等，列为文明冲突的核心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文明之间在生活习惯，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方面，由于进展步骤有快有慢，存有差异是必然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普及和提升，彼此联系的网络更为紧密，不同文明之间已逐渐由封闭而开放，共同性越来越强，差异性变得越来越小。即使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绝，不同文明的生活习惯，会跨越国界而影响他国人民的生活，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见，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不同文明之间缺乏一条摩擦冲突的导火线。

至于文化传承，各大文明的确有不少差异。中华文明一向崇尚“仁义礼智信”，为人处世之道，重视“廉耻”，“良知”，人际关系讲究“公平正义”。中华文明不是宗教文明，但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和事件，足以作为中华文明意识形态的道德典范。两千年前，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中西亚和古印度文明。五四之后，中华文明也融入了不少西方文明的精华。但整体来说，外来文明并没有撼动或完全取代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基于传统价值观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无论是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的各个层面，跟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重点的确不尽相同。

中华文明的社会结构比较重视家庭和宗亲关系，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氏

族和宗乡的组织结构，以强化血缘，同宗和乡亲的身份认同，增强族群的凝聚力。氏族和宗乡组织的宗旨，是在同一个氏族或宗乡的前提下，彼此互相提携，同舟共济以克服客观环境的挑战。关键是，中华文明的家族和宗亲观念对不同文明并没有排斥和敌对的实质内涵。

中华文明有容乃大，对外来的文明一向抱着“和而不同”的包容态度。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会和伊斯兰文明联手跟西方文明相对抗，这无疑是缺乏逻辑的推理和想象，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深入了解伊斯兰文明的现状，就知道伊斯兰世界派系分裂，地缘政治矛盾重重。在不同的派系中，极端派穆斯林歪曲回教教义，散播种族仇恨，已成了世界和平的祸端。中华文明一向以和为贵，会跟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根本是无中生有的妄想。

美国共和党首领之一的斯金娜，曾在今年的美国国会，大声呼吁西方白人政权，包括苏俄，联合起来跟世界其他文明对抗，以维持西方文明的独尊地位。这是白人至上民族优越感结合民粹主义的最好写照，如果西方白人政权都响应她的号召，反而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大祸根。幸好许多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都对她的言论给予严厉谴责。亨廷顿把部分白人至上的民粹主义者的反非西方文明看成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恰恰是倒因为果。

科技文明的激烈竞争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从政治和经济体制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已逐渐转移到科技文明飞跃发展的竞争上。在人工智能和数码科技的带动下，科技界已经加速研发大数据，区块链和数字经济等高端科技产物。研发目标一旦实现，将给全世界的方方面面，如金融服务，政治体制，交通和电信，民生福利等等，带来巨大和长远的影响。可以想象，谁能先完成以上各项目标，不论他来自哪一个文明，谁就能登上人类文明殿堂的宝座，独领世界的风骚，甚至确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新规划。

科技文明的高速发展，引来了比目前的贸易战更为激烈的科技战问题。试问，这些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究竟归属于哪一个文明？哪个文明不想拥有它们？认真地说，科技文明其实是全人类的共同产物，是各大文明智慧的结晶，根本没什么归属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现代文明产物还有很多，如生物科技，医疗科技，航天科技，清洁能源，互联网技能，核能科技等，跟人工智

能一样，都是跨国界，跨民族的产物，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文明的最好见证，不可能跟任何一个固有文明挂钩，而跟另一个文明产生冲突。

从许多移民国家的社区发展历程，如澳洲，加拿大，美国等，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习得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少移居海外的华人，经过长期的侨居生活，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可见不同文化的伦理意识，审美价值，道德观念等，经过代代传承，虽成为个别群体的重要文化内涵，但這些意识和观念，都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后天逐步习得所形成的结果。所以，人类物质文明的高级形式，跟文化意识的习得和传承，并不是互相排斥两个概念。

文明冲突的潜在危机

话说回来，不同文明间产生冲突的逻辑虽然不强，但在多元而又复杂的国际社会里，国与国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少足以破坏社会安宁甚至危害世界和平的火苗。譬如，极端宗教意识，狭隘国家至上观念，军国主义，种族偏见，民粹主义，文化优越感等。如果有人从中炒作煽动，这些火苗就会破坏区域的安宁，甚至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中东时局的混乱，就是极端宗教排外主义和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后果，明显地跟文明冲突扯不上关系。

这些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说层出不穷，构成一波波冲击文明社会的逆流。面对此起彼伏的文明逆流，人类社会最大的挑战，我想，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积极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外，就是如何加强对文明逆流的管控，严防这些文明逆流的突发，爆发和蔓延了。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对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新加坡强调不同宗教的和睦共处，对不同宗教间的互相诋毁和攻击，采取严厉有效的零容忍政策。这个模式值得多元宗教社会借鉴。

简括地说，文明的冲突既不是必然，目前只能被视为假设性的论述，有待历史的验证。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人们如果能高瞻远瞩，一方面尽力保护历史遗留的文化珍宝，一方面兼容并蓄，积极创造日日新又日新的新文明。这样，人类社会才可能有一个绚烂的未来。

作者为前教育部华文专科学
前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

在多元社会里对 “肤色盲”的随想



文：叶鹏飞

总统哈莉玛在第14届国会开幕式发表施政方针时说：“在国内，新加坡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正在成长。我们有了新的愿望和期望，包括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看到更强有力的制衡。”

联系到人民行动党在今年全国大选后的检讨，不难想象这是执政党对自己选举成绩不尽理想理由的判断之一，即年轻人希望探讨此前被视为敏感政治禁区的种族、宗教等课题，对政府家长式的治理方式不满。

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完整，既然执政党自己得出这个结论，并且宣之于施政方针上，后续就必然会表现在政策上，开放更多的言论禁区。但是，总统也不忘提醒：“在每一代人当中，有些人想重新讨论敏感的问题。年轻国人更倾向于坦率和公开地讨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不过，这种对话必须保持克制和互相尊重，因为种族、语言和宗教将永远是本能性的课题。”对于保持克制和相互尊重的提醒，我深表赞同。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富于理想性，这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但是，光有理想并不足以带来所欲的良好结果，单纯讨论也未必就能得出新的答案；任何探讨，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更必须立足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后者则是缺乏人生阅历的青年所仍待充实的。

多元的现实

新加坡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必须拥抱多元价值。英国人开埠后，为了经济需要而从中国、印度等地引入劳力，转口贸易吸引了中东商人前来定居。这些不同族群带来各自的文化信仰，形成了今天多元种族、宗教、语言的社会现实。

这个历史背景，决定了新加坡在建国后必须拥抱多元价值。当然，新马因为政治理念和原则的严重分歧而分家，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认同多元价值的信念。二战后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新兴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建立在基于特定

种族、宗教或语言独霸的政治安排，最终导致血腥内战乃至种族灭绝屠杀。

换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价值立国理念，是一种历史的现实，也是一种政治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越来越去国家化，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产业链上的不同据点，因此鼓励不同国家的员工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只看能力，不看国籍的人力分配，确实为企业带来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跃升。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带来彼此相异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为企业文化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但是，多元价值在企业文化里或许是优点，在社会国家却未必。政治毕竟关乎利益的分配，当社会存在不同种族和宗教时，利益的分配就容易沦为部落化。因为人以群分，不同种族同处一个政治实体，必然会因为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差异而导致关系紧张，甚至恶化为利益分配时的彼此怀疑和仇视。2020年8月4日首都贝鲁特发生港口大爆炸的黎巴嫩就是极端例子，该国政治权力赤裸裸按照宗教群体分配，结果便是低效、无能和腐败的政府，以及离心离德的社会。

认清了这一事实，在讨论多元价值时，就不会天真地要去推广和膜拜它，而是小心翼翼地先确保社会不会因为伤感情地公开讨论群体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政治紧张。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往往比很多善心人所想象的更广大且残忍无情。

人类对于陌生事物，包括自己所不认识的语言、宗教、种族、生活习惯的他人，心理本能甚至潜意识是当作威胁的。这也是很多多元种族社会，日常出现或隐或现歧视他族人现象的原因。当然，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和教育的普及，公开的歧视越来越不被接受，但这并不能完全改变很多人的心理或潜意识。作为社会文明的理想，持续努力消除种族、语言、宗教的偏见和歧视，必须是要坚持的目标；但是，也必须诚实接受实现这个目标的局限性。

“肤色盲”的盲点

有出国经验的人大概都有共同的经历，在异乡突然听到熟悉的“新加坡口音”，无论是新式英语还是华语，总会自然地产生亲切感。这也是一种进化本能。所谓“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典出《战国策》），人是群聚的动物，在部落时代，单枪匹马的个人或许不敌很多猛兽，但是因为能够协力捕猎，所以包括像史前的长毛象这种庞然大物，都因为懂得制作捕猎工具和集体狩猎的智人的出现而惨遭灭绝。

就如同对陌生的人和事物天然不信任，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都有亲近感，因为这种亲近感和安全感是相关联的。强调要通过“肤色盲”原则来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人，完全漠视了这种人性；而任何违反人性的理论或实践，最终都必然以失败告终。

必须指出，“肤色盲”的原意是高尚的，它脱胎自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以品格而非肤色来判断一个人。但是，“肤色盲”理念发展到今天，却是毫无根据地把族群间的成就差异，完全归咎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肤色盲”的另一个盲点，就在于没有自问一个核心问题：人们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由许多维度组成，可能是职业如医生、律师、消防员、技工；可能是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但最自然的莫过于与生俱来的种族身份，以及正常过程所使用的语言，家教传承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价值等等。

这种与生俱来的的身份认同又往往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肤色盲”要求主动者忽视这些特征，平等对待任何人，但是却并没有问过被对待的人，是否在意且坚持自己的这些特征。举个敏感的实际例子，“肤色盲”提倡者要求雇主公平招聘，但是清真馆子的老板不可能因为“公平”，而招聘非回教徒作为厨师。我们能够因此而指责清真馆子的老板歧视非回教徒吗？

唯才是用未必公平

公平作为一种理想固然可贵，但也只能尽量做到“机会的平等”而不能奢望“结果的平等”。前者的具体手段是通过提供所有人予教育的机会，让底层子弟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借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就算如此，“机会的平等”也未必能实现公平的社会；正相反，它可能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前工业革命4.0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知识密集的特性。这意味着人的智商将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科学家发现，智商无法在后天通过教育来改变，而且有超过一半的原因，取决于同样无法改变的先天基因；后天环境如家庭教养、营养摄取等占了少于一半的决定智商高低的因素。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但存在智商的差距；族群和族群之间也存在智商的差距——犹太人平均智商高于其他族群，一直是困扰政治正确的科学界的一大问题。族群之间的智商差异，同样表现在族群的收入和财富差异上。

202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20名，大多数跟互联网经济有关。工业4.0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增加，同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息息相关；而智商又决定了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跟社会结构，族群歧视等被左派学者视为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关系不大。如果智商真的是先天而不易改变的现实，而智商的分布又跟族群存在某种联系，要如何达到所有族群成就相等的“肤色盲”理想，恐怕必须有非常激进的方案。然而碰触这个课题必然引发巨大的情绪反应，因此必须怀抱敬畏谦卑的心态，如履薄冰，而千万勿以替天行道者自居。

从事教育工作的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左派学者迪波尔（Fredrik DeBoer）在其新著《对聪明的宗教膜拜》（The Cult of Smart）指出，现代教育的一大结果其实就是人群智商的筛选，把高智商的成功群体挑出来，并美其名曰“唯才是用”（meritocracy）。换言之，唯才是用体制加剧了基于智商的工业4.0时代的贫富差距。这个结论值得新加坡人深刻思考，因为我们总以为“唯才是用”体制是最公平的，最能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却很少去探讨有一利背后必有一弊的阴暗面。

小结

大自然只讲究平衡，无所谓公平；立足于自然的人性同样如此。社会制度的演进必须符合自然人性，历史反复证明，违背它只会带来巨大的悲剧和灾难。现代人推崇理性，以为理性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然而，我们无法改变身处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固然很多，但解决问题的构想不能是希望一劳永逸；就因为人性不是绝对的善与恶，体认到这一点的孔子才会主张中庸之道。这应当是我们得时刻铭记的道理。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走入曹雪芹的艺术殿堂

读新版《石头记》札记之一

／文：雨石



曹雪芹终其一生才完成一部不朽之作，当初书名不一，或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情僧录》，或《红楼梦》，或《风月宝鉴》，或《金陵十二钗》。《脂评》提到曹雪芹的手稿原有110回，后30回一说借人阅读而佚失。稍后，高鹗在程伟元的配合下，续写了后40回，成为200多年来通行的120回《红楼梦》。周汝昌在新版《石头记》序言中，称程高后40回为伪作，写作动机不良，多处与曹雪芹原作的主旨背道而驰，乃至贬损曹雪芹本人和原著的形象，“愿读者详辨真假，勿为所惑”。

二

新版《石头记》的最大特色，是紧随原著放大的字体，分别以细小红色和紫色字体，补上脂砚斋的点评和周汝昌的校注和导读，有助提升读者对原著的理解。特别引人兴趣的是，周汝昌考证脂砚斋是“金陵十二钗”之一的史湘云化名，指出“脂评”透露出“女性的口吻和心态”，如“脂评”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书未成，芹为泪而逝。余尝哭芹，泪亦殆尽”，又谓：“今而后，惟愿造化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因此，他进一步断定此书是曹雪芹夫妇合作而成。

周汝昌原是胡适得意门生，后另辟蹊径，续对《石头记》或《红楼梦》进行考证和研究，锲而不舍，终生不弃，成果累累。许多不从意识形态出发的精辟见解虽备受争议，但独到之处仍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重视，被公认为新中国红学泰斗之一。

犹记半世纪前，曾读过1957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启功注释、周汝昌等校订的《红楼梦》120回通行本，故事的梗概依稀记得，但对80回《石头记》原著的了解，其实是很肤浅、很片面的。

去年底，一位李姓年轻朋友赠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2019年第三次印刷的《石头记》，收进脂砚斋的点评和周汝昌的校批。大开本，分上下册，合计1068页，红色外皮，盒式装潢，美观大方。此书于我恍如隔世，为了不辜负年轻人的好意，也为了弥补早年读书不求甚解的缺憾，我认真地把原著读了一遍，既可破疫情之闷，又期望重新感悟一番。

曹雪芹在世42载，经历过显赫家族的最后沉沦，但他特立独行，立志要在社会浊流之外，为他敬佩的一股清流立传。所以，尽管生活多么潦倒，“茆椽蓬牖，瓦灶绳床”，却丝毫不影响他的“襟怀笔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直至脂砚斋于甲戌年（1754）钞阅再评，才正式命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周汝昌以九旬高龄，于2007年完成兼容“脂评”和他本人校注的《石头记》。可以理解，他是出于对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尊重仰慕和研究心得，从原著留下“我未学，下笔无文”的自谦语，以及“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心声，读出了《石头记》的博大精深，这也是我们对待此书应有的态度。

三

读着读着，你不禁浮想联翩：为什么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称之为“开天辟地以来第一部奇书”，为什么大文学家鲁迅说“自从有了《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为什么周汝昌无怨无悔把一生献给了“新红学”？你惊叹真正伟大的艺术创造，是如何用生命和灵魂来完成的。从屈原到《离骚》、《天问》，从司马迁到《史记》，从李杜、文天祥、岳飞到他们的诗篇，从八大山人到他的笔墨，从徐悲鸿到他的绘画，从聂耳、冼星海到他们的音乐，从鲁迅到他的文学事业，从无数先烈到献出性命那一刻的吟咏，联系到眼前的《石头记》，你为先辈们呕心沥血，铸就精神灯塔，引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而由衷感佩！

没有曹雪芹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和执着，那郁结在心中的感受和真情，对文学的诚敬和挚爱，对“历历如绘”的种种情状的描绘，何以转化为一部旷世巨著，恢宏恣肆，典雅清丽，奇幻而不唐突，纠缠而不失主旨，写情而不落俗套，写人则恰如其分，写景变化万千，写物抓住要领，文心匠意，淋漓酣畅。

《石头记》借助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展现一个时代和封建社会的面貌，留下艺术创作的典范。作者对人物的经营，层层推进，柳暗花明，笔墨多变，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紧紧相扣。读者从文本出发，参照“脂评”和“周注”，既收获审美愉悦，又提升鉴赏水平。如果说我们的文学作者需要向经典学习，汲取丰富的文学营养，扩大文艺视野，曹雪芹原著无疑是值得认真看待的。古人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

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不可不慎也。

四

艺术创作离不开作家的生活阅历和真实感情，他的社会观、价值观和洞察力，文学的积淀和素养，以及作家本人的个性、天分和独创性。曹雪芹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难怪《石头记》原著缺了三十回，却无损于它的光辉和魅力。综观全书，以下几方面令人感触尤深。其一，文化气息贯穿始终；其二，想像空间既大且奇；其三，匠心独具，傲步文坛；其四，底蕴深厚，布局奇妙；其五，一笔多用，多笔一用。

明清两代的人文思潮，有力冲击腐朽的封建体制和愚人文化。秉承这种思潮，曹雪芹塑造了以贾府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和传统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写尽世态，刻划身边各类“浊物”、“蠢物”，真情描述单纯而善良的“儿女情长”。原作紧扣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所以书中人物纷繁，性格各异，遭遇不一，但作者不以非白即黑，非好即坏待之，人物的多面性和丰富性跃然纸上。更妙的是，此书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奇幻世界，女娲补天余下的一块已通灵性的巨石，如何被点化为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玉，由幻化为豪门公子的贾宝玉衔着诞生贾府。巨石，宝玉、贾宝玉，三位一体，真真假假，错综交织，演绎成一连串如幻如梦、真假难分却具有深层意义的人事纠结。“贾不假，白金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出土金如铁；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现实世界的荣华富贵终归要破灭，人间缱绻缠绵的真情和善美得以永恒。这一切都归功于曹雪芹对文学的虔诚，让“白茫茫大地”上奇葩绽放，永不凋谢，给后世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书中自有黄金“粮”

我的大半生阅读回忆

／文：林言

我读过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是《呆话》，那也是我拥有的第一本书，是哥哥介绍我到路边书摊买的。那年是1955年，我付了五角钱，是吃两碗汤面的代价。

我至今记得的其中一个笑话是，呆子喝了一口汤感觉淡然无味，妈妈连忙添了一小茶匙的盐，汤立即变得美味起来，于是，他自己拿出盐罐来添好几茶匙。

我好像从小喜欢买书，每个月一次到后港的国华戏院书摊买香港出版的儿童图书：《世界儿童》、《儿童乐园》和《世界少年》，后来也买台湾出版的《少年旬刊》。我喜欢阅读那些图文并茂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少年旬刊》连载的印度神猴传说，对我尤有吸引力。

读高小那几年，我也常一个人跑上光洋校友会的三层楼会所借书。我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世界上有爱莎尼亚、乌克兰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我为这些国家的民间故事入了迷。也是那个时候，由校友们轮流充当的图书管理员，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安徒生和格林兄弟，我便兴高采烈地走进一个个精彩的童话世界。

小学毕业那年，学校赠送的奖品里包含几本书：《呐喊》、《白杨礼赞》和《生死场》。我那时可没读，读不懂，却还晓得珍惜，收藏至今。

读过好些私密书报

升上中学，我更常到校友会活动，有个大哥哥私下借给我书，每次都是用报纸包

好。那两三年，我读了几本很好看的小说：《红毛楼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写本和《刘胡兰小传》等。我知道它们是禁书，不可转借人。后来我也读过几本社会科学方面的入门书籍：《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和《社会发展简史》等。

我对《红毛楼故事》印象特深，写的是新加坡学生求进步的故事，文字浅白通顺，作者是后来回中国的韩萌。同个时期，我也在校友会图书馆读过本地作家谢克著的《困城》，印象深刻，相信是因为写的本地人故事。

六十年代初，我在校友会能借到的书，都是巴金、茅盾、郁达夫的小说，还有就是欧美作家的作品，其中又以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著作为多。我在阅读茅盾和郁达夫的小说时都有点期待，因为书里偶尔有些男女情色的描写，我阅读时是颇为兴奋的。《沉沦》最让我震撼，作者在日本留学时偷窥女人冲凉的描写，读了都感到害羞。

其实，我家床底下还真藏有一些黄色书报，虽然数量不多，我都把它们读遍了。记得多数是描述洪熙官和洪文定父子与苗人打斗的武侠故事，其中不乏父子中了苗女情蛊而情欲焚身的情节。还有一种据说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才查禁的《蓝皮书》，对我则没有什么吸引力。

成年后我读的第一本色情书应该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第一次看到的这本书，书皮破烂，后面还缺了几页，但是没关系，夫人和园丁几次偷欢的详细描写

都没缺损。后来有个朋友通知我，大坡大华戏院门口大龙沟前的书摊有卖。那晚我是几乎立刻搭车下坡找到那书摊而且一口气买了两本，后来转送人一本。当然这期间，我还读过朋友借阅的非常露骨的春宫书，满足自己的性幻想。

中正两个图书馆

中学时代我还有另外两个借书来源。

竖立中正湖畔的图书馆，是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大房子，不过学生不能直接翻阅藏书，只能在一排排的木格子里寻找所要书本的介绍卡。卡是按书名笔划和部首编号。我们写下编号，交给站在柜台后面的管理员，他们便进书库找书。我借过一些书，多数都是带点进步色彩的小说，包括苏联小说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同学介绍的，如《人民的炮兵》、《铁流》和《士敏土》。前两本我始终缘吝一面，后者却是图书馆主任郑老师亲手递给我的。他说：“别借给其他同学。”他也是我的高中华文老师。其实，那本借了大半年才终于获得老师特别开恩的《士敏土》，我并没有读完，其中一个原因是情节进展很慢。我是直到离校后好几年读了《车间主任》这类描写苏联经济建设的著述，才感受到苏联文学的深度和广度。

到中正戏剧研究会的图书馆借书就容易得多。我读中四就不再参加戏剧会活动，却常去借书，只要有执委在会所，立即可以从书橱里拿出书翻阅。我那时选择的都是剧本，夏衍、李健吾、曹禺、郭沫若、田汉、洪深、阳翰笙和欧阳予倩的剧本都没错过。我那时读剧本当读故事书，速度很快，直到有一天借到一本解释该怎样阅读剧本的文学理论书时，才略有所悟。作者说阅读剧本不同于读小说和散文，要从台词里外分析和补充，才能较好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还要设身处地为剧中人物的种种反应提供合理解释。

红包钱买书

中学时经济能力有点改进，特别是每年从父亲手里接到的红包是日益丰厚。就那几年，红包封里的钞票是从一张五元绿钞逐年增加到四张。一过了年，我就到丹絨加东路与樟宜路交界的人民书店买书，买的书包括新马作家的作品。我就是在那时候接触到韦晕、方北方、苗芒和吐虹的创作。学校同学也来班上推销本地出版的多种书籍和杂志，至今不会忘记的是那本附带有许多人民抗日军照片的《马来亚民族运动简史》。不过，我

那时买了也没阅读，至今也没机会阅读，因为政府一宣布为禁书，哥哥就把它丢进垃圾桶。

有一两年，我们学校门口中午时分也有人摆书摊。我听同学介绍，接连买了《金陵春梦》连续四部的章回小说。那时候很难读到叙述中国当代历史的作品。在香港出版的这套讲述蒋介石、毛泽东、国共战争及抗日战争的历史小说，一时还真引起轰动，连我父亲都花了好多时间慢慢啃读。

我们父子三人包括我哥哥共同阅读的书，最多的还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是买《民报》，每天追踪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后来是直接向车站旁临时搭起的小书店买《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在香港报纸陆续刊登后一两个星期，本地就会出现单行本，我爸爸常催促我去问：新的到了吗？

雨夜读禁书

高中毕业后，我常参加社阵支部的活动。我的阅读范围就包括当时左派团体出版的报纸和刊物。每个星期天我也到惹兰福财村子沿户兜售《阵线报》和《人民呼声》。

我认真阅读的这类出版物还包括《火焰报》、《大学论坛》、《大学青年》、《戏剧研究》、《政治学报》、以及社阵、人民党、马来亚劳工党、本地工会和乡会出版的多种书刊杂志，如《乡村问题参考资料》。

也是在那期间，出现了我阅读经验里最为兴奋最为激动的时刻，“市面”突然同时流传着四本红书：《红



岩》、《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和《林海雪原》。即使到了今天，这几本巨著相信仍会是叫许多人感动和赞叹的高水平作品。

这四本书，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只有一套在流传，近十个人都伸长着脖子等候对方交书。“对不起，昨晚爸爸半夜起来熄灯。我保证今晚一定读完。”另一人承诺：“我今天不上班，下午就能跟你交换。”我也是在十来天里读完这四部平均各600页的奇书。有个晚上，寄宿朋友家，他读《红岩》，我读《青春之歌》。尽管夜里风雨大作，我们都没缩进被窝，而是开灯读到天亮。我们是在享受青春的激情，尽兴地淋浴在绚丽夺目的闪光里。

马恩列斯著作选集

出来工作几年，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有家小书店老板有中国书来源，私底下进口很多《人民画报》、《红旗》、《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还有小说、散文、剧本和诗歌，包括那八个革命样板戏脚本。当然，还有毛泽东的选集、语录和诗词等许多红宝书。

我还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多本、白色封面的马恩列斯著作选集。今天翻出来查阅，竟然有半数留下我当年伏案苦读的痕迹，有些划线，有些还用铅笔写了点阅读体会。

其实，我哪里读得懂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不过，在迷迷糊糊的阅读过程中，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识都非常渊博，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岂止如此，他们还能结合现实，努力为当时的复杂混乱世界指明方向。他们写得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即使今天翻阅，仍觉得都是铿锵好文章，是人类文化的宝藏。

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引起我多读几本像美国摩尔根著的《古代社会》这类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著作的兴趣。我也找到当年自己写下的一段读后感：“由于知识的浅薄，我不能确定本书所举的一些科学例证，是否在目前仍是先进的、正确的……”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另一本我比较轻松进入状况的书，但是我也在书页间找到自己40年前留下的一点读书疑问：“氏族制度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为什么它又能促进好的影响呢？民主自由是可以脱离社会阶段来看待的吗？我不能相信他的结论没有勉强的成分？”以上所记显示，我当时读书还是敢于“私下”提出疑问的。

我有两个版本的马克思著的《资本论》，但是对着它们我只有兴叹，三大卷，应该读不懂，就选读薄薄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我也找到划线的文字：“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我当时有顿然开悟的感触，显然源于小时候的观察：在五十年代新加坡实施宵禁戒严期间，我们家附近便出现许多流氓，向着经过的英军车辆抛掷石块和玻璃瓶，后来他们更趁乱抢劫商店。

我买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特别兴奋，那是我阅读的多部史书时常引述的一本著作。400页的密密麻麻文字，我是利用所有业余时间以及工作时间一口气气读完的，是最有满足感的一次阅读。我是怎样利用工作时间读书的呢？我有八年管理一家诊所的配药部门，那里病人不算多，还有个助手在柜台分担职务，因此我有很多时间坐在窗前读书作笔记。医生没干涉我看书，只是提到我就以佛像代称，那是形容我总是端坐案前。想来那几年我读书最勤。

七十年代，我多读了几本鲁迅和高尔基的著作。为了参与团体筹备的鲁迅纪念活动，我那次算是连续读完所有鲁迅的作品，包括以前觉得没什么看头的《两地书》。1975年看了《夜店》的演出，有很多想法，于是找回《在底层》，然后又追踪高尔基的其他剧作。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讲的是苏联工人运动与十月革命的历史，从1883年叙述至1937年，写得简明扼要，而且分析透彻，以我的水平无从质疑。今天翻阅，才发现本书结束语的最后几段话最有意思：“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历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我买这些书不便宜，《红旗》的定价是人民币3角，我付出的价格是港币3元。

到香港买禁书

七十年代，我多读了几本鲁迅和高尔基的著作。为了参与团体筹备的鲁迅纪念活动，我那次算是连续读完所有鲁迅的作品，包括以前觉得没什么看头的《两地书》。1975年看了《夜店》的演出，有很多想法，于是找回《在底层》，然后又追踪高尔基的其他剧作。在朋友的协助下，我得以看了十来个剧本和好些相关的著作，包括他的著名小说《母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

1980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旅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到三联书店买禁书，包括《韬奋文集》三册。

以后我读书就跟着感觉走了。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和台湾的出版物犹如浩瀚书海，怎么选？我是从报纸的介绍和朋友的推荐里寻觅，尤其是那些得奖和宣称畅销的书籍。以这么些年的经验来看，这是一条能满足我读书欲望的捷径。

我喜欢读中国当代作家写的小说和散文，现在闭目能记起的作家有：李劫人、贾平凹、莫言、张贤亮、毕飞宇、余秋雨、高行健、金宇澄、苏童、陈忠实、钟阿城、章诒和、黄永玉、钱钟书和杨绛等。有几部小说是有人问起就会介绍的：《一个穆斯林的葬礼》、《东藏记》和《狼图腾》。台湾作家的作品也读了好些，记得的作者有白先勇、三毛、龙应台、钟肇政、朱西甯、黄春明、吴浊流和张系国等。

我也按图索骥，慢慢阅读了好几本至今回味无穷的翻译小说：《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天堂来的一个电话》、《一个人的朝圣》。我也没冷落新加坡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我都尽量拜读，也包括本

地作家写的英文小说。我读过的有林宝音和菲力·惹耶勒南出版的小说集，还有《新加坡的鬼故事》，读完以后我就敢于向人解释它们会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爱读自传

进入21世纪，我更喜欢阅读具有大时代气息的新马闻人传记。

贺巾著的《巨浪》和《流亡》，是小说也不是小说，我是读得心潮起伏，还在等待他的第三部著作问世时，据说他已病重不能执笔，去年病逝，确实叫人遗憾。我阅读赛扎哈利的两本回忆录后，更是急着向友人推荐，他写得真实感人，各种遭遇娓娓道来，毫不声张，却是蓄满了力量，是向时代发出的最强音。这两部著作是《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

张素兰著的《在蓝色栅门的后面》，是一部叫人再三掩卷思考的书，那些肆意欺凌弱小者的狰狞面目真令人痛恨。作者不掩饰自己曾经产生的胆怯，尤令人怜惜。本书成功之处，是在无意中生动地勾画出几个政府人的嘴脸。

林清如的《我的黑白青春》，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好书，作者以亲身经历向当权者提出多项质问，抨击指鹿为马的政治现实。傅树介医生著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也是一支向执政者发射的利箭。他要申冤，要公平，要社会正义。两位年长作家发出的正是不平之鸣。

读了谭显炎撰写的《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也深有感触。那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潜入马来半岛森林的抗日志士的真实经历。他不害怕抵触一般人的认知，如实描绘了人民抗日军的光辉形象。李炯才在台湾出版的《追寻自己的国家》也颇能引起我的阅读兴趣，里头说的执政党故事好些是前所未闻。

2017年底出版的《郭鹤年传》，颇能满足我向来对新马政治的好奇心。读着郭鹤年的成长，盯着他怎样积攒巨大财富，我不敢羡慕，却感觉一切得来不易。我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读书是一种生活享受，我很高兴能乐在其中。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白崇禧的“台湾岁月”



／文：何华

读《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



思考界定蒋、白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的心理状态。经过几年的资料收集，去年秋冬白先勇开始撰写《台湾岁月》，写得非常辛苦。我和白先勇老师常常通电话，谈《红楼梦》、谈昆曲、谈其他话题，他都兴奋不已，开朗乐观，唯独提到父亲白崇禧，他的语气顿时变得凝重严肃。白先勇自己到了晚境，他说“我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晚年处境真是太难了，他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挺过来，在台十七年父亲被打压被监视被羞辱，他忍辱负重，能上能下，不卑不亢，保持了一个老将军的尊严和晚节。”一方面，作为儿子，白先勇了解父亲，当然要为自己的父亲说话；另一方面，白先勇也是在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将军鸣不平，论军事才能和战功，白崇禧毫无疑问是第一等的，诸葛盛名，传播八方。于公于私，白先勇都要写这本书。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败退到台湾，1966年12月2日因冠状动脉梗塞病逝台北家中。他56岁抵台，73岁过世，在台湾度过了艰难的十七载。白崇禧飞抵台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向历史交代”，与中华民国共存亡。

白崇禧军阶为陆军四星上将，那是终身职，但是他在台湾，既无兵权，亦无政权，最后的职位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先勇写道：“战委会是一个养老院，安置一些来台资深将领，主任委员是何应钦，另一位副主任委员是顾祝同，其他还有孙连仲、薛岳，这些不同派系的将官，这些在大陆都曾身经百战的老将们，都安置在战委会这个养老院里。”白崇禧在台的

白先勇与廖彦博合著的《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共三册）近日出版，前两册为《北伐·抗战》和《国共内战》，由廖彦博执笔；第三册《台湾岁月》由白先勇执笔。写完这本书，白先勇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还白崇禧一个历史公道。

本文着重评说第三册《台湾岁月》。之前，白先勇在《父亲与民国》（2012年）一书里，对蒋、白关系有过阐述。当时，白先勇还没有看到蒋介石的日记。不久，蒋介石日记公开，在史学界引起轰动。日记里透露，蒋、白关系非常复杂，四十年分分合合，蒋也曾多次笼络、重用白崇禧，向他示好；但也几度闹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人关系彻底破裂。蒋到台后的日记对白崇禧百般辱骂及嫉恨，白先勇看了，当然会重新

住家也非常简陋，“战委会有些将领，公家配给了高级住宅，父亲没有，于是便在松江路买下两幢丙种公务员宿舍，因为家里人多，所以把两幢前后打通成为一整栋。那时松江路多为公务员宿舍以及空军的眷村区，全是一些木板平房，漆着军营似的草绿色。……台湾夏天炎热，木屋里热气出不去，热得像蒸笼。”台风季节，屋子还漏雨。白先勇的母亲从不抱怨，也不提从前在桂林、上海、南京的房子。白崇禧夫妇就在松江路127号这栋木屋里度过了他们风雨飘摇的晚年。

国民党丢掉大陆，史学界公认蒋介石责任最大。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这时的蒋委员长是“民族救星”，在国内外的威望达到顶点；然而，短短四年后，他痛失江山，仓皇渡台，成了“民族罪人”，声誉一落千丈。白先勇分析，蒋介石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白天硬撑着，不露心思，但到了夜晚写日记的那一刻，便心魔作祟，他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桂系及桂系首领白崇禧就是迁怒推责的首选对象。日记里，提到白崇禧，用的都是“广西子”、“白逆”、“奸回”、“误国害民”等一类恶毒字眼。白崇禧晚年在台，处处被打压，甚至被特务24小时监视，白的一举一动，对蒋来说，都是心理上的威胁。一个小空军叛逃，只是因为他是广西籍贯，蒋介石马上产生条件反射作用，凭空想象这起叛逃事件与白崇禧有关，这是典型的妄恐症(Paranoia)。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在日记里对白崇禧的诋毁已经变成一种执迷(Obsession)，脱离事实太远，近乎心理变态了(Psychopathy)。”

书中，白先勇引用《黄旭初回忆录》里的话：“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禧的长才，但又每每对他不满，真是矛盾。”《黄旭初回忆录》里还记录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一段言语：“蒋先生和各元老谈话，常露对白氏的批评，谓其不守范围。我曾为此与蒋先生辩论，以为他直接指挥下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都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既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发展所长，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蒋先生却这样回答张静江：“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蒋介石这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深藏着微妙的非理性因素。蒋对白的军事天才，显然是嫉妒的，嫉妒是很可怕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嫉妒本身就是最强烈的理由。

1954年，白家人发现有特务24小时跟踪监视白崇禧。监控一事，对白崇禧当然有很大的刺激，蒋动用国

家机器对付白崇禧，这种手段类似对待敌人、犯人和罪人。白崇禧自忖乃堂堂中华民国的百战将军，如今却落得被特务监控，形同犯人，真是莫大侮辱。如果白真是党国罪人，为何不公布罪状，明正典刑，而只是采取这种阴暗卑劣的手段！白崇禧考虑再三，写了一封密函给蒋介石，陈述自民国十三年入党以来，忠党爱国，向蒋介石输诚。密函结尾列举了被便衣跟踪的几个事实，请蒋查明。蒋介石大概觉得派特务跟踪自己的前国防部长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尤其在自称是“自由中国”的台湾。于是，蒋派了副总统陈诚去敷衍白崇禧，说：“那些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白崇禧回答陈：“你是副总统当然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需要。”

白先勇写道：“既然当局派特务二十四小时监控父亲、我们全家，合理推测，我们家的电话也必被监听，来往信件也被检查，家里很可能被装上窃听器了，总而言之，父亲以及我们全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统统被‘上报’了。就如同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中的老大哥，我们家也有一个隐形的Big Brother，睁大著一双电眼，在监视我们的言行举动。”白崇禧的老秘书杨琼口才甚佳，出言诙谐，爱发闹骚，一天杨秘书在白府学蒋介石骂人，一口宁波土腔，维妙维肖，大家笑倒。白先勇母亲走进来正色道：“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讲话，连累长官。”

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母亲手术失败，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后，白先勇到外面休息室去打电话通知母亲的弟弟二舅，白先勇写道：“我从窗子可以看到楼下的停车场，那部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赫然停在那里，那三个情治人员立在车前面，他们大概也得到消息了，三个人指手划脚，交头接耳，很兴奋的样子，我突然感到，在我们家最慌乱、最哀痛的时刻，这几个由高层派来监控我们家的情治单位人员，严重的侵犯了我们家的隐私，这是一种莫大的不敬、不尊重，是一种有计划的凌辱。如果当时我手上握有一柄机关枪，我很可能向着那几个跟踪特务横扫过去。”可见，那些年，特务的跟踪对白家的隐私和情感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伤害。

白崇禧是回族，信奉伊斯兰教，他在世界回教界声望很高。入台后，他军政权利全部被削，但还担任回教协会理事长。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约旦等国领导人访台，指定要见乌默尔白(Omar Pai，白崇禧的回教名字)将军。对此，蒋介石也怀恨在心，成立“五

人小组”——任务就是迫使白崇禧辞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在政府扶持下另设一个中国回教青年爱国大同盟（简称“回盟”），和白崇禧领导的“回协”唱对台戏。白崇禧1957年只得被迫辞去“回协”理事长。由此可见，白崇禧在台举步维艰。晚年的白崇禧，回教是他的精神寄托，连这点宗教安慰，蒋介石也从中作梗。虽然不是回协理事长了，但作为一个教徒，白崇禧每周五仍去清真寺礼拜，和教友们在一起，他感到温暖。

实际上，蒋介石日记里，除了痛骂白崇禧，也骂宋子文、胡适、何应钦，连最亲信的陈诚也不放过。在日记里骂人成了蒋介石发泄怒气的习惯。1960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里骂胡适：“此人实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其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蠹贼。”骂人骂多了，蒋也就成了骂人的行家，亏他想得出“狐仙”一词。蒋骂胡适，因胡提倡民主自由，反对蒋介石违宪三连任。

这本书另一个“重点”就是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可能会改变甚至会颠覆固有的“李、白”一体的印象。白先勇分析，1948年，李宗仁出头竞选副总统，是蒋、白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也是李、白开始分道扬镳的序幕。白崇禧知道，蒋介石心里已经有了副总统人选：孙科。所以白崇禧反对李宗仁竞选，但李竞选决心已定，不愿收回。李飞抵南京，向白崇禧求援，白基于两人几十年的旧情，不得不出面帮助李宗仁，最终击败孙科。这个结果令蒋颜面无光，蒋与李、白关系又开始走向分化。蒋介石对白尤其气恼，因为白自抗战以来，一直在中央任职，国共内战开始，又任蒋介石的国防部长。蒋介石心想：在竞选这件事上，李、白到底又搞在一起了，白最终还是站在了李一边。蒋介石的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白崇禧虽然帮李宗仁竞选成功，但对李此举内心是不认同的，李、白之间也埋下不和的因素。

国民党崩溃前夕，李宗仁不作交代，以代总统（李1949年1月21日就职代替总统）的身份飞去美国治病。对此，白崇禧也曾强烈反对，两人关系进一步紧张。蒋介石想利用白对李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主动辞去代总统，以便他名正言顺恢复总统职位。若李不肯辞去代总统，蒋在台复职就是违宪。但是，李宗仁决意和蒋对着干，白崇禧在台致电李宗仁，劝他退位，李置之不理，非但不理，而且在美不断发表反蒋言论，蒋介石满腔怒火都发在白身上。在蒋眼里，白这枚用来牵制李的“棋

子”已失去意义。李宗仁在外的一言一行，对于在台的白崇禧和桂系官兵都是一种压力。1965年，李宗仁投奔大陆、“回归祖国”的消息传到台湾，让白崇禧及桂系人员更加处境艰难、无地自容。

白先勇写道：“父亲与李宗仁自广西统一，李、白、黄广西三杰桃园结义起，北伐龙潭之役，李、白合作击溃孙传芳，扭转危机，抗战徐州会战，二人共同指挥创下台儿庄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李、白名声响彻国内外。可是，到了最后，两人竟因政治立场不同，走向割袍断义的绝境。”

书中还提到白崇禧与陈诚、叶公超、周德伟等人的交往。

到了台湾，白崇禧一直做冷板凳，而陈诚权倾一时，是蒋介石的宠臣。对白崇禧遭受的不平待遇，陈诚内心大概是同情的。他俩关系微妙，在大陆时，两人军事战略不同，常起冲突。但两人私下，都相互尊重。1962年，白崇禧过七十大寿，时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的陈诚身穿长袍来白府拜寿，白先勇公允评论：“那一辈的国军将领，自有他们的风度。”

在台最后十七年，白崇禧除了宗教的寄托，狩猎、下棋也是他排遣孤寂的方式。外交部长叶公超是他的猎友，私交甚笃。白先勇评说：“父亲和叶公超，两人个性相近，守正不阿，是极少数敢对蒋介石说真话的国民党官员。”叶后来因外蒙古入联合国问题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外长一职被免。叶公超也是文学天才，是研究英美诗歌的专家。胡适、钱锺书对他也很佩服，胡适就称赞“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叶公超一表人才，打猎服穿在身上特别帅气，但枪法不准。白崇禧“常笑说叶公超是‘理论狩猎者’，因为叶谈起打猎头头是道，但经常空手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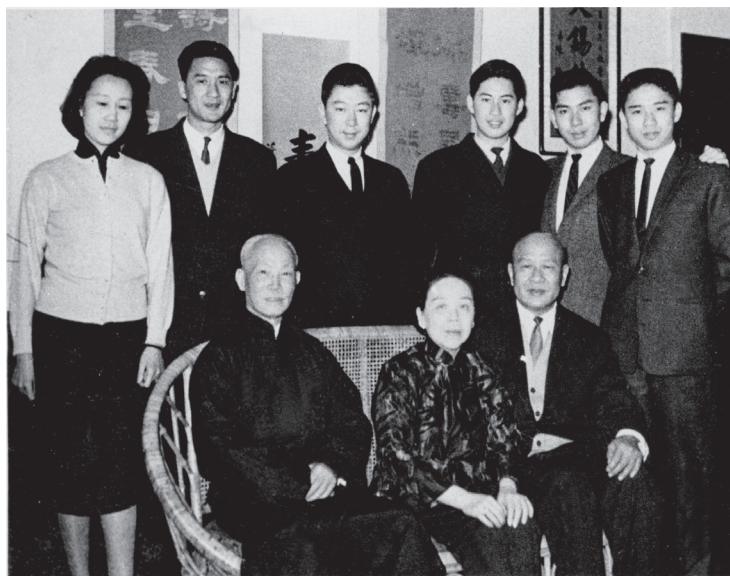
白崇禧晚境艰难，门前冷落，在位的官员为了自保，多不敢上门，怕被特务上报，周德伟是个例外。“周德伟当时是财政部关税署署长，这是个敏感的位子，可是周德伟没有顾忌，不怕密报，照样大大方方经常出入我们家，陪父亲下一局围棋。”周德伟是湖南人，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刚直，性格耿介，快言快语，针砭时弊时辛辣如湘菜。“据他儿子周渝说，周德伟退休，政府只给了他十六万退休金，两夫妇还得靠儿女供养。”白崇禧过世后，白先勇把“他们两人时常对弈的一副围棋送给周德伟作



白崇禧与叶公超一起狩猎。



1952年10月29日，白崇禧去松山机场送围棋神童林海峰赴日本深造。



1962年，白崇禧七十大寿，副总统陈诚到白家拜寿。

纪念，感谢他不畏情治监控，常来陪伴父亲。国民党内还有像周德伟先生这样风骨铮铮的人，实在难得。”

大家都知道台北有个紫藤庐茶馆，其实这就是周德伟故居。1975年周德伟退休赴美，儿子周渝接管这幢日式宅院，周渝雅好文艺，并开放空间，支持一些刚起步的处于探索阶段的艺术家。1981年，老宅在周渝之手改为紫藤庐茶馆。紫藤庐里保存着周德伟遗照及“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对联，有了这张照片和这副对联，紫藤庐就不仅仅是一间茶馆和艺术场所了。

白先勇写小说和散文用一支笔，他写历史传记类文章用的是“另一支笔”。几年前章诒和读了白先勇写的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连连惊叹，没想到白先勇还有这一手！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譬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同时也是最佳的文学作品。白先勇在访谈中曾说：“我记得我在台大念书，大一便学了《史记》，用其中的十几篇文章当作古文教材。后来想想，学到这些实属有幸，《史记》的文学性是一流的，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场景的描写均极为生动。”可见《史记》对白先勇影响很大。白先勇的“另一支笔”就是司马迁的史家之笔。譬如：白崇禧晚年在台喜欢下围棋，而且他一向爱护人才。白崇禧对少年林海峰十分呵护，募款供他去日本学棋。1952年，11岁的神童林海峰去日本深造，白崇禧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一老一少在机场合影留念。1966年，林海峰功成名就，

返台期间登门拜访白崇禧（当年年底白崇禧归真），林海峰已长得高大魁伟，两人再度合影，笑容灿烂。2013年，白先勇访日，在东京大学有一场演讲。在日期间，林海峰请白先勇吃饭。关于这次聚会，白先勇只写了一句话：“在席间他（林海峰）追忆道：我还记得长官的手，好温暖。”席间，两人一定聊了很多，但白先勇只摘取这一句，就足够了。“我还记得长官的手，好温暖”一句，就是白先勇的太史公点睛之笔。

白崇禧1966年12月2日在台病逝，9日追悼会公祭，丧礼按照最高标准的国葬仪式。当天，蒋介石第一个前来灵堂献花致哀，并题挽额“軫念勋猷”。第二天10号，蒋的日记马上变脸，发泄余恨：“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而未像李宗仁、黄绍竑之降匪受辱以死，亦云幸矣。”白先勇最后总结道：“‘君臣一体，自古所难’太史公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如此结论。历朝为了君王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韩信、李广、岳飞、袁崇焕，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中国人的名言‘伴君如伴虎’，蒋、白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配文照片由白先勇先生提供

扶桑谈之五

“大丈夫”

成功攀登富士山



文：黄彬华

我在日本创下的“生平首次”实在不少，爬山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举成功登上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

富士山虽然只有海拔3766米，而且是一座沉睡中的活火山，却由于坐落在广袤的关东平原上，更显得它鹤立鸡群。它的美就是肃穆和突出，既均衡又平稳，真像是一尊已入定的大佛，也像是一把倒插着的大折扇，更像是一顶戴在东京头顶的大笠帽。

在爱标新立异，又偏爱以“吉祥物”搞噱头的日本人心目中，它就是日本一块大“看板”，象征日本的“注册商标”。它虽然距离东京有80多公里，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依然可从东京高处的自家阳台，远眺到它那浮世绘般的英姿。

新干线开通之后，或在航班飞机上，一靠近东京时刻，人们总会下意识，朝着富士山方向寻找其芳踪。富士山显然已被看成是日本的守护神了。

古代，日本人一度称它为“芙蓉峰”，也曾叫它为“福慈”，甚至“不二”、“不死”等别名，日文发音又几乎都叫“FUJI”，后来就被统称为“富士山”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日本人心目中，它不仅是一座典型的日本圆锥型火山，更是一座传统的神秘圣山。

半个世纪前登山记录

我是在半个世纪前登上富士山的。登上山顶时恰逢是“七月七日”，让我回到了历史，又体验到多变的现实。

我6月底到“亚大”（日文班）报到，隔周便是漫长的暑假开端，在我正感受到孤独与彷徨之际，香港同学梁君来访我的室友小梁，彼此一见如故，甚至欣然接受了他的首个邀请，冒然参加了他们筹划的富士登山之旅。

香港梁比我们都早到日本，也认识较多亚大的日本学生，因为他总在饭后散步背诵日文时，会跟附近宿舍的日本学生打交道，其中有部分是亚大柔道部学员。这次他更从他们口中，打听到暑假攀登富士山计划。既然有义务向导，又有现成的保镖，加上彼此又都是邻居，而且都是初生之犊，未加思索便决定要一同上路。

回想起来，这就是所谓机缘，也是一



初春的富士山



作者与土谷洋一在富士山口前合影



“亚大”六人登山队队员齐集富士山顶

股冲劲，几个原本不知“山”为何物的异邦人，第一次异国爬山便去挑战日本的圣山，日本第一高峰。既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如果它突然苏醒，翻个身又喷起火来，还流出大量熔岩，我们不是有危在旦夕之险？幸亏我们无知，自然变无畏，反而让门外汉的我们，意外成功攀登上了日本第一高峰。

“富士山嘛，一次就够了”

事隔多年，跟一位日本友人提起这次壮举，却意外听到一句日本顺口溜——“富士山嘛，一次就够了”。意思是，“攀登一次富士山应该够了。没有登过富士山固然会遗憾，重复攀登证明是个笨蛋。”此从，我再也不敢向人炫耀此事。

第一次亲临富士山区是1958年的初夏，富士山一年一度宣布开山的头几天。当时，确实不知天高地厚，除了连夜赶去添购一双帆布鞋，再带上毛衣和夹克，便如此轻装上阵了。到了山脚，入乡随俗买了一根登山木棍，既可当拐杖，又可沿途盖章留念，据说这是日本登山朝圣的习俗。

既然是圣山，它应该很神秘、很浪漫、又很美丽的吧！确有看到过一些它的好照片，尤其是旅游宣传照，远看富士山确实够干净、雄伟、典雅，很有魅力。

但坐上登山巴士，一离开河口湖畔，沿途就只能见到大小块的黑砂砾、矮树林，不要说什么英姿，就连一座

像样的山也见不到，直到抵达海拔2000米的“五合目”中间站，风景就一直是这个模样。

从五合目到山顶的直线距离，照说只有1775米，换成平地走路，也就只有两公里而已，估计半个小时就能到达，但富士山不仅到处有峭壁陡坡，而且覆盖着岩石和泥灰，即使有残雪，也显不出美丽。到半山腰人只能徒步而上，全程大概花了6个小时才抵达山顶。

攀登富士山，不是跟着大家往上跋涉，而是在Z字型的泥沙路上，排着队往上移动身躯，也许这就是攀登富士山的唯一办法，但肯定不是一般“爬山”的方式。我们不知挣扎了多少个小时，只记得到达海拔3400米的八合目临时宿舍时，天已漆黑，大家都被迫在富士山中度过一夜。

“大丈夫”的高帽子

我们的先头部队——练柔道的三人，不时会回过头来慰问我们：“大丈夫ですか”（daijobu desu ka，还行吗？），有时也会问：“寒いですか”（会冷吗？），或者说：“頑張つてね！”（ganbatte ne，坚持住，加油！）。

说我们“大丈夫”，开始还以为是给我们戴高帽，夸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呢。后经香港梁的翻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问我们：“还顶得住吗？”而已。从此，学了这三句日语，也牢记着它，一边挣扎，一边诅咒，直到征服了富士山。

有一段时间，他们见我们眼泪鼻涕流个不停，遂把我们背着的行囊全“夺”了过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唯有香港梁自认身体健壮，直接夺回了行囊继续上路。

人在极端状态下，有时确实会失常。队友景棠兄就曾破口大骂三字经，说自己长到这么大，竟然被迫要在富士山中，往自己肚里吞下自己的鼻涕，真不想再当傻瓜继续往上爬了。我灵机一动，便指着他背后几个十来岁小女孩，用激将法说：“我们怎能让日本女孩耻笑呢？何况天色已晚，又已无退路了呢！”小梁唯有苦笑，最后还是理智地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因此掉队。

日本队友星冈，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白饭团，说是他母亲亲手捏制的。虽然咬下去像在吃冰块，还沙沙作响，当时却是最香脆的果腹之物。从此，又认识了一个新生事物——日本饭团。

到达了山顶喷火口

登上富士山，才发现所谓山顶，其实是个直径约800米的大喷火口，四周还有5座高低不等的小山峰，从最高3776米的剑峰、3756米的白山岳、伊豆岳、朝日岳……直到标高3710米的驹岳，这就是所谓富士八山峰了。在火山口一带，除了小山峰，还有气象台、小邮政局、小神社、小商店——这些当然都是地处日本最高峰的设施了。

到达喷火口之前，我们曾在八合目的临时宿舍休息了几小时，包括在半夜4点吃早餐，接着便跟着大家再往上移动，除了准备迎接冉冉升起的太阳，也开始欣赏到一望无际的云海，有如此宏伟的景象，顿时才觉得也真不虚此行。

暂时忘却了寒冷、疲惫，甚至饥肠辘辘。兴奋时，也跟着大家喊了一声“万岁”，但我们的“万岁”肯定有着不同意涵、有不同情感，包括这次的成功、成长的异国生活自信，以及历史纪念日“七七”与富士山的交会……

应该回来谈“上山容易下山难”的经验了。

从喷火口边缘往内看，它是一个约240米深的大窟窿，目前已经没有再喷火的迹象。据说，它最后一次喷火是在1707年，经过了近300年的喘息，也许已经疲倦，或许还在蠢蠢欲动，暂且就只能相信日本火山专家的分析 and 判断了。富士山暂时不会再爆发吧！

破解“下山难”的魔咒

所谓征服富士山其实是一种假象。富士山已经停止喷火，每年入秋后会积雪，积雪会崩，砂砾也会塌，长年累月形成很多峭壁和斜坡，有经验的爬山者就利用这种地势，像滑雪一样冲下山去，不仅轻松而且可快捷下山。上山6小时，下山变成两个半小时，但必须有胆识，又要有技巧，不然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日本同学很难用语言来教导我们，只好用表演方式来示范，而我们也只有依样画葫芦，所幸全程没有发生意外，因此化解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的魔咒。回想起来，依然为当时的冒险捏了一把冷汗。

我当时想，《林海雪原》原著有近似的描述，就当黑砂是白雪，从斜坡顺势冲下去吧，这确实是个捷径。事后检查：一、我的树胶鞋头部都开了花，二、我的脚趾也流了血。原来，是树胶鞋不堪负荷，既开了个大口，又擦破了我的皮，暴露了我的最大弱点，不仅皮破血流，还难在平地再行走。幸亏这只是皮肉之痛，而且换来快速下山的快感，无意中又经历了一次一生最大胆的冒险经验。

认识富士山，就跟认识日本一样，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验其艰辛和喜悦，以后通过阅读和漫游，包括旅行、工作，甚至在当地小住，加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跑遍日本，总算对日本有较全面的认识。

日本人不仅崇拜富士、热爱富士，更把全国314座类似圆锥型山峰，统称为“乡土富士”。一年平均有30万人挤往富士登山，日本政府更花费20多年，尚未能替富士山申请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荣衔，说明富士山虽是日本的象征，却也是日本地位的写照。

2013年，富士山终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它为“世界遗产”之一，不过不是当初申请的“自然遗产”，而只是一般的“文化遗产”。

作者为本地前媒体人

泰戈尔的新马文缘

南洋商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八日 星期六 文化 第四版 (六十)

紀念泰戈爾博士特輯

泰戈爾遺像 徐忠作

徐忠作

悼文爾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泰戈爾遺像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泰戈爾先生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泰戈爾先生，你走了！
 在一個不平凡的早晨，
 你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你的靈魂，
 已飛向那遙遠的故鄉，
 在那個充滿了
 你愛過的地方。
 你走了，
 但你的詩，
 你的歌，
 你的思想，
 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精神，
 你的勇氣，
 你的希望，
 將永遠指引我們前進。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愛，
 你的慈悲，
 你的寬容，
 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靈。
 你走了，
 但你的光輝，
 你的榮耀，
 你的偉大，
 將永遠照耀我們的心靈。

1941年9月8日文化版“紀念泰戈爾博士特輯”。



文：周維介

新 加坡湯申路上段與楊厝港路交界處有個名為教師園 (Teachers Estate) 的私人住宅區，里头的大道小路，都以中外文學家為名，包括馬來文學鼻祖文西·阿都拉、中國詩人杜甫與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 (Tagore)。以泰戈爾為名的路徑，還延伸至緊挨着教師園的小工業區里，方圓之內有若干冠以“泰戈爾”大名的弄巷。

本地人對泰戈爾之名也許並不陌生。從華校禮門走出來的學生，多半對泰翁有

粗淺認識。因為從小學到中學，華校不同時段不同版本的語文教科書，多有選錄泰翁的作品。尤其是時序進入了1950年代，華校教科書的編寫權漸漸從中、港转移到本土后，泰戈爾入選的詩作比過去都多。根據現存資料，他恐怕也是華文課本里絕無僅有的入選印度作家。

大胡子泰戈爾，孟加拉族，1861年生于印度加爾各答，1941年高齡辭世。八十人生，這位同時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創作的印度詩人，于1913年 (52岁) 成为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印度与孟加拉两国国歌的歌词，都出自泰戈尔之手，这也是个独一无二的纪录。

中文世界的读者熟悉这位亚洲文豪，或是五四前后他备受新一代中国知识份子推崇的缘故。1924年，泰戈尔62岁，他受邀访问中国，为纪念此行，梁启超给他取了“竺震旦”的中文名留念。“竺”是中国对印度的古称，而“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竺震旦”三字并列，纪念了两个古老文明国度源远流长的文化互动。后来，泰戈尔投桃李报，给五四诗人徐志摩取了印度名“Susima”（中译为“素思马”或“苏萨玛”），Susima，古印度王子之名，太阳神的意思，象征阳光和希望。在孟加拉语中，素思马有“雅士”的美意。

华校课本里的泰戈尔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小学教科书里没有泰戈尔的作品。若干年前，我接触了一大批新马华校中小学教科书，方知1950年代本地出版社编印的华小课本里，有泰戈尔的诗踪——1956年1月，上海书局初版的高小《现代国语课本》第三册（供六年级使用）里，连续两课选用了泰戈尔的诗歌。第20课是“泰戈尔诗选一：《责备》、《审判官》”；第21课是“泰戈尔诗选二：《玩具》、《著作家》”。这套“上海版”教科书，多次重版至1959年。

小学高年级选读泰戈尔的诗作，可能与五十年代的社会背景有关——1942至1945年日本占领了新加坡，教育近乎停摆，因而失学者众。战后百废待兴，家庭经济窘境迫使许多人延缓入学受教，致使小学阶段出现大量超龄生，因此高小教材的编写必须兼顾这群学生的心理状态。例如1960年代中学课本里的《落花生》（许地山）、《古代英雄石像》（叶绍钧）、《水的希望》（郑梦周）等篇章，在四五十年代的小学教科书里便已亮相，甚至出现过同个出版社的中小学课本同时选用同作者同篇章的现象。

中学华文课本积极推介泰戈尔作品时，新加坡已成为自治邦。过去华校的中学语文课本，虽以中文名家作品为编写圭臬，但也不忘搭配若干西方或亚洲地区的篇章，让学生有机会吸取其他语种的文学营养，这对扩大与平衡学生的视野，有大裨益。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之前，中学语文教科书里的翻译作品，以俄国、日本与中亚作品为主要对象，印度文学近乎绝迹。1959年教育供应社出版的中学《语文精读课本》，从第二册至第五册，一共选用

了泰戈尔的八首诗作，这些作品，分别由金克木、冰心与郑振铎翻译。同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语文》，也有不少泰戈尔的创作。

1961年，南洋书局编写专供英校华文科使用的《星华文选》，第三册有《泰戈尔诗选》；1974年教育出版社高中《华文》第一册，第17课选用泰戈尔的《两亩地》；1977年教育出版社中学第一语文《华文》第三册，第10课是泰戈尔诗选。林徐典主编的《华文》（第一语文）第二册，有《泰戈尔诗选》，编入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Jitanjali）里的三首抒情诗。Jitanjali，意即“献给神的赞歌”，泰戈尔就是凭着这本诗集而赢得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的新马文化缘

1927年7月，泰戈尔受邀到马来亚访问，当地文教界反响颇大。由于第一手资料匮乏，一路来有关泰戈尔访问新马的具体行程存在着若干出入。目前以华文书写的泰戈尔新马行文章，几乎都记录他此行到访了新加坡、马六甲、麻坡和檳城四地，并重点谈论泰戈尔与知名学者谭云山的会晤，强调泰翁此行的收获之一，是谭云山同意前往他所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这些著作都提到他俩在新加坡会面，但具体内容则无着墨。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于1925年10月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在工商学校执教，并于一年内先后兼编《叻报》副刊《星光》与《新国民日报》副刊《沙漠田》。翌年10月，转往柔佛州麻坡中华学校（中化中学前身）任教。不及一年（1927），又转到半岛东岸的丁加奴（今名登加楼）州首府担任维新学校校长。同年，他又回到柔佛，在峇株巴辖爱群女校教书。1928年，谭云山前往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次年，儿子谭中在峇株巴辖出世，泰戈尔给他取了一个印度名字Asoka（阿输迦）。



1956年上海书局初版的高小《现代国语课本》第三册封面，连续两课选用了泰戈尔诗歌。

泰戈爾的诗作蕴含深刻哲理，在印度享有“诗圣”地位。五四新文学鸣锣起步之后，泰戈爾的作品对徐志摩、冰心等作家产生了一些影响。他的诗文、小说、戏剧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多达二十余种，反映了他受中文读者群欢迎的程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泰戈爾生前通过多种渠道，把他的天地情怀镌刻在新马人的精神光碟上。

从以上信息，可知谭云山在新马不及三年时光里，却辗转于新加坡、麻坡、瓜拉丁加奴、峇株巴辖四地。泰戈爾访问马来亚时，谭云山很可能是在柔佛州教书。目前所见的华文资料，都确定泰戈爾与谭云山在新加坡会面，但这些文字都未说明两人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或述及面晤的内容。马来西亚作者郑昭贤的《泰戈爾与麻坡中化》一文，则提到泰戈爾于1927年7月28日到访麻坡中化，由方之栋校长出面接待。郑文描述，泰戈爾抵校后，在该校四维堂出席约60人的茶会，之后再回到麻坡三马路的新民舞台（后来的丽士戏院）发表演讲。文章没有提到曾是该校教师的谭云山是否在场参与活动。

目前所见最具体记录泰戈爾新马行的文献，是1920年代新加坡印度协会出版的英文《印度人》杂志。1961年连士升撰写的《泰戈爾传》一书，提到《印度人》为泰戈爾访问马来亚出版了“泰戈爾博士专号”（Dr. Tagore Number），由汤玛斯（T. G. Thomas）主编。《泰戈爾传》书写泰翁走访新马的章节时，不少资料引自这份杂志的专号刊。

根据《泰戈爾传》第17章《游览马来亚》的叙述，泰戈爾当年的马来亚之行，走访了新加坡、马六甲、芙蓉、吉隆坡、巴生、瓜拉江沙、安顺、太平、檳城等地，没有提到麻坡，也未谈及泰戈爾与谭云山会面一事。但《泰戈爾传》第十章《办国际大学》，则有叙述谭云山协助印度国际大学创办中文学院一事，并引述了1958年2月8日南洋商报作者迷都所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20周年》一文的内容。

访问马来亚28天

1927年，由马来亚各民族组成的委员会邀请泰戈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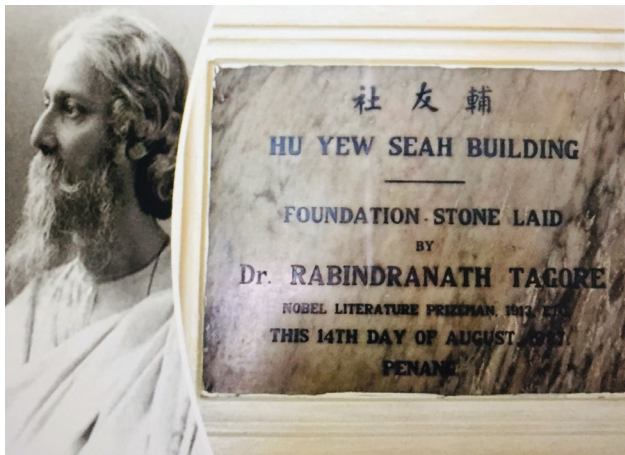
到马来亚访问，委员会在各参访城市都成立接待单位负责接待工作。泰戈爾在新加坡受到的是克里福特（Sir Huge Clifford）总督上宾的高规格接待。7月20日，泰戈爾乘坐客轮安布罗斯号（Ambrose）抵达新加坡，由新加坡市政府委员会主席花勒（R. J. Farrer）到码头迎接后，直接驱车前往总督府，先在总督府住宿三天，再到印度殷商拿玛茜（M. A. Namazie）的别墅落脚。

泰戈爾从7月20日到8月16日的新马游，长达28天。有关泰戈爾这趟行程的路线，中英文资料略有出入。例如英文资料显示，他在马六甲停留三天，一些华文材料则说，泰戈爾在马六甲住了一宿，翌日便抵达麻坡。

连士升根据《印度人》杂志整理出泰戈爾在新加坡主要的活动，大致如下：7月21日，由海峡华人协会在中华俱乐部（Garden Club）出面招待泰戈爾；22日，在维多利亚剧院演讲，由总督致辞开场；23日到印度人协会演讲；24日在华校总会与华教人士会面；25日，在维多利亚剧院公开演讲，由辅政司主持。据《印度人》专号的报道，泰戈爾在新马的演讲，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泰戈爾走访马来亚时，《星洲日报》尚未创刊，《南洋商报》在泰翁旅新的七天里，每天都有他的行程报道。7月24日是华社招待泰戈爾的日子，《南洋商报》的相关报道甚详，但未有泰戈爾与谭云山会晤的内容。这项名为“星洲华侨学界欢迎泰戈爾先生大会”的活动，在小坡二马路（维多利亚街）中华电影戏院举行。25日晚，泰戈爾前往牛车水观赏人寿年班的粤剧表演。

泰戈爾的马来亚之旅，首站新加坡与末站檳城最受关注，逗留的时间也较为长久。他在檳城游览四天，8月13日抵达时由当地欢迎会主席连裕祥在辅友社（Fu You Seah）设宴接待。接下来两天，他先后前往钟灵中学礼堂



与Empire Theatre发表公开演讲。泰戈尔在槟城，留下的珍贵痕迹，是为当地的辅友学校主持奠基典礼。2015年朵拉在《异乡的花朵》中提到，2009年左右，辅友学校的董事陈先生某日“看见印度大使馆的专车停在学校外头，下来两个印度人，趋前一问，是印度驻马大使为了寻找泰戈尔的足迹，特地从吉隆坡北上槟城。在学校当了六年董事的陈，这才发现‘辅友社’最古老的教室里，墙上嵌有一块1927年8月14日的奠基石和身着白袍、童颜鹤发，长须飘逸的诗哲泰戈尔照片。”

辅友社是槟城华社客籍名人钟乐臣所创办的互助组织，目的是协助土生华人学习中文。辅友社即是后来人们熟悉的辅友学校。泰戈尔当年访问辅友，为该校主持奠基仪式，这张挂在墙上的老照片，显示泰翁站在该校的基石旁，牌匾上清楚写明泰戈尔为学校奠基的时间，确定了泰戈尔与辅友学校的关系。这老旧不起眼的相框，无意间担下历史使命，成了大师在槟城留下珍贵遗迹的力证。

两华文报出版纪念专刊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羽化仙游，翌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同时发布了消息。《星洲日报》晚版的消息与早版不同，早版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逝世”为题，并附上一两百字的“短评”，晚报则刊登另一则题为“泰戈尔去世前/痛论世风浇漓”的消息。《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在泰戈尔辞世的两周内，先发表了杨哀的《悼泰戈尔》和余清波的《悼念泰戈尔博士》二文，于9月8日另推出“诗哲泰戈尔追悼特刊”，发表蒙逸的《诗人泰戈尔》、林我玲的《泰戈尔翁之绘画》、张明慈的《忆泰戈尔诗哲》以及天生的《泰戈尔先生略历》这

四篇文章。同一天，南洋商报也在文化版推出《纪念泰戈尔博士特辑》，徐悲鸿在特辑里发表了《詠泰戈尔先生》与《泰戈尔翁之绘画》这两篇文章之外，还加上他手绘的《泰戈尔造像》；特辑里另有古岸的《悼泰戈尔》，并附上“泰戈尔博士手笔”、“泰戈尔博士签名”以及两张泰翁的绘画作品。两份华文大报联手推出专刊追念泰翁，表达了新马文化人对这位诗哲的敬重。

泰戈尔辞世之际，徐悲鸿正客居星洲。南洋商报于9月8日推出纪念特辑翌日（9日），还刊登了另一则相关新闻，报道“新加坡播音台”于9月8日下午五时半，推出了一个纪念泰戈尔的特备节目，内容包括：徐悲鸿以华语讲述他与泰戈尔的交往；播放与泰戈尔有关的歌曲与音乐，并以英语朗诵泰戈尔的一首诗。1939至1940年间，徐悲鸿曾出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因此他与这位文学大家交往颇深。《南洋商报》特地在新闻中把徐悲鸿的广播稿全文刊登，徐氏在广播稿中提到，当泰戈尔的死讯传来，世人都为之唏嘘震悼，“这因为泰戈尔先生那种伟大的仁爱，在整个宇宙中间所起之回声，就是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两句话的明证。”

泰戈尔的诗作蕴含深刻哲理，在印度享有“诗圣”地位。五四新文学鸣锣起步之后，泰戈尔的作品对徐志摩、冰心等作家产生了一些影响。他的诗文、小说、戏剧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多达二十余种，反映了他受中文读者群欢迎的程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泰戈尔生前通过多种渠道，把他的天地情怀镌刻在新马人的精神光碟上。本地中小学华文课本选录他不少作品；南来作家谭云山客居新马，与泰戈尔结下学术情缘；泰戈尔仙逝时，画家徐悲鸿旅居新加坡，电台播放了特备节目，主流报章大篇幅推出纪念特辑，在在透露了文化界对泰翁的敬重，点滴情牵，搓揉成一段他与新马的文化缘。“你我需遍扣每扇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门”，这是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谱写《最最遥远的路》歌中的一句话，歌词原作正是泰戈尔的诗篇。诗翁当年为了传播理念，壮大自己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到各地与文化人结缘。他飞鸟一般滑翔至遥远的马来亚，扣门探访、传播思想，心宽宇宙大，他赢得了半岛文化界落下的热烈掌声。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归

／文：林臻

2002年^{10月间，}中国北京的杜实宁、实京姐儿俩，千里迢迢捧着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骨灰盒子，回到岛国来。五十二年前，也即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诗人曾在南洋女中与华侨中学任教，家住加东马绍尔路，每天安顿好两个年幼的子女，便行色匆匆奔走于武吉知马路上；课余又赶往莱佛士图书馆，查阅有关马来亚、新加坡的史籍，陆陆续续写成一册掌故性的《热带风光》。二战前，诗人出生与成长于马来亚霹雳州实兆远甘文阁，与蕉风椰雨，乡亲土著朝夕相处，直到二十年代前往中国升学为止。

诗人祖籍福建古田，却自幼生长于马来亚霹雳州滨海小镇实兆远——一个福州人群居的地方。实兆远无疑在他的生命中占着不可轻易抹去的印记：三个子女的名字都嵌有一个“实”字，其中一个甚至就叫“实甘”。《热带风光》书中收有多篇追述早岁实兆远的乡野风物，晚年重返故土，感触良深，继续写了多首怀旧的诗篇，更称实兆远是“我生平所爱的第一个”，几与“初恋情人”无异。

皖南事变肇致蒋介石大开杀戒，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作家纷纷南逃避难，其中一些便到华文中学执教，当时的华中和南中等校就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诗人于四十年代初西南联大毕业不久，也来到新加坡，与郑伯华、杨守默、李宏贲等人执教于华侨中学，也兼任南洋女中教席，直到五十年代初被迫离开为止。短短四五年间，他也跟杨守默那样陷入急剧变动的局势中，不但目睹方生与未死两大实力的剧烈较量，更深为年轻学子奋起呼应的行为而感动。后来两次重返新加坡，一些已身为祖父的华中老校友犹惦念不尽，特地设宴款待老师长；等到他的骨灰送到时，也陪到滨海安葬。师生情谊六十年不变，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标杆。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逝世共计三十八年，加上早岁返乡暂居和到西南联大读书的几年，诗人在祖籍地生活了大半辈子。风云际会，身不由己：先是经历了抗日战争与旧政权治下的动乱社会，其后山河变色，新政权统领全国并振兴中华民族。诗人以诗纪程，为置身时段的形形色色面影以及由此触动的感受留下诸多篇什，其中尤以堪称“时代代表作”的《滇缅公路》一诗，生动又鲜明体现一个民族坚毅无畏的精神淋漓尽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坦然证明：诗人本色并不是只会吟风作对的“逸士”，而是敢于正对惨淡现实的勇者。

翻开杜运燮诗选，读者还不难发现：虽然已身在祖籍地，他仍心系新马两地，感怀之情恒久不减。此外，后来又补作了系列实兆远童年生活的回忆文字；以《你是我最爱的第一个》为书名的诗集，于1993年由霹雳文艺会出版，收集第一次重返新马的篇什25首。可以说：在南来的作家中，无论在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内容内容的多样，似乎无人可资比拟。

祖籍地与诞生地，精神家园与自己生长的异域，始终成了诗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纠结。似假还真，似幻非幻，怎样也无法“一刀两断”。1997年重返新加坡，在游览圣淘沙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亚洲最南端的所在，难掩欣喜之情，挥笔写下《最难忘那最南端》一诗，诗中表达“明天也许有一天，我再来这里，会登上一座标志式的美丽建筑物，旁有一块刻有汉字的大石碑”。五年后，他果然如愿以偿，安详地永远躺在圣淘沙近域的万顷碧波中，投向几百里外《所爱的第一个》的怀里，“离‘最南端’不远，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为本地作家



陈宗瑞画作《学舞》

南洋画派

论者心中的美丽憧憬



文：姚梦桐

编者按

姚梦桐先生是新加坡备受尊敬的资深艺术史学家，曾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任职于教育界，勤勤恳恳，1996年获颁国庆表扬奖。先后出版《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2019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翻译出版姚君著述的英译本——“Migration, Transmission, Localisation: Visual Art in Singapore (1886-1945)”。近年姚君在本刊发表过多篇专文，对战后新加坡美术活动、画家和作品有详尽透彻的论述。本文作者以精辟论点和大量实例，对多年来画坛上盛行的“马来亚画派”、“南洋画派”的观点，从学术角度予以驳斥。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

艺 术界往往把“南洋风格”与“南洋风”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有先后序列，“南洋风格”比“南洋风”早，“南洋风格”不等同于“南洋风”；后者的“风”并非风格，有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意涵，比“南洋风格”更为丰富。

一块石头泛起层层涟漪

1950年3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 society)首届本地画家作品展在文化协会礼堂举行。画展遴选委员之一马来亚大学教授慕礼尔(Roy Morrell)在一次演讲会上指出：“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战后新加坡艺术活动普遍复兴。新加坡艺术协会正试图团结艺术家创立‘新加坡画派’……。有几位新加坡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员尝试打破传统创造一种本质上以马来亚画风为主的路线。”文中“马来亚画风为主的路线”的内涵，后文将给予解释。慕礼尔这一番话犹如一块石头抛进水里泛起层层涟漪。

(1)《海峡时报》特稿《新加坡艺术展大获成功》(“Singapore Art Show A Big Success”),赞誉“新加坡艺术协会1950首届本地画展“是一个一流且令人鼓舞的展览。”文中分析陈文希,钟泗滨以及陈宗瑞的作品:陈文希《咖啡男孩》的艺术构思“不太西方也不太东方”;“钟泗滨具有同样特点,他的水彩与油画一样优秀,水彩画《大教堂》和《风景》尤其引人注目”;“陈宗瑞两幅画轴《清晨的洗手间》与《海边人家》,尤其表现这种特点,这种构思再次显示了他已往的绘画风格。”展品《海边人家》,画幅右边树丛下有浮脚屋,舢舨,马来妇女与小孩,这幅作品沿袭探索画家之前充满南洋情调的作品,如陈宗瑞画于1937年的《甘榜景色》,画面尽是南洋风情,画境丰盈——孤舟静摆,浮脚楼默然静对;白云自白,流水自流,云自无心水自流的“山静日长”东方哲理境界。

(2)《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画展报道：“钟泗滨的油画与水彩大胆突破的创新手法，形成的艺术气魄是艺坛的一朵奇葩。刘抗油画色调鲜明浓烈，题材富有生活的现实性”，其参展作品之一《爪哇街》题材来自本地街景。1951年11月陈宗瑞，刘抗，陈文希以及钟泗滨举行“四人画展”，《星洲日报》记者高云参观展览后报道：“……把陈宗瑞与刘抗的特点融汇陶铸另立典型，从而创造一种代表‘新马来亚的风格’。”报章的评论从技巧题材切入，可知“马来亚风格”的特色是“融汇东西方画技，题材多以本土人文景致”为主的画风。

(3)1950年10月艺术协会举办首届全马教师学生美术作品展，呈现出“一种马来亚风格的绘画”。观众觉得以中国水墨画技法来画本地景物，予人一种崭新的视觉效果：“画轴里一簇簇红毛丹垂挂在绿叶丛中，给观众一种新的、愉悦的视觉享受，这是马来亚景物对华人画家的影响。”其实20世纪30年代，南来画家已经将洋溢南洋风情与热带斑驳色彩的景物入画，并以“热带情调”、“融冶中西艺术于一炉”来描述华人美术研究会年展中的艺术现象。美专学生的展品引起《海峡时报》记者诺尼·赖特(Noni Wright)的注意。他访问了林学大校长并发表了《东西方艺术在马来亚风格的绘画中相遇》(“East and West Meet in a Malayan Style of Painting”)。文中引述林校长的一段话语：“我可以教学生画东方风格的画，也可以教他们画西方的风格。学生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自己的绘画风格。在马来亚，东西风格可以融汇一起。‘马来亚画派’的发展需要时间，你不能强求，但是它一定会到来。”这篇文章转载在1951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画刊》第一集里，该刊《卷首语》林学大重申“沟通东西艺术，建立马来亚的新美术”是美专创办的目的之一。怎么他主张的“马来亚的新美术”在诺尼·赖特的文中却变成了“马来亚画派”？

(4)慕礼尔在1952年《走向马来亚画派的绘画》(“Towards a Malayan school of painting”)阐释马来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出现了：“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东方与西方相遇’，那么有人很可能会问，在哪个艺术领域里出现了表达真正‘马来亚文化’的形式。我担心的是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非马来裔的马来亚人，把‘文化’看作是对往事的怀旧，或是几百英里之外已经难以接近的东西”。“我们忘记了文化应该赋予当下生活以意义，我们也忘了，若要一个真正的

马来亚，那么其文化应该代表我们所有人进行表达，而不是只呈现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但除了共同的地理背景之外，内部无法融合、互相冲突的杂烩。”“我不知道其他艺术的发生情况，但依我看来，在绘画中已经萌芽了一种真正的‘马来亚风格’”。慕礼尔认为文化赋予当下生活的意义，住在同区域(新加坡与马来亚)的人们应该将周遭的人文景致呈现出来，不应眷恋属于自身的文化，而忽略了一种真正代表马来亚文化之“马来亚风格”已经悄然萌芽。他用大篇幅的文字，引用陈文希，陈宗瑞与钟泗滨的作品，描述“马来亚风格”——尝试融汇东西方画技，题材多以本土风景人文所形成的艺术风貌。按照慕礼尔的思路：表现为“马来亚风格”的新马区域的独特艺术风貌，被披上政治色彩的外衣，说成“马来亚文化”——一种共同想象的文化体，并憧憬“马来亚风格”的路线延续下去，最终形成“马来亚画派”。

“马来亚画派”的迷思

西方人所提的“马来亚画派”出现过吗？下文将从“南洋艺术之父”林学大的美术观和新加坡独立前华文媒体有关画坛活动的资料切入，慎重地审视这个问题。

第一，林学大提过“马来亚画派”吗？

1938年林学大创办美专的动机是考虑到位于南洋地区的新加坡是东西交通要道，移民的多元文化，期望建设具“热带特质”的南洋艺术风貌。1951年林学大再次重申“沟通东西艺术，建立马来亚的新美术”(是东西兼容、勇于创新的南洋绘画风格)是美专创办的目之一。林学大与时俱进以自身的美术修养与敏锐洞察力，用专业语言的论述与创作实践去描述、去示范他对南洋美术的期许。经过十年辛勤耕耘，美专1948年展的参观人数近8000人，社会的观感是琳琅满目独具“南洋风趣”。

1954年林学大提出‘南洋风’的新美术。他说：“画家应该了解世界艺术动态的思潮，构思具社会意识的题材，创造出‘南洋风’(Nanyang Feng)的新美术。”吴得先于1955年作出诠释：“南洋风，实即马来亚风。马来亚已走上独立自主的大道，不能不有它的国风。这“风”是以热带情调为主，融汇华巫英印四大民族美术遗留的风格于一炉，沉浸涵咏才可以完成南洋风的美术”。“南洋风”中的“风”即是“国风”。按《诗经》的《国风》是西周时期十五个不同地域的诸侯国，各有自家风土民情的诗篇。对新马画家来说，马来亚已走上

独立自主的道路，美术作品也应具自家独特的艺术风貌。林学大一向主张艺术反映生活，五十年代在反黄色文化，反殖民主义的声浪中，文化工作者提倡爱国文化，以不同艺术形式反映人民诉求，为创造马来亚文化事业作出贡献。林学大期望美术界在发展爱国主义文化的工作中也扮演积极作用，于是在“马来亚新美术”的基础上，注入具时代意义（反黄，与反殖民）的新元素，从而提出“南洋风”的新美术。“南洋风”是特定区域、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与“南洋风格”的不同是充分体现绘画作品的时代性、配合社会思潮兼具社会功能。

1955年林学大在《南洋青年美术》的《刊首语》中对南洋美术的内容与形式定出六大纲领：（一）融汇各族文化风尚；（二）沟通东西艺术；（三）发挥二十世纪科学精神、社会思潮；（四）表现当地热带情调；（五）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六）配合教育意义、社会功能。他南来后经过多年观察思索与艺术实践提出完整的南洋美术概念！“融汇各族文化风尚”位居六大纲要之首，因为它是塑造马来亚文化（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融汇各族文化才能建立一个多元性、包容性的社会。这是海外华侨自觉性的诉求，与西方人在英国人“宏伟计划”的框架中，以建设马来亚文化作为各族共同文化身份认同的想象体的内涵截然不同。1956年以美专学生为骨干的艺研会巡回美展，画展特刊封面上三个人头，其含义即是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团结，折射出华侨逐渐倾向认同居留地的愿望。这与南洋美专初期的成立宗旨：移殖“祖国文化”、“辅助华侨教育”的理念有着天壤之别。1959年冯伟英《为马来亚艺术辛苦耕耘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访问记》，林学大再次重申上述论调，念兹在兹的就是“南洋风”。

到了50年代末从“马来亚的新美术”发展到“南洋风格新美术”（“南洋风”）日趋定型。1958年林学大以极兴奋的语气强调地说：“我认为沟通中西艺术，形成‘南洋风格新美术’的创校理想已次第实现。”究竟他的底气从何而来，首先是多年来的创作实践。

1954年林学大《巫族婚礼》反映不同民族习俗，表现社会的多元性，正合乎“融汇各族文化风尚”的理念。1953年洋溢“热带情调”的《圣淘沙》，1954年反黄作品《可怕的时间》，1955年反殖作品《福利巴士罢工》/《工潮》，创作手法受到立体派的影响。颜色是黑、白和

灰色，画面的以灰暗为基调，构图新颖，达到震撼的艺术效果。其次从美专学生的作品而来，如蔡名智《马来亚史诗》、郑国伟《劫余》/《拾遗》、李文苑《建筑工人》/《印度工友》、林友权的《余恨》与《寻真理》等都在1956年艺研会举办的“美术巡回展览会”上交出靓丽的成绩。林学大赞赏该次展出的反黄和爱国主义作品，能把现世纪的科学社会思潮和艺术打成了一片。”1958年7月分别留学英国法国的陈存义与赖凤美陆续毕业学成归来。1958年赤道艺术研究第一届画展成功举行并引起社会广泛注意，该会主要领导人都是毕业于美专。林学大艰辛办学，终有回甘，坦言自己创校理想已次第实现。

从1938年创校到1958年，二十年来林学大提出具“热带特质”的南洋风貌、“马来亚的新美术”、“南洋风”的新美术、“南洋风格的新美术”，找不到任何“马来亚画派”的蛛丝马迹。

其次，我国独立前华文媒体提过“马来亚画派”吗？

让我用历史来说话，由始至终官方或民间在我国独立之前艺术界一致“强调正努力创造一种马来亚艺术”，压根从未提过“马来亚画派”：

（1）1956年“陈文希中西画展”，艺术协会何国豪会长致辞说：“他是马来亚有数的名画家，在这里生活七年之久……致力于创造一种当地独特风格的作品。”副会长莎里文（Dr. Michael Sullivan）推许陈文希的画是沟通东西的桥梁，糅合中西画之所长，把欧亚文化融汇贯通。

（2）1957年钟泗滨在槟城举行画展，论者赞誉他的作品“具有‘南洋独特之风格’及美感。”

（3）1957年南洋美专第15届学生常年展，给予社会的观感是“色彩强烈，‘南洋艺术’的独特情调。”

（4）1958年艺术协会第九届年展，会长何国豪致辞说：“展品所表现的仍是一种‘马来亚的风格’，不属于‘西方或东方的艺术’”。

（5）1958年玛戈《南洋美专常年美展观感》，文中“……当地题材，强烈色彩，几乎一看而知为马来亚的产物……关于‘马来亚风格’是怎样的，也许言之过早。”按玛戈看法，要谈“马来亚风格”为时尚早，那就遑论“南洋画派”。

（6）1960年2月4日，赤道艺术研究会敦请文化部

长拉惹勒南为第二届美展主持开幕，他在致辞中欣慰地说：“这次展览会进一步证明我们有能力和奉献精神的本地艺术家，正努力创造一种‘马来亚艺术’”。

(7) 1960年6月2日为庆祝自治邦周年纪念，举行全星美术展览会，文化部次长李炯才在美展特刊中指出：“第一届全星美术展清楚证明了当地的画家，正在努力创造马来亚的艺术，不过，‘马来亚风格’的特性，却有待长期的发展才能形成”。

1960年文化部长拉惹勒南以及文化部次长李炯才都认为‘马来亚风格’的特性必须经长期发展才能形成。

(8) 1963年南洋美专二十五周年美展记者访问林友权代校长，他说：“我们对建立‘马来亚风格’的新艺术的这个目标，怀着无比的信心，这个目标必能达到。”

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次(1966年)汇集本地画家的作品展——艺术协会第17届本地画家展，该会副会长林友权致辞时说：“这次所有展品都具有个人的独特表现风格，更特出的创造力和富有生命力，这在创造我们特有的艺术形式方面，是正确和健全的。”致辞中闻不出“南洋”味道。

以上我把片片碎锦连缀起来，从个展到全国美展(1956-1966)，十年来民间或官方言论：只提“南洋风格新美术”、“当地独特风格”、“南洋独特之风格”、“马来亚风格”、“南洋艺术”、“马来亚艺术”等，从未提到“马来亚画派”。那么，我们有“南洋画派”吗？

“南洋画派”存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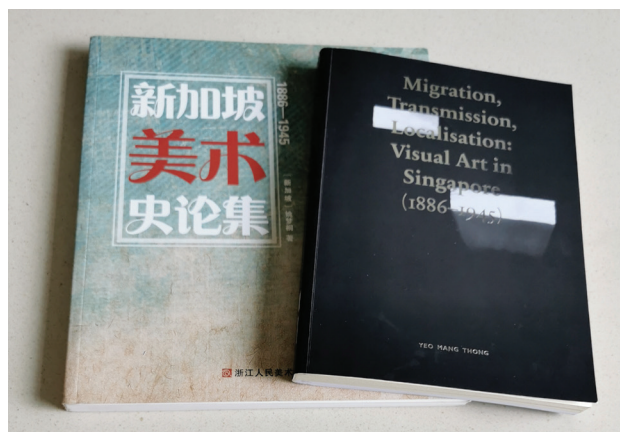
1985年11月5日，《南洋商报》刊登《张荔英回顾展》，文中说：“我国文化部与国家博物院在1981到1985年之间举办系列回顾展，以褒扬杰出的老一辈画家(刘抗、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与张荔英)对新加坡画坛所作的贡献，并作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一批老画家为本地画坛培育了众多接班人，更奠定了具有南洋风情的画风，形成了‘南洋画派’，造成极大的影响力。”这段报道的关键词是“奠定”、“南洋画派”，在四大画家的影响下，艺坛产生了“南洋画派”。“陈宗瑞等之峇厘写生画展，轰动一时，这一展览也被视为‘南洋画派’崛起的一个里程碑。陈宗瑞无疑是‘南洋画派’的一要员。”也有研究者认为“刘抗的一生与‘南洋画派’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般认为艺术画派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 一群具共同艺术观的画家、有别于其他画派的表现手法、相近的绘画风格、且有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2) 同处一个地域、具代表性人物；(3) 具传世作品；(4) 跨越时代、承前启后的延续性。唯有如此才能把画派的意涵说得清楚，我们具备这些条件吗？我尝试逐点说明。

(1) 四大画家的风格各异

我采用刘抗的文字说明：“钟泗滨的画风不时在变，从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到抽象派都尝试过，现在回返抒情的写实，将印尼绘画形式的特征，渗透到油画里去，创立独特的风格。陈文希是中西画兼长的艺术家，他的油画深受布来克(Georges Braque)及克利(Paul Klee)等人的感染，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构思，无论布局，设色，行笔都超然脱俗的手腕，一种大家的风度。陈宗瑞潜心研究水墨与油彩，均获优越成就常作大幅度的彩绘，结构缜密，敷色沉郁，是他艺术生涯的一绝。我爱过梵高(Vincent Van Gogh)爱过高更(Paul Gauguin)也迷恋过马蒂斯(Henri Matisse)崇向开朗豪迈的一路。”可知四人的画风不尽相同。

为了进一步厘清求证心中疑惑，我访问几位先后担任南洋美专的讲师如蔡名智、黄明宗、方良、曾纪策，他们都认为四大画家的风格各异，质疑“南洋画派”的存在。诗书画俱佳的许梦丰说“印尼画家甚多也甚特出，堪称享誉东南亚艺术第一大国。如果第一代画家以本地事物或风景如画便誉之为“南洋画派”，何其目光之短浅耶？我认为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刘抗四画师家只当誉为‘新加坡第一代杰出画家’似较贴切。”美术评论家杜南发的看法是“南洋风格”或“南洋画派”，迄今未止，只是略具雏形，多以地域或物象为据，未真正成型。前南



姚梦桐学术著作

洋艺术学院院长朱添寿也就画派的概念分析：“四大画家的峇厘之旅，随后的画展引起艺术界的注意和兴趣，就有了‘南洋画派’的说法是不妥的。”担任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11年的梁振康也认为，所谓“南洋风格”在几十年时间内是否成形，或是否形成一个画派，言之过早。

(2) “南洋画派”欠缺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

刘抗留下的文章不少，然而内容繁杂，涉及范围又广，究其缘由或者可借他的话解释：“当地画家只顾埋头作画，而未念及正确理论之建立。”细读《陈宗瑞文集》一书，其中如《漫谈中国画与西洋画》、《中西画杂谈》、《略论水墨画之本质与内容——献给墨澜社》以及《漫谈国画》等篇文字不乏闪烁精辟画理，一些作品的题词总结绘画实践，如1950年的《河边洗涤》：“余写南国风光，恒以中法为之，而此帧独以阴阳之法衬托之。盖在初试，然斯法殊乖吾意，今后当不复为之。”遗憾的是缺乏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

(3) 从“四画家峇厘绘画展”推论“南洋画派”不合逻辑

四画家峇厘绘画展从1953年11月6日到15日，于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作品有油彩、蜡笔、粉画、毛笔画共一百余帧。印尼驻新加坡领事致开幕辞说：峇厘绘画展促进人们认识峇厘岛人民的生活与自然美景。参观画展者以“西人为主，占百分之六十”，购画者多为西人，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前后参观三次并购买六帧画作，还邀请四位画家到官邸茶叙。画展给社会的观感是“作风新颖，题材特殊，为本坡过去所罕见者”。艺术协会主席基逊禧尔（Dr C. A. Gibson - Hill）赞誉他们各以不同格表现峇厘人文景致。我国美术史上四大画家的贡献功不可抹杀，峇厘作品展呈现的是洋溢南洋风趣的南洋风情画，还远远谈不上“南洋画派”。

身为南洋艺术之父的林学大于1958年提出“南洋风的新美术”，它的意涵是“南洋风格”+新元素（作品的时代性，配合社会思潮兼具社会功能）。那么，在稀释了的“南洋风”的前提下推论峇厘绘画展奠定“南洋风格”并发展形成“南洋画派”，是可笑的、不合理的。

(4) “南洋风”已经烟消云散

谈“南洋画派”离不开“南洋风”。然而，上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我国独立与经济步上轨道，反映时代思潮，兼具教育意味，题材敏感的作品，慢慢不为人们所重

视。赤艺最后一届年展（1968年）成为绝响，“南洋风”新美术余韵缭绕，之后，渐渐消逝，淡开化去。如此，何来的“跨越时代，承前启后的延续性”。2003年中华美术研究会主办以南洋画风为主题的画展，出版《南洋风作品集》，时任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的方良，在画集《序》文中语重心长地说：“现代艺术思潮和社会现实的冲突‘南洋风’是否因缺乏营养而寿终正寝？‘南洋风’是什么？是否已走入历史？我们要‘亚细安艺术’还是要‘狮城风’？我们对林学大先辈的教诲和发下的作业，我们完成了吗？他在结论时更是豪气万丈，这次画展与期间的座谈会，希望为迄今没有定论的课题寻求辩解，什么是‘南洋风’以及今后的创作方向，激发更多同道加入共创‘新南洋风’”。这段话尤能窥视“南洋风”的窘态！

结语

八十年代“南洋风”概念被偷换成“南洋风格”，之后论者又演绎成“南洋画派”，这种以讹传讹的逻辑错误越洋飘海远及日本。2002年福冈亚洲美术博物馆举办“现代艺术II，南洋1950-1965：新加坡艺术之旅”，这展出依据Piyadasa和Sabapathy的看法，结果把“描绘异国情调，异族女性乐园的作品”定义为“南洋美术”，将“南洋风”译成“Nanyang style”，四大画家也成为“南洋风”的代表作家……该展不但将南洋风定义为异国趣味和乐园风的作品，还把社会写实主义的作品分出去，放在另一类来和南洋风作品相对比……殊不知，反映当代社会思潮的创作理念正是林学大的主张。

在我国美术史上四大画家的贡献功不可抹杀，峇厘作品展呈现的是洋溢南洋风趣的南洋风情画，还远远谈不上“南洋画派”。我想：“南洋画派”与“马来亚画派”纯然是论者流淌在心中的美丽憧憬！

作者为本地美术史研究学者

香雪遗事



文：陈弘庵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某年的一个晚上，我应友人之邀参加刘抗先生主持的香雪庄雅集。当晚参与的有哪些人，看了些什么书画，如今已忘得一干二净。惟有主人一身素白的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梳得烫贴的头发，温文儒雅的谈吐，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陈之初先生是我国商界的潮籍闻人，其经商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位于我国中央商业区罗敏申路长丰大厦就是陈先生的公司。然而一名商人公余之暇雅好书画文玩，这在新加坡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纵观香雪庄的收藏，书画以任伯年、徐悲鸿与赵少昂诸人的作品为精；印章方面则以齐白石的印为最多，其自用印则为王福厂、陈巨来、邓尔雅、冯康侯、王壮为与王北岳等人所制。此外，之初先生也喜爱收藏砚台、砂壶与陶瓷。香雪庄编印之艺文书籍甚多，现举数例以见陈氏在传播中华文化上的用心。香雪庄于一九七零年出版饶选堂教授编《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氏在序文中说：“今秋，将重有美洲之行，发篋得甲骨复印件拓片若干，暇日稍为排比，辑成一册，题曰《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友人陈之初先生见之，助资促其印行。”就此足见陈氏之文化

修养非一般商贾可比；一九七八年，之初先生再出资由饶选堂教授为他编印《香雪庄藏砂壶》。饶氏为此写了一篇代序《供春壶考略》，文中有段话这么说：“星洲香雪庄主人陈之初先生精鉴别，富收藏，所度宜兴砂壶尤为一时之冠。”同时，也从《扬州画舫录》卷四稽考出扬州东园天宁寺道旁的十三房有家宜兴土产砂壶专卖店名曰“香雪居”，竟与之初先生的香雪庄暗合，诚为一桩趣事。陈氏于该册卷首题写“余所藏砂壶选堂兄为编录成册。复考出扬州画舫录中壶肆香雪居与余斋名适合，若有前缘，因题二十八字：平生自忖无茶癖，宝此砂壶最可人。不用买田阳羨去，笑他香雪是前身。”如此一来便构成一个收藏佳话。至于出版画册方面，一九五零年之初先生借出两百多件书画由新加坡中国学会主办展览并编印《香雪庄书画选辑》。此画册由叶遐庵题署封面，中国学会会长李绍茂作序。李氏在序文中说了一句深具意义的话：“吾人诚觉此等珍品，不特陈君个人可以自豪，且新加坡亦当引此为荣幸也。”这次展览结束，中国学会把售出的入门券所得款均用于“捐助马来亚大学、新加坡防痨协会及同济医院”。一九五三年，香雪庄出版了由陈宗瑞先生主编的《任伯年画集》，此册共收任画一百件，书前有徐悲鸿手写的《任伯年评传》。陈宗瑞先生在编后赘语写道：“香雪庄主人陈之初，喜爱任伯年画，连年搜求购买，得任画逾百，经精赏鉴别，去芜存华，集得真品百帧，影像付梓，旨存宣扬一代巨匠……化外蛮荒，能有如是之搜集，所谓神物得鬼神之呵护，此之云乎。”这本画册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问世，足见编辑之艰辛。至一九八

一年，陈氏又出版了《香雪庄藏印》。此印谱采线装宣纸精印，之初先生在扉页题写了“齐白石先生铁书”。此外，还以白描画了一张白石老人的像并系一首七绝：“金铃护子慈亲意，松火攻诗哲匠心。虽有艺名传宇内，星塘老屋未忘贫。”藉此数端，我们可以窥见陈之初是真的用心去读懂自己的藏品的内涵，并由衷的赞叹！

陈之初归道山后，我国亚洲文明博物馆接受其子嗣捐赠了一批书画、砚台与陶瓷（见《香雪庄珍藏》，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二零零六年）；此外，我们也在中国与香港的拍卖目录看到许多香雪庄的藏品。人生无常，藏品也无常。私家收藏多在物主故去后因种种原因星散四方，虽说古往今来皆如此，但那究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只是发生这样的时代，自然也就引人深思。

晚清硕果楼陆心源的藏书靠家族生意支撑，并开放予有志于学的士子借阅。后来陆氏家族的生意走下坡，再也不能维持藏书阁的各种度支时，曾呼吁清政府给予协助，但腐败的统治者面对内忧外患，已日薄西山，自顾不暇，那还有心情理会这批宋版书。无奈之下，陆氏后人只好狠心售书予日本嘉静堂文库。（可参阅《潜园遗事》，页一零八，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今日，我们处在一个经济繁荣，政治修明的太平盛世。倘若一个政府只知重视经济而不知文化建设，且沾沾自喜美其名曰“务实”，这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从上而下也就可想而知。前有虚白斋，后有香雪庄，怎不教人歎欷！

作者为中学教师



文：郑爱强

南洋竹枝词的演变与特色



《竹枝词》原为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流域巴渝的一种民歌，古时盛行在土家族的先民——巴人的部落。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源远流长，内容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通俗自然、清新活泼。到了清代，竹枝词已呈现出一种空前繁荣的创作局面。晚清国门开放，西方文明随之而来，中西文化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相互交织，促成了各方面的变革，特别是文学方面。诗人走出中国国门，在异国他乡创作各类海外竹枝词，开拓域外题材，成果丰硕。

南洋竹枝词始于19世纪末

现存史料中的第一首南洋竹枝词，于1888年3月29日刊登在新加坡《叻报》上，内容描写福州南台岛艇妓卖唱风情，构思与创作虽在中国，但为竹枝词落户新马一带开了先河，从此源源不断。根据本地学者李庆年博士的统计，现留存在各类报刊上的竹枝词有四千余首，作者包括邱菽园、潘受、林云仙、叶季允等，诗作均以吟咏南洋风物为题。为华人文化在南洋传播和推广起到重大作用。邱菽园是早期新华文坛著名诗人。他于1896年创立丽泽社，鼓励当地文人填词创作，拟定课题，亲自点评，多方鼓励，而他自己也创作许多竹枝词带动社员。随着华文报业的发展，许多优秀竹枝词便在报刊发表。1933年邱菽园在《星洲日报》“游艺场”版开辟“星洲竹枝词”栏，大量引用马来词汇，一度成为诗坛佳话。由此可见诗社给南洋竹枝词提供了有益的土壤，而报业的发展则为竹枝词提供了展现的舞台和传播渠道。生活的经历和才华，决定了南来文人们都能够写出富有南洋色彩的竹枝词。

文化冲突和交融的“混血儿”

不同年代从中国南来星洲及马来亚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到南洋文化的熏陶，两地生活和习俗彼此融合、渗透和互动。竹枝词受到一般南来诗人的喜爱，将其视为一种便捷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些作品尽管增加了新的元素，仍然遵循竹枝词的创作传统风格，形式与七言绝句一致，其内容带有典型强烈的世俗风味，地方色彩，方言语汇，用句通俗，内容多样化，不乏风花雪月。

早期南来文人对南洋的感情复杂，身处南洋既有对异地文化的好奇也有欣赏，如丘逢甲《槟榔屿杂诗》反映了对南洋风光的体验：

谷绣林香万树花，青崖飞瀑落砧砑。谁知地下潜流出，散作春泉十万家。

槟榔屿是马来西亚西北部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岛，因盛产槟榔而得名“槟榔屿”。到访者创作竹枝词的内在情感，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描述，往往与中国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表达一种政治情怀。

另一首：

海外居然谱学通，衣冠休笑少唐风。黄金遍铸门楣字，不数崔卢郡望崇。

“崔卢”是指崔氏与卢氏，从魏晋到唐代，都是山东的士族大姓，地位较高，重视谱学，作者借此表现马来亚槟榔屿虽然也很重视家族传承。中国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思想背景，投射在南洋不同文化土壤上，彼此冲突和交融，诞生南洋竹枝词这一“混血儿”。

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情怀

南洋竹枝词如实记录南洋的风土人情，笔下常流露对南洋女子服饰的好奇和吟咏。

马来装束斗时新，未肯奢华让别人。头上钗钿胸钮扣，晶莹钻石尽镶舍。

马来人女士的服装衣宽如袍，遮手盖脚且色彩鲜艳，样式美观，头披单色纱巾。

二八年华绝妙容，纱笼一幅髻蓬松。南中儿女翻新浪，半露鸡头半酥胸。（中人《巫装》，1919年9月2日《檳城新报》“文苑”）

纱笼是马来人用于穿在下身的围裙。纱笼因其宽大，穿著方便舒适凉爽，很适合热带地区采用。印染的花纹、色彩都极富马来情调，凸显马来人的形象。南洋竹枝词对南洋印象的随性记录，实景再现，对诗人来说是被发现的新景致和观察到的新对象。

螺髻高盘帖翠钿，纱笼木屐态蹁跹。阿侬生爱天然足，罗袜慵穿况说缠。（笑罕子《星洲竹枝词》（1903年8月1、3日《叻报》）

发型盘在头顶，形状像螺壳的发髻上有玉制成的头饰，生动描绘了效仿穿纱笼跋木屐的年轻女子，热爱自然的青春气息。

巫妇衣装又不同，背观浑似虎皮蒙。倘教蹲伏山林里，乍见几疑大伯公。

这首竹枝词文风诙谐幽默，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和之前“阿侬生爱天然”的华族女子的“态蹁跹”形态截然不同，形成强烈的对比。

新词汇和古文诗词的巧用

一片波光灿落霞，丹戎江畔尽渔家。老翁叉手船头立，笑看群儿扑水花。

丹戎：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新加坡地名。

诗词生动活泼，渔民的淳朴生活及儿童戏水的场景跃然纸上。

大东陵又小东陵，十里丛林十里青。几个顽童轻蹑足，竟从树下捉蜻蜓。（黄藻洋《星洲杂咏竹枝词十二首》之一，见1916年10月4日《国民日报》“文苑”。）

东陵 Tanglin，新加坡地名。

一幅和谐的乡村自然风景，温馨的一幕，词人的内心应该是平静惬意的。

巴刹呼余又卜干，绵蛮重译听来难。别求两话赅场市，马吉称名义较宽。（邱菽园《星洲竹枝词》）

巴刹、卜干、马吉：均为市场的意思。

灯街笳鼓夜迢迢，人影憧憧鬼影摇。巴刹马兰曾几日，又装魑魅斗元宵。（黄吉云《巴城元宵竹枝词》1917年2月19、20日《国民日报》“诗苑”）

巴刹马兰：pasar malam 马来语的夜市。

弥思小字是安拿，明慧堪称解语花。啾啾莺声夸百转，方言最爱学中华。

弥思：Miss 小姐的意思。

红毛丹果味马尼，不羨枇杷与荔枝。更爱槟榔随口嚼，点唇沁齿赛胭脂。

（邱菽园《星洲竹枝词》1932-1933《星洲日报》“游艺场”）

马尼：马来方言译音，甜的意思。

将异族的词汇掺入作品中，竹枝词中不可胜数，这是对他族友善的表现，在民族隔阂与分而治之的殖民时代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洋竹枝词加入新名词多为音译字，有地名音译，名词音译，食物音译，还有称呼音译，有些甚至是闽南语和粤语的音译。这和南来的中国移民多数是广东沿海各地区的福建省和广东省息息相关。新造词容易表达在异国的所见所闻，确切地描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当时的年代，汉语还没有南洋一些事物的词汇，诗人用译音词表达、代替汉语中没有的词语，一些新名字用得非常巧妙，简明，是南洋竹枝词区别于中国国内竹枝词的一道独特的文字景观，同时新语境也给了竹枝词新的生命力。

南洋竹枝词的社会文化功能

其一是祖先崇拜仪式的表现。

祖先崇拜在现实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除了纪念祖先的功绩，也用来加强共同血缘观念，以巩固内部的团结，所以拜祭只是外在形式，其目的仍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有学者认为中国史传的文化源头就在中国人最

初的祖先崇拜意识之中，而祖先崇拜意识又突出表现在宗庙祭祀仪式中。祖先崇拜对现世的人具有积极的作用，当人们做事时，认为祖先能保佑自己，我们要为祖先争光，要“不辱先”要“光宗耀祖”。

清明时节祭幽冥，祖乃相邀往踏青。麦饭纸钱纷设祭，恒山亭复碧山亭。（笑罕子 1903年8月1、3日《叻报》）恒山亭、碧山亭，皆为新加坡坟山。

其二是记录丰富多彩的庙宇。

早期南来打工华人在本地落地生根创业，也将家乡供奉之神明恭请过来，所以在星洲，不论哪个南来籍贯的移民，都为心中神明设坛建庙，这些神坛庙宇其实也是早期移民的活动中心，这也给了离乡背井华人精神上的慰藉。

迎神赛会也奇观，闽粤同腾海外欢。最是潮洲人异样，大办园山恰如盘。（笑罕子《星洲竹枝词》）

这首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了不同籍贯的移民，如福建、广东和潮州人不同迎神赛会的奇观。

土地神称大伯公，墮郎就是托帡幪。侄孙众夥祈关顾，何乃痴聋似作翁？（慧居士《星洲杂咏竹枝词》）

墮郎：马来语tolong意为关照。帡幪：汉语庇护之意。一般迷信者，口语每曰：“求大伯公墮郎。”其意为：求土地公多多保佑。

港畔桥头玄武宫，巍巍木偶广神通。焚香顶祝犹余事，尚有年年演剧风。（洪玉莲《浮罗山背竹枝词》。年年三月玄武宫演剧酬神。）

演戏酬神是庙宇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种风俗也随移民一起来到马来亚，成为社区庙宇活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来移民，庙宇的社会功能也日渐扩大。神庙办学校，援助贫困学生；办体育活动，办醒狮团或互助社等，庙宇并不单是一种宗教载体，它和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造福社区，为安定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落叶归根到生根的转变

先说落叶归根。南洋竹枝词中有大量作品，反映诗人们心系故国的落叶归根意识。

滔滔水势源流涌，落拓天涯感慨多。客里每怀家国恨，

更从何日唱离歌”（黄延《星洲海边杂咏》1919年3月22日《国民日报》“诗选”）

故国是每一个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活是青天白日旗，青裙白衣女孩儿。要她祖国随身带，念念无忘一党徽。（邱菽园《星洲竹枝词》）

由一位小女孩身着青和白色的服装，联想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面“青天白日”旗，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将此旗作为党旗。是身在南洋心系故土的表现。

内地纷争势不休，避危闪祸作南游。河清海晏奚何日，每念家乡朝夕忧。（颜星投（1928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中国战乱，移民南洋避危闪祸。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及漂泊孤寂的心理。

岁寄还乡巨量资，家人妇子喜孜孜。诿惟妇子家人乐，祖国无形塞漏卮。

下南洋华人一切从零做起，通过艰苦拼搏，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生意成功岁末寄回家乡的巨量物资怎能只让家人妇幼快乐，对于祖国来说，是在塞一个无形的漏卮。

橡风椰雨故依然，经济崩颓惨不前。漫道谋生南度好，几多空手宝山旋。（少陵野客1937年2月14日刊登在《新国民日报》的《华侨》）

南洋景色和故国之思是水乳交融的，写南洋其意则在对中国的思念。因此，南洋竹枝词的作者从来都不是刻意表现热带风情元素，他们对于椰风雨林、人情风土的外南洋特色作为其作品的主题，只是南洋生活境遇的自然折射。

再说认同本土，逐渐生根的转变。

加东道上逐轻尘，习习凉风吹海滨。此是桃源真世外，闲中消受百忙身。（谢松山《星洲春节杂碎》1948年3月3日《南洋商报》“和平·南洋诗坛”）

此时此景已是倾向本土的内心感受，真实而亲切。

别井离乡不计年，只缘儿女债难填。无端说到前途事，搔首踌躇欲问天。（郭益民《感怀》1948年7月23日《南洋商报》“和平·南洋诗坛”）

“前途事”已经是“踌躇欲问天”了。

点缀南荒破大荒，居然本地好风光。平添八景湖山壮，久把星洲作故乡。

邱菽园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并终老，尽管“南荒”是大荒，如果能添八景，就可当作故乡。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回中国的意思。

南来移民有的后来又随季候风回国，也有相当多部分常年居住本地。由于移民女性较少，华人便逐渐与当地土著通婚，其后代成为了当地华人的组成部分。既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南洋发扬光大，又接受南洋文化的熏陶，融入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多元种族文化的新马，社交礼仪、节日风俗，饮食习惯，在南洋竹枝词有所体现，凸显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

视野的扩大与题材多元化

早期南洋竹枝词以城市生活为主，大多数是抒写个人情怀或唱和之作，很少接触到国家和民生课题。1931年初《檳城新报》出现一个纯诗词刊物“诗词专号”，成为马华诗坛上的创举和盛事。主编曾梦笔的《霹雳道上》，让人看见乡村景象已进入诗人的视野：“半边残照古皇城，橡树椰林一例青。啼煞鹧鸪声不断，狗头山上白云停。”

梅宋博《星加坡竹枝词十五章》，描写了小贩做生意的艰辛：“道旁买卖小生涯，昨日亲朋讨借移。几字方牌志未领，当街巡警势难支。”

《怡保竹枝》中古董的《南洋不景气有感》，反映经济萧条、民生疾苦的状况：

失业工人最可怜，忍饥终日断炊烟。英雄有武无能用，不若归家学种田。（写失业工人的困境）

侨民欲救肚中饥，摆物街也聊自支。巡警无情拘候审，个中冤屈有谁知？（写小贩的坎坷）

太息南邦一局棋，商场凋蔽最堪悲。货陈闹市无人问，门可张罗众素知。（写三十年代经济不景气）

更有用竹枝词描写抗战题材的：“送过棉衣又雨衣，万家轧轧转车机。裹将热血冲锋去，不尽仇人誓不归。”诗中作者自注：春季多雨，近日赶制雨衣雨鞋，为华中军队需要，与东回各界各女校师生合做棉衣，同为应时物品。

邱菽园的《抗战韵言》，专为声援抗战而作，是南洋竹枝词的重要部分。1937年至1942年是新马抗战诗歌

勃兴的时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步步升级，新马诗作者的抗战情绪急剧腾涨，创作了大量的抗战诗歌。邱菽园的《抗战韵言》竹枝词体现了抗战文艺具有的坚实内容和时代色彩的重大意义。

小结

由于竹枝词形式短小，不受音律苛刻限制，便于描述自然风貌，因此内容广泛，50年前的作品已成为记录南洋风土史料的集成。而文辞平易，内容朴质，也是南洋文人用来表现真实心态，讽喻政事或寄托乡思的形式。在社会文化迥异于中国的蕉雨椰风热带自然地理环境下，诗人感触独特，言为心声，见而必录，成为南洋竹枝词的创作特色。诗作中所描绘的，让我们如临现场，欣赏着一幅幅的南洋风土画，生动逼真，色彩浓艳。

邱菽园在《五百石洞天挥麈》中对竹枝词有很高的评价：“由上古三百篇而乐府，由汉魏齐梁而近体，而竹枝，而词，而曲，而传奇，其道亦屡变矣。”对于竹枝词的重视和推许可见一斑。

他的《星洲竹枝词》以数十年居住在星洲的体验和观察，剖析本地的各种事物，作品中有许多记录之事保留了已消失的民间习俗，在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他在竹枝词中运用了闽南语、马来语，由竹枝词在不同地域受当地方言的影响来看，他的作法既反映了竹枝词的文体特征，也是南洋竹枝词的演变的必然。南洋竹枝词在战后还出现过一段时期，到了1950年以后就消失了。

南洋竹枝词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真实地记录了新马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参考文献：

- 《庙宇文化》（新明日报丛书）
- 《南洋竹枝词汇编》李庆年 编
- 《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李庆年 著
- 《采风南洋：邱菽园竹枝词探略》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立 著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http://whis.ccsn.cn/sjs/sjs_lsjd/201807/t20180709_4498387.shtml?COLLCC=3712079291&

“希盟”政府

终究承认不了独中统考

／文：穗 昕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4届全国大选，“希望联盟”（简称“希盟”）胜出，替代霸据政坛61年之久的“国民阵线”上台执政。

“希盟”在其《竞选宣言》中明确承诺胜选将会承认华文独中统考¹，还附带说明“让独中生可以统考成绩申请进入本地国立大专学府，申请者只需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的考试中，获得国文（马来语文）单科优等或以上的成绩。统考文凭也将受鉴定，以确保其水准和现有国立大学的入学门槛相等”。

2020年2月23日，一批政党政客和国会议员聚集吉隆坡喜来登酒店，谋划推翻“希盟”政府。随即“希盟”政府首相敦马哈迪自认已不获大多数国会议员支持而与其全体阁员呈辞。“希盟”政府垮台，“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诺言也跟着烟消云散。

其实，509大选《希盟竞选宣言》关于“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诺言，说到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承诺！

“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其教育部长马智礼博士表示，承认独中统考课题牵涉马来语文地位和国民团结等因素，在新政府执政的五年内，任何承认独中统考的决策，都将以全面的调研为先导，以确保不会影响马来语文的地位与重要性，以及不会损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关系。“希盟”首相敦马哈迪也强调承认独中统考需要考虑马来民族的感受，安抚他们放心。

似乎只有“希盟”成员党的民主行动党对承认独中统考充满自信，其部长、领袖们言之凿凿地保证“希盟”执政期间内必定承认独中统考。但是，“希盟”下台后，敦马哈迪接受传媒专访，却表示民主行动党已经看清国内政治现实，接受“希盟”政府不能承认独中统考的事实，大大“打脸”民主行动党部长、领袖们。

“承认统考特委会”专业素质不足

“希盟”执政期间，面对承认独中统考的舆论压力，教育部迫于成立“承认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下文简称“承认统考特委会”），以针对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的客观实情进行调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观点，协调各方达成共识。

但是，这个“承认统考特委会”毕竟教育专业素质不足，留下不少遗憾，让人嗟叹。信手拈来就有：

“承认统考特委会”邀请一些政党、社团、乡团会馆、宗教组织、青年团体的代表进行对话交流，听取他们对承认独中统考的意见与立场，但与会诸代表各自阐述其组织或个人立场，意见分歧鲜明，难有共识。“承认统考特委会”成员慨叹资深代表是“对抗”的、“民粹主义”的，甩不开“思想和历史包袱”；年轻代表则展现“理性”的、正面的“对话”，让人“感到欣慰，因为看到了希望”，应该多跟年轻人接触。如此简单一分为二，不能调和各方观点，谈何促成共识？

“承认统考特委会”主席邱武英建议各国立大学为来自非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举办入学考试，认为这是解决承认独中统考问题最具“创意”的方式。殊不知把独中统考文凭升读国立大学的学术价值贬低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准考证”！

邱武英也察觉“现有国家教育系统是失败的”，但却没有刨根究底。他毕竟认识不到现有一元化国民统合教育制度与多元民族语文教育制度并存的局限性与难以缓解的矛盾，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转型“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这制约他调研解决承认统考问题的思维。

“承认统考特委会”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承认独中统考存在的若干症结，从中也可以窥探“希盟”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的意向与态度。

教育政策掣肘承认统考

首先，承认独中统考遭遇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掣肘。出席“承认统考特委会”交流会的人士，没有反对独中教育和独中统考的存在，甚至还对独中教育加以肯定与赞誉。但是如果承认独中统考，则违背当局“通过一项规定国语（即马来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国家教育课程和共同考试的国家教育制度来建设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系统”的政策；同时，也违反国家宪法关于马来语文公共用途（教学媒介语）的规定。他们坚决不认同两套不同的教育体系并存，也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解决30%没有报考国家教育文凭考试的独中学生的升学问题而改变国家教育制度。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和历任教育部长、教育部官员就多次以“独中教育不符国情、违反国家教育政策”，“独中课程有悖国家教育课程的内涵”为由，拒绝承认独中统考；甚而“希盟”政府教育部长马智礼也担虑承认独中统考恐影响马来语文的地位与重要性。

看来，承认独中统考问题的解决，还须取决于一元化国民统合教育政策与多元民族语文教育理念矛盾的化解，以及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没有意愿落实“跨文化教育”理想，促成多元民族语文教育共存共荣。然而，这似乎不是“希盟”政府教育改革的议程。

其次，承认独中统考纠结于“学术承认”抑或“全能承认”。马来西亚华社争取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主要用意有二：一是作为升读本地国立大学的学术凭证；二是作为申请公务员职位的基本资格。然而，目前探讨承认独中统考的用意，似乎只集中于第一项，而忽略了第二项。即使争取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作为升读国立大专院校的学术凭证，“承认统考特委会”交流会一些与会者也有所微言，认为“独中统考生将瓜分现有非土著就读国立大专的固打份额”。此外，也有传闻“承认统考特委会”将建议“统考文凭持有者只能申请进入本国政府大学深造，不能以统考文凭应征政府各级公务员职位”。

这种观点和建议，未免窄化了争取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的用意，也是对统考文凭持有者的歧视。半世纪以来，华文独中春风化雨，作育英才，丰富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内涵，实现了教育社会功能的“本土化”。承认独中统考，本质上来说，是为国储才，让独中毕业生学有所成，直接服务社会，参与国家发展建设。

承认统考的附加条件

其三，承认独中统考有附加条件。在争取政府承认独中统考进程中，当政者认为独中课程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和国家课程纲要的规定，特别是独中的马来语文学科水平不及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标准，同时历史和地理课程的“本土”教学内容不足。因此，政府承认独中统考，须要附加SPM马来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优等或及格成绩作为学术条件。据说“承认统考特委会”的调研报告也将纳入“独中统考生必须在SPM全科考试中取得4科（包括马来语文、历史、地理等）优等成绩”的建议，作为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的附加条件。

基于对马来语文国语地位和学习知识语文价值的尊重，马来西亚华社普遍能够接受政府承认独中统考附加SPM单科马来语文优等成绩的条件。至于SPM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条件要求，华社是不以为然的，咸认无此必要。因为独中历史、地理课程研制和教材建设，早已“本土化”了，且皆以国家教育课程标准为基础，内容包含世界中等教育相关科目教学范畴，本土课程内容比重也超过30%，学术水平不在国家教育课程之下。

如果强制规定SPM全科马来语文、历史、地理优等成绩作为全面承认独中统考的附加条件，对整体独中教育发展将是严重的打击。因为有志于升读本地国立大学的独中生，除了参加独中统考，还需报考SPM全科文凭考试，情何以堪！再说此举也是贬损独中统考价值，致使独中统考文凭沦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随着“希盟”政府的垮台，其大选宣言“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诺言兑现无期，马来西亚华社也无从与它纠缠下去；而非民选的“国民联盟”政府，自然不会把民办教育事务放在心上。争取政府承认独中统考话题无以为继，可以偃旗息鼓了吧？但愿下届大选，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勿再把承认独中统考当政治筹码，忽悠华社。马来西亚华社争取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始终必须坚守独中统考学术价值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否则沦为独中统考“送终人”，断送民族教育品牌事业！

作者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者

注1：华文独中统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民办60所中等教育学府“华文独立中学”（简称“华文独中”或“独中”）的内部统一考试（简称“独中统考”或“统考”），创办于1975年。独中统考文凭已获世界500多所大专院校认可作为入学学术凭证，但至今尚未获得马来西亚政府承认。

二十不惑 三十而已

女性的年龄焦虑与自我发展困境

／文：张 骊

近来热门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似乎都围绕着女性的群像刻画。电视剧《二十不惑》描绘了一群大学女生的友情。电视剧《三十而已》描绘了三位三十出头的女性的爱情、婚姻和事业。而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则寻找了三十位三十岁以上的女明星来进行女团选秀，可以说是最近话题度最高的现象级的综艺。女性剧场终于不是单纯的爱情剧、家庭剧或者职场剧，更多的是在探讨女性全方位的问题。

以往大部分的影视剧和综艺设定，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主角，女性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陪衬，起的只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而如今，这些女性题材的影视节目都赚足了关注度，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占据热搜的位置。可能是“物以稀为贵”，也反映了女性主义的风潮，女性观众的自我意识在崛起。从名字上，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影视剧和节目，把作为女性年龄的数字，像一个巨大的logo打在了屏幕上。通常我们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电视剧里是“二十不惑”，“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宣传口号，则是“三十而骊”。这些说法，在向观众表达女性对年龄焦虑的破除。二十岁是已经可以辨明人间是非，三十岁不必非要成家立业，就此停滞，而是可以拥有很多的可能性，像黑马（骊）一样，继续突破前行。

当代女性充满了年龄焦虑，这不仅仅是自我认知上的困惑和舆论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学业、工作和婚育中均会遭遇到切实的年龄压力。年龄这种完全无法改变的时间维度，衡量甚至决定着女性的发展。女性肩负了生育的压力，生育能力可能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社会催促着女性早早婚育。但同时，社会又不想看到女性的生存压力，不接受因为婚育影响工作的女性，也不接受因为婚育导致容颜衰老身材走样的女性。这一点在女明星身上尤为明显，超过30岁或者已生育的女明星，工作量会急剧减少，适合她们的角色也越来越少，失去曝光机会，逐渐被观众淡忘。所以不管在节目里还是私下，女明星不敢胖，不敢老，一旦失去了青春靓丽的形象，或者被生育困住，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获得立足之地。

影视节目看到了女性受众这个市场，因此越来越多做出相关议题的内容来迎合市场需求。但是“过犹不及”，影视剧里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的形象，对受众产生了更大的年龄压迫。《三十而已》里面的“完



美主妇”顾佳，三十出头就拥有了价值千万的豪宅，推动丈夫事业发展，又把家庭事务和育儿打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她美貌依然，情商颇高，十项全能。另两位女主角也是青春靓丽、活泼可人的模样。《乘风破浪》里的人气颇高的几位“姐姐”，都看不出“妈感”，仿佛她们从未生育过，身材容貌依然姣好，活力满满。她们严格控制食量，勤于保养，造型上也是往童颜幼龄靠，五十多岁的伊能静，扎着歪辫子穿着纱裙出境。但越是想显示超脱年龄和身体机能衰退的“举重若轻”，越显得力不从心。节目组不断剪切姐姐们训练受伤和疲惫不堪的镜头，让观众感受女明星为了突破自我有多么拼命，多么不容易。

观众无疑是羡慕他们的。但是这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结构性的。女性既要满足传统的婚育期待，又要满足新时代女性自我发展的期待。不满足其中任何一点的都会遭到隐藏的歧视和区隔。社会要求女性在三十岁之前完成这两种期待，事业和家庭双重完美。“完美女人”遮蔽的正是被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在男性凝视之下，女性的容貌焦虑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重。女性要“独立”、“坚强”、“窈窕”，同时具备优秀母亲、妻子的品质的同时，还必须拥有“自我”。茱莉亚·伍德在《性别化的人生》里提出，衡量女性的标准都是基于一种排除女性体验的理论之上。评价女性的眼光和标准，是男性角度出发的，这就意味着女性在身心上面临的困境并不会被考量。真相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十项全能，女性因为生育和母职的压力，困境更多重，突破更艰难。

镜头里的女性形象，光鲜亮丽，化妆加上滤镜呈现的效果，强烈地传递着“逆龄”这个观念。商业逻辑希望女性观众接受这种观念，去购买昂贵的护肤产品来使自己像女明星一样“冻龄”。荧幕里传达的审美观依旧是“妹系”审美，尤其在东亚社会，时间对女性分外苛责，似乎只有停留在二八芳华才是最佳。德国心理治疗师瓦德兹在《女性自恋》里阐释，社会对一个女性的价值总是强调身材、个人魅力、傲人成就、物质生活、完美形象，但这种强调，却容易导致女性形成自恋人格，这种自恋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绝望，绝望地寻找自我、寻求突破。媒介试图展现这种女性自我突破，但在展示女性力量的同时，也向女性观众施加了年龄焦虑、外貌焦虑和事业、母职等方面的焦虑。

现实当中的女性遇到的困境不一定像影视剧里那么戏剧化，但是会更多元、更复杂。普通女性没有像女明星那样的容貌和财力，不可能通过几天的舞蹈训练就立刻“脱胎换骨”，迎接人气的翻盘，获得各种代言机会。也更不会像女明星那样有团队帮助带孩子处理杂事。更不会像电视剧里云淡风轻的结局，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现实中，职场女性要面对雇主的挑剔和来自家庭的压力。与其说“平衡”或“兼顾”事业与家庭，不如说她们被要求什么都无可挑剔，像超人一样。当求职撞上适婚年龄，生育成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升迁机会也不会平等。不少女性会在30岁怀孕生子前后遭遇被边缘化的处境。智联招聘《2020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认为“生育”是造成职场不平等的首要因素，而男性则认为这是“传统的社会分工”导致的。该调查也显示，女性在家庭琐事上花费的时间远超男性，无论是否生育，都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女性在家庭和职场的夹缝中生存，她们的生活，远远称不上“乘风破浪”，倒是“披荆斩棘”。能不能轻易地说一句“三十而已”，能不能轻松地“三十而骊”，这是摆在所有女性面前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荧幕上网络上可以“导演”出来的。

这些女性题材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所传递的女性观多少还有些价值混乱，这也是当下现实社会中的性别观念的映照。譬如女性审美依然是白瘦幼，今天的“姐姐”无非是昨天的“妹妹”。无论如何，出现这样这些女性题材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都是令人欣喜的，也是某种程度的一种进步。它们的意义在于，让女性群体被看到，尤其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位不同际遇的女性，如何思考、如何转变，如何塑造自己的新生。尤其是找到自己的人生主动权，突破旧有的认知，尝试更多的可能性。也同时可以看到新的女性群像，女性如何帮助女性，女性如何理解女性。当然媒介对于女性题材的打造，尤其是成熟女性题材的打造，还是有进一步的空间。希望每一个女性能够真正摆脱凝视，不受舆论束缚，更有勇气和自信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偏见。女性需要展现坚韧的女性力量，不被世俗所束缚，不害怕被定义，无所畏惧，才能一往无前。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博士生



文：卢丽珊

俄罗斯首先注册冠病疫苗

8月11日，被疫情笼罩的漆黑夜空阴郁而凝重，一则仿如卫星般闪耀和强劲划过天际的新闻，抓住世界媒体和群众的眼球。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更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俄罗斯——相对又穷又落后的俄罗斯，成为全球首个自行批准冠病疫苗注册的国家。

普京总统最高明的做法是宣称自己一个女儿已接种，而且反应良好，似乎还嫌戏剧性不足，俄罗斯以救世英雄的姿态，将疫苗昵称为“斯普尼克（卫星）-V”（Sputnik V）。

斯普尼克1号，是苏联在1957年发出的第一颗进入行星轨道的人造卫星，从此开启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

之后“斯普尼克”就成为苏联宇航成就的代号，也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定符号和思维，来到现代还可能唤起民族自尊。资助疫苗研发计划的俄罗斯主权财富

基金（RDIF）的首席执行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也紧接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宣布宣称：这是俄罗斯的“斯普尼克时刻”。

“斯普尼克”不止上到太空，还深入人心，1967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效仿美国《读者文摘》格式，专在苏联境外出版的官方宣传性杂志也叫《斯普尼克》。这本刊物在新加坡也买到，我年少时看了不少，除了《国家地理杂志》之外，小本装的《斯普尼克》满足了我对苏联的好奇心。

对首发注册疫苗有保留

作为一个持俄罗斯绿卡的新加坡人，我第一时间接到弟弟的简讯，叫我赶紧想办法回俄罗斯找疫苗回来；虽是玩笑话，期望却是血肉般的真实。询问莫斯科的生意伙伴，他说俄罗斯确实已研发和试验两种冠病疫苗。不过，此时俄罗斯人更关心隔壁“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进入失序和流血暴力抗争的状态，情势正在改变俄罗斯、白俄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深远，对于首发注册疫苗倒有点保留，小心表态。

很多俄罗斯人亦对“首发疫苗”新闻不置可否，有些趁机自我调侃一番，出现的搞笑网络视频包括接种疫苗后全家大小都会长得像普京一样，或者接种后逐日“转码”，竟然自动会说俄语了。然而，当我问及当地的医疗界人员，他们基本上对疫苗还是信任的，唯一可惜的是志愿参与接种的人员不多而令外界诟病。

根据德米特里耶夫，俄罗斯当局不认为个别疫苗发展国家，在没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而率先批准有什么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加速疫苗实际推行的速度。他表



俄罗斯疫苗

示，全球有超过20个国家对新疫苗感兴趣，估计十月能进行大规模接种。

截至八月底，注册后的疫苗将为俄罗斯四万名自愿者接种，尤其是高危群如医疗人员和教师。俄罗斯卫生部免疫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拉希姆·哈依托夫说：“尽管注册后临床试验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知道该疫苗可产生良好的免疫反应并产生抗体。它还提供了良好的细胞反应，最重要的是，它是无害的。”

他强调说，新疫苗不仅是另一种疫苗，而且是新一代疫苗。它是在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和免疫学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开发的。

尤其是快进入秋冬季节，第二波感染的威胁何其紧迫，千呼万唤的疫苗消息一出真是如雷轰顶，全球媒体无不争相报道，但是更令人注意的可能还不是俄罗斯到底是不是真成功研发了疫苗，而是迥异的全球反应才是最大看点。是敌是友的分明壁垒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冷战时期。

首先没有捷足先登、成为首个批准疫苗国的美国反应最强烈。虽然总统特朗普在消息发布隔日即温和的给予祝福：“我们对此了解不多，我们希望它能起作用、能成功”，然而，另一厢，刚刚在8月底突然离奇辞职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则毫无保留的否定俄罗斯的研发。她说美国有更优异和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俄罗斯远远比不上，目前美国有六种疫苗进入第三阶段的测试。

欧美国家持怀疑态度

早在八月初俄罗斯未宣布前，美国权威免疫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已对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安全性质疑。疫苗注册后，他表示一般上疫苗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发展，俄罗斯急速注册疫苗举措将“伤害很多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法兰西斯·柯林斯博士，甚至把俄罗斯的举措视为“俄罗斯轮盘”，意指冒险及罔顾审批过程中确保疫苗安全和有效的“基本组成部分”，认为全球每个疫苗专家都会关注这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西欧国家如英法德国也保持怀疑态度，表示没有信心，甚至严厉谴责。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表示，患者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弗朗索瓦·鲍卢克斯也表示，总统普京宣布的决定是鲁

莽、愚蠢的。鲍卢克斯表示，没有经过良好的测试就大规模进行接种，这将是一种不道德的做法。

“世界第一疫苗”后续发展令人屏息期待，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美国家的怀疑和严厉批评，亚洲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境内进行的大规模接种成果，都是接下来的看点。说穿了，首发疫苗以及最终成功生产，意味着庞大的经济收益，当然各国都想抢占市场。

事件也看出苏联解体近30载，仍然和欧美国家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不管是在思维、相互合作及理解的层面，都有待加强和加深。尤其是人类正面对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共享共用研究成果，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并有效遏制冠病病毒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作为“半个”俄罗斯人，我不愿意相信俄罗斯仅仅是因虚荣和抢占市场而抢先注册，而是相信俄罗斯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资源。俄罗斯为人己，都必须以最快速度推出疫苗；截稿为止，俄罗斯占全国染疫人数最多国家的第四名，仅次于美国、巴西和印度，俄罗斯染疫人数超越100万人，死亡人数1万7000，死亡率远远低于上述国家。

在全球精神紧绷、各大经济体四面楚歌、民不聊生的情形下，俄罗斯疫苗若无法达到公众的高度期望，作为一个深具民族自尊的国家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庞大的。

美国免疫专家福奇曾表示，疫苗达到百分之百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只要能达到百分之50至70，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可以批准上市。因此人类得持续对防范和隔离措施保持高度重视，而不是期望疫苗能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以为已经战胜病毒。

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纪病毒战役，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文：陈迎竹

疫情背后的思维探讨



类面对灾难时往往最能凸显内在的方方面面，从知识面、思想意识到潜意识，从道德修养、宗教信仰到人性和本能。对个人来说是这样，扩大到整个社会和国家，又更复杂了，因为千千万万的个体在上述各方面会互相交缠，会有很多冲突、妥协、角力、融合，需要的是人性中的体谅、包容、互助、协力，才可能比较容易渡过难关。不过我们多数时候看到的是人性中的自私面，因而灾难的降临就成为一个社会最大的考验，各种观念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的大爆发。

面对这场全球冠病19疫情，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最为极端的莫过于美国内部。很多研究指出，政治保守的共和党人一般对政治和安全威胁更敏感，冠病疫情被特朗普政府和亲共和党媒体描述成是被民主党和左翼媒体利用来威吓美国人民的武器，以达到左翼

的政治目标。一些亲共和党的知识分子则相信，左翼自由派媒体试图利用疫情攻击特朗普以求达到弹劾他的目的。

研究显示，特朗普政府在起初阶段，很可能是将疫情的严重性认定为左翼和民主党人的阴谋，而低估了真实的破坏力，拖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将医学和科学事务赋予政治色彩，甚至试图加以政治化利用的态度，终于导致美国疫情至今不绝的严重后果，甚至连特朗普自己和白宫官员都发生连串确诊染疫，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美国国内在大流行病面前持续上演的政治角力，其背后牵涉到的，是包括共和党右翼政府决定与左翼进行大对决的战略，而对决的终极对象，则是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右翼保守派相信，美国今日越来越多国民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被崛起的中国蚕食了

该有的利益和权利，甚至在中国的宣传下逐渐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美国产生厌恶之情。

这股意识形态的对决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再次浮上国际政治舞台，冠病19的疫情则在总爆发过程中雪上加霜，让问题加倍复杂化，形势加倍恶化。

除了国际政治间的意识形态，冠病19疫情在医学上，也出现不同阵营的思维角力，最早引起世界关注的是英国如何对待和处理疫情的方法。

英国约翰逊政府最初鉴于英国本土疫情爆发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医疗体系估计难以负担，于是几乎决定放弃“抢救疫情”的行动，提出让老年人躲避，年轻和中年人照常生活、工作的对策，同时避免经济的停摆。这一决策的理由是一旦有六七成人口感染之后，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约翰逊在电视讲话中，甚至向国民预言英国短期内要付出几十万人死亡的代价，以达到群体免疫的结果。

然而这一思维路线的选择却引发极大恐慌，原因包括一：在医学上，无人真正了解这一新的病毒特征，如何能确定它会产生群体免疫效果？二：在政治原则上，民选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宣布放弃对人民的卫生医疗照顾责任？如果一场流行病就可以让卫生部门弃守其天职，让人民自生自灭，战争来了怎么办，更大的天灾降临怎么办？

换言之，对冠病19的群体免疫效果只是医学理论的一种，在约翰逊宣布政府的决策之后，英国医学界就群起质问约翰逊政府，何以选择这一理论而不是积极防疫治疗的理论？这显示即便是科学领域也存在理论假说的竞争，而政治领袖的选择和拍板一旦失误，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半年过去，人们对病毒的了解更多，虽然大规模的感染在很多国家已经发生，全球死亡人数也节节攀升，自然而然的群体免疫依然遥不可及，反倒是主要国家都回到基本面，竞争疫苗的开发与生产。

政治力对医学专业领域的介入或凌驾指挥，也反映在一些国家对是否戴口罩或禁止外出的态度，彼此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医学根据，然而最终事实证明，戴口罩有助于迅速阻绝病毒传播，是更经得起考验的医学常识。

同理，禁止人们外出和聚集，把人类活动空间局限在自家内，在中国武汉“封城”以及湖北“封省”的决定发生之后，很多人才开始发现可以如此大规模处理疫病。

随后，很多国家和城市也在某种程度上跟进，也有改变做法的阻绝方式，但都是同样的医学思维，即阻断病毒的传

播机会。但因为对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播方式还不完全理解，因此应该阻绝和隔离（以及停工停产）到什么地步，国际上和各国内部始终莫衷一是，这也是很多国家内部相继爆发各种矛盾与对立的根本原因。

停工停产以减少聚集的情况，快速演变成很多国家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国家之间停止交流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全世界的经济到现在还在淌血不止。

这一发展背后涉及的思维是人本为主，即以拯救性命为最高原则，生产与经济活动必须在性命（不分职业与贵贱）面对严重威胁时，做出让步。而同样基于人本思想，政府在企业收入骤然中断的时候，必须靠大量拨款纾困，纾困工商业的背后就是挽救工作机会，帮助员工继续领取薪水，维持正常生活，让国家继续运转。

不同国家采取的措施大同小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国家财政的宽裕与否。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和企业高管主动宣布减薪，共体时艰，则是展现一种作为表率领袖意识，这也是领袖是否能体察局势，表现出符合身份同时又契合大众期待的行为。

类似的抗疫与经济孰轻孰重的争议，不时在一些国家内部爆发，但这背后牵涉的思维其实并不矛盾，抗疫与经济发展同属民生的大课题，处理不好都会造成社会民生的困顿。

比较大的争议是在美国之类的国家，由于刚好碰到选举年，左右政党的对立益发尖锐化，要不要戴口罩、是否限制出行、是否限制工厂和企业活动等等，都被高度政治化。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执政的地区各自采取自己的措施，两党支持者也各自以可以区分的行为表态，导致乱象丛生。

总统特朗普始终不遵从医学专家的建议戴口罩，分析家就指出是为了个人形象，也是对共和党支持者心态的判断（他相信共和党支持者不希望看他戴口罩遮脸）。反过来，他的执着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拒绝戴口罩。

至于经济活动，几乎整个抗疫期间，美国各地一直不乏反对限制工商活动和限制出行的示威和对立行动。政治意识的对立完全压倒医学和科学专业精神，这是美国抗疫过程的不幸。

压倒专业精神的过程中，所用理由就是人民的自由选择权，拒绝为抗疫而施行的限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甚至被视为政府企图走向独裁，但这其实是胡乱解读。“自由”观念的定义纵然有很多，但为了公共利益与福祉，短时间内在社群内部的集体行动，并不至于损害个人自

由，也没有证据表明限制措施会导致美国出现独裁政府，在实质上损害人民的自由权利。

哪怕从最严格的定义去看待自由，只要不钻牛角尖，都会接受没有一个社会里的个人可以完全自由。社会（或国家）的运转，需要一定的规则（法律），法律的制定只要符合国家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应该被接受，个人要予以遵守。因此只要制定法律的人是切切实实获得人民委托，就应该得到认可。虽然在委托过程中，也就是民主选举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弊病，但在一定条件下接受现状，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

当然，这里没有否定在两种情况下，违法的反抗也具备正当性，这也是一些政治学理论所认可的：一，在一些民主国家，掌权者过度违逆民主原则，垄断权力，以致在民主制度的底线——选举过程中，产生严重不公平的现象。

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在很多后起民主国家都可以找到，例如把有影响力的反对党人一个个搞到无法参选，最后选民也没得选择，例如柬埔寨。但老牌民主国家的乱象有时候不是人为刻意要制造不公，而是制度本身长期存在的缺失，一直得不到改革修正，而政治人物则利用这种制度漏洞，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就长期被质疑缺乏真正反映民意的代表性。但严格来说，这不能算舞弊。前者的情况，可以说明后起民主国家为什么政治容易动荡，因为人民的挺身反抗从常识上来讲，是很容易获得民间同情与支持的。

二，在一些长期缺乏民主选举事实的国家，权力的延续已经失去代表性和正当性，只能依赖武力维持，人民在某种情况下（例如灾难）的反抗与争取自由决定的权力，因此也在民间具有高度的认受性，即不会引起人民之间的普遍反感。

上述两种情况下的抗争，属于不可忍受。与因为卫生或其他民生问题而遭短暂限制的个人自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为了对抗疫情而刻意违法，就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2020年这场持续一整年的瘟疫，影响范围之大之深，或许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经历的最大灾难。期间受到广泛议论的课题，除了各种抗疫措施的对错、经济政策的有效与否，也少不了关于政治体制优劣的争论。

美国持续以中国制度不透明，信息封闭，导致这场灾难的大扩散，指责中国。中国则为自己辩解，认为就因为权力集中的体制，才能断然决定封锁武汉和湖北，阻绝病毒扩散，并且在武汉内部快速处理掉疫情，在一两个月内大幅降低感染情况；反观民主开放的国家，疫情至今仍失控的比比皆是，中国

在舆论上还为此自豪，并得到海外不少支持观点。西方舆论为此指责武汉在处理疫情期间，真实的死亡等情况，外界至今仍无从知晓，认为这样的制度不足以肯定。

议会选举民主制度与中国制度的优劣，需要从更多面向与例子去论证，那是更大的工程。以一场灾难来论断体制，在证据上当然太简单。就像长期以来都有人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来论证中国制度好过西方，甚至提出“中国模式”的说法。

只要把视野拉大，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比较并不完整，甚至是偏颇粗糙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过去四十年，民主制度的阵营也有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例子，而与中国体制接近的国家，也有经济一直落后的。

同理，这次抗疫，民主体制也有应对得很好的，韩国甚至在这期间举行大选，新西兰10月也举行大选，而其他应对得好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因疫情影响到体制内部该有的争吵或团结。

思想是人类独有的复杂能力，这样的大时代，正适合我们借机会锻炼思考和分析能力，从表面的政治与国际新闻现象，去深入思考背后的论述依据。在庆幸自己躲过病毒肆虐之余，也能有智慧上的收获，这或许是吾人在郁闷的2020年，比较值得欣慰的一点。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文：十 渡

困 疫 四 记

一

外世界，视线所及之处，是这样的情状。

第几天了，某个晨早，远天破晓，阳光微曦，我探目直望而出，对面组屋廊道静寂无人，瓮栽树见得无声的绿，或高或低，阒然不动分列廊道边。

廊道外临区内13号小路……几个月前应居民申诉才修葺一番的行道树已经长回了枝干，逐渐拔高，叶片一簇簇慢慢地又长成了树冠。街灯发光，影影绰绰，竟不觉得绿，其实色泽倒是深浅不一。或嫩或老，就是不如先前的生机。

幸好，我依然看得清外世界的颜色。

其实生机如常，就是宅慌了，生发许多的疑虑。

永远的乌鸦开始了生活，一颗树一颗树地追逐和鸣叫。依然凶悍，不知疫病。或许已经免了疫。

乌鸦羽翼乌黑，不见灿然的色泽。有些部位浅化了去，成了灰色。乌鸦从课本的“慈乌失母，哑哑吐哀音”到袭人撒野、驱逐孩童，霸凌八哥鸽子种种作为，早已失去美好的意象。

乌鸦的叫声高低不一，多带警告，哪怕单调难听。

听出了，就避开吧。夜间外出，就避开了。

夜间到附近小公园散步，当然封上了口罩。

连续几天冷热交迭，想来香灰莉树已经暗香滃漫，满山满岗了。果然是，百米开外，融合

着夜色和微风，香气一层层地从山岗的节能灯色下荡开，涔涔而下，似乎有雨。

比黑板树的香味好。黑板树比较浓郁，有时窒人，晕人。

当下就想起那时的异香。有差别。那是好事。

好不容易呵，我的嗅觉，完善如常。

我看到对面组屋廊道末端那家人黝暗的门洞，铁闸门冷冷地囚着两朵简单的铁花。一朵铜黄色，一朵灰白色，纹风不动。

第几天了，我想，如果写文章，我给那解禁归来的家人说一声什么好呢？

自由的断路。禁锢的自由。铁打的自由花。凝固的自由花。都好，都可以。

换一种劫后的说法——欢迎你！爸爸。妈妈。阿仔。阿因。我想念你！

我想。有时会很沉重无助，有时会很喜悦顺心。

欢迎你们。一切安好。

视觉好、嗅觉好、听觉好。终于一切美好。味觉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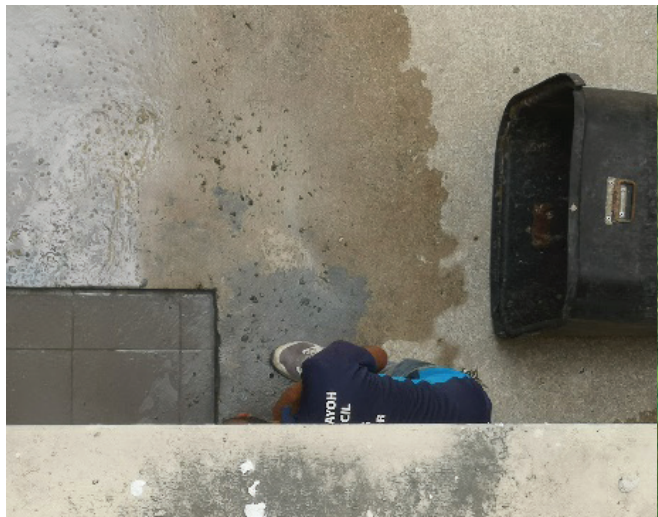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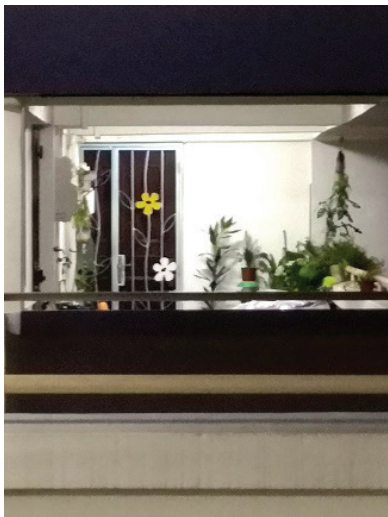
铁花冷冷地等着，自由真不容易呵。

这家人经历了了。

二

外世界，视线所及之处，是这样的情状。

许多天过去了。许多天之前的某一天，隔着客厅铝窗花和玻璃窗叶的外世界，是这样的情状。



依附于四层楼高停车场天台的一侧，电梯工程依然不见得有进展。拖宕了许久的邻里小区工程呵。

正常现象——别太计较吧，时局困难呵。我心想。

以行内人说事吧，工作总要一步一步地协调推进。也许有猫腻，不过正常。

一夜间就围上绿色的安全防护纱网，一层层地裹住鹰架的外围。提醒工作安全的告示牌处处可见。停车场露天楼面搭接电梯槽井，进出施工的那部分甚至围上固定的隔离墙，留了活门，却又堵死了，不让进出。

结构已经都建构好了。屋顶也都铺上了防水涂料，都依了设计的斜度疏水，从远处见不到积水；也都在某处外墙面抹上了细密的灰浆，等着上涂料。有一堵墙就抹了一半——抹了一半下回再续上，那就看那个一口四川口音汉子的功夫。

有一回，夜间九点了，他伙同一众工友都还苦坐路边等着前来接载回宿舍的货车……眼神在手机微亮的视频和路尾拐弯的幽暗街灯下逗转，即将十点了。也不见得紧张烦恼，也许习惯了。

宿舍进出从来不是自由的。大家都明白。能够不控制吗？

也不算大事——就是前些时候有些地方闹了事。都是移动的星星移动的月，红白天地下为了生计讨教了红白的事。有的文明有的不。

于是绿色的安全防护纱网裹住了风月和云雨。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地过去。

不美好，城市停工不是件美好的事，令人发慌，令人烦

闷——我在心底下忐忑不安，好像什么地方做错了。

升旗吧，高歌支持医护人员那事也都在某个夜晚举行了。升旗吧。

后来，后面高楼终于升起一面面的旗，逐日增加。

我看到移民的星星移民的月，红白的天地等着四川来的汉子，还有一帮肤色铜褐、毛发卷曲、长相好看，体格结实的南亚人。

有时，我从客厅外看，总要想起这几个星期下来，他们的遭遇和安危。

客工们，你们还好吧。

三

许多天过去了。

视线所及之处，外世界是这样的情状。

我居住的是那种矮矮四层高的组屋，就躲在某处邻里小区的双向车道边。

从平面图上看就整个正角一长一短两条线，孳生了同样的一栋在另一边，依着两个正直角间一条虚拟的中线在地面层建有一个小小的公园游乐场。

一个楼层算十家，一栋也就三十家人，公用着后面五道竖井当垃圾槽。

客工两人，每天一次，驾着一辆不带车牌的平板低台垃圾车，电池起动，操控着方向盘，或上午或下午，一个个井槽清



理垃圾。垃圾筒拉出来搬上平板车随即换个新筒，有时还开闸启动高处的水管，洗涤槽壁，让污垢随水而下，流出没入地下的疏水管道去。

他们有时探了一整个身体到槽井门边去，有时稍微后退让出了半个身子，一如平时，并不四处张望，偶尔仰首上看，照面见我，嘴角难得地浮现一丝笑意，转瞬即过，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举止。

一显一隐，就让我想起那两个英文句子：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疫情反复，令人困惑的五月啊——两个星期里的家暴事、街市掷物事、裸身寻人事……空气炙热，纷纷扬扬，困得一众城人晕头转向。

干下那么许多事啊，也许事后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

自由的真义小小的亮了一次相，无需课本的注解。

客工，你无名的客工，您好。

in full gear

break you don't

四

许多天过去了。

视线所及之处，外世界是这样的情状。

“断路器” 阻断下了闸，第几天了……

我目睹了最后一天殓丧主家哭棺背立，送走至亲的离去和无奈——都戴上了口罩一色的浅蓝，晃动着半边起身的亡灵也许正困难地认清最后的一面。

也见到在绿树傍着的对街行道上，一个妈妈手车推着宝宝温馨的情状。妈妈封密了一个大口罩，孩子呢，孩子虽然小，也戴上一个小口罩。

孩子的娃娃呢？孩子的娃娃更小。

孩子把她，或他，一手举起，看了看，指着给后面的妈妈看，说了什么。

风吹过树梢，阳光温存罩住，和熙明亮。有蝉声。偶尔有黑枕黄鹂一只一飞而过，啾一声，等着后面又一只。引得孩子抬头寻觅，又给妈妈说了什么，顺手抱紧了娃娃。

此外尽是八哥，或鸽子，从附近屋顶一角扑下，等着什么地尾跟着。

一个妈妈推着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抱着他的或她的孩子——他们从树冠露出一角，在我的视线所及处，慢慢地走到另一角去，徐徐没入午后的静谧中。

妈妈看来挺自在，孩子们看来都没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图：林少彬

困疫写真





／文：黄 葶

樟木飘香

这是一个典型的樟木箱子，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村子里每户人家都有这样的物件。我曾经问过母亲，那么难看的東西为何家家拥有？母亲轻轻拍着我的头笑着说：“伢子，等你长大了就晓得了。”

这个箱子的岁数比我大，我睁开眼睛识别的第一幅画面就是它。和今天一样，它高高搁置在大衣柜的上面，那时的大衣柜比现在的好看，柜身上镶嵌了许多漂亮的花瓣。

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箱子是母亲的嫁妆，是外公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连同这个箱子一起来到我们家的还有它的小伙伴，大小一共四个箱子，被外公称为大四喜。它们散开每一个可以放很多东西，几乎一家人路上吃的用的全部家当都能塞进去。而合起来一个套一个可以变成一个箱子，一点不占地方。

眼前的这个箱子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里面那个小箱子，它和它的三个兄弟随着我们家的迁移，艰难地存活着。几乎每迁移一个地方，它就失去一个兄长。母亲曾



粗略计算过，说它从藏在最里面的襁褓位置到最后的裸体现身，也就十一个春秋。

第一个失去的是体积最大的老大，那一年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还不满四岁。我们家当时住在南京长江边上，一个叫上新河的码头。那一年我总觉得天空上有飞机在不停转圈，轰鸣的声音震耳欲聋，城里动不动就拉警报，然后就是到处躲藏。

每到这时父亲总是一手抱着我，一手拉着哥哥，带着母亲一起往外跑，跑到一个黑漆漆的防空洞里，和许多躲避炸弹的人群挤在一起。此时大人们慌作一团，紧张的不得了，而我们兄弟却觉得洞里很好玩，趁着父母不注意，拉着其他小朋友变着花样玩，玩得很开心。

随着日本人进攻南京的脚步越来越近，许多人都开始逃亡，父亲也做出了出走的决定，放弃了他在码头的营生。一家人由水路出逃，由于船小人多，地方有限，父亲只好舍弃了体积最大的樟木箱子，将老大特别小心地藏床下一个不被发现的地方。其余三个箱子装满逃生所需之物品，与它的主人一起逃往赣州。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投降后，我们才回到南京，然而那个藏在床下的大兄弟早就不知去了哪儿，连个樟木茬子都没留。

母亲知道后很伤心，埋怨父亲为何当年不一起带走？父亲安慰母亲，和死了那么多南京人相比，这点代价算什么？

第二个樟木箱子是在江西送了人。那时我们家已躲到赣州，住在离二孔庙不远的地方。全国大部分南方城市都沦陷了，到处都是血腥的场面，赣州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暂时还算安宁。

相对安逸的日子撑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形势发生了突变。日本军队开始由广东北部向赣州发起了进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天上飘起了大雪，整个赣州城就像披上了一层白霜，山上树上，房

顶田野，全是洁白的颜色。这情景过去了几十年了，至今回忆我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哪个城市有如此的洁白，如此的肃穆。

赣州人早已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大家有秩序地举家迁移，城墙上贴出的公告有一款明确指出：“任何人无论是卡车，马车，必须少拿物件多载人，违者一律充公。”

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又做出了让母亲伤心的事，他很不情愿的放弃了第二个樟木箱子，送给了更需要的流动医疗队使用。自己家里所有的零碎挤进了剩下的两个更小的箱子里。为防止敌机的轰炸，撤退选在夜晚，一家人随着撤退的人流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其实安全的地方只是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了，因为任何一个被称为安全的地方，瞬间就会变成战场。

母亲这次很坚强，一滴眼泪都没流，月亮在闪烁，马车在颠簸，我们兄弟俩在母亲低声的儿歌中安静地睡着了。

我们走后没多久，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本军队如潮水般发起了进攻，他们在赣州遇到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力量悬殊，难看的膏药旗最终还是挂在了赣州八镜台上。章河和贡河的汇合水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鲜血溅满了整个城墙。

剩下的两个樟木箱子陪着我们一起颠簸到了广西梧州，在那里安顿下来后已是次年的夏天。这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水路换公路，公路转水路。马车换了几辆，卡车和船把屁股都坐出了茧子，甚至有许多路由于战事中断而只能步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逃难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也第一次领教了亡国的滋味。那滋味刻骨铭心，一旦亡了国，也就没了家。

这一年的秋天，日本投降了，我清楚地记着那天梧州城的夜晚陷入了疯狂，梧州两岸放起了烟火，鞭炮响彻了一夜。人们喊啊、唱啊、跳啊、舞啊，比过什么节都热闹。确切说是解气，是发泄，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终于胜了！

第三个樟木箱子是随着父亲走的，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刚十五岁，返回老家的父亲突然患病，没有几天的功夫就撒手人寰。他几乎没有时间向我们交待什么就走掉了，感觉父亲就像平常的一次普通远行。

安静的葬礼上，母亲把父亲生前喜欢的物件小心地放进了第三个樟木箱子里，随着他一起入土了。时隔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失去了两个樟木箱子后，父亲很愧疚，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们总有一个人会先走，如果你舍得，就让我先带一个箱子走前面，等有一天，我会在箱子边上等你来。”

我十八岁考取了大学，母亲很高兴，临行前把家里最后一个樟木箱子给了我，以那时家里的状况，这也是她唯一值钱的物件了。母亲再三嘱咐：“伢子，你别看它表面上老土，但它实用，不会生虫，用了你就懂了。”

从那一刻起，这个最小的也是我们家最后一个樟木箱子就一直跟着我，跟到了武汉，跟到了西安，跟到了我结婚生子，也跟到了我子孙满堂。在这期间也搬了几趟家，扔了不少东西，许多今天看来不该扔的都扔了。可这个樟木箱子我却一直保留着，它寄托着我对母亲聚少离多的思念，也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情怀。

母亲是在我的目送下含笑九泉的。八十七岁的老人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送她回老家，说要陪父亲，要和父亲一起守着外公送的樟木箱子。我答应了母亲。三年后我和妻子一同护送她的骨灰去了老家，回到了她老人家一辈子魂牵梦绕的老院子。

走进村口，我发现整个村庄被樟树包围，粗粗的枝干，茂密的树叶，一股一股的樟树清香扑鼻而来。我捧着的骨灰盒仿佛有了声音，也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也听得懂。我俯下了头，仔细听，是母亲在说话。她告诉我，她终于可以不走了，因为她一生最喜欢闻的，就是家乡的樟木飘香。

如今，母亲留下的樟木箱子，静静地搁置在大衣柜的顶端，它的模样在周围家私的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笨拙而沉重。但正像母亲说得那样，它没有变形，也没有发霉，就连里面放置的母亲六十年前亲手做的一双布鞋还依然如故。

是啊，今天看它是有点土，有点笨，可我却觉得它特别亲切，特别熟悉。每当看到它，就让我想起童年，想起故乡，想起由它引起的那尘封已久的故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回首来时路

《怡和世纪》十年



文：邹文学

2010年，怡和轩董事部对其不定期出版的会讯进行改革，将其提升为一个更有分量的综合性期刊，取名《怡和世纪》。迄今历时十年，刊物总共出版了44期（包括前十期的会讯）。

刊物由一群热心的怡和轩会员及准会员先后负责出版工作与发行，他们常年义务为俱乐部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刊物属于赠阅性质，发行量可观，是俱乐部为推广人文建设而对社会所做的一种报效。两三年前转变为付费刊物，发行量锐减。

十年的心路历程

自创刊以来，《怡和世纪》的篇幅逐期增加，从几十页逐渐增至百多页，内容则全面地呈献了综合性刊物的面貌，每期都设专题，每个专题都邀请学有专长的各方有识人士发表见解。此外，也容纳对本国、邻

国和国际时局的分析、对经济的检讨和展望、对文化、历史和人物提出的新见解、以及书籍、旅游和艺术的介绍。

至于《怡和世纪》的编辑方针，可从第16期的“怡和点击”看出端倪。这篇题为《宽可容人 厚可载物》的文章有这么一段话：“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人人有责，人人有份。作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社区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的桥梁，大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扮演自己作为公民社会一份子的角色。公民社会应该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政府与公民社会在讯息的传播方面也应该有全方位的沟通与交流。”

《怡和世纪》的出版，就是要广开言路，容纳非主流观点，从而激发人们对历史与时局的多角度探讨，这样既有助读者开拓眼界，也能加强读者思考深度。那么这些年来，这份非盈利性质的杂志，究竟在哪些领域显得较为特出呢？

精辟的专题探讨

《怡和世纪》每期拟定的专题，都是编辑部经过深思和认真讨论所得，这里且从30多个专题里介绍其中的14个，相信能帮助读者回顾本刊关心的课题。

- 发奋图强、扬威国际——介绍了三位南洋大学科学家的成功故事：哈佛大学心血管基因组主任刘宗正、加拿大病毒研究专家谢华谦、国大生物学系主任丘才良。（16期）

- 在做饼与分饼之间——叶鹏飞主要分析了新加坡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他指出：“由于自由市场



赢者全拿的残酷竞争,使得能力不够或运气太差的人,容易掉入难以爬出的生活泥沼。”谢声远整理的杨南强英文访谈稿补充道:“新加坡应立即推行大规模改革,公民应享有全民医保,建屋局必须放弃市场决定的订价方案……三房式组屋的订价应该是一户人家常年收入的两倍而不是五六倍。”(18期)

• 教改,当聚焦何处——这个专题共选刊了八篇文章,周维介是这样点题的:“时下的教育缺陷,除了受教育者无法独立思考,教育的内容也缺乏人文美学的有效熏陶。”陈经源的一席话也值得大家反省:“我们在教育界的人士,没有毅力和勇气提出对的看法……我在此深深鞠躬以示遗憾。”(19期)

• 为了那消逝的记忆,从死难人民纪念碑列为国家古迹谈起——林清如为我们追述了1963年8月,10万群众出席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的激动场面:高德根大声疾呼:“血债不还誓不罢休!”编委会发表的点击《以史为镜 长治久安》更写道:“殖民地时代的治史态度在现代社会根深蒂固,遗毒既深又广。”文章也严正指出:“纪念星华义勇军的形式和规格显然不能较英军或马来军团的纪念碑逊色。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政府该做的事!”随后,郭文龙撰文响应:《立碑纪念星华义勇军,刻不容缓》(20, 21期)

• 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大学办学理念——王昌伟说:“建国后,包括当下的大学政策,却是由政治意念主导的,其中既有对国家未来的整体规划,也有政党眼下政治利益的考量,却不一定最符合社会的期许和一些普世的理想和价值观。……把大学建设成名副其实的职业培训所……关于真理、关于自由,我们并不在乎。”(22期)

• 历史应该怎么学——王昌伟说:“课本里的历史知识,是典型的官方论述,其中的是非黑白,清清楚楚,没有讨论的余地。……真正有价值的历史教育,应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之外,学习寻找材料,归纳信息,同时进行思考……超越成王败寇的论述,相信真理。坚持理想……。”(27期)

• 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郭振羽说:“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31期)

• 讨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护理——林沛说:“高度强调老年医护是个人责任,意味着对医疗护理公共开支的节制。体现在数据上,新加坡是世界公共医疗开支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加上在公共医疗开支中有一大部分是挹注在急诊医院的,导致老年长期医疗设施的处境更形恶劣。”(35期)

• 关于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纪念——黄坚立说:“把莱佛士的角色,从开埠降低为登陆,彰显了从另一角度缓解紧绷张力的意图。……尽管有内在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冲突,200周年办公室从一开始就做了把新加坡历史延伸至700年前的策略性决定。”林恩河说:“独立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理,很自然地就会作出要全面继承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言。”(36期)

• 针对马国大选,有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解读——潘永强说:“马来西亚的政体被视为半威权半民主……此番成功完成政党轮替,我认为主要归因于三大因素:一、威权体制内部的精英分裂;二、温和派主导的反对党所采取的务实策略;三、军队国家化。”(36期)

• 安得广厦千万间——陈士铭指出:“投资新加坡房地产不是没有风险的,其风险也不见得比投资其他产品来得低。”傅启汶受访时说:“房价是攸关民生大事,政府未能稳住房价,治理国家的能力受到质疑,大选得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37期)

• 邹文学专访癌症专家林子毅医生和杨竣联医师——林医生说:“人们有理由减少对癌症的恐惧,因为癌症不只不是绝症,病人在治疗过程所受痛苦,现在要比以往少许多。”杨医师也指出:“西医采取攻势,中医采取守势,假使病人都能获得中西医两方面的协助,攻守能力俱备,战胜癌症的几率就会提高。”(39期)

•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林沛回顾了二战结束后至五十年代发生的反殖运动的汹涌澎湃过程。四位前立法议员何佩珠、张金陵、陈清动和张福元,通过回忆也带领我们前往60年前的历史现场走一回。林清如还写了已少人听闻的王永元的故事。长河则写了《我所认识的TT拉惹律师》(40期)

• 邹文学专访病毒专家史家海和丘才良——两位专家描述了新冠病毒的特点和战胜这场大流行病须有的信

心。史博士指出：“人类还是有足够的智慧和能耐，逐步战胜微生物发动的战争，只是与微生物病原体的这类战争很可能会是持久战。”旅居加拿大的世界著名传染病专家谢华谦，则为读者全面介绍了人类与瘟疫多次接触的经过，并讲解治疗与预防方法。（43期）

有深度的专访和论述

《怡和世纪》的好些专访和论述，也颇具深度，如：

- 林琬绯在15期写《林少芬的忧患与期许》：“体系里很多所谓的精英，都是一些很会读书考试，很会当官的人，……当放到文化遗产工作，……那就是外行人做内行人的事了。”

- 朱崇科在17期写《新加坡双语精英：善意或虚妄》：“我们今天的华文学习似乎越来越堕入本末倒置的误区，当我们更加强调学习法的时候，更加过度强调轻松愉快……精深的华文学习更应当是精神之旅，在其中有痛苦，有欢乐，有枯燥，但也有充实的喜悦。”

- 陆锦坤在18期写《民主思想不容贬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一个国家在经济崛起后，若还是只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性，而延误了政治改革的时机，那么最终只能走向灾难。’……我们新加坡又如何能从中得到启示呢？”

- 吴新慧和林琬绯针对精英治国问题访问郭建文和何光平的文章，刊登在20期：“在这里，社会地位最终只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地位、财富。结果只能是：同一类型精英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繁殖’，致使社会种种失衡悬殊状态持续加剧，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 第23期刊登林妙娜对前副常任秘书白福添的访问：“以前的民事服务里有着许多巨人，……对自己的信念直言不讳。如果他们觉得部长哪个地方做错了，就会直接提出自己想法，再由部长去定夺。”

- 第24期，接受林琬绯访问的余福金说：“而今四五十岁的一代人，英语成为理所当然的共同语。……共同语不过是使表面沟通更顺畅，却无助于各族群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社会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学校就更应该获得授权负起行塑品格的责任。……如果问我哪里出错了，我会说是教育制度。”

- 第25期，南治国记下的郭振羽访谈说：“方言与

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太过‘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 第28期，杨荣文接受李慧玲访问：“我们庆祝行动党凯旋50年，但是也有另一支也属于爱国者，在当时落败，却为新加坡的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做出贡献。……但是当历史事件太靠近我们，要完全客观相当困难，因此，需要时间的选择。……在大动荡的时代处于失败的一方是痛苦的，并且可能被遗忘。……人世如此，胜利者书写历史。……分析哪一些是为了个人利益，因为贪腐而斗争，哪一些则是因为理想主义而奋斗，哪些人是爱国者，我想这个区别很重要。”

- 林清如在29期写了沈绮颖。沈小姐说：“在中国有很多勇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家都会说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熟的社会里，会有不少艺术家、作家、摄影师、制片人等在推动公民社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

- 30期刊登了冯焕好对本地教育制度的大义凛然的批评：“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断更新，……个人觉得不少新主意是从上而下，只要最高领导有一个念头，说过一句话，唯命是从的左右就根据这个想法去制定改革细节。……岛国实行的政策有时是非常短视，朝令夕改并不罕见，也有些政策在执行时矫枉过正，偏离初衷。”

- 冯焕好在第33期谈论狮城的华文轶事：“我们蛮以为自己当家做主之后，华族语文会更壮大，会结出累累果实；岂料一棵大树的树叶会凋零，花落尘土。殖民地政府无法消灭华文，奈何到了我们自己手里华文反而变得杳无生机。”

- 第36期王昌伟写《当历史遇上权力》：“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的部长和历史学者‘对簿公堂六小时’……部长指出历史学者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否定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这对熟悉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更何况部长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同样带有政治立场。”

- 第37期记录了好几位读者对《怡和世纪》的观感：林任君说：“我高度肯定《怡和世纪》的文化价值。这是

一个高水准的综合性刊物，既有课题的广度，也有内容的深度，无论在知识的传播、思想碰撞、观点交流、文化传承、在历史的补白上面，都扮演了正面的角色，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郭振羽说：“我很早就注意到并很忠实地阅读《怡和世纪》，就跟朋友说，这么高质量的内容，在新加坡何以为继？”李慧玲说：“《联合早报》和其他一些报刊，都在这里生存，形成整个文化生态。这个生态需要多元，特别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需要互相的支援。”黄坚立说：“现在有了这个平台，让我们英文界跟中文界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使到两方面能够有接触，有交流。”

- 第40期王昌伟指出《如果掌政者有私心怎么办？》：“质疑掌政者的意图的言论，即使在法庭上，也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不过，在法案下，部长显然可以决定这样的言论属于哪个类别。”

- 第41期，三位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专家陈有利、杨荳善和赖启健指出：经济发展与古迹保护是一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有些领导人没有保护古迹的观念，而一般人民要拥有这种观念更须要长时间培养。

- 第42期，佟暖访问了陈六使的孙子陈锡远。陈先生不无慷慨地说道：“许许多多早期南大学子始终不忘毁校之痛，……别人对南大校史最终会做出怎样的论断，我管不着。我想说的是要恢复我爷爷贡献教育事业的声誉。”三位南大的马国校友朱乾海、余国隆和沈纯良，也接受本刊专访。他们是以在科学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就贡献国际社会，为母校争光，这证明当年各种对南大的污蔑和攻击，都是刻意歧视和不公平的。

文史探索与时局评述

刊物选登的好些文史探索与评述时局的文章，皆含作者的独特研究心得，值得读者再次阅读。相关作者是周维介、林恩河、林少彬、吴庆辉、郭振羽、王昌伟、冯焕好、林康、黄有光、陈定远、廖建裕、李楚琳、黄彬华、叶鹏飞、陈迎竹、潘永强、何启良、陈丁辉、潘婉明和姚梦桐等。这里谨列举其中几位作者的文章为例：

周维介艰辛整理史料后撰写的新加坡文化史文章，内容丰富，意涵隽永，如22期《半世纪前新加坡的马来文天空》、23期《反黄运动一甲子》、……30期《华校生

的职场路》、32期《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及42期《随政治跌宕的华校历史教科书》等，都见证了作者花费的一番心血，以及敢于对不平事物发出的铿锵之鸣。举26期《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一段话为例：“特选学校贴上了华校特质的标签、讲华语运动打着取代方言的旗号，双双吸住了人们的眼珠——当负面的情绪面迎诱人的烙饼，这纯属巧合，还是一套技巧地舒缓情绪的政治平衡术？”

也署名河洛郎的林恩河，考证了许多新资料包括解密档案后，在本刊发表了多篇与主流历史记载有异的新加坡史的文章，如26期《绘制新加坡拉》、30期《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31期《马来亚的国家想象》和34期《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等。他在29期《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作的资料分析，推翻了执政党当年许多有关合并问题及全民投票的说辞。

林少彬是以多篇日本占领新马时代的揭秘文章引起坊间注目。他在38期揭露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研发细菌战的第一手资料：“新加坡医学院大楼……在新加坡沦陷后，被一群妖魔所占领，利用这里良好的医疗设备，再加上柔佛淡杯的精神医院，组成了一个制造杀人细菌炸弹的供应链！”他的其他史料研究，包括29期《重温二战历史》、41期《马来亚华人大屠杀真相》等。

展望未来

怡和轩董事部当年决定出版综合性文史期刊《怡和世纪》，目的在于配合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特殊作用的民间团体的转型，为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这些年来这份刊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许还未有定论。有如2015年林清如总编辑为《百舸争流—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的出版接受访问时所说：“谈到文化转型，虽然是上了路，我们是否成功转了型，我可说不定……怡和轩当然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光辉，她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客观环境的演变。……怡和轩如何继续保持超然的态度，那就要决定于我们大家的胆识与魄力了。”

作者为本刊编委

珍重 再见

十年征途，砥砺前行，不忘初心。

无奈时过境迁，人事已非，难以为继。

告别读者，道一声，珍重，再见！

本期之后，《怡和世纪》编委会卸下担子。

对于常年为本刊撰稿的各方人士、忠心支持与关心本刊的广大读者，

同仁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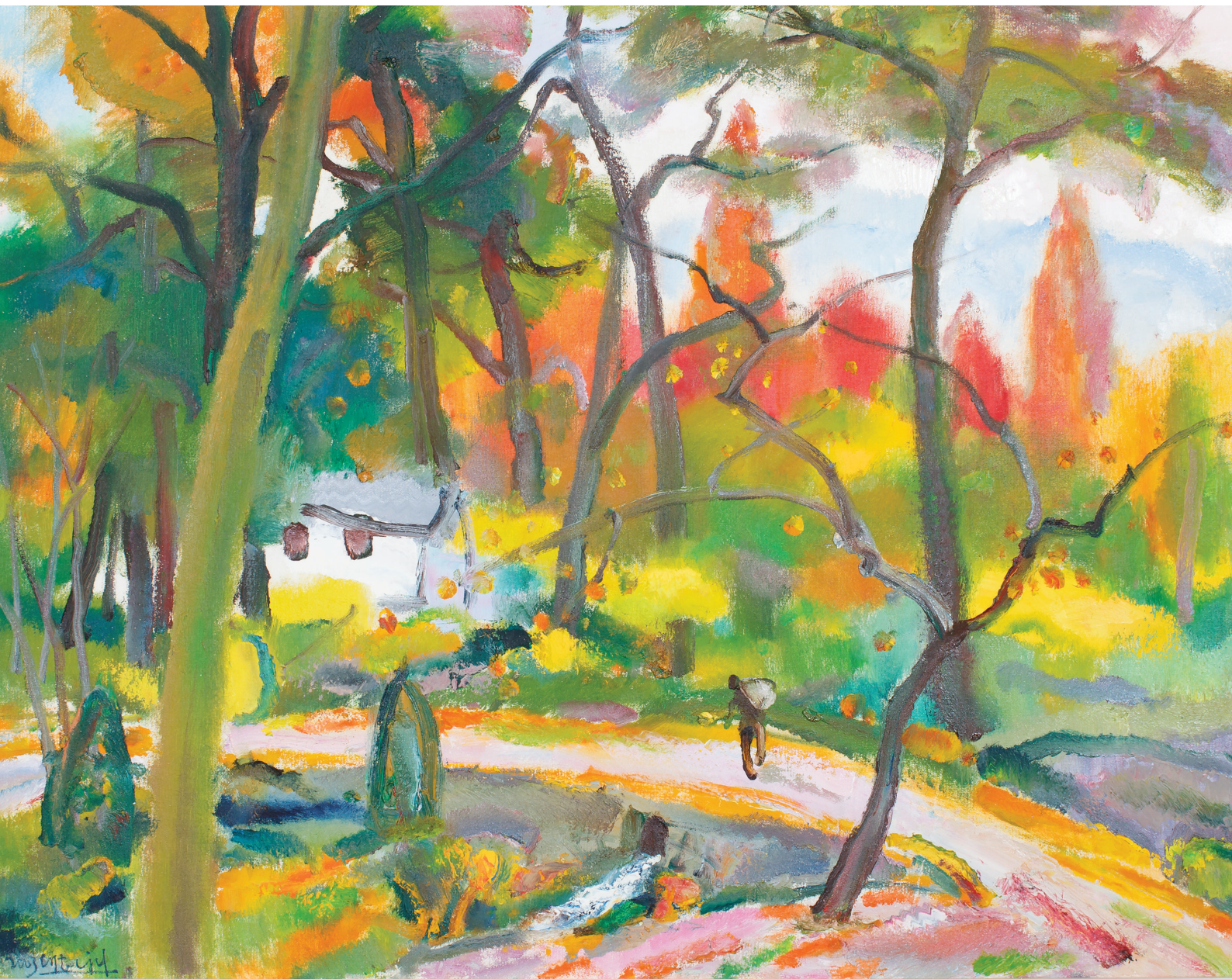
《怡和世纪》编委会

敬启



“抗战输血线”滇缅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

陈钧德
Chen Junde



金秋写意 Autumn colours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70x90cm